

芦笛文集

统独之争

芦笛 著

TONGDUZHIZHENG

台海风云|民族问题

统独之争

芦笛 著

目录

第一篇　台海风云

第二篇　民族问题

第一篇　台海风云

枪杆之邦，其能久长？

拙文《谎言之邦》在《华夏文摘》上发表后，其中“李登辉的‘两国论’是实话”这句实话触怒了爱国志士们。有位愚言先生随即在该刊上撰文驳斥，捎带著来了一番自以为俏皮的人身攻击，对於后者，本人不与他一般见识，但觉得他的观点有极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在此做个回应。

愚言说：“李登辉说的两国论，是不是实话呢？根本就是睁著眼睛说瞎话。不信您去看一下中华民国的地图，那上面不光有大陆，还包括外蒙呢。您啥时候看见台湾岛与大陆之间有条国界了？……按芦先生的意思，美国西方应该最讲实话了吧。可为啥他们也不承认两国论？”

所以，两国论之所以是瞎话，第一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与中华民国重合，第二是因为国际不承认。

这两条东西可以成为理由，实在让人无从捉摸愚先生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愚先生的那个包括大陆和外蒙的大中华民国，二蒋叫唤了几十年，越叫中共心里越喜欢。如果李登辉不是从二蒋的立场上后退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以及愚先生又何必暴跳如雷？李登辉口口声声“治权不及于大陆”、“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愚先生何以充耳不闻？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请问谁是省长？如果两国是一个国家，请问谁是伪政权？如果以民选为法理基础，中共是否应该被人家统一过去？如果论正统，中共不过是一个苏俄豢养的以暴力夺权的叛乱集团而已。其实，两

个或多个中国并存的局面古已有之。秉承“正朔”的蜀汉的地图从来覆盖魏国，连名义首都都在长安，武侯《出师表》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就是证明，愚先生能据此否认它是一个独立国家麽？至于大陆与台湾的国界，愚先生要想知道它在哪儿很容易，到厦门去走一遭就行了。

关于国际承认的问题，愚先生是否知道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中共建国後十多年内只有二十来个国家承认，也不为联合国接纳，而台湾当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如果以国际承认为准，请问那时谁是“明媒正娶”？一个堂堂的统治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管辖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被中共送了数十万平方土地给邻国）的政权，居然会在二十多年后才“过了明路”成了“正妻”，被国际社会接纳，这在世界史上还是未之前闻，愚先生能解释这种怪现象麽？如果国际承认真是那麽生死攸关，我们的“国庆”是否应该改为联合国承认中国的那一天？当然，美国当年阻碍中共进入联合国应该被谴责，根据同一道德标准，我们是否也应该谴责中共不遗余力地封杀台湾的外交空间？如果没有中共恶狗拦路、甚至流氓气十足地动用安理会否决权来惩罚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你道台湾没人承认麽？

其实，愚言一点也不糊涂，他关心的根本不是什麽真话假话问题，而是“国家统一”。他说：“大陆不让台湾独立，就是怕大陆本身分裂。您说李登辉是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是冤枉他了吗？”这就是说，哪怕台湾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为了大陆不分裂，是谎话也得坚持到底。为了避免大陆散架子，就得拿无辜的台湾人民祭刀，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你要说那太不公道，根据愚言，世上根本就没有这麽个东西。他说：“其实，咱们用不著去长篇大论地证明西藏、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证明了有什麽用？……当年大英帝国殖民五洲，如今美国称霸世界，一句话，国家强盛使然。”

这就是说，要维持国家统一，索性连谎言都用不著，专靠暴力就行。强权出公理，只要你拳头大，不管别人服气不服气，天下照样是你的。所以，管他西藏、新疆、内蒙是怎麼来的，只要握紧枪杆子，“我是流氓我怕谁？”

此话当然既痛快，又有理。正如愚先生指出，美国的加州、夏威夷（按：夏威夷是住民自决加入美国的）都是抢来的。他还忘了或是不知道俄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领土也同样是抢来的。可惜要这麼做，我们就得学人家的榜样。大英帝国垮了而俄罗斯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因为这两个大帝国当初开疆拓土的作法不同。俄国人每到一地，就把当地土著赶走或杀绝，将俄罗斯人迁入，而英国人只是向当地少量殖民，留下土著不动。如果我们要想长久维持国家统一，就得把西藏、新疆、内蒙的“少”数民族全杀掉或赶走，来一个米洛塞维奇式的“种族净化”。请问愚先生，您的治国方略里是否有这麼一条？

如果不这麼办，单靠武力压服在“国家强盛”时固可“使然”。问题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早已病入膏肓，五痨七伤，随时随地都会散板。一旦有风吹草动，神州大地就会化作前南斯拉夫式的种族仇杀的屠场。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空前的民族灾难，我们从现在起就得放弃枪杆子拜物教，面对现实，缓解矛盾，著手修复民族创伤，实行民族和解，实行真正的民族自治。其实，现在这麼做已经为时太晚，但做总比不做强，至少它可以减轻迟早要来的那场大灾难。世上没有千年帝国，于今硕果仅存的就只咱们这家。有识之士必须防范于未然，力争把一个腐败的垂死的封建帝国和平转化为民主联邦或邦联。

海外主张台湾回归的精英们自己带头搞分裂，不呆在国内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相统一，却叛国叛党，投入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的怀抱，一面却又要让三千万台胞回归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好不

容易才离开的国家。这算不算人格分裂？笔者在此建议：凡主张台湾回归者，自己先回大陆去，凡主张以武力荡平台湾者，统统报名去参军！倘没有道德勇气
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趁早免开尊口。慷他人之慨，流他人之血，不过是卑劣的懦夫行径而已。柴玲一类英雌（雄）好婆（汉），什麽时候才在中华大地上绝种断根？

其实，本人反对武力进犯台湾，完全是为中共著想。什麽叫纸老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是纸老虎。国家如今百病丛生，社会矛盾、经济危机、民族矛盾、浊浪排空的全党全民腐败、亿万“盲流”大军、千万失业大军、法轮功……，简直是危如累卵。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就是坐在火山顶上，不知道那一刻粉身碎骨。在这种情势下，能偏安一时就已是阿弥陀佛。海外学者们却还倚冰山如倚泰山，发梦去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伟业！其实，中共武力犯台之日，即是国家解体之时。

这一点，台湾人心中雪亮。据说李登辉对人说，大陆真要犯台，我们豁出去几十亿美元，花一亿收买一个军长就行了。以共军今日之腐败，又有谁抵挡得住这银弹攻势？

“志士”祸国，尤酷烈于汉奸，书生煽情，恒嫁祸于苍生。这就是上世纪中国历史的总结，它大约还将是本世纪中国的痛史。

2000 年 2 月

领袖的心事，民族的梦魇

象我们这种国家，政府的本份应该是百事不问，勤勤恳恳地胡吃海嫖。怕的不是政府不做事，最怕的是政府太热心做事；怕的不是碌碌无为，目光短浅的庸主，最怕的是野心勃勃，雄才大略的英主。

一位斯大林的传记作者说过，大独裁者都爱搞修运河、建大坝一类浩大工程，因为那是他们个人的丰碑。一般人都还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何况是帝王。越是雄心勃勃的君王就越是不守本份，以为“地球是颗红玛瑙，我爱怎雕就怎雕”。为了秦皇的开边万里，小民们只得用自己的血肉筑成长城。为了隋炀帝到江南巡幸，小民们只能为他一锹一铲地挖出大运河。为了前工程师李总理建成世界第一大电站的雄心，小民们只有挥泪告别家园，流落天涯。

西方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君，一个是据说为了寻开心而放火烧掉罗马城的罗马皇帝尼禄，另一个是说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前者据现代学者考证是一桩冤案，后者比起咱们的领袖们来真是何足道哉！路易毕竟还生有所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是无所畏惧的。当年伟大舵把为了抢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可以发动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跃进，后来又将与赫鲁晓夫的个人恩怨升级为国家冲突，一度把全民引到了核毁灭的边缘。仅仅是因为猜疑刘少奇要在他身后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他就有本事发动文革，把党国机器砸个粉碎，驱使全国人民去做他权力斗争的炮灰。正如他在八大讲话中说的，如果人类死得只剩三分之一，

换来社会主义在全球的胜利，这还是划得来的。什麽国家的前途，百姓的性命，在他手中不过是用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纸张与画笔，画废了就扔掉重来。

熬过了英主的时代，好不容易迎来了庸主的时代。尽管许多人对江总爱卖弄小聪明颇有微词，本人却一向看好这位新皇帝。当然，在重大外交场合“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是失之轻佻，在与外国元首会谈中突然用英文背颂林肯的演说也是莫名其妙，动辙背上一段唐诗宋词或是即兴吹拉弹唱，更欠缺七旬老翁的稳重，且不说是大国元首的风度了。不过正是这种维扬小才子的小风头才让人放心：好歹它使敬爱的江总更象李隆基、李煜与赵佶那样的风流天子，不象“力拔山兮气盖世”与“威加四海归故乡”的恶霸与流氓。伟人只是在史诗中和舞台上夺人心魄，在现实生活中只能让生灵涂炭。草民百姓宁要搔首弄姿的小风头，不要改天换地的大手笔。

不幸的是种种迹象显示这位才子皇帝不甘心只当个守成的太平天子，想升级为毛、邓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典上，总书记穿上毛制服，鹤立鸡群地潇洒走了一回。在《祖国颂》最后一幕中，他老人家的画像赫然出现在象征伟大祖国的巨轮上，风风光光地当了一回率领我们乘风破浪的次伟大舵把。

可这“第三个里程碑”却不是在舞台上糊弄糊弄就能当上的。毛是打下我党江山的“千古一帝”，邓不但是开“国”元勋，更是拨乱反正、首倡改革开放、引导我党走出死胡同的明君。江总呢？他老人家抗日战争没有吃过糠，“解放”战争没有渡过江，“抗美援朝”没有负过伤，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再吹也是总设计师的遗荫。说来说去他的个人贡献似乎只有“三讲”——林副统帅“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的拙劣翻版。就连香港、澳门回归，都还是赵紫阳手上办的。江总究竟能有什麽政绩让百姓地感恩戴德地山呼

万岁，让政敌死心塌地甘拜下风，让自己的伟大形象在青史上万古流芳？

答案是——打台湾。

这对於奠定江总的权位乃至于他的历史地位，看来都是一本万利。如果打下了台湾，对党，他可以证明江核心完成了连毛、周、邓等伟人都无法办到的伟业，将革命真的进行到了底，消灭了我党七十多年的宿敌；对民族，他完成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首次完全统一，其历史功绩远非割据一隅的郑成功可比；对军队，他可以一洗以书生领军的不痛快，真正过一回三军统帅的瘾；对国际，他可以傲然宣告“中国人民彻底站立起来了”，将中国首次变成统治波浪的强国。从此他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逼宫，他要当仁不让地成为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个终身元首。

然而这真的是一本万利麽？跨海作战如果真的那麽容易，当年横扫欧陆，所向披靡的德军为何隔著窄窄的英吉利海峡就是不敢过去？为什麽拥有绝对海空优势的盟国要苦心经营那麽多年，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舰队和轰炸机群后才敢在诺曼地登陆？台湾海峡比英吉利海峡宽上许多倍，不说腐败的共军的士气恐怕连当年满清的绿营兵都比不上，其机械化程度比起当年的纳粹军队和盟军又如何？当年“教训”越南时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还不曾经商走私倒股票，打的还是越共的地方部队与民兵，那场仗还打得洋相百出。一个手持四零火箭筒的单兵就能消灭我军的一个坦克营，逃掉的惟一一辆坦克驾驶员居然就此成了战斗英雄。如今我军经受过商品经济大潮洗礼，难道战斗力反而突飞猛进了吗？

打台湾，无非是三种结局：征服全岛，相持不下和大败亏输。后两种结局一定导致台湾宣告独立，敬爱的江总也要作为逼反台湾，使祖国永失宝岛的罪人而永垂青史。

要征服台湾，共军必须有绝对的制空权、制海权和强大的后勤运输能力，才能确保不仅抢滩登陆一次成功，而且能维持一波接一波的攻势，保住和扩大滩头阵地。站稳脚跟后，主力部队要迅速向纵深挺进，攻克占领战略要地，包围、消灭对方主力，最后还要占领城
市和广大乡村，粉碎一切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切都得在美国不干涉的前提下进行。哪怕全岛都基本征服了，如果久围某城不下，或是阿里山中的游击战此起彼伏，共军的战争罪行都会在全世界电视机和电脑屏幕上充分展现，再加上无数难民淹没东南亚，美国和西欧在台投资化为轻烟，日本和东南亚经济危机再度爆发……。美国民族的民族性，是喜欢扮演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大侠。利害与道义所在，这位龙头老大又岂能坐视？只要一只航空母
舰特混舰队在海峡中出现，共军的补给线就会被切断，远悬海外的孤军就得弹尽粮绝。到那时难道真的以卵击石，用核弹去袭击洛杉矶，换来对方的全面核打击，使中国从地图上消失不成？

其实，这里的设想完全多余，共军哪有能力去抢滩！据美国中情局透露，南京军区一次最多只能让四架飞机同时升空，再多就照应不过来（见《多维网》）。据《工人日报》，参加“国庆”阅兵的飞机居然有一架几乎机毁人亡。这还是千里挑，万里选选出来的尖子，平常不知道怎麽练了又练。难道敬爱的江总竟要靠这种不戳都穿的纸老虎去征服波浪？既然志在“第三个里程碑”，为何忘了伟大舵把的教导：“不打无把握之仗”？

充其量，北京只能发发导弹和（或）封锁台湾，指望著娇生惯养的台湾人屈膝投降。但以导弹滥杀平民毁坏财产，以封锁造成台湾经济破产，不仅会诱发国际性经济危机，激起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弹，更要激起普通台湾人对大陆的深仇大恨，最可能的结局是大陆使完程咬金三板斧后难乎为继，而赢得世界人民普遍同情的台湾宣

布独立并加入联合国。那时大陆欲战不能欲和不得，敬爱的江总只得在一片指责中黯然下台。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结局。战争必然导致台商、外商纷纷撤资，高昂的战费必然耗尽二十年来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本，台湾空军可能轰炸沿海的发达区域包括上海，这一切，加上国际上的经济制裁，必然使已经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大陆经济破产，将大量破产的国有和三资企业的员工和股民们抛向街头，使原来就已千钧一发的阶级矛盾、党民矛盾、干群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达到总爆发的程度。当民众最初的“爱国主义”狂热过去后，他们会痛感战争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等一切灾难，而将怒火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政府。就象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俄国和德国的人民革命一样，受过文革武斗训练的、有数千年造反杀人的深厚传统的、容易冲动发狂发昏的昏庸、幼稚、愚昧的中华民族会再一次揭竿而起，把神州大地化为内战的修罗场。

江总去年与《时代》杂志记者谈话时，坦率承认了国内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危如累卵的险恶局势，并说明这就是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原因。奇怪的是，不能实行民主，却可以去冒更大的风险打仗。放著太平天子不做，却要去玩火当亡国之君，在本当含饴弄孙的七十高龄去学伟大舵把畅游长江！可惜今日之君既非昨日之君，今日之臣亦非昨日之臣，今日之民更非昨日之民。伟大舵把赌得起，您老人家赌不起。赔了您老人家的身家性命是小事，让十二亿愚民陪葬，这风光也就太大了些。

邓公虽然大约连一首唐诗也背不出来，也可能从未听说过葛底斯堡演说，他仍然是中共中绝无仅有的杰出之士。其原因很简单：他当年在四川茶馆里学到的 common sense 超过了一切马列教条或是圣约翰大学里教的洋玩意。他知道要当中国的明君很容易：让老百姓吃饱饭就行。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无论是姓社姓资，无论是民主

君主，草民都会竭诚拥戴。悠悠万事，经济为大，吃饭是个纲，纲举目张。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可以让路：国际上可以韬光养晦不当头，国内可以裁军削军费。这种平凡的 common sense 之英明，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苏联垮杆就可以看出来。

邓公尸骨未寒，江总就改弦更张。国际上为新南盟强出头，国内大买军火想做苏联第二。可没有金刚钻，我们揽得下那个瓷器活吗？上次一口咬定人家蓄意炸咱们使馆，闹了半天虎头蛇尾，悄没声息了事。如今又嚷嚷打台湾，这次要是又一次“狼来了”，国威军威何存？成天威胁著要饱以老拳，要让台湾人民不恨大陆，成吗？逼著台湾人民一步步走上独立的不归路的民族罪人不是别人，就是崇拜枪杆子，梦想以落后征服先进，以野蛮战胜文明的中共。

2000 年 2 月

我欲因之梦琼台

台湾大选马上就要揭晓了。看了一下《多维新闻网》的问卷调查结果，宋楚瑜得分第一，连战第二，李敖第三，陈水扁第四。看来答卷的多是大陆人，爱憎分明。阿扁竟屈居毫无希望的李敖之后，可见不得大陆人心。连战是李家班的二爷，憎屋及乌，恨李登辉连带着把他也恨了进去。

可惜台湾人却不会这么看。国民党百年老店太陈腐，黑金政治黑幕重重，百姓早就渴望清洗一番污浊。再说，选民犹如观众，来回看几张老面孔迟早要生腻。我要是台民，我就不会选连战。而宋楚瑜贪污案的曝光正打在要害上。所以看来还是阿扁胜算最大，何况他又有了李远哲的支持。台湾民众秉承了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连区区博士都要称为“博士英雄”，何况是诺贝尔奖获主这种超级英雄。有这样的人物挺扁成圆，阿扁的赢面甚高。

其实，选上了谁并不重要。无论是谁当选，都不敢把台湾装在托盘里，毕恭毕敬地献给中共，这就是民主与独裁的区别。无论是陈，是宋，是连，都不会象当年的毛、周那样，谈笑间就把几十万方公里的土地送给外蒙、苏联、缅甸、巴基斯坦、印度等邻国。开天辟地第一次，有那么一部份中国血统的人当了自己的家，向世界证明了华人有能力象白人那样自己管理自己。从今以后，民主再也不是白人的专利，华人的梦想。世上总算有了一个华语国家，那儿再没有“大救星”、“万万岁”、“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英明领袖”、“总设计师”、“核心”等等作

为全民口号的无耻话语。开天辟地第一次，华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免于恐惧，免于崇拜，免于敬畏，免于被迫信奉某种荒谬教义，免于时时刻刻与这个或那个狗屁“思想”、“理论”、“学说”和黑社会“中央”保持一致，伸直腰象个人一样自由地呼吸。

英国民主制度的确立，经过了一次内战和几百年的缓慢演化；法国民主制度的实现，代价是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印度、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制度全靠外国的征服与占领；在中国，自晚清宪政运动起，为了圆民主梦，先贤们折腾了一个世纪，血沃中原，尸积九州，换来的是让国家堕入更深更黑更无从自拔的深渊。而发生在台湾的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竟只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就这样平平淡淡、悄没声息的发生与完成，没有响一声枪，流一滴血！

这才是真正的台湾奇迹！

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台湾人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他们以高度的胆识与智慧实现了我们没有本事实现的梦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台湾人的贡献，因为他们用事实驳倒了“民主不适合中国民俗国情”的先验认定。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台湾经验，以普及教育、地方自治等和平渐进的手段去开发民智，为奠定民主基础踏踏实实地下水磨功夫。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为台湾人祝福，祝他们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好，祝愿台湾的今天，也就是我们的明天。

不可否认，李登辉堪称台湾的华盛顿。虽然蒋经国的“解严”、“解禁”为后来的民主改革作了关键的铺垫，如果他象中共领袖们那样将一己之私凌驾于党国利益上，仍然完全可以在接班后故步自封，稳稳地开他的万年国大，做他的终身总统。但是他却毅然把台湾领上了民主的康庄大道，使台湾以新兴民主国家的崭新形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正是这种新形像救了台湾。美国本来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在尼克松－基辛格时代就准备牺牲台湾，拱手让中

共将台湾吞并过去。如今台湾不但幸存下来，而且面目一新，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令人厌恶的独裁政权，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以其清新形像赢得西方国家的普遍好感。尽管出于利害的考虑西方不敢开罪中共而与台湾建交，但中共如胆敢犯台，就将自绝于文明世界。民主是西方世界的政治宗教，无论怎样利欲薰心，没有哪个西方国家会无视中共对他们的基本教义的赤裸裸的侮犯与亵渎。李登辉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在盟友抛弃、强敌压境的危急存亡之秋，把台湾领出了内外交困的“埃及”。

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将李登辉恨之入骨。正因为如此，无论何人当选，中共一定要“解放”台湾。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民主的台湾成了一面镜子，纤毫毕现地显示了独裁的中共的丑陋；民主的台湾犹如黑夜中的一星灯火，时时刻刻提醒中国人民他们原可以有别种体面的像人的活法；民主的台湾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以淫威相屈、为厚利所动、拿人民利益作肮脏交易的独夫，使得中共“一国两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妙计落空。

中共的反应不奇怪，老百姓的热烈拥护也不奇怪——我们当年不也这么热烈欢呼、坚决拥护过从“三面红旗”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共的一切决定吗？奇怪的是海外精英们也一致喊打，似乎新的内战是民族的福音。当然，喊打的动机形形色色，最主要的还是因嫉生恨，是“我穷不要紧，但你决不能比我富”的共产心态的典型流露。最近某位先生竟在《多维网》上一面盛赞李登辉实行民主的历史作用，一面又谴责他是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其理由是他扔下大陆人民不管，只顾台湾人自己的利益。以那位先生的明达，却看不出这是李登辉唯一的明智选择。以台湾的弹丸之地，难道还能反攻大陆，解民于倒悬？莫非因为大陆人民受苦受难，台湾人民就丧失了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权利？难道得跟大陆捆在一起同归于尽，才不是民族的罪人？

至于“大一统”的“民族大义”更不值一哂。两千年前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翻译为现代语，就是“民为贵，国家次之，党为轻”。只要百姓生活幸福，是活在一个还是几个国家又有何区别？大一统除了满足君王的征服欲与虚荣心，对老百姓又有何好处？如果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不是让大一统捆死了几千年，华夏文明早就超过了欧洲文明。论者常以欧洲今日求统一来证明大一统之伟大，完全是夏虫语冰。欧盟是民主基础上的自愿的松散联合，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经济共同体，与我们那种以暴力维持、靠谎言黏结的帝国不可同日而语。

其他种种担心，如害怕台独引起连锁反应，导致大陆瓦解，台湾成了敌国，成了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等等，笔者已经在别的文章中谈过。此处不再重复。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我们都必须看到，和则两利，打则两伤。打台湾，将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自杀行动，它将为中华帝国钉上第一颗棺材钉。战争不仅将彻底毁掉台湾人民荜路蓝褛五十年建设起来的幸福家园，打掉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年积累下来的一点可怜家当，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伤亡，让千千万万的百姓失业破产，让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倒退五十年，让中国再做国际孤儿，而且更可能触发内乱，将中国再一次沉入血海。倘若内战中某个疯子兼流氓动用核武器，民族的大限也就到了。

我总要上下求索，求得一种最黑最毒的咒文，来诅咒那些丧心病狂、良心死绝地煽动甚至胆敢发动新的内战，将整个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的疯子们！

2000 年 3 月

北京不相信“双赢”

我认识的台湾人，都有一种大陆人身上见不到未凿的天真。有的台湾网友对大陆人没有“双赢”的观念十分困惑，以为那是过去冷战思维的惯性存留；他们甚至还想说服大陆人，让他们相信美国人只是想在大陆赚钱罢了，其实并没有什么征服中国的野心。这些人以为大陆人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他们对正在磨拳擦掌、要去“统一”他们家乡的同胞是何等缺乏了解。套句斯大林的话：咱们的脑袋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和世上别的地方能见到的样本截然不同。咱们第一不相信世上有“好心”、“善意”；第二不相信世上有“双赢”这档子事。第一个特点已在拙文《毒眼》中说过，此处讲讲第二个特点。前苏联有部电影名叫《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而咱们的首都不相信妥协。

“妥协”这个词不见于古籍，文言中也没有意思类似的字汇，大概是新文化运动时造出来的新词，说明老祖宗们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这也毫不足奇。本来，全部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建立在“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基本假设上，君臣之间、君民之间、臣民之间只能是绝对专制与绝对臣服的关系。倘有争端，则一定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冰炭不容，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甭说“双赢”，就连“双活”也是“老猫嗅咸鱼——休想啊休想！”胜利一方，一定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斩尽杀绝，除恶务尽，斩草除根，车裂大辟，去势敲膑，灭族弃市，食肉寝皮，犁庭扫穴，“恨小非君

子，无毒不丈夫”，“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以免养虎贻患，姑息养奸，让对方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虽然圣贤之道讲究“中庸”、“忠恕”，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也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但几千年来谁不是说归说，做归做。《三国演义》上曹操道：“宁使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虽是小说家言，却是放之二十四史而皆准的真理。慈禧太后的名言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要让他一辈子不痛快”。一名太监下棋时说了一句：“奴才杀了老佛爷的这匹马”，竟被拖出去活活打死。等到伟大舵把当了家，老佛爷的风范便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用敬爱的林副统帅之子林立果殿下的话来说，他是“一旦得罪人就得罪到底”。彭德怀几句语气温和的忠谏，就挣来个十年后冤死铁窗；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一句对“三面红旗”要“五、六年后再来作结论”，就被怀疑是要在毛死后当“中国赫鲁晓夫”，一个数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此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被活活整死不说，连他在中南海的住宅都用推土机铲平，真正做到了古话说的“犁庭扫穴”，让整个人在世间的存在“事如春梦了无痕”。当年敬爱的刘主席在开封头发胡须长到一尺多长、裸着下体、椎心泣血、魂归离恨天之时，老佛爷的那句最高指示不知是否在他的心头翻来滚去，让他扼腕痛悔六四年与毛的那场争执。

君王如此，百姓又何尝不如此，有时连智者贤臣都不能免俗。平定发匪的名臣大儒曾国藩，竟因有一把好快刀而被百姓唤作“曾剃头”。鲁迅立志以杂文医治国民劣根性，却又专门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提倡“打落水狗”，帮着制造出一种在文革时达到高峰的烈性传染病来。那时亿万群众奋起痛打落水狗，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此外还有“炮轰”、

“火烧”、“油炸”、“砸烂狗头”等诸般花样，极尽人类想像力、创造力之能事。所谓革命，就是一种恶毒、残忍、冷酷、灭绝人性的群众大竞赛，比赛谁的天良丧得彻底。谁要不幸还留着那么一分半分，谁就是丧失阶级立场，搞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妥协，搞折衷，搞调和，和稀泥，搞合二而一，搞投降主义，搞修正主义，就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帝修反及一切可怜虫向隅而泣去吧，我们彻底砸烂的是万恶的旧世界，迎来的是红彤彤的新世界！！！”

可惜这新世界红则红矣，却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而彻底砸烂的，又何止旧世界而已。最先崩塌轰毁的，是民族的伦理支柱，而抽掉了“爱”这个支撑一切文明的支柱、维系一切社会的纽带，这个民族的生存也就不免岌岌乎危哉。如今，我们多的是无缘无故的恨，却偏偏没有哪怕是有缘有故的爱。伟大舵把将《红楼梦》视为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史，确是真知灼见。如今的中国社会确如贾府一般，“一个个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庙堂之中的明拼暗斗不必说，谁只要在大陆坐过一次公车，对此准能心领神会。

敝人出国的第一印象，不是人家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而是当地人的和蔼可亲，人味十足，而且做梦也没有想到世上居然会有微笑的警察！这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人类不用时时刻刻头顶青面獠牙，怀揣解腕尖刀也能生活在一起。旧社会是否把人变成鬼咱不清楚，新社会把人变成兽咱是亲眼目睹。无怪乎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日理万机之余，还要花心思开展大规模的幼儿园回炉教育，教导全国人民学会说“你好”、“对不起”、“请”、“谢谢”几句话，也无怪名作家王蒙要出来大声疾呼，呼唤“善良”。一个民族闹到连“善良”都快成了大熊猫一般亟待抢救的濒灭物种，不亦悲夫！

仅此一端，也就可以明白台湾要想和大陆平等地讨价还价的希望是何等渺茫。说白了，“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人不相信善良，不相信真诚，不相信崇高，不相信平等，不相信妥协，不相信折衷，不相信调和，不相信“双活”和“双赢”，不相信“人有不忍人之心”，不相信“得饶人处且饶人”，不相信“温良恭俭让”。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邪恶、阴谋、敌意、包围、遏制、颠覆、侵略、征服、“糖衣炮弹”与“和平演变”的世界，他们用以对付外界的手段也就是这一套。因此，他们只相信实力，相信颠覆，相信征服，相信围堵封杀，相信武力“教训”，相信弱肉强食，相信文攻武吓，相信“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相信“中子弹中出统一”。

台湾要想在与大陆的周旋中立于不败之地，大概得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先伟大舵把和中华民国先总统蒋公的话去做，道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国两制”是中共决不会放弃的底线。如果台湾不想做大陆的附庸，就得面临大陆强加的战争。不通过谈判或武力来征服台湾，中共无以安天下，慰民情，定一统，文官集团更将面临军界的严峻挑战，使“枪指挥党”的固有体制危机激化。由于中共领袖的愚蠢运作，台湾问题已经放大得不成比例，成了决定中共政权是否得以生存、大陆是否能够苟安下去、维持大一统的严重问题。因此，台湾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中共的条件而屈服，要么就得准备应战。如果选择后者，就得靠自己救自己，不仰承美国人的保护，不怕飞弹袭击，不怕战争带来经济危机，硬着头皮顶下去，顶到大陆内外寒热交攻、自身元气虚脱之时就是出头天。伟大舵主教导我们说：“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条件的产生和被动局面的打破，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如今，海峡两岸战云密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悲剧眼看就要启幕。不相信“双活”和“双赢”，立志赶尽杀绝，最后只会双残双绝，同归于尽。奉劝北京政府：伟大祖国已是五痨七伤、虚不受补，实在经不住送命的折腾，还是悬崖勒马是我党的延年益寿之道。妥协应当是我们立国之本，处世之道。自己要活，首先要让别人活；政府要活，首先要让人民活；人民要活，也得让政府活；大陆要活，也得让台湾活。如果欧洲许多王室都能从中世纪悠悠活到现在，我们又何必除了血洗仇敌满门之外就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来了呢？两千年来中国人流的血积在一起，足以淹没整个地球，现在是结束演不完的民族悲剧的时候了。

2000 年 4 月 15 日

新“北勇南怯”论

某位网友最近提到辛弃疾的《美芹十论》，倒让我想起了其中一论是驳斥“北勇南怯”论的。南宋小朝廷给北方来的蛮子打怕了，士大夫们将这种害怕上升为理论，便成了“北勇南怯”论，科学地证明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是“天然合理”的。辛弃疾既然主战，首先就得痛斥这种“出师未捷胆先丧”的谬论。只是他说了许多，当年小芦也没怎么听进去，只觉得老辛是在“夜过坟场吹口哨”。历史上除了两次例外——朱元璋和蒋介石，似乎从来是剽悍野蛮的北方人征服文明而腐败的南方人。老辛自己当然是不世出的好汉，但他本人也是北方人。要证明“南勇北怯”，在他自己那儿就通不过去。

勇气似乎与文明程度成反比。南方人对付北方蛮子的惟一办法，似乎就是用腐败将征服者们烂掉。征服了几乎整个世界的蒙古精兵就是倒在这“化尸粉”下的。满清入关之初，王公大臣们日以继夜地苦思冥想，试图找出一种对付汉人这一毒招的办法，“拒腐蚀，永不沾”，使我大清避免我大元的覆辙。他们果真造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乾净、最有为的王朝，不仅创造了在内有长毛、捻匪，外有亘古未见的、拥有先进火器与先进文明的强敌包围下苦撑不倒的奇迹，而且还推出了“同光中兴”，曾、左、李、张等名臣让后来的“人民的好总理”之流望尘莫及。最后还竟然出了一个锐意改革的皇帝和皇太后，更是让邓公、江总瞠乎其后。如果不是无知小子孙大炮瞎捣乱，说不定我大清能撑到今天，代替老美做文明

世界领袖也未可知。尽管如此，等到中原易主，当年剽悍绝伦的八旗子弟还是让咱们的“化尸粉”化作了一滩脓血。

中国人真是世上最善于将自己的短处化为优势的民族。当年咱们的民族魂阿Q老先生让一群无赖按在地上痛打，逼着他承认是“老子打儿子”。Q老既挨打且受辱，想来是再也无法“精神胜利”了。可他立刻就想到他是天下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总还是“天下第一”，“状元不也是天下第一么？”Q老于是从地上施施然爬起来，欣欣然走了，轻松愉快地又赢了一回。在Q老精神的鼓舞下，咱们这些肖子孙也个个精通这聪明的“化短为长，反败为胜”的绝招。这绝招虽只有一招，却是“无招胜有招”，可以生发出无数花头。如今只讲其中一种，也就是大陆人对台湾人拥有的心理优势，唤做新“北勇南怯”论。当然，这儿咱们是“北”，台湾是“南”。

记得大陆放“空包弹”的辰光，有位龚克平先生在《华夏文摘》上力主“解放”台湾。他那滔滔万言的雄辩，老芦也记不住许多，只记住了他那“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大无畏气慨。其中的名句是：“你让王朔笔下的人物和琼瑶小说中的人物打一架，你就知道台海战事的结果了。”（大意）当然，愚顽如老芦，也知道少爷打不过痞子。不过落后和野蛮竟能成为值得吹嘘的事，连痞子们也居然成了咱们中华民族赖以腾飞的国之干城、民族的脊梁，做这种中国人可以引为自豪的东西，也就实在有限得可怜了。

这新“北勇南怯”理论的实质，就是“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似乎就只知道忙着炒股倒房养“二奶”。要去沙场上跟那些面有菜色、连“一奶”都还没有着落的童男们真刀真枪地干，恐怕就不如后者玩命。当年小小芦听“志愿军”叔叔讲故事，他们对娇生惯养的美国少爷兵无比鄙视，给小小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独有偶，前几年又在《中央日报》上

看到国军叔叔回忆当年与美军协防台湾的往事，字里行间也同样流露了对美国少爷兵弱不禁风的揶揄。看来，这“野蛮勇文明怯”的定律已是国共两军的共识。难怪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军头到形形色色的民间战略家，在畅谈中美核大战的美丽前景时，一个个都胆气如虹，豪情似海。

然而不然。却说老芦当年拜读了龚爷的文章，当下修书一封发往《华夏文摘》，请教他为何萨达姆的中东痞子打不赢联军的少爷们。大概编爷们认为这个问题不值一哂，未予刊登，使芦爷的疑问至今无从得到解答。没有高手指点，老芦只得一个人冥思苦索，最后的结论是：所谓“北勇南怯”，不是因为北野蛮南文明，北落后南先进，北贫穷南富裕，而是因为北廉洁淳朴，南腐败堕落。所以一旦北中了“化尸粉”，变得比南还烂，主客立即易位，我大元也就只有打道回府，家去静静地欣赏“大漠孤烟直”去了。当年大英帝国算得上最文明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可因为他们脑袋欠灵，想不出咱们的化尸粉那第五大发明来，所以打平了一个又一个的蛮子部落，四肢还照样健在。其实，老辛有写《美芹十论》的功夫，还不如去北国广撒点化尸粉，开开“讲用会”，推广推广他本人如何在江西等地滥刮民脂民膏，大盖“带湖吾甚爱”的人间仙境的先进经验，这才是不战而烂人之兵的上策。

如今大陆与台湾哪个更烂，老芦没去过台湾，实在是说不好。不过共军烂到什么程度，有“定国将军”的揭发为证（老芦在此强烈建议爱国志士们去把那株大毒草批倒批臭，特别要证明那些人名、地名和数字都是捏造的）。想来这种“天下第一”，决不是娇生惯养的民主国家可以望其项背的。民主的精髓是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不仅使自己的贪官墨吏难以上下其手去攒钱盖带湖别居，而且让敌人的化尸粉也撒不进来。英国鬼子在香港没中咱们的“国粉”、烂成一架骷髅就是证明。所以，咱们的新“北勇南怯”论，

仍然是Q老“化短为长”的传统功夫。这一点，光看共军军头展望中美大战的光辉前景时的宏论便可了然。据《多维新闻》，军头们说美军“没有战斗经验”，不知海湾战争算不算战斗。所以，Q爷“天下第一”之后的“自轻自贱”，实在是没法“除了不算”的。

然而却又不然。台湾当然没有大陆烂，但似乎却没有大陆“勇”，起码是对大陆的痞劲毫无认识。老芦遇到过的台湾人屈指可数，不过说这话有点根据。

却说老芦89年在德国莱因河畔那超过带湖的人间仙境中，碰上了几个亚洲人。听到他们口吐国语，真是意外之喜，当下赶过去攀谈。原来他们是台湾国中的教师，利用暑假到欧洲租车旅游。老芦顿时感慨万千：连中学教师都能到欧洲旅游，实在是了不起！于是没口子盛赞他们为中国人争了口气。那时伟大祖国还未发动伟大规模的公费旅游运动，我在海外见到的黄肤黑发的游客，不是日本人就是香港人。后者虽是同胞，人家却往往自认是大英“皇民”，连彼此交流都得用英语，说不出的别扭。所以可以想见我当时的兴奋与自豪。那时六四刚过，中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我十分担心中共总有一天要犯台，毁掉中华民族的最后一块净土，让莱茵河从此变成人家国中教师的梦中之河，于是便在聊了一会闲天后问道：

“你们认为中共会不会打台湾？”

“不会！”异口同声，斩钉截铁。

“为什么？”

“因为，”毕竟是教书的，答覆的逻辑性很强。“如果中共打台湾，台湾必然拼死抵抗。最后即使打下来也成了废墟。中共死那么多人，花那么多钱，打下个废墟来干什么？”

我只能废然长叹。在这钢铁般的逻辑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就算我能把在共爷手下讨生活几十年的所有心得体会和盘托出，这些“娇生惯养、琼瑶小说中的人物”们又能明白共爷从来就是不讲逻

辑的怪物么？六四的枪声还回响在耳际，年轻的国中教师们就忘记了那是世间最无理性、最不讲逻辑、最不按常理出牌的怪事。本来，只需派几个“雷子”，把什么柴大官人的小姐、我你拉稀之流捉将官里去，再把学爷们的家长找来修理修理，顿时就会云开雾散。学爷们造反，一开头就是因为怕“秋后算账”，等到真个算将起来，又焉有不抖作一团的？一个人抓进去，千万人躲起来。到时少爷们忙着背靠背揭发、面对面批判还来不及，谁还记得广场上那个仙姑（婆？）像？却偏偏要沿街杀人、遇楼打枪，生怕洋记爷拍的录象带不够长，洋倒爷不撒鸭子跑他娘！

后来勾结上了一个“台谍”，天天蒙他馈以《中央日报》。那的确是份好报纸，其中的“中副”让老芦如行山阴道中，美不胜收。于是才知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人、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为什么说是中共上台断送了中国人拿奖的希望。只是政论版让人看了气短。六四血迹未乾，满朝文武就在那儿引德国的例子，证明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浑忘了人家是西统东，而且苏联、南斯拉夫正在散板。搞“国统纲领”那阵子，什么国策顾问邱爷、杨爷，说的话听来简直像“宇宙语”一样，让人真不知今夕何夕，彼岛何岛，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当时老芦就想，台爷们对共爷如此情热情急，迟早要把全副身家贴进那个窑子，祖国的“和平统一”也就瞎子磨刀——快了。

以后在海外中文杂志上看到，六四时美国华侨要去中国使馆抗议，想找一幅五星红旗来烧。最后终于找到了，旗子上却赫然印了“Made in Taiwan”，让老芦真是哭笑不得。后来又听说台湾又对逃到那儿去的某位“民运”人士尹爷痛加折磨，为流亡人士提供政治庇护的前提也是文明国家中最苛刻的。老芦也不喜欢“民运”人士，但救人一命是起码的恻隐之心。为了怕激怒中共，就连起码的道德原则都不要，可叹小芦当年还一厢情愿，盼望着台湾反攻大陆

成功，救我等于水火呢！说起来，如今“鲁胞”喊打的多，讲和的少，在“呆胞”一面也有些过错。

等到大陆放“空包弹”，《中央日报》上更是热闹。高官贵人一再晓谕大众：中共说的犯台三条件，我们一条也没犯，我们又不是不想统一，又没有外力介入，所以请诸位回家垫高枕头梦黄粱，兄弟担保屁事没有。弄得来似乎台湾的安全就全靠在严守中共的要求上。可笑台爷们实在是不知共爷那套伎俩：“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当年知青下乡，有哪个不是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自愿”充军？你不想独立，我说你独立，你就是独立。等我“解放”了你，还要让你们全部上街、万人空巷地迎接“解放”大军，再把那一小撮“台独”分子揪出来斗个七死八活，然后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平民愤，而快人心。“呆胞”们呆到一厢情愿地以己度人，端的是燕巢幕上，兔眠虎旁，跟当年老辛效力的南宋小朝廷似乎也没有两样。

这两年因为“呆”友回国，一直没能看到《中央日报》，也不知旧时王谢堂前燕是否悟出了“虎兔相逢大梦归”，把窝搬到了稍微坚实一些的去处。只是看吕副总统前两天秦庭哭师，呼吁各国向中共施压，不禁又为台胞们捏了一把汗。国际上的公关功夫当然要做足，然而指望美爷欧爷来给自己保命，不过是把燕窝从幕布上搬到了芦苇上。

当年墨子主张“兼爱”，提倡对人不分亲疏，一般的柔情似水。孟子却认为那是反人性的，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爱应该象地震一样，从亲人这个中心一波波地向外扩展，也就是共爷们常说的“有核心、有层次的团结”的意思。孟爷的话当然是对的。西方哪个国家，不是“爱吾民，以及他国之民”？要让人家牺牲自己的儿郎来给您老保住房地产，这种事大概只有尼泊尔的释迦

牟尼同志愿干。老美已经两次抛弃过台湾，您老怎么又知道他们不会干第三次？

台湾的安全，不在于它是否按中共的拍子跳舞时是否踩在对方的脚背上，更不能指望共爷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也不能把宝押在老美有足够的魄力，为朋友可以把牛耳尖刀插在自己的毛排骨上。真正的安全，靠的是贵先总统蒋公说的“心防”。他老人家跟中共斗法数十年吃足苦头，最后被赶下海去，这几十年的亏不是白吃的。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共爷云：“困难象弹簧，你软他就强”；毛酋云：“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倘若真正有决心不怕把宝岛打烂，为了自由宁愿战至最后一人，老共也就不敢造次动手。如果处处伏低做小，看共爷眼色行事，倒让对方看轻了，无异于鼓励对方拔拳头。谋略大师毛泽东教导我们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的确是少爷对付痞子的惟一取胜之道。

如果“呆胞”们真能如此，则新“北勇南怯”论终将成为历史笑谈。

2000 年 5 月 13 日

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

2000 年台海危机，老芦以草民之身，跳出来大骂中共，坚决反战，因而成了网上大汉奸。如今台海风波又起，为良心驱使，我不能不又出来发言，但这次却是数落台湾这边的。这态度看来貌似矛盾，其实内里完全一致，都是着眼于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使然。

如今不管是海外华人还是台湾人，“统”派和“独”派都势成水火，形同仇雠。在统派看来，祖国统一是天下最神圣的正义事业，独派是背叛民族、分裂国家的民族败类。而在独派看来，“住民自决”是神圣的民主原则，凡有起码自我尊严的人，都有权主宰自己命运，岂能效懦夫屈从外来政权的压力？

如果光从这种冠冕文字之争来看，便一辈子也看不出谁是谁非。大家似乎都忘了，其实无论是独立还是统一，本身都不是甚么神圣到不得了、了不得的伟大事业。统一或独立本身不过是手段，而人民的福祉才是永远不变的目的。

这道理再明白不过：大陆当局当然梦想统一，因为君王的统治欲决定了他们酷爱“大一统”，而台湾当局当然盼望独立，因为北面屈为大国之臣，怎么也比不上南面踞为小国之君惬意。因此，两岸的统治者当然要在自己的权限之内竭力影响民意。大陆是专制政体，民意由统治者任意塑造，所以大陆人民当然是清一色的统派。台湾是民主政体，但执政党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意，所以自李登辉当国以来，独派的势力和影响与日俱增。这其间居然没有哪个政治家真的像李登辉标榜过的那样：“民之所欲，长在我心”，想一想究竟怎样解开这个死结才对两岸人民最有利。

目前的客观情况是，台湾和大陆政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水平不同。无论在哪个方面，台湾都远比大陆先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出于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和憎恶，大多数台人根本不愿意统一。尽管如此，统派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这里面的原因无非是两条，首先是先总统蒋公和经国先生训练出来的“爱国思想”的残留，其次是害怕大陆用武，毁了台湾的经济。所以，既不想统一，又不敢或不愿独立，不如就这么拖下去。我猜，这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意愿。

这里面的第一条是人民的感情取向，我无从评论。第二条乃是人民出于本能的趋利避害的考虑，我觉得非常明智。如果我是台人，我也只会这么想。从 1949 年起，台湾一直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哪怕就是打出“台湾共和国”的牌子来，也无法使她变得更独立一些。相反，公开独立反而会把中共逼到不动武就要出现严重统治危机的死角，从而挑起台海战争。而战火一开，不管谁输谁赢，最先倒霉的还是台湾的普通老百姓，不是两岸的政治家们。管你国家是一个还是两个，管你们谁做总统谁当主席，只要能让台湾安享太平岁月就行。退一万步说，就算中共拱手请咱们获得名义上的独立，那又有甚么好处？以后跟大陆作生意、到大陆旅游就再也享受不到现在能享受的优惠。

另一方面，从大陆来说，维持现状也最有利。现在大陆正值政经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当局快速走资，极度激化了本已是危如累卵的社会矛盾，下岗工人抗争此起彼伏，政权腐败穿骨见髓，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民族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端的是险象环生。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这过河的泥菩萨能够保住自身、化险为夷就算上上大吉了，哪顾得上去开边拓土、建功立业？台湾不宣布独立，咱们就眼开眼闭装作那是中国的一个省，等到以后有实力再说。怕就怕他们“不识做”，非要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逼得咱们

在国际国内都下不了台，非打不可。而这一打麻烦就大了。眼下俄国和美国如胶似漆，中国大有代替前苏联作美国头号敌人的模样。战争必然成全中国的这一邪恶形象，大陆从此沦为国际公敌。哪怕打赢了，经济也难得承受国际制裁的巨大打击，而经济一旦垮杆，全国必然大乱。打不赢就更糟，新疆西藏势必受到台湾榜样的鼓舞而跟上，腹背夹击，政权只怕垮得更快。因此，无论从统治者还是从人民的角度上来说，维持现状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利益来说，维持现状也是最有利的。美国现在正筹划收拾伊拉克，实在不愿意此时远东又再多事。而且，一个不统不独、统独取向不明的台湾，实在是老美用来对付大陆的一个黄金筹码。在某种程度上，老美利用台湾，就像中共在文革中利用高帽子一样。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高帽子只有拿在手上时最有威慑作用，一旦戴到羞辱对象头上去，那威力也就丧失了，因为对方此时已是“死猪不怕滚水烫”。这其实就是老美出尔反尔、朝三暮四的原因。不久前，布什总统再度重申信守三个公报，尊重“一中”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却又居心险恶地教唆台湾军方发展进攻型武器（如中程地对地导弹），以此来吓阻大陆的武力讹诈。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一面作这种罪恶教唆，一面却又置身事外，告诉台湾不能指望美国提供这种武器，必须自己发展或向他人采买。这种教人卖淫而又拒绝作老鸨的伪善态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山姆叔的心计：他们当然不想坐视大陆吞并台湾，但更不想为台湾独立让自己的子弟兵趟进血海去。依我看，山姆大叔完全是左右开弓，举起左手反对独立，举起右手反对统一。这种“中庸之道”当然是美国利益决定的：无论台湾回归了还是独立了，美国都要失去一个从中渔利的天地。

因此，维持现状，不统不独，其实是两岸三地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明乎此，我就实在不明白陈大总统为何此时出来高呼“一边

一国”。这海峡两边一边一国本是存在了53年的客观事实，你就不是不说它也存在，说破了并不能让这事实再得到甚么本质上的改进，却只有激怒中共，毒化两岸气氛的负面作用。老芦搔破脑袋也实在想不出陈大总统此举除了作秀外，还能给台湾人民带来甚么好处。不客气地说，陈大总统此举，如果不是缺乏政治智慧使然，便是党派政治利益的考虑压倒了台民利益。

第一种可能其实不能排除，因为政治家，无论奉行的是甚么意识形态，其实都是人类中智力比较低下的一种异类。比起小布什来，老江似乎也不能算惊天动地的愚蠢。陈大总统既是政治家，当然也就决不会聪明到哪里去，所以才会说出这种蠢话来。其所以如此，大概他是低估了中共的痞子本质，看多了中共的“狼来了”，拿对方满不当回事，以为共军永远只会虚声恫吓。

如果陈大总统真的这么想，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目前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确实是务实派，完全明白开战将给政权存亡带来多大风险。但问题是中共为了维持一党统治，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煽动所谓“民族主义”思潮。如今这玩意已经假戏真做做成了真家伙，开始将当局自己的军。据台湾情报当局的披露，共军百多名将领最近上书江泽民，强烈要求打台湾，再一次凸显了共党军人妄言国事、“枪指挥党”的优秀传统。中共过去多次向全世界宣告动武底线，其中台湾独立是第一条。如果台湾真的打出独立招牌而中共当局无所作为，恐怕立刻就要出现深刻的政权危机。与军队毫无渊源的江泽民要想继续统治下去，恐怕非得屈从军方的压力不可。哪怕他不同意大规模跨海作战，使用导弹袭击、动用潜艇封锁海路这种事恐怕还是有胆量批准的。

更何况今日共军已非昔日吴下阿蒙。据不久前披露的美国军方分析，五角大楼过去一向认为共军没有跨海作战的常规战力，但现在这一看法已经改变。据信，由于大陆向俄罗斯购买驱逐舰，现在

共军海军已经有了反舰导弹，能够确保跨海抢滩。就算共军跨海作战失败了，作为一个对台民负责的民选总统，陈水扁也该考虑到共党恼羞成怒之余狗急跳墙，向台湾疯狂发射飞弹，使宝岛彻底毁于战火的可能性。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共政权的痞子本质。如果萨达姆能在大败之余纵火焚烧科威特油田，您又怎么知道中共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来？

陈大总统此时说此话可能还有一个考虑，那便是李前大总统“2008 年”的占星家式的预言。我不懂占星术，也没有研究过《推背图》、《惊世大预言》一类奇门遁甲，参不透此话玄机何在，只能用理性来妄测，那便是：陈、李大概都觉得越这样拖下去，两岸经济关系就越发紧密，到最后两岸便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拆不开的经济共同体，到了那时，台独便将变成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所以趁时犹未晚，赶紧给这趋势泼点冷水。那“一边一国”论其实并不是为独立造势，只不过是蓄意惹恼中共，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借中共之手来冷却两岸的经济交流而已。

如果这真是台独战略家智囊团献的国策，那么我只能认为这是欺骗背叛台湾人民的阴谋诡计。以现代人的文明观点来看，是统是独，该由台湾人民根据自身利益来考虑决定。如果两岸经济交流最终导致合则两利，那么无论是谁也无权根据一党的政治追求便横加阻遏破坏。本人反对这种个别政党政客破坏出于民意的自然统一趋势的立场，和我反对中共当局因为政党私利便强迫台湾回归一样坚定。

另一个可能是陈大总统故作惊人之语，乃是出于党派政治考虑。阿扁执政两年，政迹乏善可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陈为了连任而在此时作政治秀，以换取独派的全力支持。这说起来也是美式民主国家的一个通病：当选总统为了连任，常常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塑造个人形像上。比起来，英式民主还较少这种毛病。

其实，客观地说，继续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对台独既有利又有弊。有利的是，后蒋政权搞的本土化运动，极大地稀释了二蒋刻意培养的“大中华民国国民”意识。要明白这一点，只需比较一下两代台湾留学生就够了。本人在80年代后期在海外碰上的台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全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民族观念”似乎比我的还强些。但近年来碰上的台湾留学生却全都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可以想象，这种趋势再延续几十年，便不会有几个人认大陆为自己的祖国的一部分。

不利于台独的那个因素上面已经说过了，那便是日益形成的两岸经济纽带。一个腾飞的大陆为台湾人民创造的投资、创业和就业机会，不是别的国家能够取代的，更何况两岸之间还没有语言障碍。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这种趋势再延续几十年，两岸势必要形成一个无法拆开的经济共同体。

在我看来，两岸政治家们或为统或为独如此殚精竭虑，实在和人民的福利没有多少相干。一个真正以民瘼为念的政治家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无为而治”，让时间来解决难题，让后代子孙自己作决定。如果过了几十年统一真是两岸人民的利益所在，人民自然会选择统一，如果那时还是统不如独，则台湾人民也不会选择回归路。这才是有大智慧、大品德的政治家们应有的心胸与气度。舍此不由，却因为政党私利或是自己的愚蠢去毫无必要地激化两岸矛盾，让两岸人民毫无来由地蒙受血光之灾，那才是对人民犯罪，无论是统是独都该反对。

2002年8月13日

阿扁的坑人秀

台湾大选已近，阿扁正紧锣密鼓地策划台民公投。在这种时刻干这种事，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对此，著名台独元老洪哲胜先生也毫不讳言。昨天他明说了，阿扁此举在于为自己拉选票。

洪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那是因为阿扁此招顺应台湾民情。总统干出符合民意的事来，当然要在人民心中威望大增，所以有助于连任。

如果阿扁此举真是顺应民意，则这种为自己拉票的政客作法就值得肯定。问题在于，洪先生忘记出示民调结果，显示台民确实想在此时迫不及待地进行公投，完成“台湾政权的本土化”。

在我这旁观者看来，硬要说台湾人民盼公投如大旱望云霓，似乎无法理解。天下百姓的心理都差不多，最感兴趣的是政府某个行为究竟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在这种时刻进行公投，当然对总统的好处自不待言，可对老百姓究竟有什么好处？

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中说过，从 1949 年起，台湾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无论是否在名义上独立，都不会改变它事实上的独立状况。宣布独立并不能使它变得更独立一些，却会激化台海危机，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甚至导致战争，为台湾人民带来数不尽的灾难。死人破财不说，前途也吉凶难卜。就算台湾打赢了，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那又得到了什么好处？它本来不就一直是独立的么？如果打败了，则台湾人立刻要当大陆人那种顺民，一黟政要还要被中共当成战犯通缉，从此只能在海外当寓公。

您说，有哪位普通百姓，愿意国家去干这种刺激中共，挑起战祸，风险极大而毫无收获的事？看官们若使用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普通台民的位置上，立刻就能看出这点来。

洪先生对此也有解释，他说，中共绝不敢打台湾。要是我们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被统一过去，那就得像大陆人一样吃大苦，受大罪，当“亡国奴”了。那结论自然是无比悲壮：我们台湾人宁愿站着死，也决不跪着生！台湾人民在六个外来政权面前都没屈服，难道还会怕了中共？

（顺便说句无关的话：“外来政权”是哪六个我还真不知道，把荷兰、郑成功、满清、日本、国民党全算上，也只有五个阿？莫非连三国东吴都是“外来政权”？洪先生的先辈想必是在那之前从大陆“外来”去的台湾了，呵呵。对不起阿，调侃而已。不过，看来得去调查布什总统的祖先是何时从英国“外来”到美国的，以防止美国被“外来政权”控制。一个移民国家跟母国讲这种话似乎有点可笑。您说是不是阿，洪先生？不说这话也具有独立资格，澳大利亚、新西兰不就是榜样？说这种话并不能增加独立的法理依据，反倒不必要地刺激大陆同胞——当然只是血缘上的。）

此话当然说得气壮山河，可惜有点文不对题。现在不是中共要去征服台湾，是台湾总统为了拉选票，忙着搞公投刺激中共。而且，难道不公投，台湾就会被征服，搞了公投，中共就再也没办法（或不敢）去征服台湾了？公投既是如此威力无穷的法宝，我看民主国家可以撤销国防军了。敌人来了就举行全民公投，以保河山，而救黎庶。

那“中共决不敢打台湾”的话更离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发动侵略战争。”敢问一众民进党人，您们是中共的参谋长么？怎么敢说这种斩钉截铁的话？这倒有点像大陆那些拒绝考虑暴力革命触发核

内战危险的革命英雄们了。如果阿扁居然敢把台湾三千万人民的身家性命押在这种猜测上，以此巨大赌注作毫无彩头的赌博，那就是天底下最不负责任的总统，根本就不配当什么民主政治家！

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中共惊天动地的愚蠢，把台湾问题炒作到了不成比例的地步。自 90 年代起，为了在离心离德的国民中制造内聚力，为政权镀上“合法”的金，中共一直在玩弄所谓“民族主义”这张牌，作为新国教取代破了产的马列毛主义。这套拙劣的戏法却让百姓跟着假戏真做，使中共当局被自己的愚昧宣传逼进了毫无回旋余地的死角。

因此，如果台湾真的宣告独立，中共还不敢动武，则立刻就要出现统治危机。不仅人民要上街闹事，恐怕就连军队都要发动政变。去年几百名共军将领上书中央要求打台湾，便露出了此中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还要去毫无必要地让宝岛去冒那毫无必要的巨大风险，可以说是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陈老扁到底为什么要在大选临近前造势搞公投？难道真的是顺应台湾人民急于“明确身份”的要求？非也。他这无非是“草船借箭”之计，又名“借力打力”之“乾坤大挪移”。

我的一位台湾朋友跟我说，2000 年大选时，他原来根本不想投阿扁的票，但朱总理此时却毅然挺身而出，帮阿扁拉票，威胁台湾人民不许选阿扁。他这一招比阿扁自己的宣传有效一万倍。许多台湾人被这赤裸裸的威胁激怒，转而投阿扁的票。我那朋友就是其中之一。据他说，他的好几个朋友都是这么转了向的。

阿扁当政四年，除了推出许多“写真集”外，政绩实在乏善可陈。此时想连任，当然就得借助外力，再来一次草船借箭，借力打力。要借力，当然就得刺激中共，让他们释放出巨大的助选能量来。

不幸的是，中共吸取了教训，尽量克制自己不再提供免费箭矢。阿扁的“一边一国”一度引起了中共的愤怒反应，但中共迅即就忍下去了。阿扁访美，中共也眼开眼闭。

这说明哪怕蠢笨如中共，也还是能吸取教训的。过去他们以为“北京只要吼一吼，台湾就会抖三抖”，台湾人民朵朵葵花向太阳，日夜盼望解放大军神兵天降，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却根本不知道台湾人就算不恨中共，也怕透了中共来统一，更痛恨中共把台湾当成治下的一省，动不动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发一次威，就等于为台独加一把油。中共所有的庄严声明，统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船上插着的箭枝。抗议李登辉访美、在台湾第一次大选前发“空包弹”、第二次大选前由朱镕基出面威胁台湾人民等蠢举，无一不起到相反的作用。中共真是为台独施洗的教父，李登辉、陈水扁的大施主！

不过他们眼下似乎学乖了，击穿其忍耐力的阈值高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要请中共大施主来助选，当然就只有使用强刺激才行。因此，莫怪老扁对“公投”如此起劲，舍此之外他还真没有什么法宝了。

这“公投”法宝当然奥妙无穷。“住民自决”乃是现代文明世界普遍接受的民主原则。阿扁这一招，在国际社会上看来非常合理，中共要干涉就一定会自行描足那个专制怪物的形像。国际舆论本来就同情台湾，痛恨中共以庞然大物之身去欺压一个弱小的民主邻邦。因此，它确实是阿扁对付中共的一个极其有力的“合法斗争”武器。

问题是，国际舆论的同情根本就不能为台湾保驾护航。上次跟ＸＸＸ先生争论时我就说了，支配大国外交的不是道义而是国家利益。因此，国际社会从来是接受既成事实，不会去为空泛的“道义原则”为外国人拼命。几天前我和单位上的色便姑娘聊天时，非常

cynical 地跟她说，南斯拉夫成了民主国家后得到的美援，绝对不会有铁托当政时得到的多。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绝对比不上在冷战中分化瓦解敌对阵营付出的金钱多。说得她连连点头称是，说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我早在旧作中指出，台湾独立其实无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将打破远东现有的战略均势，造成局部紧张，甚至导致战事，而老美绝对不会因为保卫台湾，去和庞大的中国正面交战，陷入几十个越南战场中。就算中台不交战，台湾平安无事地独立了，美国也会就此失去了一个挟制中共的筹码。因此，眼下这种不统不独的状况才真正是美国愿意维持的。

就算美国人支持阿扁，那又便如何？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老美会不会为了保证台湾独立与中共交战。民运党人要搞台独，恐怕先得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们绝对不会回答，因为那答案是明摆着的：如果老美会为台湾人打仗，则中美也就不会有那几个信誓旦旦反复申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的公报出来了。既然有了那些公报，台湾独立后中共真要动武，老美还有什么理由出兵打抱不平？

退一万步说，就算美国出兵，那又便如何？直接经受战祸的还是广大台湾人民。死人如麻，毁产无算。就算打赢了，台湾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人民又得到了什么？反倒连去大陆经商、投资的优惠都丧失了。

综上所述，阿扁这一招，完全是政客为了个人利益作坑人秀，拿全台人民的身家性命赌博，唯一的受益者就是他自己。如果我是台湾人，就一定会反对他这种坑人秀。

在此，老芦愿再作一次“帝王师”，为冲突各方献计：

对中共当局，我的劝告是：如果你们想统一，趁早忘记“中央政府”的身份，少说那些“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话近来倒不听见了，可见诸位智力有所改善）、“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

的神圣领土，主权不容谈判”的屁话。这些话每说一次，阿扁的船蓬上就多几吨箭。武力威胁只能激起台湾人民同仇敌忾之心，是奇效如神的“台独催生剂”。

请一定记住基辛格的话：“威胁只有当自己确有能力和决心付诸实施，而且对方也相信自己有这种决心和能力时才会奏效。”空包弹、军事演习和前总理朱镕基那种空洞威胁，不但是官逼民反，而且是“狼来了”之类的笑话，徒让对方小觑了，认定你们根本不敢来真格的，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和平统一的唯一有效手段是“笑脸攻势”，以诚意去征服台湾人民的心。

在此我想强调指出，大陆社会现在危机无比深重，如果对台用武，完全是自杀行为，国家很可能因此而崩溃。因此，必须淡化那愚不可及的所谓“爱国主义”宣传，以免国民假戏真作，逼得你们下不了台，在台湾真的宣布独立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硬着头皮去开战，实行民族自杀。

对眼下阿扁的坑人秀，最策略的处理方式是冷处理，决不要在媒体或官方场合大叫大喊，更不要威胁台湾人民。越是这么作就越是激起台民的逆反心理。与此同时，应该通过美国人跟阿扁打招呼，让老美压阿扁就范。刻下老美在中东陷入了第二个越南，对解决北韩问题有求于你们之处正多。因此，可以跟老美坦率讲明，如果坐视台湾独立，你们的统治就会垮台，所以不惜为此一战。只要老美相信了你们的坚定决心，我敢担保他们反起台独来一定会比你们还积极。

对台湾的反对党，我的建议是：如果贵党想当选，就必须揭穿阿扁坑人秀的私人动机和可能招致的巨大恶果，坚持要求公投与大选脱钩，推迟到新政府上台后再进行，以免决定国策时受到党派政治的干扰。与此同时，应该将宣传集中在抨击阿扁的内政失误上，把公众的注意力转到内政上来。

对阿扁和民进党人，我的劝告是：不要随便玩火。如果公投真的决定台湾名义独立，则大祸立至。就算老扁能因此连任，台湾也打赢了，他治理的国家也只能是一个残破不堪的瓦砾场。如果打败了，则他不是沦为阶下囚，就得逃亡海外作寓公，连先总统蒋公都不如。

2003 年 11 月 19 日

“台湾本土化”的隐忧

换位思考看“外来政权”

“台湾本土化”是李登辉的夙志，也是他和继后执政的民进党一直在努力推行的国策。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那意思似乎是，台湾必须从“外来政权”的压迫和影响下彻底解放出来，让国民从精神上彻底和中华文化决裂，让台湾人具有自己的 national identity，使得台湾变成在精神上、文化上高度独立的国家。

无庸讳言，这“外来政权”乃是最刺激大陆人感情的理论。不过老芦是大汉奸，倒也还能理解。须知作汉奸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会“换位思考”。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台湾人的地位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台湾本省人的心态的。这其实已经在我的旧作《丑陋的大陆人：决不忏悔》中说过了：

> “如果我们有点起码的内省能力和忏悔心，我倒是觉得让‘神射手琥’先生暴跳到云天外的那句‘台湾人的悲哀’很有道理。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台湾人的位置上，就不难体验出人家的无奈：
>
> 百年前不顾人家的苦苦哀求，我们无情地弃人家如敝屣，把人家扔给豺狼保自己的平安。人家做了五十年的‘皇民’，连语言、姓氏都改了，忽焉一日梦醒却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个‘敌国’的公民。往后五十年人家又成了一个被赶下海的中央政权的避难所，被迫承担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国共战争的苦果。‘安全感’是人类幸福的最起码的要素，可

五十年来人家哪一天不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头上无时无刻不悬着中共‘解放台湾’这柄达摩克利剑，‘呆胞’们活到今天没给真个吓呆吓疯，全亏他们的神经纤维粗过了旧金山金门大桥的钢缆。以弹丸小岛与大陆巨人抗衡，国际上找个帮手还被人家抛弃。要硬扛着代表全部中华民族的大‘中华民国’招牌，则脸皮再厚，也难得绷下去那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天方夜谭；改成‘中华民国在台湾’，却又招来大陆的‘空包弹’。以外贸立国，开在国外的使馆却被中共逼得一家家关张。做一场总统或外交部长，却划岛为牢，最远只能去去金门马祖，连老芦都不如。连选选自己的总统，都要招来疯狂的文攻武吓。惟一的‘选择’，似乎只有要么举手投降，要么等着吃中子弹。敢问人家作了什么孽，让您们这么糟践过来，蹂躏过去，还要充满无产阶级义愤，似乎人家借了您们的米还的却是糠，扒了您们的灶还要推后墙！

人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我知道的母亲，是任劳任怨，只知默默奉献，不知索取，温柔恬静，慈爱祥和，敞开心胸作儿女们的避难港湾的爱的化身。从未见过哪家母亲在大难临头时把小儿女扔给强盗，过后又骂人家没有骨气，认贼作父，倘不飞也似地扑进自己的怀抱，就要用狼牙棒把儿女打个天灵盖迸裂！以这样的‘祖国’比‘母亲’，是对‘母亲’这个圣洁字眼的最大亵渎与冒犯！”

这里没说的，是台湾光复后国府的愚昧操作在台民心头留下的深刻心理创伤，那就是“二二八”事件。洪哲胜先生在几十年后提起犹有余愤。其实，那事件非常复杂，既有共党在背后的阴谋操纵，也有人民的真诚抗议。最主要的触发因素，还是国府烂官烂兵们贪污腐败，欺压同胞，既严重伤害了台民的感情和自尊，又让习惯于日本人廉洁法治的台民从心底鄙视出来，最终酿成民变。

这其实是当时沦陷区普遍发生的现像。根据张戎的《鸿》，东北人民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了国土重光，不料前来接收的国军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亡国奴！”咱们中国人就是有那本事，国军没本事抵抗敌人，把父老乡亲扔给豺狼，转过头来还骂人家没骨气，是奴才！

所以，台湾光复后出现的那些乌烟瘴气的现像，倒不是国府有意歧视台民。台湾的特殊，在于它已经脱离祖国半个世纪，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经受了相当彻底的“皇民化”洗脑。有道是“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在那种特殊地区搞咱们特有的腐败那套，和在民族地区“破四旧”一样，必然要引起离心倾向，二二八事件爆发就是必然的了。

尽管该事件是武装暴乱，任何一个主权政府在那种情况下决定武力镇压都是应该的，但它依旧深刻地伤害了台民的感情，在他们心底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我记得在《大家论坛》时看过的洪先生一篇短篇小说就谈了那事。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小说只能算浅薄宣传品，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倒有助于咱们大陆人了解台湾本土人的心态。

因此，台湾本地人视大陆政权为“外来政权”，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这其实是民族悲剧，是没出息的中国人自己造下的孽。其传统原因，在于咱们的政府和军队跟西方的甚至日本的不同，从来不把子民当回事。

“外来政权”说的尴尬

“外来政权”说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不用从法理上来剖析，光是从逻辑上看，它就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台民绝大多数都是移民后代。严格说来，所谓“台湾本地人”是高山族，亦即台湾人叫的“山胞”。这情况很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真正的本地人是毛利人，所有白人都来自于英国，也有点像美国，真正的土著是印第安人，此外所有的人都是外来的。

因此，即使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它也只能是类似澳、新那样的移民国家，大多数人民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母国。把母国设立在殖民地的政府称为“外来政权”，这种笑话还从来没听说过，至少美国独立宣言就没把英国当成“外来政权”（foreign regime）加以谴责，是不是？

遗憾的是，“外来政权”说的拥护者们却看不到荒谬，竟然意识不到如此一来，就把公民分成了两等，无形中播下了人民分裂的祸种。

“台湾本土化”的隐忧

在提倡“本土化”的人看来，国民党既然是外来政权，则 1949 年以后到台湾的“外省人”当然也就是“外国人”了，这就必然要加深所谓“外省人”和“本省人”的鸿沟，不必要地引起人民之间的敌意，甚至有可能形成对某一部份公民的歧视。

这“本省人”、“外省人”之分，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狭隘地域主义。如果把它放大为“本国人”与“外国入籍人士”，那就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前面已经说过，绝大多数台民都是大陆移民的后代，区别只在于“外来”时间早晚而已。如果把二蒋领导下的中央政权看成是“外来政权”，那逻辑结论就必然是跟着二蒋入台的大陆人统统是外国人。这些人的后代顶多只能算入籍人士。哪怕他们的政治权利

和土著居民相等，在精神上总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一点我辈海外赤佬恐怕体会最深：哪怕您入了人家的籍，再过一百年人家也不会把您的纯种后代当自家人，说起来还是“那个中国家伙”。

因此，在我看来，“本土化”的最大弊病，就是它强行把台民分成了“自己人”和“外人”。李登辉已经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虽然原来是国民党主席，但为了让政权落到民进党手上，使尽了阴谋诡计。其中最不体面的是他在 2000 年大选时看宋楚瑜风头甚健，有当选可能，竟然弄出个“兴票案”来。前段他又故伎重演，再拿此事作文章，想给宋抹黑，但被宋的律师们及时驳回。李为何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民进党人才是“自己人”。前两天他就公开承认，台湾政权的本土化是他的心愿，如果阿扁此次落选，他就要亡命国外。

李登辉此言，其实透露出他把民主国家之中的政党之争看成“自己人”和“外人”之争。这其实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歪曲。谁都知道，在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中，不同政党只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政治利益，并不搀杂着地域、民族或种族成份。议会政治如果不从这些因素中超脱出来，必然会引起国民分裂，实在是后患无穷。

更何况要实行“本土化”，就意味着废除“外来政权”带来的那一套中华文化本位教育，包括废除普通话教育，将台语定为官方语言，改动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删除或淡化一切与大陆有关的内容，强调台湾的本土历史与本土文化，等等。只有这么作，“新台湾人”才能获得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的 identity。

问题是，作为独立国家，台湾的历史实在太浅，本土文化根本就无法和母体文化相比拟。更何况二蒋推行了几十年的大中华文化教育。要在国民心目中强行割断和母体文化的联系，大概比澳洲废

除英国历史、英国文学课还更艰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几乎不可行，而且必然在国民精神世界中引起巨大混乱，让许多人无所适从，反而丧失了自己文化历史上的认同。

问题还更在于这国策势必把族群冲突扩大到文化冲突上去。二蒋的教育其实非常成功。我有位台湾朋友就只会讲普通话，而且非常熟悉中国的文化历史，甚至比我还爱中国。虽然他是“外省人”，但太太其实是本地人。即使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挤与歧视，觉得自己突然成了外人，无法打进“本地人”圈子去，为此愤愤不平。他对民进党人非常不满，对所谓“本土文化”也嗤之以鼻。他看民进党的眼光，和美国民主党人看共和党人的眼光完全不同，不光是政策上的分歧，更代表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历史、政治上的全面冲突，而这冲突的结果将决定他这“外人”在社会上的浮沉。

更严重的是，民进党人的大陆政策，似乎常常和他们对国民党的积怨纠缠在一起。因为受过国民党政府的迫害，这些人非常痛恨二蒋及其政府。洪哲胜先生自己就多次在网上忆苦思甜，痛说“白色恐怖”下的经历。既然现在二蒋和国民政府成了大陆来的“侵略者”，这种仇恨也就会很自然地扩散到现在的大陆政府头上去，使得民进党政府决定大陆政策过程中搀进了毫无必要的感情因素，使本来就复杂敏感的两岸关系更成了一团乱麻，为海峡两岸良性互动造成了人为障碍。

与此相伴生的必然是“外人”们对大陆的认同。这些人受大中华教育影响甚深，对中国感情深厚。推行“本土化”造成的上述一系列结果，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情绪反弹，促使他们认大陆人为“自己人”。我想，这就是为何台湾民主化出现“急统派”。当我得知某些台湾人竟然堕落到崇拜他们根本不了解的毛泽东时，气得把“再教育”学会的粗话全部骂了出来。事后冷静想想，其实这应

该说是“本土化”的副产物之一，倒不能轻率地将其归结为共党的渗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本土化”的最大隐忧，那就是有把台湾变成第二个北爱尔兰的潜在危险。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整个爱尔兰原在英国治下。爱尔兰共和国在 20 年代独立，但本岛北部六郡因为信奉英国国教的英格兰移民较多，公投决定留在联合王国内。当地的爱尔兰族（天主教徒）不服，以城市游击战和恐怖活动争取北爱独立，和“忠诚派”血战几十年，死人毁产无算，直到最近才停火。

当然，台湾的情况和北爱不一样，没有宗教冲突因素在内，而且，黄人似乎没有白人玩命，扯旗造反的事一般只会在走投无路才会干。即使如此，从长远看来，这“本土化”运动仍然无明智可言。要把台湾建成民主繁荣安定的社会，首先必须实行内部的民族和解。为了台湾的长远利益，民进党人必须学会忘记宿怨，埋葬对二蒋“外来政权”的仇恨，填平“外人”和“自己人”之间的鸿沟。文化的多元化当然应该提倡，但为李登辉盼望的那种“台湾政权本土化”，实在是后患无穷。

2003 年 11 月 21 日

学会换位思考，化解仇恨

——致洪哲胜兄

写此文是想跟洪兄说几句心里话，当然我也知道你不可能听进去。记得四年前某位网友跟我说："人是不可能说服的。"四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觉得也对也不对。其实我说服了许多人，大概该算是说服读者最多的网上写手吧。不过有的人确实不可能说服，例如你和其他那些"民运"好汉烈妇们。不管怎样，好歹咱们在网上相识一场，尽心而已。

洪兄是我最先认识的网友之一。第一个是林思云，第二个就是你了。

过去我对你印象一直很好。这也毫不足奇：对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坚持某个信仰的志士，一般人自然会有一种崇敬之情。尽管我不赞成你的信念，但我尊重你这种精神。特别是你奋斗毕生，并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颇有点"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风亮节。

打动我的还有你出众的风度。犹记四年前你我都在《大家论坛》，同受拥共派围攻。对方什么下流话都骂了出来，你却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讲理，让我非常佩服，特地在《丑陋的大陆人》中提到此事，说你心平气和说理的文字后面跟满了下流骂帖，就跟苍蝇叮满了肉片一样，云云。

但最近你的表现却让我大失所望。这倒不是指你"偶尔露峥嵘"。风度小事耳，在网上混，饶是柳下惠转世，迟早也要开口骂人。我刚上网时，谁不夸我是谦谦君子？比陈礼铭先生还温良恭俭

让三分。现在却成了头名网霸，在网上纵横决荡，当者披靡，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连垃圾斑竹都得挨我的三百杀威棒，挨了还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只有揉着疼处乾瞪眼。所以，洪兄混到今日还这个样子，应该说是很难得了。

让我觉得最失望的，是你其实和大陆出来的那些“民运”好汉差不多，满心眼是宿怨旧恨，连我的野徒出尘西贝公子都不如。他小人家虽在国内，却还能说出“仇恨与民主精神不相容”的名言来。

我觉得，你最大的误区，是和大陆“民运”好汉烈女们一样，不会换位思考，缺乏“民之祸福，长在我心”的人道情怀，政治立场和取向基本上是生活在持续的仇恨中，不知道这么做其实是祸国殃民。

这话你一定会觉得说重了，其实不然。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台民祸福长在我心，就会看出，从外交来说，与大陆（或你心目中的外国中国）的关系是生死攸关、举足轻重的关系，其重要性甚至远远超出对美关系。与如此庞大的强邻反目成仇，对台民来说实在不是什么福音。正如我那天在跟帖里提醒你的那样，连遭受过中国武装入侵、烧杀抢掠的越南，现在都千方百计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何况大陆和台湾并无什么解不开的仇恨？

如今你却因为中共当局对台湾有过文攻武吓，就刻意煽起两岸之间的仇恨，甚至写文章证明台人辱骂大陆人为“中国猪”是无可指责的抗暴行为。这种短视作法，实在是令人扼腕。

从内政上来说也是这样，我在《“台湾本土化”的隐忧》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台湾的前途，取决于台民内部的和解。为了全民福祉，民进党人必须消除对国府的宿怨旧恨，化解省籍情结，对公民一视同仁，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否则后患无穷。不意你却不

但坚持“外来政权”的谬论，甚至还把岛内的“统派”视为为虎作伥的“中国猪”，简直就是生怕台湾不变成北爱尔兰第二！

老实说，我实在不明白，你的那些琐碎怨怼，何以能如此长久保鲜，生生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简直成了阿拉伯神话里的魔术口袋。你那些忆苦思甜、痛诉国民党“中国猪”“白色恐怖”的文字，我也看过两眼，实在觉得是“茶杯里的风暴”。一个人竟然会把这些毫无份量的琐屑怨恨牢记在心，让其重量压倒对全民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的心胸，似乎实在难以恭维。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自己和家庭的遭遇就不说了，这里只给你举两个例子吧，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第一个例子是下乡第一课。那天我进得村去，第一眼就看见村头的大树上高高低低地吊满了“黑五类”，下面是挥汗如雨的“基干民兵”。人人手抡麻绳，如打陀螺一般抽那些吊在大树上的人。那些人给抽得如陀螺一般团团转，身上的鲜血如同旋转雨伞时伞上的水四下飞散……

第二个例子是修水库时，公社开了一个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斗争会。一对地主夫妇给捆在一起，两人中间插上了爆破用的雷管。公社干部将一枝点燃了的香烟交给他们的儿子，让那人去点燃雷管，以此“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那儿子涕泗纵横接过了烟头，上去点燃了雷管，却不跑开，紧紧地抱住两老同归于尽……

请问你见过这种情景么？你那些怨妇情怀，究竟值几两几钱？如果不是先总统蒋公和经国先生的“白色恐怖”保住了台湾，你洪哲胜别说跑到国外闹台独，只怕要变成那个递香烟的公社干部！

饶是这样，老芦今天照样成了“保皇党”、“专制制度的辩护士”，因为我知道，神州大地之所以会出现那些惨绝人寰的恐怖情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咱们是一个只知道复仇、革命、造反、杀人的劣等民族。要让咱们的子孙后代再不过当年小芦那样的恐怖日

子，先知先觉们就得大声疾呼，启蒙教育国民，从民族的字典里永远删去“革命”那个血腥罪恶肮脏的字眼。而要作到这一条，首先就得“民之祸福，长在我心”，从自己开始，化解那血海深仇。

这其间，最重要的一条是“换位思考”，也就是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用别人的心情和眼光看问题。说句不谦虚的话，在这方面我做得非常成功。所以，我虽然是汉族，却能感同身受地体验少数民族遭受过的灾难；我虽然是“大一统”传统观念至今残存的大陆人，但照样能体会出所谓“台湾人的悲哀”。说句不客气的话，同情和支持台湾人的知名大陆人之中，大概只有我不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是出自由衷的人文关怀。正因为如此，我的《我欲因之梦琼台》和《丑陋的大陆人》等名篇，才会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台胞的心。

可惜洪兄眼中却只有国府和中共对台湾人作下的孽，甚至把对他们的仇恨扩散波及到“中国猪”们的头上去，从来不会来个“移形换位”，把自己放到大陆人的角度，试图用他们的心情和眼光，看看台湾人对大陆作过的孽。

因为吾兄缺乏这种能力，我不得不给你提个醒，用意不是如你一样煽动两岸人民的仇恨，而是想促进台湾人的内省能力。多的就不说了，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以免引起副反应：

台湾原来是中国民族大敌世仇日本帝国的一部份，台民是与日人平等的“皇民”。抗战期间，由台湾人组成的“皇军”师团，不但在南洋对盟军作战，而且直接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事。我记得战争后期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努力中，就有台湾“皇军”师团参加华南战役的一系列战事（包括攻陷广州）。

台湾光复后，不幸爆发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非常复杂，既有日据时代的台湾望族参与，又有共匪在幕后操纵。该事件虽然是官逼民反，但完全是武装暴乱，台民首先动手抢夺枪支军火，杀害

国军和外省人，并提出了“台湾独立”的行动口号（根本不是洪先生说的争取自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主权政府都有权采取武装镇压，平息暴乱，恢复治安，保护无辜百姓。何况激起民变的台湾省主席陈仪还被蒋公处决了。关于该事件，记得《枫华园》几年前有篇很翔实的文章。请哪位网友去刨一下贴出来，请洪先生说说那是否属实。

就算二二八事件整个是国民党政府的错，把那仇恨算到全体大陆人头上来也未免太离奇。就连台岛内的国民党“老贼”们也都死光了，莫非在美国度过了大半生的洪兄主张中世纪式的“打冤家”，“子子孙孙打下去，打不尽‘中国猪’决不下战场”？

国府撤离大陆时，带走了全部黄金储备和故宫博物院的全部中国国宝。马悲鸣先生等论者多次指出这个问题，并主张台湾独立的前提是归还这些债务。但洪先生从来不敢正视这些最起码的合理要求。

国共对峙期间，国府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密切配合美国，对大陆实行了 30 年的封锁禁运，使大陆人民本来就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相反，除了炮击金门以外，大陆从未对台湾施行过有效的“蹂躏”（这是洪先生的指责之一），只进行过文攻武吓。但这武吓的前提是台湾独立，那已经是中共的退让底线。更何况这武吓是双向进行的。不久前台湾国防部长就公开宣布，台湾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包括轰炸三峡大坝。

公平地说，大陆只有民间“学者”辛旗威胁过用中子弹攻击台湾，官方还从未作过类似台湾国防部长这种丧尽天良的恐吓。连我这最同情台湾的大陆人，看了那则新闻报道都怒发上指冠，觉得如果台湾当局真的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来，则大陆用中子弹轰击台湾也毫不过份。

和民进党政府的僵硬的敌对态度相反，大陆当局近年来一直在采取善意姿态，鼓励推动民间交流，通商通航互访，并给了台商一系列的优惠待遇。不幸的是许多台商在大陆胡作非为，引起了大陆人的反感。即使如此，当局也眼开眼闭，并不依法处理。例如几年前深圳玩具工厂大火，烧死女工无数，其原因就是台商怕工人在工作时间溜出去，居然把窗户统统焊死，把车间门锁上，导致火灾起后工人无从逃命，活活被烧死。

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许多台商在大陆开的工厂，比欧洲 19 世纪的血汗工厂还残酷，工人毫无地位，动不动挨打受辱。记得有几个大陆船员实在受不了台湾船长的虐待，奋起抗暴，杀害了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酿成重大血案。

不仅如此，对于中共当局的一系列善意姿态，台湾当局从无对等回应，反倒为了自己的党派政治需要，搞边缘政策，蓄意刺激中共，实行“草船借箭”，这种政客手法，完全违背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说是三言两语，一口气又写多了。希望读者和洪兄体谅我的苦衷。总而言之一句话：我辈上网，应该对两岸人民有点起码的人道关怀，应该干的事是拆墙填沟，消除化解上代人传下来的愚昧的仇恨，而不是煽起两岸仇恨。必须看到，无论对大陆而言还是对台湾而言，和则两利，恨则两伤，战则两亡。台湾如果能和大陆统一，应该是双方心甘情愿、欢欢喜喜的统一；台湾如果独立，中国和台湾之间也应该是亲密友好、有特殊关系的邻邦。真正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促进两岸的良性互动为己任。

2003 年 12 月 1 日

猜一把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已进入倒计数，距投票只有20多天了。据ＴＷＢＳ消息，民调显示 43％被调查者支持连宋配的泛蓝阵营，支持阿扁泛绿阵营者仅占 36％，1％的人尚未打定主意。表示不愿领取公投票者也略多于愿意领取者。如无意外情况发生，看来蓝阵营胜出的可能很大。

如所周知，四年前，老芦写了《我欲因之梦琼台》，在大选揭晓前准确预言了阿扁获胜，并为李登辉和民进党人摇旗呐喊了一番，从此堕落为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兼台湾特务，被爱国志士们足足骂了三年多，直到去年下半年我写出一系列批评民进党人的文字来，才有同志明白我原来并没有拿台湾人的一分钱。记得五月海还在“罕见奇谈”上了个帖子，专门向我道歉。

四年后的今天，老芦从民进党人的同情者进一步堕落为反对者，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式的“螺旋式下降”。如今您要让我说心里话，我实在是盼望民进党人大败，让台湾的天空一碧如洗。

这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一言以蔽之：阿扁和民进党人“不识做”，磨穿了中立者原来对他们的同情心。

人类天生对弱者有同情心理，对恃强凌弱者常有同仇敌忾之心。这就是弱者的一种道义优势，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的丰富资源，但如何巧妙运用这资源则取决于弱者的政治智慧。

聪明的政治家懂得“哀兵必胜”的道理，始终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备受欺凌的可怜虫，但决不作祥林嫂，决不直接地反复地说出，

而是引而不发，点到即止，让公众自己去作出结论。如果作到这点，即可长期获得舆论同情。

可惜具有这种政治智慧的政客们实在太少。最常见的是那种愚昧政客，在尝到舆论同情甜头之后，误以为自己的道义优势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魔术口袋，逮住了死用滥用，老是用同一滥调反复刺激听众大脑中的同一个兴奋灶，很快就磨穿了旁人的同情心，让大众开始厌烦起来。到此地步这些同志还不醒悟，还要喋喋不休，直到把“弃妇”形象描到十足十。从陈水扁直到“民运”那干人，全都犯了类似错误，统统栽在了这上头。

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不知老子教唆的“知白守黑，以柔克刚”的政治斗争策略，主动脱出“受害者”形像，挑衅攻击对方，甚至干出拉登那种不择手段的滥事来，由此在大众心目中完成从受害者到 trouble-maker 的形像转变。阿扁当然不是本拉登，但论其策略本质，我实在看不出两者的错误有何区别。两者原来都是受强者欺凌的弱者，但两者的反击都过了头，导致公众同情心来了U转。

我原来对台湾的同情因素很多，首先当然是对我党的痛恨与憎恶，雅不愿看见五星红旗插上阿里山，玷污了最后一块华人净土；其次是我党恃强凌弱、作威作福的恶棍作派激起了我的强烈反弹；第一次台湾大选前我党发“空包弹”，对人家进行赤裸裸的武力讹诈。第二次大选前朱总理竟然召开记者招待会，以武力恐吓台湾人民，不许人家选阿扁。最后当然是“住民自决”的现代文明常识，使我坚信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神圣权利。就是在此背景下，我才写出了那一系列反战文字。

不料老扁却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下水，根本就没点国务家的头脑与气度。记得他当选时，外国评论家还指望他作台湾的尼克松，在对大陆关系上作出重大突破。如所周知，老尼原是最死硬的反共政客，不料他上台后竟然主动与中苏和解，奠定了“缓和”的国际政

治格局。这种事也只有他那前极右派敢干，民主党总统决无此胆量，否则立刻就要被共和党的极右分子骂成叛徒。

这梦似乎到现在还有人做。那天我看网友五月海的道歉帖，似乎就流露了这意思（如有误解，请他指正）。可惜这些人没看出老尼和老扁的根本区别，也就是能上国际政治台盘的熊肉和只配在小岛上胡弄愚民的猪下水的区别。

老尼当初之所以走那步，是因为他看出再和中苏对立下去，根本就无从结束越战，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毫无好处。因此，美国人民的利益需要他主动跨出和解的第一步。作为精明的政客，他当然也看出了自己此举的轰动效应。果然，他上台时仅以微弱多数当选，但竞选连任时却获得全面大胜，谁都知道那和他访华访苏的巨大轰动效应分不开。

这就是能上国宴的尼熊肉：在为选民谋利益时同时为自己谋利，在忠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搞党派政治，绝对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陈下水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如我在一系列旧作指出的，不统不独最符合大陆、台湾、美国两岸三地人民的共同利益。台湾人民当然不能被大陆无端欺负，但如果和大陆彻底搞僵了，甚至卷入战火，对台民什么好处都没有。因此，任何一个“民之祸福，长在我心”的民主政治家，一定会在维护台湾事实独立状态、坚持自决权的同时，把与大陆改善双边关系看成是外交的重中之重。如果这么干，则一定会在促进台民福祉的同时，如尼熊肉一般为自己和本党带来巨大的政治利益。

可惜这下水扁食（注：关于“扁食”之典，请看《聊斋》）却是个心胸狭隘、毫无器量、只知耍小聪明、既无战略眼光、又无起码包容的市井村夫。

先说器量，下水扁货和李登辉一样，当选后居然没有“全民总统”的观念，仍然和在野时一般，陷于省籍情结中出不来，自己把自己降为“本省人”的喉舌，把“外省人”当成归化了的外国移民后代，大搞极度短视、后患无穷的“台湾本土化”，简直是要把台湾蓄意制造为第二个北爱尔兰（请参见拙作《“台湾本土化”的隐忧》，民进党“理论家”洪老先生至今未能写出一字来反驳此文）。

陈下水关起门来搞这套变相种族歧视也倒罢了。他的同党还要把这些烂货搞到网上来。洪老先生不但肆意歪曲历史，把民进党执政前的华人政权统统说成是“外来政权”，甚至在网上煽动“种族”仇恨，连“中国猪”的侮辱字样都肆无忌惮地写进“文章”标题，让老芦这中国非猪更非下水气炸了肺。看来无论是中国“猪”还是台湾“猪”，只要一沾上“民主”二字，便个个是逼反同情者的行家里手。“民运”党人如此，民进党人又何尝不如此？统统是上不了席面的下水货。

陈下水的最可笑、最荒谬之处，还是丝毫不顾台民利益，简直把“打大陆牌”当成了《说唐》中张士贵骑的“呼雷豹”头上长的那撮毫毛。

据《说唐》介绍，该马头上长了一撮毛，只要主人一揪那毛，“呼雷豹”便长嘶一声，阵上所有的战马闻声立刻屁滚尿流，瘫痪在地，自然骑主也就只好听凭对方宰割。这马后来落到程咬金手上，他手闲不住，骑着它乱揪那毛，最后用力过度，把那撮毛揪了下来，从此“呼雷豹”就再也没有那威力了。

这就是陈下水干出来的烂事。4 年前，许多人本来不想投下水的票，不料朱总理慷慨出来为他助选，开了那个记招会，激怒了台湾人民，下水于是当选。执政四年，下水把脑筋主要动在煽动“种族”歧视与“种族”仇恨上，以及效模特儿拍“写真”，毫不知耻

地卖那张下水扁脸。四年雇佣期满，发现自己交了白卷，赶快故伎重演，搞什么“公投”，刺激挑衅大陆，指望再来一次“草船借箭”，让中共再次帮他拉选票。可惜他猛揪“呼雷豹”头上那撮毛，却用力过度，把那毛整个揪下来了。

下水扁脑里大概没有多少灰白质，所以看不出那毛和天下的所有毫毛一样，并不是无限可揪的。

第一，大众当然会同情被强者无端欺负的弱者，但如果弱者莫名其妙地对着强者猛晃拳头，跳着脚大骂曰：“中国猪！你有本事就来打老子！我就不相信你敢动手！老子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老子不等你动手，就先发制人，轰炸你的三峡水库大坝，淹死你半国人！”则恐怕那同情心立刻就荡然无存。

第二，据老芦在草根社会中数十年的观察，天下多的是“宁愿跪着生，不愿站着死”的庸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煽动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从来只是短效的，举凡政治大业，决不可能长期靠民众的义愤和同情心维持。四年前台民激于义愤选择了下水，那因素很多，在我这 cynical 之人看来，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还是中共叫多了“狼来了”，把自己骑着的“呼雷豹”头上的毛揪下来了，弄得台湾人心存鄙意，再也不相信中共会来真格的。

如今可不是这么回事了，连老美中央情报局局长都相信中共会动武。台民岂有不怕的？好日子不过，何必去无事生非找难受？难道就为了在口头上捍卫本来就享有的事实上的自决权？

第三，凡是比较成熟的国民，对政府外交上的成就远不如对其内政政绩的关心。换言之，成熟国民比较现实，注重的是实惠而不是什么虚无飘渺的“国威”。陈某内政搞得一塌糊涂，却专门在与大陆关系上作文章，又如何让台民看得上这种一心旁骛的当家人？

第四，“草船借箭”的前提，是对方上当。但哪怕对方再笨，您也不能指望人家永远上尊驾的当，因此，这种好事可一而不可再。如果对方不发箭，您就免不了变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第五，台湾如要生存，不能不仰承山姆叔的鼻息。山姆暗扣（uncle）的心事，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中说过了。换言之，揪“独立”那撮毛，不但让中共的战马屁滚尿流，也让暗扣的战马瘫痪在地。这种烂事干多了，暗扣免不得火起，当众赏尊驾一火腿，莫非尊驾连暗扣也要骂进去不成？当然只好抹抹肚子忍了，弄得里外不是人。

正因为此，下水最近才微妙地改了口风，奢谈起什么“台湾与中国文化上的同一”来了，可惜太晚了。

另一方面，随着中共逐渐脱去了那层痞子皮，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都不复当年的穷措大模样，开始有点专业人士的气味了，在对台关系上的举措尤其得体，有时简直让老芦怀疑中南海诸公（婆）是否看了老芦的有关文字，成了可教孺子。

我在论述两岸关系的旧作中，多次指出共党对台策略的重大失误，并引用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名言教育我党：

“威胁只有在自己确有决心和能力将威胁付诸实施，而对方也相信自己确有此种能力和决心之时才会奏效。”

过去大陆的文攻武吓之所以毫不奏效反而引起对方的反感和鄙视，完全是不懂这道理，乱揪想象中的“呼雷豹”头上的毫毛造成的。

我反复指出过，统一必须是双方情愿的自由恋爱，决不能是“强迫作爱”。唯一的正道是“戒急用忍”，促进两岸交流，使大陆和台湾结成强大的经济纽带，变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共同体。苟如此，则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结合，正如欧洲经验启示的那样。期以半到一世纪的时间，此策必收瓜熟蒂落、水到渠

成之功。舍此不由，却要去挥舞大棒，动不动高唱“我手持钢鞭将你打”，只会吓跑新娘。

当然，大棒有时也不能不挥，非此不足以震慑陈下水那种以国脉民命为儿戏之辈，但只能在幕后挥，决不能当成大菜，动辄抬到国际大宴的席面上来，弄得海外舆论哗然。台独的七寸，其实是在山姆暗扣那里。与其去威胁同胞，莫如去恐吓暗扣，让暗扣出面反台独，要比大陆出面有效一万倍。

这次中共似乎就这么干了，表面冷处理，幕后却作足了文章，作到了上面引用的基辛格名言。现在连ＣＩＡ头子特内特都深信，台湾如果独立，中共既有决心也有能力使用武力解决。此公乃是世上最大的间谍头子，连他小人家都这么说，有谁的权威还大得过他？人家的一句话超过《人民日报》社论、外交部严正声明的一亿句话，对台民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这种情况下，下水如果还要一意孤行，势必引起渴望和平的台民的强烈反感，而这才真正是釜底抽薪之策。

所以，老共这次干得还真漂亮，开始有了点“解放”前国府外交的职业水平。如果这么干下去，下水扁脸就这次当选也无足虑。只要暗扣扣死了他，跳蚤便使出吃奶力气也顶不起被子来。

当然，为两岸人民计，最好的结果，还是下水从此落败，以后每下愈况，彻底丧失政治号召力，这才是台湾人民之福。下水这呼雷豹头上的毛不拔除，两岸终无宁日。

2004 年 2 月 29 日

台湾独立对大陆的冲击

刚才网友问我，台湾如果真的独立了，对大陆会有什么影响？影响大了。

第一，因为中共多年愚蠢运作，滥用“爱国主义”这帖烂药，把愚民煽动起来，反倒剥夺了他们的外交回旋余地特别是让步余地。因此，如果台湾真的独立，中共不动武，势必天下大乱，温和派全面被整肃，甚至出现文官政府被推翻，枪杆子指挥党的恶性局面。台海战争如果爆发，则大陆必然完蛋，从此淹没在血海里，起码半个世纪后才会乱定。

第二，即使不打仗，它也会刺激党内权力斗争，导致军内强硬派占上风，使政府既定的改革计划大幅度转向。

第三，独立的台湾必然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港澳地区人民心目中形成带头羊，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加速中华帝国崩溃，导致前南斯拉夫式的惨剧。

老芦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从理论上赞成住民自决，你的问题，我早在四年前写的《丑陋的大陆人》中反复论述过了，但请别忘记，谈论抽象原则时决不能忘记具体国情民俗。现在的国情是，中国是由一个昏愦腐朽的独裁政党统治着无数潜在的暴民（＝愚民），危机深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台独将为中华帝国钉入第一颗棺材钉，导致 21 世纪第一场大屠杀，因为这些原因，我反对台独或任何独，不是从道义上说人家不该独，而是从民之祸福而言反对可能造成民族灾难的一切蠢动。

当初在《驴鸣镇》论坛和醉汉网友聊天，他说，如果独立不死人，则他也要回去搞东北独立，和日本南韩共存共荣，亲善提携。这虽然是笑话，但确实也就是这么回事。迄今为止，造成人类最大规模死亡的理论发明，就是民族主义。

2004年3月20日

为步履维艰的台湾民主政治祈福

这次台湾大选，牵动了亿万海外华人的心，害得老芦一宿没睡，守在电脑前同步跟踪计票结果。这里面当然不只是忧国忧民情怀，还有我个人的考虑：事前我跟台独人士洪哲胜打赌，说蓝军将赢。等到揭晓之际，当然要关注自己的预言是否应验。

事后证明老芦的政治洞察力果然非凡：如果不是变生不测的那两枪，阿扁早就输了。即使有那两枪的“悲情”煽惑力和陈文茜无比愚昧的应对提供的反面助力，绿营也才多出了三万票，而且还有作弊嫌疑。可见绿营确实不得人心。

台湾大选如此波谲云诡，一波三折，实在是让人不能不感慨万端，深觉台湾的民主政治之路暗礁重重，实在是步履维艰。

枪击事件的阴谋论解释难以成立

下面这些话，是我在大选结果最终揭晓两小时前写的：

目前的阴谋论有两种，主流阴谋论是阿扁玩苦肉计，末流则是小安子力主的中共暗杀。前者可谓事出有因——这种事出在这种时候，实在蹊跷；后者则极不可能：中共吃饱了撑的，去制造一个“民主烈士”？再说，人家要干，难不成连“基地”的水平都没有，不用肩扛导弹、火箭筒、迫击炮之类，却去用把改制土枪？

主流阴谋论，我看也不能成立。蓝阵营推出的12大疑点以及厦门大学某教授推出的若干疑点，我看都经不住推敲，倒是阿扁自己说的看上去可信：鞭炮声震耳欲聋，他连自己受伤都不知道，以为

是给鞭炮炸伤了，后来才发现越来越疼，这非常符合受伤的自然情形。至于绿方提供的信息自相矛盾，则完全是自然的。大凡在这种千头万绪的骡马大会中发生的事，开头获得的信息必然是这样，这倒恰好证明不像伪造——倘若是伪造，则恰好一出台便编造得滴水不漏，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

最主要的是，阿扁如果要造假，不该动作得这么晚。在大多数选民都已经打定主意时来这手，效果未见得有多大，政治代价却会很沉重，似乎不至于出此下策。

当然，造假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过我看难度实在太大，比韦小宝在冯锡范家埋死尸难度高多了。如果是假开枪，则有个事后制造车上现场（弹孔等）的难题。如果是真开枪，则有真的致命危险，再说凶手也可能被抓获，招供出来就不得了也。

所以我看，造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迄今为止，所有的质疑中，我看只有蓝营中某资深外科大夫的最有力。据他说，扁伤根本不像枪伤，因为没有子弹高速擦过留下的烧灼伤。但对方大夫则坚持说有烧灼伤，还说如果不信，只好请总统展览肚子给众人看了。有趣的是，蓝营某老汉居然说那不是扁肚，老扁太瘦长不出那油肚来，笑死我了！唉。

不过从网友贴出的照片上来看，确实是看不出什么烧灼伤来。老芦不懂医，也不知道那照片的分辨率是否可以高到显示烧灼伤。但问题是，如果阿扁想作假，难不成这边竟然没有个医学高手设想到可能会出现的一切破绽，造他个天衣无缝？

所以，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接受阴谋论。最大的可能还是这是一个偶发事件。

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看法。不管怎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前头。”最后结论应由警方作出，不能像陈文茜那样信口胡柴。更混帐的是，新党立

委郁慕明竟然对支持者高喊：“台湾的命运不是一颗子弹所能改变的，如果有第一颗、第二颗子弹改变大选，那么，就让第三颗、第四颗来改变台湾吧！”简直是暧昧地煽动暴民作乱。

和蓝营的愚蠢运作相比，阿扁的讲话倒确实有 statesman 风度。那讲话无一字攻击政敌，更没有影射栽赃，却把自己打扮成台湾民主象征的模样，利用中国人（尽管他们不承认）固有的迷信心理，说天佑台湾，所以自己命不该绝，台湾的民主不会失败，云云。好像他死了，台湾民主也就完蛋了，让老芦颇为佩服。比小聪明，蓝营根本不是阿扁对手。

选举无效？

蓝营以连宋为首，公开提出选举不公，要求验票。应此要求，台湾最高法院已经宣布查封全国所有票箱。

这要求看来也不是毫无证据，据亲民党立委周锡玮揭发，在高雄县三民乡的一个投开票所，所有废票都是投连宋的。还有记者发表照片，在嘉义县朴子市，投票者竟然是一名 5 岁女孩，而县长夫人竟然就站在她后面等候投票！

更蹊跷的是，据周锡玮披露，美国在台协会在 21 日下午 4 时与陈水扁见面，要求这次大选的选票要查清楚。立委郭素春则宣布：“美国认为台湾选举有争议，暂缓发出贺电！”国民党立委章孝严也公开提出美国未贺电，质疑选举不公。

耐人寻味的是，迄今为止，美国确实没有依国际惯例，向当选总统发出贺电，只由国务院发言人埃瑞利办公室代表美国政府发了个暧昧其词的声明：

> “祝贺台湾人民进行了一场民主的竞选活动，数量众多的台湾选民行使了民主的选举权。

> 我们注意到，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泛绿阵营以微弱优势获胜，泛蓝联盟已就此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我们相信蓝绿双方及其支持者，都会保持平静，他们会通过既有的法律程序，解决有关选举结果的疑问。”

从这个信号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美国对民进党政府的微妙态度。区区觉得，阿扁为了一党私利大搞边缘政策，时时逼老美在民主理论规定的道义和地缘政治的利害考虑之间作选择，已经失去了山姆暗扣的欢心。

蓝军反应殊不足取

我看到有的网友发表议论，认为蓝营要求验票是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无庸质疑。这话从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没有把现实国家利益考虑进去。而连宋阵营恰是在这重大问题上举措失当，令人鄙夷。

但凡大选这类涉及全民的大规模活动，出点差错甚至局部舞弊都是难免的。尼克松是历史上有名的无耻政客，可人家当初跟肯尼迪竞选时，明明有线索提示肯尼迪勾结黑手党在三个州舞弊，仍然以国家利益为重，公开认输并向对手道贺，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风范。即使是戈尔，也只是向最高法院申请裁决，并没向连宋那样，亲率民众前往总统府示威，让人不能不浩叹台湾无人。

此中之轻重缓急不言自明：台湾民主目前还在试验期，任何一个以民之福祉为重的政治家都会看到，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换言之，最重要的是鼓励民众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完善游戏规则，养成全民尊重游戏规则的习惯。在学徒期间，你不能指望一开头就如西方成熟国家那样，人人按规矩行事，不能因为出点差错就

纠缠不休，导致大众对这全民游戏是否可以公平进行丧失信心和热情。

更何况有的问题完全是缺乏经验造成的。例如废票多达 30 万，里面当然可能有作弊情事，但据说也有没有使用快干胶泥，导致票被污染的技术问题。这些都是在日后解决的技术问题，用不着借题发挥，挫伤民众的参与热情。

如今蓝营首领却带头杯葛选举过程，指责政府操纵选举，甚至质疑枪击事件，完全是人为地制造一场原可避免的政治危机和信用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对民主的信心，实在不足为训。

绿党应该吸取的教训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绿军这次都是险胜。最有说服力的是两项公投都因投票不足法定人数而作废，说明阿扁搞的那套“草船借箭，借力打力”肮脏诡计已被许多台民识破，公开以抵制的方式来表态不参与。

台湾的民主实验比不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完全是在夹缝中无比艰难地生长起来的弱苗。由于台湾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国共对抗的遗产，台湾民主政治一开头就举步维艰，民选政府面临着别的民主国家没有的难题：与大陆的关系和内部族群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定会朝乾夕惕，戒慎恐惧，处处着眼于和平解决与大陆关系的历史性难题，化解内部的族群矛盾，争取实现内部的统一和谐，谋求良好的国际环境。

但阿扁上台后却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发国难财，靠历史悲剧渔利，刻意制造矛盾，激化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对内则大搞“本土化”，谴责所谓“外来政权”，以煽动岛内族群之间的对抗来谋求一党私利。他放着全民总统不做，却自行降为本省人的总统，使

原应基于代表不同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政党之争，堕落为不同族群之间的混战。这种效法前南斯拉夫米洛塞维奇的“种族民主”，只配为有识者唾弃。

好在这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台湾人民正在逐渐成熟，已经看穿了阿扁那套坑民误国的下流把戏。即使有了暗杀事件和 30 万张废票的助力，绿军也仅仅多出了 3 万多张票。这对绿营应该是一个促使他们清醒的警告。须知执政党连任是惯例。无庸讳言，执政党竞选连任总比在野党容易。美国总统如果不是有重大失误（例如卡特没能救出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则一般都能赢得连任。如今在朝的绿军却只赢得三万张选票，比起四年前来，选民支持率只上升了 10％。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如果还要庆贺成功，实在是自欺欺人。

总而言之，希望民进党政府好自为之，吸取教训，与过去那种狭隘的族群观念彻底决裂，拿出全民政府的气度来，搞利益决定的民主政治而不是“种族民主政治”，处处把全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在忠于全民利益的前提下玩党派政治。这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样子。

这劝告当然也适用于在野党。朝野双方都应不倦努力，争取把台湾的民主变成西方式的 decent 的 fairplay，为大陆人民作个辉煌的表率。不要弄巧成拙，反倒让大陆人民看不起民主制度。

为步履维艰的台湾民主政治祈福！

2004 年 3 月 21 日

台情断想

我对统独之争的立场

我觉得奇怪的是，本人写文章，从来专用大白话、大俗话，不意至今还有网友不明白我对统独之争的立场。为避免读者进一步的误会，兹在此用再不可能招致误会的语言讲明白我的立场：

A、本人不是台独分子。

B、本人不是主张大一统的“爱国主义者”。

C、本人坚决反战，特别反对武力攻台，为此在四年前大骂中共，现在大骂下水扁食，出发点完全是同一个。

D、中国是统一还是大卸八块，我毫不在乎。不过，鉴于前南斯拉夫的教训，考虑到中华民族是世上愚昧绝伦的民族集合体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共党多年统治积累下来的民间和族间的深仇大恨，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地区独立都只会引起民族之间的疯狂大屠杀，因此，在现阶段，本人疯狂反对一切地区、民族的独立，主张维持现状到后代有足够理智、能和平分家之时再说。

希望这四点声明一劳永逸地说明白了我的立场。

流氓与民主政治

昨见网友感叹，说在中国搞政治，从来是谁流氓谁赢。其实这感慨，我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晚清朝廷孤儿寡妇加孙黄，斗不过袁项城那小流氓；汪精卫那小白脸，斗不过蒋介石那中流氓；其介

如石之蒋公，斗不过毛泽东那超级大流氓。说到底，政坛如沙场，两军相逢狠者胜，两氓相逢痞者赢。所以，连战那小白脸公子哥儿，注定是败在水扁那贫寒出身的市侩流氓手上。

许多人对水扁有好感，因为他是平民出身，这就是民主制度给人的幻觉之一：它像传统中国的科举制度，造成了一种"人皆可以为总统"的"政治 lottery"错觉，记得樊弓教授就曾用"在美国，任何人只要想就可以当总统"来证明"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梦话（难为他还使用了"证毕"字样！）。其实姑不说这胡话天真到近乎白痴，"平民出身就可敬"的屁话也毫不成立，跟我党的"阶级分析"也差不多。要我挑阿，我还是宁愿要贵族出身的同志作总统，这种人的心态起码不会受到朱元璋、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严重扭曲。

既然是政治，就必然脱离不了流氓气味，所谓"政治家"就是"流氓"的别名。无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统统如此。两者的区别，不是政治家道德水准的区别，而是制度设计之合理性的区别。西方民主政治的假定是"人性恶"（记得思云在此胡说八道，说出什么"无罪推定"是西方民主的基础的屁话来，其实恰好说反了，民主制度的设计前提就是假定政客们一定会滥用权力，人民必须像防贼一样地防他们），靠制度来实行以毒攻毒，以权力制衡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要学西方搞民主的根本原因。

可惜咱们那个弱智之邦的特别弱智的"民主精英"们死也没本事弄明白这点，爱屋及乌，对民主制度这并非完美无缺的俗世发明实行"三忠于四无限"不说，还要把中国传统的那套"德治"原封不动地搬来，对西方政客顶礼膜拜，以为那些人统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在国内拜龟孙中山还不够，到美国来还要见佛拜佛，遇塔扫塔，连布什那种不成材的烂仔都当成大罗金仙，真让人看了不能不恶心。

其实阿扁那些上不得台盘的烂事，东西方政治家统统干过。基辛格最痛恨的人是北越总理黎德寿。据他说，老黎和他在巴黎谈判，动不动就装心脏病发作，当场“昏死”过去，以可怜相来软化对方心肠，诱导对方在关键条款上让步。肯尼迪虽然出身豪门（这倒和我刚才的理论相冲突，算是规律的例外吧），却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这家伙肝脏有病，长年黄疸，怕美国人民担忧他身体不好，便雇作家写文章编造神话，说他这二战英雄（那倒不是吹的，他真得过勋章）在太平洋战区为保卫祖国患了恶性疟疾，导致面色发黄。老尼的烂事更ＴＭＤ多，居然授意手下人雇佣古巴难民潜入心理诊所，盗窃政敌病历，以披露他人隐私来搞臭对方。

所以，阿扁那“暗杀案”（我现在也开始相信“阴谋论”了，唉）虽然不要脸之至，说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

不过，庄子说的好，“盗亦有道”，连做强盗都有职业道德，何况是作政治家（＝流氓）？黎德寿装心脏病发作，是为他的祖国争利益；肯尼迪雇佣枪手帮他写书争普利策奖，虽然是欺骗公众，却也没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尼克松对付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但唯其那种痞子，才有铁血心肠滥炸河内、布雷海防，炸得北越再也挺不下去，不得不乖乖回到谈判桌上，满口答应原来拒绝的条款。所以，只要符合全民利益，便作流氓，似乎也可以原谅。

但阿扁这次的流氓作得实在混帐。为了作总统，竟然不惜造成国家政治危机和政府的信用危机，导致国民分裂，对民主政治丧失信心，在大陆人民面前为民主政治抹了黑，真是罪不容诛！

结局预测

我看，台湾不会大乱，闹腾一阵子也就算了。反对党毕竟抓不到过硬的把柄，最后还不是只有揉揉肚子忍下这口恶气。今天我转

贴来的那新闻已经说了，票箱虽然已经封存，验不验还得听阿扁任命的最高法官。这结果不是明摆着么？

那破案的事我看也没指望。我最觉得奇怪的是，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如安全、防卫、治安、情报等系统，按理说应该完全中立，不该介入党派政治，在破案时不得受政府控制。可台湾似乎不是这么回事，不但国防部长是军人而非文官，而且似乎连警察系统也听政府指挥，这ＴＭＤ算什么民主国家？既然如此，还破什么鬼案？正应了敬爱的林副统帅的话：取得政权；就取得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

总而言之，目前的骚乱终将平息，决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而阿扁的总统也就坐稳了。未来四年，对于民进党人来说非常关键。这四年中，“台湾本土化”运动一定会由政府以强力推行，使台湾人残存的“大中华情结”稀释到等于零。

我在旧作中说过，比较一下 80 年代出来的台湾学人和最近出来的台湾留学生，立刻就可以看出两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天差地别。老一代留学生统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爱国情怀比我尤甚三分，可新一代根本就没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由此可见官方洗脑的伟大作用。

楼下王希哲大放厥词，不知道他老人家到底是以台湾国民党人身份，是以大陆民运党魁身份，还是以前文革武斗瘟神的专家身份胡言乱语？他号召台湾人民实行“571 工程”，煽动武装暴乱，以暴力推翻人家通过民主程序合法产生的民选政府，似乎只证明此公大脑严重错乱到了彻底脱离现实的地步。建议他还是去台湾考察一次，或起码找几个在美台胞开个座谈会，看看台湾人到底是认同美国多些，还是认同大陆多些；台湾是更像美国，还是更像大陆。

总而言之，愚以为：

第一、此次大选结果逆转的希望不说为零，也非常之小；

第二、目前的骚乱不会持续下去，终将逐渐平息，因为国亲两党毕竟没有过硬证据，长期闹下去反倒显得是无理取闹；

第三、民进党继续执政四年，台湾“本土化”运动势必得到进一步推进，使台湾离大陆越来越远，反对党在四年后“咸鱼翻身”的希望越加渺茫。而两岸关系也决不会得到大幅度改善，进入良性互动，这势必给中美政府带来共同的难题。可以设想，以后是中美在某种程度上结盟共同对付台湾，虽然这设想看上去似乎太匪夷所思；

第四、未来四年中，台湾不会宣布独立，但阿扁一定会不时乱揪“呼雷豹”上的那撮毛，以边缘政策去骚扰惹恼大陆，在中美两国政府首脑心目中变成不折不扣的 nuisance。台湾的悲哀，是无论是该国首脑还是人民都没有真正独立的气魄，不能不仰承山姆暗扣的意旨行事。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反对党立委在广场上以美国没发贺电作为太上皇旨意来号召民众就够了。台湾在精神上过于依赖美国，因此，只要美国人不同意，他们就绝对没那胆量独立，而老美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目前不统不独的现状才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第五、阿扁这次的流氓行为，在精神上分裂了台湾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脸，在国民心灵深处玷污了民主的神圣字眼，留下了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它犹如北洋政府的曹锟贿选一样，必将在未来台湾政局中留下深远的负面影响。

大陆是否会动武？

不会。只要台湾不捅破那层窗户纸，宣布名义上的独立，大陆就只会装聋作哑、眼开眼闭混过去。大陆的内部危机实在太深重了，中共根本就心无旁骛，岂敢再去对外用武贾祸？

不过，不能排除此事会构成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口实。而且，扁嘴再当国四年，大陆政府也实在没有好日子过。其实阿共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台湾当局不公开给大陆难堪就行了，无奈阿扁打大陆牌已经打出了瘾来，要他就此戒断，恐怕没那么容易。方今之世，大陆不用打台湾牌政权也能生存，而民进党不打大陆牌便岌岌乎危哉，因此，双方形成了一种攻守定势：民进党靠台海危机渔利，而中共文官政府因台海危机遭灾。这一攻守态势看来起码还要延续四年。这种紧张局面的持续存在，实非两岸人民之福。如果台湾当局的边缘政策最终催生了大陆的强硬军人政权，则两岸人民的大限也就到了。

当然，老芦是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但愿上面所说的话没一句应验。

2004 年 3 月 22 日

焦大的悲哀

余大郎那天跟帖笑话“王稀汁”，说王希哲会让国亲（不是皇亲国戚，是国民党和亲民党）塞上满口马粪。这话我越想越觉得入木三分，所以才来写此短文略作发挥。

焦大的悲哀，在我看来，是刻舟求剑，不知或不顾时移世易，死抱着当年的老黄历就是不肯放手。当年他和贾府的太爷一道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一生对贾府忠心耿耿，总是以为后代会和荣宁两国公一样厉行延安作风，及至看见他们花天酒地，“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要痛心疾首，大骂出口，最后挣来的便是满口马粪。

王希哲又何尝不如此？此人直到现在，还居然没从先总统蒋公的“反攻大陆”的春梦中醒过来。世上竟然真的有这种一睡数十年的“睡美人”，如果我不是亲眼在网上看见，还真不敢相信。

我和王是同代人，文革时代的中学生，只是我是老高三的，大概他比我低了一两届吧。但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他至今还居然还连我 70 年代初的觉悟都没没有。

盼望蒋公反攻大陆的梦我也做过，不过那是在 70 年代初不堪水深火热时的绝望梦想。但即使在那时，我也知道毫无现实可能，不过是走投无路之余的自欺而已。其时王却是比毛还左三分的马列主义者，等到 30 年后，他才开始作起“反攻大陆”的梦来，而且还居然把梦想当现实，连我 20 刚挂零的水平都还没达到。

事情的可笑度还远远不止此。当年小芦发梦时，老蒋还在，人家可是真有那贼心没那贼胆的，而且，朝野都同仇敌忾，一致把大

陆当成了光复对象。如今台湾有谁还会做那种梦？恐怕连老兵都早就死了那条心。绿蓝两军的分歧当然有政策上的分歧，但更重要的我看还是权力斗争，把蓝军当成了当年“汉贼不两立”的国民党，这可笑程度跟把美国的民主党当成共产党也差不多！

我早就开导过王先生：如果不能实地到台湾考察，最起码在发宏论前，先就近找几个台湾年轻人开个座谈会，看看人家到底有多少“大中华”情怀，到底是更认同美国还是中国，到底是更像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对自己的锺情对象毫无了解，一厢情愿地单相思，以为人家会在你这伟大统帅的率领下，千军万马跨过海峡，浴血死战，去光复大陆，这种妄想，比慕容复拜段延庆作干爹，想借大理国的兵去灭了大宋还更滑稽万倍。

最奇特的是，王先生因为当年指挥过儿戏式的武斗，从此便以为是拿破仑转世，时时处处进入角色，不是以耆老之身发豪言曰：“将来我带兵打中共”，便是居然以“台湾人民武装起义总司令”的身份，在网上推出行动纲领，庄严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武力推翻“伪民选政府”。让任何一个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不能不劝他去看看心理大夫，虽然这听上去确实像是人身攻击。

其实王司令值得同情而不是谴责，他以现身说法的直观方式，再生动不过地向网民展示了党文化加封建糟粕会使人脱离现实、彻底丧失心智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更可悲的是，他居然看不出自己的可怜亦复可悲的小丑角色，竟然悟不出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国民党的最大难堪。直到现在人家还没来塞他满满一嘴马粪，恐怕是忙着对付民进党没功夫吧。不过，等尘埃落定之时，哪怕是为了公关形象，我相信人家迟早也会动手术把这莫名其妙的赘生物切除，免得授政敌以柄，涉嫌收养暴徒。

据说吾尔开希也到了台湾，不知是真是假。我看阿，台湾无论哪党，最好都别跟大陆出去的什么“民运”、“人权”人士来往。

这些人全是下三滥，谁挨上谁倒霉，不但绝对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而且直接就是妨主的的卢马。

2004年3月25日

“中国人的立场”

前文贴出后，人之初先生说，王希哲先生有信念，所以应该鼓励他发言，不应该让他住嘴。这话完全是对我和王司令的双重误会。从老芦这边说，我写文章冷嘲热讽，目的不是要让他闭上嘴巴，而是让他睁开眼睛。从王司令那边讲，他又岂会因我的区区文字住嘴，难道我的文字比“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还要大？这岂不是小看王司令么？网上是个费厄泼赖的地方，王司令不服，完全可以请芦入瓮，尽情讥笑我的心智，是不是？

据人之初先生的观察，王先生是极难得的有信念的人。今天他和小安子吵架，我也没细看双方的帖子，只是模糊地记得王司令说，什么都可以背叛，只有中国人的立场不能背叛。所以，看来他那万分宝贵的信念就只有一个：民族主义。除此之外，什么都可以背叛，民主信念、人道主义等等概莫能外。

奇怪的是，此话一出，顿时彩声雷动，居然没人出来问一声，到底那是什么中国人的立场。

在我看来，王先生确实采取的是“中国人的立场”，而且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人的立场”，可惜用现代文明人的观点来看，那不过是下三滥中国痞子的立场。

根据王先生的“信念”，不管是什么主义，也不管是什么政治行为，什么政党，什么政府乃至政治组织，只要与他的“大一统”观念相冲突，就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哪怕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也要发动人民起来以暴力推翻，理由很简单：该政府的

政策不符合他的“中国人的立场”，所以就只能是“伪民选政府”，是武力消灭的对象。

假定王先生的信念真的得到了台民的呼应，台湾发生了王先生呼唤的“人民起义”，那又便如何？全岛陷入暴乱，满足了中共对台用武三条件，为避免外人趁火打劫，共军大举登陆台湾，卷入岛内战事，由此触发本来就万分危急的国内危机，全国陷入大乱。一番混战之后，全国人口十停死去四五停，这才逐渐恢复和平，由某个转世毛泽东再次统一大中华，弘扬国威。请问，那除了为独裁者带来历史上的风光体面外，对普通中国人来说，究竟又有何乐趣？

中国的千年悲哀，正在于有过太多太多这种信念坚定的志士，他们激于中国在近代史上所受的屈辱，把“祖国尊严”当成了最高的终极信念，为此不惜践踏和背叛人类的一切良知，为亿万普通中国人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甚至死亡，在对全民犯下一系列史无前例罪行之后，他们还要坚持认为“胜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因为“人命轻于草芥，社稷重似泰山”！

在我看来，如果说这世上有什么最高的道德和终极信仰，那就是人道主义。偏离或背叛人道主义精神、无视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的疯狂行为绝对只会是罪行。以“民族大义”号召煽动内战的人，无论喊出何等蛊惑人心的口号，打出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帜，统统都只会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国贼罪犯。这种罪犯的信仰越坚定，一旦得逞后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也就越严重。如果毛泽东是邓小平那种毫无信念的实用主义政客而不是病态的理想主义者，中国人如今在海外一定要风光万倍！

“中国人的立场”不是只有一种，大多数其实是很下流的龌龊把戏。以“中国人的立场”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的政客是最危险的政客，只讲“大义”，不考虑普通人祸福的政治家一定是丧尽天良

的野心家。如果您想做个现代文明的中国人，恐怕先得学会这些常识才行。

2004 年 3 月 25 日

“曲线反台独”志士洪哲胜先生

众所周知，四年前，无论是对李登辉还是陈水扁，我的印象都非常之好。对民进党当国，我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希望，那倒不是天真如五月海，以为扁脸会变成统一的黑马。前两天我才再度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统是独，I don't give a shit。早在四年前我就在《丑陋的大陆人》中反复讲述过，只要人民安居乐业，所在国家究竟是一个，是两个，是N个，究竟又有何差别？在现阶段，我反对台湾形式上的独立以及一切民族或地区的独立，无非是因为特殊国情意味着那一定会导致战乱与种族灭绝。

四年前我寄大的希望于（这可是抄袭伟大领袖语录了）下水扁陈，乃是希望台湾在他的领导下，从此迈上民主的康庄大道，为大陆作个带头羊，摸索出一套在中国文化传统下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宝贵经验来，为大陆人民作个光辉的示范。记得我在《我欲因之梦琼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 “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台湾人的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他们以高度的胆识与智慧实现了我们没有本事实现的梦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台湾人的贡献，因为他们用事实驳倒了‘民主不适合中国民俗国情’的先验认定。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学习台湾经验，以普及教育、地方自治等和平渐进的手段去开发民智，为奠定民主基础踏踏实实地下水磨功夫。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为台湾人祝福，祝他们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好，祝愿台湾的今天，也就是我们的明天。
>
> ……………

> 民主的台湾成了一面镜子，纤毫毕现地显示了独裁的中共的丑陋；民主的台湾犹如黑夜中的一星灯火，时时刻刻提醒中国人民他们原可以有别种体面的像人的活法；民主的台湾中找不到一个可以以淫威相屈、为厚利所动、拿人民利益作肮脏交易的独夫，使得中共‘一国两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妙计落空。”

四年后回首，我不能不无限辛酸地发现自己的浪漫主义是何等天真可笑，而帮我从这迷梦中惊醒过来的，乃是曲线反台独的志士洪哲胜老先生。自从我的台湾朋友回国后，我早就停止了阅读台湾报纸，对民进党的了解，主要还来自于洪老先生在网上的现身说法。全亏他的再教育，才让我明白了民进党的民主是怎么回事。

老芦的野徒出尘公子说过一句让我终生佩服的话，道是：“仇恨和民主精神不相容。”这其实是鉴别真民主与伪民主的一个重要尺度。不幸的是，我通过洪先生看到的台湾式民主恰恰基于仇恨，陈水扁政权不过是一个类似前南非种族主义政府那样的民主政权。

这种民主政权的最大特点，是它有一个明确的仇恨或歧视对象，不但以从政治上消除这仇敌为本党宗旨，而且以煽动仇恨或憎恶心理来号召人民，形成政治凝聚力，构成一种政治权力资源。达到这目的最有效的法宝，是我党发明的“忆苦思甜”，专门在刺激听众的肾上腺上狠下功夫。洪先生几年来孜孜不倦于此，实在让我惊讶他从未受过我党教育，到底是哪儿来的“天眼通”。

在洪先生笔下，台湾历史如同我党改写的中国历史一样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民进党上台前就是台湾的“解放前”，所有的政权不但都实行专制暴政，而且都是外来政权。因此，这种统治具有双重的黑暗性：统治者不但是独裁者，还是异族侵略者，人民不但是暴政下的奴隶，而且是呻吟在异族侵略者铁蹄下的亡国奴。

为了捏造这个神话，洪先生效法我党以宣传帝国主义侵华史煽动仇外心理，专门在网上宣讲“中国侵台史”，甚至上溯到三国东吴时代去。好像大陆人的老祖宗飘洋过海到台湾去，都不过是上那儿去掠夺人家的金帛男女。在我记忆中，似乎只有ＸＸＸ先生在网上大诉几百年前的蒙古侵宋血泪帐与此差相仿佛，就连希特勒那种族主义的老祖宗，都没干过这种以翻历史旧帐煽动种族仇恨的烂事。

就算洪先生说的都是真事，那又便如何？哪怕芦家远祖全是海盗，专门到台湾去杀人放火，跟区区在下究竟又有何相干？莫非洪先生要实行“远祖债，灰孙还”的连坐新法律，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敦促我良心发现，自动赴台湾投案？就连我党也才查到三代为止，莫非洪先生觉得那还不够科学？如果洪先生不是这个意思，那请问您宣传这些历史仇恨，还能有什么别的现实目的？预期起到何种效应？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美国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洪博士，竟然堕落到不惜编造“科学证据”，撒出弥天大谎来，言之凿凿地说90％以上的台民都有原住民的血液。这种神话完全是对网人智力的公开嘲弄，我就此问过他几个问题：

第一，这发现有什么根据？难不成 90％以上的台湾人的基因组都作过测定？检验报告在哪里？

第二，那血液的份量请问是多少？原住民就算全部和移民通婚，两者比例如何？如果前者远远高于后者，难道不会给稀释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第三，那 90％以下的台民是否就是台奸，必须遭受歧视？

第四，难道台湾人立国的 national identity，居然是生物学依据而不是历史文化的同一？这种主张，请问和纳粹测量头颅尺寸和其

他身体特征来确定子民的亚利安血统的纯粹度究竟有何区别？难道台湾版本的民主，就是新纳粹主义？

这些问题，他到现在也答不上来，只能一如既往，使脸皮顶过去，如同陈总统用夹克衫挡住子弹一般。

就算那是真的，他也恰恰在此露出了种族主义的恶臭。任何有点世界史常识的现代公民都知道，在生物学上作文章，正是种族主义的最明显标志，当初纳粹的“科学家”们就化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测量比较犹太人、吉卜赛人、非洲人与所谓“亚利安人”的头颅尺寸形状。党卫军候选人都要经过最严格的体检，以确定他们的亚利安血统是否纯正。

说实在的，看了洪先生那惊人的人种学研究报告，我禁不住暗自为 10％以下的无原住民血统的台民当心：这比例与我党最爱使用的 5％实在太接近了，他们会不会变成类似“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或“民族异己分子”？这也是我请教过洪先生的问题之一。他贵人事忙，迄未赐复，更是让我为那些不幸的“外来政权余孽”转侧不安。

总而言之，蒙洪先生在网上耳提面命长达四年之久，老芦便再迟钝，也领略了民进党人的基本教义，在此不揣冒昧总结于下，如有掌握得不够准确之处，敬请洪先生拨乱反正：

一、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甚至不是华人。“解放前”的一切华人政权都是外来侵略者，都是暴政，一片黑暗，绝无丝毫光明，绝对不能实事求是的肯定那段历史中应该肯定之处，只能忆昨日之苦，思今日之甜。

二、台湾人虽然具有与中国人同样的文化、历史、传统，但那是中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结果，不能作为民族认同依据。

三、台湾民主化就是台湾“本土化”，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民进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的斗争，不是民主国家议会政党之间的争

权夺利，而是民族解放战争，它意味着在思想上彻底清除大陆文化影响，在政治上组织上彻底清除外来政权余孽，消灭“国民党这些暴政残余的兵勇”，使得“外来政权彻底失去踪迹”。

四、为了达到民族解放的神圣目的，必须将中国大陆视为假想敌，将对国府的仇恨扩散到现在的大陆政府和所有的当代中国人头上去，将两岸亲善视为对异族侵略者的变节投降，将岛内的统一主张当成卖国言论，为此，必须在人民中搞层层划线站队，将统派谴责为出卖祖国的台奸和中国猪。换言之，这种民主自由有明确不移的底线，那就是决不宽容主张统一的政治主张，因为那是卖国罪行。

这就是我多年学习洪哲胜思想的一点心得体会。当然，到目前为止，它在许多方面还只是一个理想蓝图，尚未完全兑现为社会现实。

这就是我为何痛恨民进党人，希望泛蓝阵营当政的原因。我其实并不在乎台湾是否独立，也不认为国亲执政会带来大幅度的两岸关系改善。但我痛恨这种蓄意制造台民分裂、逆世界文明大势而动的种族主义政权。台湾是华人实验西洋民主的宝贵实验室，如果台民被一群鼠目寸光、心胸褊狭、陷在陈年宿怨中不能自拔、以琐屑怨毒立国的宵小领入歧途，使宝岛变成大陆文革期间两大派的角斗场，使台湾步北爱尔兰甚至前南斯拉夫的后尘，跌进民族分裂的万丈深渊，那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空前的悲剧。

2004 年 3 月 25 日

陈水扁政权不是法西斯政权

——答郑义先生

刚才看见了狗崽子阶级弟兄（这是老马的封赠，却之不恭，呵呵）老郑的大作，惊喜交集，赶紧来回贴。

老郑说：

> “芦笛还是客气了：陈水扁哪里是南非式的种族主义民主，似乎更接近于希特勒上台初期的民主吧？………同希特勒一样，陈水扁（李登辉）也是民主选举上台，靠的也都是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激起的仇恨，并对人民之一部分实行歧视压迫……所不同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用对外战争造成巨祸，陈水扁（李）没有这个能量，他能做到的，也就是玩战争边缘游戏，以夺取和巩固权力。
>
> ………
>
> 据我对民主的理解，富人穷人，本省人外省人都是人民，更不用说他们的后代。我坚信一条真理：以任何名义在人民中制造仇恨与分裂都不是民主而必定是专制！从此我再不受台独之迷惑！血缘、出身、种族等歧视，与共产主义的阶级歧视是性质相同的！”

第二段话我特别同意，举四肢赞成。说出这种话来的人，才是和老芦一道遭受过社会歧视与迫害的好弟兄！

西方民主和“人民民主”或“种族民主”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是全民民主，决不因谁的种族、出身、成份、教育程度、经

济状况、政治主张就实行歧视，甚至动用国家机器剥夺人家的天赋人权。

两者的另一根本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的政治斗争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手段，其目的在于达成合理妥协，而后者把政治斗争当成不流血甚至流血的战争，目的是全面压倒对方甚至消灭对方。前者以人道主义的博爱为政策基础，后者则一定要诉诸盲目仇恨。因此，一个以煽动仇恨作为政治资源的政党，必然是邪恶的政党，以仇恨立国的国家，必然是邪恶的国家，所以，我完全同意你这句话：

“以任何名义在人民中制造仇恨与分裂都不是民主而必定是专制！”

这其实也就是我“扫荡”伪民运的根本原因：他们把对专制制度的痛恨扩散到全体共产党人甚至所有拥共派头上去，把为数绝对超过一亿的人民开除了“人籍”，实行你我都备受荼毒的毛主义。我和那些人的根本区别，是我正因为受过毛共的糟践，对那套恨之入骨，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奔走呼号，防止那套邪恶政治再在中国重演，而那些人（如贵友高寒先生）却是做梦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烧饼再翻过来，让对方也尝尝暴政滋味。

不过，我不敢同意的是你对陈水扁政权的基本评价。我倒不是客气，老芦是网上头名战犯，骂人之毒，直追敝同乡绍兴师爷鲁迅先生，网人有目共睹，这“客气”的恭维还是第一次听到，呵呵。不过我的嘴毒，恰在于我目光锐利，作出的指责抨击一般都是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因为特别准确，正中要害，对方才辩无可辩，赖无可赖，不能不把我恨进骨髓里去。

正因为我的一贯风格如此，我才不敢同意你对陈政权的基本估价，因为那似乎不够实事求是。当然你将两者作类比也有一定依据：两者都是人民选上去的，两者都靠煽动种族仇恨渔利，蛊惑

（似乎不能说是“裹胁”，后者似乎有使用暴力威胁的涵义）了大量民众。不过在我看来，两者的类似之处也就到此为止。你忽略了最本质的一个区别：迄今为止，台湾的民主政治基本还是程序民主，而这正是西方民主和毛共“人民民主”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

其实我本来打算就这问题写篇东西《我们的民主和他们的民主》，其要旨就是，世上有不同形式和实质的民主，毛共的“人民民主”是一极，而西方的程序民主是另一极。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尊重不依民意为转移的基本游戏规则。两者都同样强调人民支持，同样以代表大多数人民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确实都代表了大多数人民。但共党与纳粹取得民意支持的方式，是使用暴力撕毁不符合他们心意的游戏规则，仗恃人多势众，任意制定新规则并随便践踏之。这种民主的实质，是剥夺法律对少数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最终必然导致暴力拜物教，形成恐怖统治，使大多数人民轮流充当迫害者与受害人。而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能避免这种暴民政治陷阱，正在于它强调游戏规则高于一切，民意的体现必须通过程序来进行。

用这个标准来考量台湾政治的实情，我不能不说，陈阿扁尽管是个祸国殃民的阴毒小人，他却是基本遵守了游戏规则的。当国四年，他从未像希特勒或毛泽东那样，靠直接诉诸民众，绕过现有的政权机构，践踏既存的游戏规则另搞一套。

或许有人要说那枪击事件是践踏游戏规则，对此我不敢苟同。哪怕那完全是陈自导自演的丑剧，那也不过是试图欺骗公众，并未依靠暴民胁迫政敌，更未动用国家机器整肃对方。而且，假定陈确实导演了那场丑剧，那又到底算是犯了什么法？须知世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没有什么专门立法，禁止总统候选人以假装被刺来骗取选票。作为总统候选人，这种欺骗行为当然极不道德，但毕竟不是普

通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民间诈骗案，谈不上严重违反游戏规则，顶多只能说是钻了规则的空子。

因此，我同意网友消极的观察，阿扁是律师出身，专业就是在体制内玩死人，蓝阵营有本事，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在体制内把对方玩得翘辫子，这才是称职的程序政治家。

可惜连宋那对草包似乎根本不配玩现代文明政治，一误再误，在枪击事件后竟然不待调查，便胡乱表态，公开指责对方作假，嗣后又率队前往总统府示威，在提出验票、对方同意后还不甘心，现在更蠢蠢欲动，蓄意制造大规模群众冲突，以此施压来迫使总统下台，简直是对民主政治的公开颠覆！如此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就连我这个巴不得他们上台的同情者，都要隔洋拍案而起，将电脑屏幕上那张连小白脸啐个满面花！

相比之下，阿扁的一系列动作颇具现代政治家风范。他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处处体现出以大局为重、相忍为国的气度。不仅他在“遇刺”后的讲话可圈可点，而且对方要验票，他也就同意验票，见招拆招，反倒将死了对方的军：这验票的活谁来干？还不是当初那些点票的工作人员。其结果不验可知。如果验完了还是那结果，请问蓝营如何下台？如果蓝营不同意由原来的人员验票，一则直接得罪了那些人，再则又能请谁来验？遮莫请联合国特地派出蓝盔部队来开箱？就算请得动，那些人又识字么？

因此，蓝营现在要诉诸街头暴力，可以说完全是斗智输给了对方，智穷势蹙、骑虎难下之余狗急跳墙。话虽难听，可惜真情就是如此，连我这同情者都不能不这么说，否则对不住我客观公平的名声。

事到如今，蓝营大势已去，越折腾下去，败的就只会越惨，不但加剧恶化了民进党人造成的人民分裂，把大批中立者变成绿营兵，而且招致国际文明社会的反感，让美国靠山看穿他们不过是一

群扶不起的刘阿斗。最后连民进党执政以来一直存在的“朝小野大”局面都要不复存在。

这就是我出来痛斥贵友王希哲先生的原因。其实那不是吵架。我主要是见不得他酷爱暴民民主入了骨，惟恐台湾不乱，是个反台乱台分子，想把毛共恐怖统治输入到台湾去，所以要拍案而起，出来大骂之。这种人跳得越厉害，就越是妨主，一定要把人民心目中残存的蓝色留恋冲洗一空而后快。这也毫不足奇，我早就说过无数次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从来是伪民运人士如贵友高王二位的专业，他们的网上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正直的中立网民对所谓“民运”事业甚至民主本身深恶痛绝。

关于你对台湾问题和中共问题的基本分析，我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你说：

> “李登辉陈水扁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之大劫巨祸：由于他们的挑动，台湾可能从初步民主走向专制，大陆则可能从争民主变成打内战。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的存在，中国可能从共产主义普遍崩溃的历史大潮脱离出来，走上一条格外艰难格外血腥的坎坷之途。有人说共产党一打台独就会垮，当然不排斥这种可能。但还有一个现实和另一种可能：共产党利用台独凝聚人心，无论台海之战胜负，以领导战争获得合法性，以‘外患’、民族族群仇恨压倒自由民主。无论从岛内政治、大陆前途还是两岸关系、东亚和平诸种角度来看，李陈都是大祸！他们不挑，台湾自然会族群融合，他们不挑，老共实际上也维持不了几天了。唉，愿天佑台湾，天佑中华吧！”

第一，天不会佑台湾，也不会佑中华，我历来认为，中国是上帝诅咒过的土地。

第二，我基本同意“共产党利用台独凝聚人心，无论台海之战胜负，以领导战争获得合法性，以‘外患’、民族族群仇恨压倒自由民主。”其实我前期的作品完全是针对这一问题痛下针砭的，但我不认为中共急于打台湾，理由已经在一系列旧作中说过了。

第三，我觉得，台湾国民的心态之所以在短期内就完成从“大中华国民”到“台湾国民”的急剧转变，李、陈固然是罪魁祸首，但其实也得力于中共的大力协助。我早在一系列旧作中反复抨击过，指出中共是催生台独的教父。令人遗憾的是，贵友王希哲先生竟然与中共隔洋呼应，使尽浑身解数引起台湾人民对大陆人的憎恶。

第四，我认为，“他们不挑，台湾自然会族群融合，他们不挑，老共实际上也维持不了几天了”的说法值得商榷。

如果你说的“台湾族群融合”是指本岛内的族群融合，则我完全同意陈李是挑动族群对立的罪魁祸首。台湾人民的分裂完全是他们当政后一手制造出来的。但如果你说的是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完成自然融合，则在我看来并不具备这种天然趋势。

无情的现实是，即使没有李陈的人为推动，台湾也在逐渐漂移，离开大陆而漂向美国西海岸。这其实是全球文明冲突的一部分：强势的西方文明俘获了台湾，如强劲的台风一样，把这艘原来就缺乏民族认同的孤舟，送进了漂离大陆的太平洋海流。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它拉回来，咱们只能靠文明的重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用自己文明的吸引力去战胜老美的吸引力。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统一之道。

可惜没几个中国人看得出这最明显不过的现实来。从当政的中共到在野的贵友王希哲，无不迷醉于用东方“武明”的硬拳头去击败西方文明的软性勾引力，实行贵仇敌马悲鸣先生鼓吹的“强迫作爱”，唉！

至于“他们不挑，老共实际上也维持不了几天了”的基本估计我也不敢同意。以中国人的耐受力，只怕老共能维持到我等断气那天还摇摇不坠。老郑阿，我劝你还是趁早立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呵呵。

其实，我说过好多次，独裁制度的最可怕与最可恨之处，恰在于它的崩溃会引起巨大灾难，让此前的一切灾难相形见绌，所以，我并不希望中共迅速垮台，因为我非常害怕中国变成让贵友高、王如鱼得水的巨大杀人场。

> “但台湾民主确实面临走向专制的危险。希特勒之前的魏玛政府，就是一个比台湾完善得多的民主政府。——如何？一煽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迫害犹太人，很快就法西斯化。当然时代不同了，难度加大了。今天之台湾，谁是压迫者？——台独基本教义派！蓝军的反抗有相当大的正义性。虽然，由于中共的存在使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有时投鼠忌器，但不能以任何理由挑动仇恨，不能以任何理由在民众中挑动对立，这应该被确认为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此话我也不敢完全同意。

第一，我不认为台湾有法西斯化的现实危险，理由已经说过了：迄今为止，台湾的政治还是程序政治，李陈只敢在程序内玩弄阴谋诡计，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家的专业。

第二，台湾目前的民主政治，确实有在民进党人主导下走向种族主义的危险，这就是我写作那篇文字痛加抨击的动机。但种族政权并不等于法西斯政权，一个民主政权也完全可以是种族主义政权，南非前政权就是如此，人家可从来是民主的。这话我早说过许多次了，民主不是善，只是一种制度，具体是为善还是为恶，端看人民的普遍觉悟如何。

第三，我认为，事情恶化至此，蓝军不容辞其咎，不是用“反抗有相当大的正义性”一句话就可以开脱的。蓝军的明智策略，应该是避开与中共合作的嫌疑，重点指责对方内政一塌糊涂，出于政党私利煽动族群对立，分裂人民，对外实行边缘政策，靠无理刺激中共来转移国民视线，恶化对美关系。最重要的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按法律程序行事，决不能靠暴民对政府施加压力。哪怕一时受挫，也应该看到长远利益，以国家为重，以争取民心为重，决不能干出上周那数不胜数的蠢事来，既为民主宪政造成人为危机，又加剧了人民分裂，以致民心尽失，令人为之扼腕浩叹。

蓝军之败，败在统帅是白痴。连宋二人都不是搞民主政治的料。连小白脸不过是专制制度选拔出来的奉命唯谨的马屁精，宋则是个宫廷政治家。以此二人领队来对付律师讼棍陈阿扁，焉有不败之理？

依我之见，蓝军还是早日偃旗息鼓，迅速停止街头抗争，把眼光放到立法院选举上，并力争四年后当选。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让连战引咎辞职，把小马哥弄上去试上两年。而宋则不可引退，否则亲民党就算完了——那本是他的私人队伍。

2004 年 3 月 26 日

且看蓝军如何跨下虎背

台湾这次大选，带来的环球冲击波比上次还严重，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鉴于争执道义问题和法律问题容易引起意气之争，我想简单从策略分析上说两句，这大概不会引起网友分裂或血压上升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政党想成功，光有个正确的政策根本就不够，是政治家就得讲策略，无论是东方西方，专制民主，全都一样。

现在蓝军大规模集会向政府抗议，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据网友转过来的帖子是三要求：

“为枪击真相要调查、公正公开验票、国安机制启动，若陈水扁对此三大诉求无法具体回应，国亲表示「无法约束群众的作为」。”

这种条件，有点类似最后通牒：你不答应，我就“无法约束群众的作为”，根本就不给对方回旋余地，只能在答应与拒绝之间作挑选，类似中国政府酷爱的“主权不容谈判”。

从策略上来说，这应该是走投无路，无比绝望的最后一击。这一拳打出去，对方若不投降，就只能破釜沉舟地拼到底，兑现自己的威胁。

那么，如果民进党政府悍然拒绝，表示决不向威胁屈服，决不在压力之下谈判，蓝军又该如何因应？让群众如何“作为”，才会吓得政府投降？

很明显，只有大规模暴力。但那样一来，不但立刻给了绿营动用国家威权机器镇压的借口，而且势必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只要美国太上皇放句话，只怕蓝军就要吓得屁滚尿流撤回去。如此虎头蛇尾，以后还怎么让民众看得起？就不说中间群众，恐怕就连铁杆蓝军也灰心丧气，斗志全失，以后再不会为政党主席卖命。这立法院选举就再也休提了。

就算蓝军不走这步，专靠和平示威，但这种事干长了，务必影响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弄得怨声载道，最后还不是只有像六四那样，再衰三竭，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效果是同样的糟糕。

另一可能是，民进党将计就计，满口答应对方的三条件，民众还有什么聚会闹事的理由？当然只好散去。如果重新验票证明水扁"做票"，则蓝军当然可以咸鱼翻生，连宋就此当选，蓝军大胜。但如果验出来还是那么回事，蓝军岂不是在天下人面前证明自己疑心生暗鬼，全军尽墨，从此再没脸见众乡亲？

那枪击真相调查也如此。如果调查出来真是作弊，则蓝军可以要求重新选举，但并无理由让连宋当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蓝军大概可以轻取全台。但如果调查出来确实不是阿扁作假，那蓝军该怎么办？当然只会是无理取闹，自己成为被大众唾弃的对象。

从以上这些简单分析不难看出，蓝军此举，完全是孤注一掷，把整个身家性命都贴了进去，取胜的前提就是两条假定："枪击是假，点票舞弊"，万一这两条假定都不成立，蓝军就面临输光当尽的前景，恐怕要从此溃不成军，再不复为成气候的政治势力，遑论问鼎总统的最高权位。

蓝军统帅竟然丝毫不顾政党的长远利益，出此只有走投无路之时才能豁出去不顾一切的险着，实在令人扼腕！

老芦阴暗心理发作，不免要猜测这是国亲两党的老人政治引起的：无论是连是宋，这都是他们登上政治生涯峰巅的最后一搏。如

果不作此搏，他们就再没登上这末班车的希望了。至于此搏会不会给本党的政治生命判死刑，他们根本也就不必操心：反正自己作不了总统和副总统，本党能否生存下去又与自己有何相干？这就是“来日方长”和“来日无多”的政治生理学差别。唉！

以上策略分析，丝毫不涉及孰是孰非的道义问题。网友有谁不同意，尽可上来砍吾一刀。

2004 年 3 月 27 日

基于仇恨的政治信仰不值得尊重

——答洪哲胜老先生

首先得为我态度粗暴向您道歉。老芦自幼秉承严格传统家教，敬老是其中一条。以年纪论，洪先生算是我的长兄辈，即使政见不同，也不该恶言相加。在此特地向您道歉。

今天看见您和网友的对话，不禁为您悲从中来。您年纪那么大，辛辛苦苦在网上日日劳作，为贵党作宣传，为台独大业鞠躬尽瘁，单论这份精神，实在是难得。有的网友认为您上网有报酬，我倒不这么想，第一，我和您不大一样，不喜欢用阴暗心理往坏处想人家，疑心生暗鬼地编出个"黑名单"的神话来，弄得自己下不了台。第二，我记得您在网上贴出的简历，知道您炒房地产发了一笔，衣食不愁，用不着指望这点小钱，更何况您早过了退休的年纪，有什么必要在网上挣这点小钱？依我看，您几十年如一日这么干，完全是信念使然。

过去我非常尊敬您，说到底就是这个原因，可惜后来渐渐就看出名堂来了。我想您大概读了拙作《"曲线反台独"志士洪哲胜先生》吧。我不知道您有什么读后感，但如果您我易地而处，有人写了篇这种文章，详细介绍我是怎么通过自己的拙劣宣传，卓有成效地把一个最同情自己的人转变为反对者，我一定会懊丧欲死。这说明您四年多化了无数心血汗水，全然是在作负功，"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一个当初因为替台湾说好话被同胞什么都污辱过来的同情者，生生变成了台独的坚定反对者，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思想成熟的老朽，您自己去想想您的反宣传威力该有多大吧。

这就是我为您觉得悲哀的原因：因为您和那些“民运”人士不同，您似乎是个真正的志士，无私地把一生献给了您自以为是正义的事业，其间并没有什么私人名利的考虑，所以我曾引用伟大领袖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比喻您。

可惜，您尽管无私，信奉的却是毫不值得尊重的邪恶信仰，因为它建立在狭隘心胸导致的仇恨上，毫无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这恰恰是您失败的原因，也恰是老芦作为网上最有说服力的写手成功的原因。其实若以网德而论，您不失为略有瑕疵的君子，而老芦则是作恶累累的网霸，连我的阶级弟兄老郑都忍不住要批评我：“你太爱吵架了。”所幸网民的眼睛是贼亮的，就是这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有无，使得您在网民心中瑜不掩瑕，而老芦瑕不掩瑜。透过您的彬彬有礼，网民看到的是琐屑怨毒压倒对两岸人民福祉的关怀；而透过老芦的穷凶极恶，他们看到的则是“民之祸福，长在我心”的博大胸怀。当然这远期效果也就截然不同了。

也许您会觉得我说的太过份，请允许我以今天的例子来作个说明。

今天您在楼下，和本来持中立态度的网友对话，用非常简短的解释，卓有成效地把她原来的中立立场向反方向扭转了。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我来剖析一下吧：

你说：

> “解释：我不反对连宋们在公投议题上投反对票；但是在中共磨刀霍霍向台湾的现在，鼓动这么多人拒领公投票实在太可恶了，尽管他们有拒领的权利。中共的导弹威胁 not real?????”

此话一出，竟然激得对方写了一个激烈的帖子。我觉得您的话没说全，所以她的反驳没说到点子上，这里不揣冒昧把您的话外音补足：

第一，您的“民主”是一种霸道的“民主”，与您政见不同的人就是“实在太可恶了”。

第二，您把反对党看成是民族败类卖国贼，影射连宋是不顾国家安危、勾结民族大敌的台奸。

第三，您的民主就是剥夺反对党拒绝按贵党定下的调子跳舞的神圣权利，剥夺他们劝说别人拒领公投票的言论自由。

第四，你诬陷政敌的手段不但恶劣而且拙劣，完全是对世人智力的放肆嘲弄，居然把是否参与公投说成是关系台湾存亡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似乎那张票一投下去，大陆的导弹也就不 real 了，敢问这是什么样的愚人节笑话?

贵国公投票的内容我也在网上见到，那不但和民意调查毫无区别，而且完全是谁都只会答“噎死”毫无实质性争议的烂问题，一望即知那无非是政客搞的滥把戏，完全是为公投而公投，对台湾前途毫无任何建设性意义。建议下次贵党再搞这种把戏，乾脆改为“你是否认为太阳从东边升起？”如此则一定能获得 100％的同意率，充分证明贵党的公投动议深得民心。

您看，光这么一个简单例子，就充分演示了您的宣传是何等拙劣，唯一的效果，就是让人情不自禁地对民进党人那被仇恨扭曲了的褊狭心灵心生厌恶。

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例如许信良投靠蓝军，您出来大声喝彩，认为那是好消息，理由竟然是他如果成了蓝军统帅，外来政权留下来的痕迹就此给消除得乾乾净净。这种以籍贯划线的下流“民主政治”，老芦还真没在西方文明世界看到过，或许只有美国

南部那些叫嚣“white power”（白人掌权）的三 K 党余孽可以比美。

这说明在你心目中，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省籍问题，也就是你所说的“消灭外来政权残余（＝中国猪＝台奸）”的千年大计。两党的根本分歧，不在于各自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也不在于政见的分歧，而在于籍贯的差别。因为许是本省人，所以无论他持何种政见，哪怕是使用绝食的极端手段威胁政府也罢，都是您的自己人。“亲不亲，省籍分”，恰和我党当年“亲不亲，阶级分”异曲同工。

看在网上多年的交谊上，我想给您进最后一次忠言，洪先生，您以耆老之身，不辞辛劳上网宣传，对象应该是那些持中立态度的人，不是出于对中共的盲目仇恨为您喝采的“同志”。对那些人，无论您说什么都没有什么区别，您争取的对象应该是中立者。这是您得时时牢记在心的第一条。

但要说服这些人，您最起码得作到别让人家看穿您的真相，力求作到“伪善也是善”。要做到这点，千万别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外来政权”的怨毒，更别冒出种族主义恶臭来。所以，千万别再搞什么忆苦思甜，痛诉“外来政权”的斑斑血泪帐，那玩意顶多也就只能在岛内煽起愚民的仇恨，制造台民分裂，在文明世界一钱不值。何也？

第一，局外人对这些烂帐毫无兴趣，您别指望他们会感同身受。

第二，这些烂事说多了，只会倒了众人胃口，让大家觉得民进党人心胸无比褊狭，一心梦想的就是咸鱼翻身，把外省人踩在脚下，毫无埋葬宿怨、放眼未来、主动实行民族和解、把台湾建成各族人民和平安乐的大家园的政治家胸怀。这种人当政，只会误国害

民，反台乱台，进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累到大陆同胞头上去。

2004年3月29日

但愿陈总的枪伤是真的

刚才看见洪老的转贴，谓美国专家称陈水扁的枪伤是真的，不由如释重负。我虽然痛恨阿扁那鼠目寸光、以制造民族分裂、煽动仇恨骗取大位的政治骗子，但兹事体大。如果阿扁真是造假，则不但台民从此对民主政治丧失信心，而且台湾的民主实验也要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变成笑话。相比之下，与其让台湾民主信誉破产，不如让阿扁再当国四年，反正跳蚤顶不起被子，他的边缘政策有老美制衡，而种族主义的煽惑迟早要让国民鄙弃。

当然这样一来，蓝军难免溃不成军。如我在《且看蓝军如何跨下虎背》中说的，蓝军闹事的前提，是假定阿扁在枪击事件和点票中都作了假，如果这两件事最终证明都并无舞弊情事，则蓝军当初掀起来的巨浪必将狠狠砸在自己头上，不但从此失去信誉，而且要让政敌当成把柄，起码说嘴四年。不过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局外人谁也帮不上忙。

又忍不住想给洪老再进忠言：我说洪老，你替贵党辩诬是应该的，但攻击政敌似乎就不必了。把自己降为一个党派政治家，似乎不会为您的宣传增加说服力。您要宣传民主，恐怕还是得把胸襟放开阔些，把着眼点提高一些，着重从正面给大陆人介绍点台湾经验。没您参加，这网上打架已经有人满为患之势，用不着再把蓝绿党争引到这泛海外的华人论坛上来。您说呢？

另外，我记得人之初写过个帖子，笑话您不遗余力鼓动大陆民运其实是自掘坟墓，那话可谓入木三分。在现阶段，中国若是共党当家，起码二三十年内台湾可免战祸，若是真的把早产民主引了进

去，您就看吧，弄个米洛塞维奇式的人物上台，我敢断言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顺应民间那沸腾的“爱国主义”思潮去打台湾。王希哲先生已经用他的“571 工程指令”在本坛为大家最生动不过地演示了这一点。在此之后若还是看不出好歹来，那可就真是迟钝得不可救药了。

对不起阿，没讥笑您的意思，只是实话实说成了习惯，完全是好心。

2004年3月31日

台湾人为何如此恨大陆人而不恨日本人？

老芦这辈子没去过湾湾，对台湾既毫无感性认识，也谈不上什么理性认识，不过那小岛既然颠倒大陆芸芸众生，当然也免不得让我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免不得来瞎掰几句，恐怕连盲人摸象都说不上。说错之处，还望本省（或本国，谁有兴趣管那些？）人如洪老先生斧正。

台湾人为何如此恨大陆人而不恨日本人？套句流行的洋句子：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按理说，就算国府和日本同为“外来政权”，两岸毕竟是同文同种，台人应该更恨日本人才对。可人家偏不，李登辉对日人司马辽太郎就坦承他 20 岁以前也是日本皇民，根本就不以那亡国之恨为耻。吕副总统就任后第一件事似乎就是访问日本，感谢人家的侵略。民进党上台后，硬是把“台湾光复日”改名为“终战日”，连那词汇都跟日本人用的一模一样。那用对国府的仇恨根本就无法解释：你就算恨国府那个外来政权，可台湾光复难道不也是台湾人的光荣么？何必连那不承认，硬要改成个中性词，把自己和战败国捆在一起？难道日本战败也是台湾的耻辱不成？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如此荣辱与共，殊难索解。

您要说日本人对台湾人好过了国府，至今还让台民感激涕零，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史有明载，日本进驻台湾后，遇到顽强抵抗，于是大开杀戒，杀的人头滚滚。“二二八”和那比起来，犹如魁父之丘比珠穆朗玛峰。但人家今天只纪念“二二八”，从来没谁想起那些倒在日本军刀下的祖先。

您要说国府实行所谓“白色恐怖”，可日本人统治似乎也不是什么王道乐土。我在一次派对上遇到一位台湾老者，人家可是从日据时代过来的。据他说，日人治下治安非常好，可谓夜不闭户。我大奇，问怎么才能做到这点。答：没人敢作小偷，因为抓住了就得枪毙。“白色恐怖”再恐怖，恐怕也不到这种没人敢做小偷的地步吧？

所以，台湾人的亲台憎华情结，似乎并不是双方仁厚程度差别造成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一直到我在网上看了若干过来人的口述记录，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

好几位台人都回忆过国军刚到台湾的情景。所有的回忆者都必然提到他们乍见国军时的惊奇，那便是堂堂国军竟然足登草鞋，衣破褴褛，和他们见惯了的装备精良、身着黄呢军装、足登皮鞋的士气高昂、军容严整的皇军可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人都是势利的，最初的印象也就是最深刻的印象。皇军的神武是不用说的，当然只会让台民感到无限钦服与自豪，特别是战争初期他们的子弟兵随着太阳旗东征西讨，席卷整个南亚之时，当地也肯定举行过无数的祝捷大会。如此神武的军队却竟然给中国军队打败了。国军到来前，台民不知把胜利者幻想成何等英武模样，殊不知竟然却是洪七公率领下的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猿形鹄立的丐帮！

此前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其实非常成功。经过几十年的洗脑，台湾人早在心底认为自己是大日本帝国的优秀皇民。官方的种族歧视宣传早就深入人心。许多人不但不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反而和真正的日本人一样，对“支那中国猪”那劣等民族充满了鄙视。参与侵华战争、和国军交过手的台湾皇军军人，则更是只可能鄙视那些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如今他们却不得不乖乖地站在欢迎的队

伍中，眼睁睁看着那些废物脓包以征服者的身份，趾高气扬地闯进自己家园。

更令人生气的是，这种战场上不堪一击的军队，吓唬百姓时来却威风十足。而且，无论是接收的官吏还是军队，都同样的贪污腐败，这和日本治下的廉洁可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根本心理原因：“被敌国来的劣等肮脏民族征服掠夺”这种广泛错觉，引起了国民心目中普遍的愤懑、嫉恨、挫折感和复仇激情。事情的真相根本就不是洪老苦心孤诣编造出来的那个神话，是“祖国人”倒行逆施引起台民强烈反弹。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难看出洪神话是何等地经不住推敲：“祖国人”这种后天观念，必须由社会强行灌输入给国民，说明白点，那观念的建立只能是长期洗脑的结果。请问，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府有这么做的可能么？

我这里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没有丑化任何一方的主观动机。老芦的前半生给人喂饱了拙劣的神话，由此养成了对任何形式的神话的天然反感，以及难以制止的戳穿神话的强烈冲动。过去一则因为觉得洪老先生是朋友，不忍踢朋友的场子，更主要的还是怕加深两岸人民的反感。如今这些忌讳都统统没有了。反正我不说，两岸人民之间的仇恨与误解也会因以洪先生为一方、爱国愤青为另一方的齐心协力的合作而蒸蒸日上。我说了也毫无用处，口水未干便“人间蒸发”了。有分教：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如不说，不如痛快说。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看，台民的反应完全是正常的。人性天生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特别憎恨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弱者。心理学上有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说的是人质居然会对劫持他们的匪徒产生一种敬慕依恋心理。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情结，似乎完全可以用此现像解释。的确，日本人特别符合强有力的征服者的形像：

强悍、无情、铁腕、公正、廉洁、勇敢、能干、具有亚洲人最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这对一个原为大清帝国蛮荒外省的居民来说，几乎是一种天神形象了。

相比之下，国府及其军队当然只能让习惯了天神统治的台民看不起：懦弱、无能、贫困、落后、肮脏、羸弱、贪污、腐败、恃强凌弱、欺负百姓，等等，等等。最让人看不起的还是，无论是大陆还是国府，苦苦折腾半世纪后，无论在哪方面都仍然赶不上当年的战败国日本，大陆比起台湾来，只有更烂、更落后、更野蛮、更贪污腐败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您还好意思让台湾人管您叫“乡亲”？

大多数台民当然不知道，当初来接收的“祖国人”形同乞丐，完全是因为日本帝国（含台湾）把巨大的战争灾难强加在大陆上。“祖国人”贪污腐败，无非是因为饱受战祸之苦，实在是穷极了，当然巴不得到台湾来大大地捞上一票。“祖国人”对他们穷凶极恶，是因为台湾本身就是大陆灾难的来源之一。那些衣着破烂的军人中，不知有多少人的父老、乡亲与同袍倒在了“皇军”手下。如果不是上峰一再告诉他们台民不是日本人，其实是自己的同胞，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来！

因此，说到底，这其实是历史造成的最令人伤心的悲剧。伤心之处不在于台湾 100 年前被日本抢走，也不在于台湾人至今也不想和大陆统一，而在于台湾人确实是对的：中国人就是比不上人家日本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如此。所以，如果没有开罗会议，台湾至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的话，则我坚信不但如今中共绝无胆量去索取台湾，而且台湾人也决不会开展什么“本土化运动”，推行陈水扁从金日成那儿抄来的“主体思想”。

历史和未来都永远属于强者。

2004 年 3 月 31 日

台湾二题

上次贴出《台湾人为何如此仇恨大陆人而不仇恨日本人》，有的网友似乎没明白那中心意思。其实我不是责备台湾人势利，而是抒发“我心中永久的痛”，那意思很简单：台湾人鄙视大陆人，不认咱们作乡亲，反认日人作同胞，正如香港人民宁愿作大英帝国皇民，也不愿意回归祖国一般，乃是因为咱们实在不成器，不但没有“祖国”的天然亲和力，反倒产生一种强大排斥力，其威力大到足以抵消异文异种的鬼子引起的天然排斥力还富富有余。世上居然有这种奇怪现像，不能不让人作三日哭。

更可痛哭者，伟大祖国到现在也悟不出这道理来，还在迷信流氓的大拳头，信奉“强奸即是作爱”的伟大真理，死也不明白即使你就是把那蕞尔小岛武力“解放”了，人家还是从心底看不起你，而且恐怕更要恨你入骨。武力再强大，也无法改变人类感情的取向。强奸并非唤起爱情的动力。

扯远了，还是来说正事吧。公共论坛的好处，是天南海北四方杂聚，哪个国家、地区的人都有，是个增长见识的好去处。趁眼下日本帮云集此地，又有个台独元老洪哲胜先生在此，老芦赶快来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请教日本帮盗夥们的，第二个是请教洪老的，都跟台湾沾点关系吧。

一、台湾、“满洲国”与韩国

这三个地方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当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感情截然不同。台湾人的心理我已经在那文字中说过了，一是以作日本皇民为殊荣，仿佛那是厕身于灵霄宝殿一般。二是对前主子感激涕零，至今不敢或忘，要等到作了副总统之后，专门前去朝圣，代表人民对人家的侵略表示衷心感谢，可谓与毛泽东呼应于后（毛也曾先后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以及田中首相表示过感谢，第一次讲话原文见于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与思云从日文中译出的颇不相同，明说了就是感谢大日本皇军在客观上帮助中共上台）。

“满洲国”的情形我不清楚，不过，我敢肯定的就是，我知道的东北人，似乎没谁痛骂过日本，骂的倒是老毛子，说他们奸淫抢掠，无恶不作。这毫不足奇。苏联红军就是这种土匪军队。他们在欧洲东线打出国境后，一路奸淫抢掠，柏林几十万女性居民几被淫遍。某镇妇女被淫后，集体演出“N女投江”的惨剧来。我看过的一部电视文献片就有一位女士回忆她母亲被淫后带着全家投河的回忆。那些土匪甚至连集中营里放出来的苏军女战俘都不放过。这事可不光是受害者的控诉，苏联自己的档案里也有相关材料作铁证。

因此，看见老马和思云受共党宣传蛊惑，至今还在称赞苏联那个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丝毫不亚于日本的匪类国家，我就禁不住气得牙痒痒的。不过，这可是人家的神圣人权，我无从干涉也不敢干涉，呵呵。

又扯开了。总而言之，以我自己的感觉来说，东北人民对小日本的感情起码是中性的吧，既不像台湾人那样赤胆忠心，又不像对老毛子那样切齿痛恨。

韩国则完全是两回事。该国恐怕是世上最痛恨日本的国家。我看的一部电视文献片中就说，在 60 年代日本举行的奥林匹克大赛中，韩国拳击运动员打败了日本对手，举国腾欢，举行盛大庆祝。

运动员回国后，受到群众狂热欢迎和国家元首接见，简直就成了民族英雄。人家也明说了，他们切齿痛恨日本，所以把那事件看成是对日本的一种报复。

从历史上来看也如此，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运动与日本统治相始终，不但出过刺杀伊藤博文的英雄，还有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

而且，跟中台两国首脑（请五月海网友表生气，我就是认为中国和台湾是事实上的两个主权国家，早就写在一系列的旧作里）竞相感谢大日本皇军的侵略相反，韩国始终坚持要日本作出正式道歉，而最后也就真的争来了人家的谢罪。

相比之下，台湾似乎从来没出过刺杀帝国首脑的壮士，也似乎没有什么成气候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我记忆不错，台独运动是从光复后才开始的，针对的对象是合法的中国政府。如果不是开罗会议决定台湾回归中国，台湾留在日本帝国之内的话，则恐怕如今世上连“台湾独立运动”这个词都不会有——人家忙着在灵霄殿上班还来不及呢，谁还会去自贬三等，学邢燕子、董加耕自动上山下乡？

同是殖民地，为何人民对宗主国的态度却会如此截然不同？我的感觉是，日本人似乎特别讨厌歧视韩国人，对韩国也从没像对台湾和东北那样，投入极大的心力开发经营之。

不容否认，日本人在东北和台湾都下了很大功夫，使那两个地方迅速现代化了。台湾日月潭发电站和东北小丰满发电站一样，都是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直到现在，东北也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方，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

相比之下，韩国却非常落后，光复后根本就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毫无现代化气息，而且文化落后，完全是一个极不发达的国家，与日本帝国的其他地区完全不同。

这或许就是三地人民对日本人态度划然有异的原因？请留日大贤们有以教我。这个问题其实三年多前我就在《说道》请教过日本友人中村一先生，可他没有明白回答。

二、东方党人与西方党人

老芦在反对暴力革命和“扫荡”伪民运的一系列旧作中指出过，世上有两种组织政党的方式，一种是列宁发明的布尔什特党（bullshit），其特点是“黑社会＋军队”，是特地设计出来颠覆国家政权的威力无穷的法宝；一种则是西方议会政党，完全是松散的大杂烩。设计目的是通过民主程序、和平公开地争权夺利。

那天某位网友在拙作《我仍然看好台湾的民主政治》之后跟贴，提醒我中共、国民党和民进党人都是按苏共模式建立的。在他看来，这就是台湾实行民主的一大障碍。

中共按其洋主子的模式建党，这事实谁都知道。国民党也确实按照苏共模式改造过，只是极不彻底，这事也是谁都清楚的。但据他说，民进党人居然也如此建党。这对我倒确确实实是个新闻。

不难想见，如今的国民党绝对不会还是当年在大陆的那副样子。理由很简单：它早就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不可能不被多年的执政软化，最起码的，您若还想奉行那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军队式纪律，根本就行不通。这就是我将海外孤臣王希哲先生比作焦大的原因：他刻舟求剑，至今还以为国民党是那个革命党，真是脱离现实不知到了何等地步。

当然，传统毕竟难以消除于旦夕之间。或许，今日的国民党虽然革命斗志丧失得差不多了，但组织的严密仍非西方的议会政党可比吧。否则他们怎么在短期内就组织起 50 万人来进行浩大示威？

至于民进党人按苏共方式组党，似乎也有可能，因为该党党人长期受压制，具有秘密斗争的革命党人特点。当然，他们大概是仿效对手的模式组党，其实是苏共的再传弟子。

台湾选举风波发生后，美国政界对此有所评论，网友曾将有关帖子转了过来。记得老美在那上面教育台湾人民，说民主的主战场是在法院和议会，不是在大街上，还说，台湾人民要学会建立忠于信念的习惯，不是忠于个人，民主和忠于个人不相容，等等。

人家说那话，自然有人家的根据，而这话可以视为对那位网友的论调的一种佐证：如果蓝绿两营普通民众都忠于个人，则两党的组建方式颇有苏共的特点，须知忠于个人正是布尔什特党最突出的特点。

另一佐证来自于亲绿网友转到此坛来的某个帖子。记得那上面说，对蓝军的挑衅，民进党各地党部骨干非常气愤，反复请示中央是否应该反击，云云。

任何一个在西方文明世界长期居留过的同志，只要一看这话便能闻出共党的气味来：倘若民进党真的是西方式的议会政党，就决不会有这种下级请示上级如何行动的笑话。人家的政党不过一种极度松散的利益集团联盟，跟个俱乐部、联谊会也差不多，第一没有什么铁的纪律，第二没有什么下级请示上级如何行动的怪事，第三不会组织群众大规模上街，第四允许党员随便跳槽，朝象暮驴寻常事耳。

因此，看来台湾党派政治还真是承受着沉重的专制与革命的时代遗产，这似乎也就是它为何与文革时期的两大派冲突非常相似的原因吧。

以上所说，当然只是我这局外人隔洋胡猜，到底真相如何，还得请民进党人洪老先生出来解释一番，谢谢！

倘若我所猜不错，则台湾民主政治还任重道远，成熟正未有穷期。台湾人民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山姆叔的那些教导，把主战场转移到国会和法院去，不要忠于个人也不要忠于某个族群，更不要忠于仇恨，而应该忠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

2004 年 4 月 4 日

可怜，陈总统的“本土化”

昨见洪老把陈总统的《生生长流台湾情——心情笔记》贴了出来。那乃是总统本人的心情笔记，当然不可不读，当下沐浴更衣上香之后，恭恭敬敬地捧读一番，不料越读越觉得凄凉，也算是体会到了李前总统说的“台湾人的悲哀”了吧。

所谓“台湾人的悲哀”，其实就是这“本土化”本身就是个最大难题。无论是李前总和陈现总，都大力推行慈父领袖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力争“成为世界岛自我定位、自我期许”（按，此话语法不通，我怎么也顺不过来，对不起拉）。老芦这种善于换位思考的同志倒是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思，这就是我何以能点破“李陈思想”的朝鲜来源。

北韩和台湾的社会制度迥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既往都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现在都想独自立国，当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斩断国民精神世界对中华文明的依恋，在国民心中树立起自家的国格，人为培养出一种民族自尊心来。这就是“反对事大主义”成为慈父领袖“主体思想”核心组成部份的根本原因。

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记得 60 年代，小芦看北越出版的《南方来信》，那据说是南北越之间被分离的夫妻、父子、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集，越看越觉惊奇：那些信的作者据说都是普通老百姓，可里面引用的典故传说，全是咱们中国的那几部经典，其中《西游记》大概是引用得最多的，可见越南的普通民众对该书的熟悉程度，恐怕也不亚于咱们这些“炎黄子孙”。

我当时就想：这算是什么独立国家阿？主权独立，文明却谈不上独立，连老百姓聊闲天讲情话都得使用中国典故。如果我是这种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会觉得非常窝囊，肯定要想办法移风易俗破四旧，把这些外来文化遗迹统统除去，否则主权再独立，无非也是人家的文化殖民地。

所以后来这些国家排华反华，我一点都不意外。越是这种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周边小国，就越是缺乏自信心，一定要过度反应，宁左勿右，处处与中国划清界限，特别强调自我尊严，以免"事大"之嫌。

据我猜想，韩国在这方面似乎还比较成功——人家荷包比较争气嘛。越南可就不然了。虽然 80 年代双方大打出手，但越南毕竟惹不起中国那庞然大物，不久双方又和好了。记不得是哪儿看来的了，据说现在越南市场上充斥着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就连电视台放的也全是中国粗制滥造的系列片。

这两个国家虽然一度作过中国藩属，但大部份时期还是独立国家。虽然本土文明只能算是中华文明余脉，但人家毕竟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家的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等等。可要"本土化"还那么艰难，何况是台湾！

我在《"台湾本土化"的隐忧》中指出：

> "更何况要实行'本土化'，就意味着废除'外来政权'带来的那一套中华文化本位教育，包括废除普通话教育，将台语定为官方语言，改动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删除或淡化一切与大陆有关的内容，强调台湾的本土历史与本土文化，等等。只有这么作，'新台湾人'才能获得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定位（identity）。

问题是，作为独立国家，台湾的历史实在太浅，本土文化根本就无法和母体文化相比拟。更何况二蒋推行了几十年的大中华文化

教育。要在国民心目中强行割断和母体文化的联系，大概比澳洲废除英国历史、英国文学课还更艰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几乎不可行，而且必然在国民精神世界中引起巨大混乱，让许多人无所适从，反而丧失了自己文化历史上的认同。”

这里说得再具体些：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您总得有点历史伟人、文化巨人、传奇人物让国民景仰崇拜，把他们当成民族的骄傲来追思效法吧？请问台湾能推出什么这样的人物来？又有什么本土经典小说可以取代《西游记》、《三国演义》，有什么台湾成语可以取代中文写作必需的成语典故？光是个“取而代之”这种寻常见惯的滥词，要讲清来龙去脉，您也非得扯到“外国人”项羽头上去不可。

大概陈总也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真空而试图填补之，而他的《生生长流台湾情》似乎就是一种“本土化”的绝望努力：以追思伟大的先辈表达他的“长流台湾情”，籍以号召民众实现“世界岛自我定位、自我期许”（这次总算将此病句起死回生了，谢天谢地！）。

这就是老芦为他悲从中来的原因：他无限深情追思的台湾人的伟大先辈，竟然是个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

我这不是全盘否定日本人在经营开发台湾中作出的贡献，也不是诋毁造福于台湾人民的八田先生，我觉得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台湾总统，陈水扁为何就看不出来：日本人下大力气经营台湾，主观动机完全是为日本帝国扩张提供经济奥援。如果没有台湾和满洲提供的军粮，或许日本帝国也就没有能力进行那罪恶的战争如此之久！

某位西洋作家形容建造中死亡极众的某条铁路（记不得细节了）时说，那条铁路之下的每根枕木，都缠绕着一个冤魂。似乎也

可以说，日据时代嘉南平原“呈倍数成长”出来的稻米，有许多化成了射进中国和南洋的平民、军人胸膛的子弹！

然而陈总却想不到这点，不仅如此，从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读出他对用鱼雷轰沉八田所乘轮船的美军的无声谴责。如此“生生长流台湾情”，到底流出了多少人道主义气息？！

最令我不解的是，在陈总统深情款款的追思中，竟然丝毫不提“外来政权”国府的十大建设。难道台湾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迅速起飞，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挤进了发达国家行列，不是在国府领导下实现的？难道跟着国府那“外来政权”“入侵”台湾的人中，就没谁作出过可与八田相比的卓越贡献，而又不曾像八田那样，用自己的努力成果去支持一场罪恶的战争？为何八田要享受特殊待遇，不至于沦为民进党人发誓要消灭的那些“外来政权余孽”？如此泾渭分明的爱憎，到底是出自什么难以出口的逻辑？

所以，依区区愚见，陈总的“本土化”大概少写了一个字，那其实应该是“日本土化”才对。

可怜。

2004 年 4 月 8 日

“端木奏折”、“芦笛五戒”与洪哲胜宣传策略

缘起

今见网友端木丁模仿日本田中首相，给洪老上一奏折，略云：

> “田中奏折（如果真有）说：欲征服世界，先征服支拿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满洲。
>
> 把这个理论用在这里，就是，老洪若想让大陆人信奉他的台独理论，为民进党张目，就必须先说服海外华人，欲说服海外华人，先说服本坛网人。欲说服本坛网人，先说服老芦。”

这可是大大地抬举我了，说服了老芦就能说服本坛网人？说服了本坛网人就能说服海外华人？这可是我那马师弟最擅长的“飞跃推理”，你怎么公然剽窃人家的智力财产？

当然，老断木这话有一定道理。老芦乃不折不扣的布衣，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不拿任何人的钱，不参加任何政治势力，在这个意义上，代表着绝大多数网人乃至海外华人，具有早期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提倡的所谓“典型”意义。

更何况老芦经受了我党数十年的教育与再教育，经过无数次免疫接种，对各式各样的政治宣传具有强大免疫力。如果谁有本事说服老芦，则我敢断言他一定能说服大多数背景类似的海外华人。最起码的，宣传家们不要干出“民运”痞子那些蠢事来，把老芦当成阶级敌人痛加整肃，彻底剥夺老芦的同情心，逼得我写出系列雄文

痛加批判，让他们只能和几个同党跑到人迹罕至之处，无任凄凉地作“昨夜寒蛩不住鸣”。

洪老先生倒还没弄到这个地步，不过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四年前，我是他的事业的最大同情者，而且那同情既不是出于对共党的仇恨，实行“凡共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也不是因为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老芦是专业人士，不必以政治信念作为粮道，对民进党的同情完全出自现代文明觉悟特别是人道主义。不料蒙受他四年的宣传之后，竟然被他“策反”了，变成了坚定的反绿人士。这不能不说是他宣传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应该引为惨痛教训。

这就是“芦笛奏折”的写作缘起，目的是教育洪老先生以及网上活跃着的形形色色的政宣鼓动家们，怎么有效地进行宣传，力争成为老芦这种说服读者最多的网上写手。

为“宣传”正名

在西方文明世界，“宣传”这个词非常之臭，几乎是“撒谎”的同义词。犹记几年前，某侄辈要出国，寄了份英文ＣＶ来请我修改，那上面有什么“学生会宣传委员”，我立刻改成了“学生代表”，并回信告诉对方，千万不要再让“宣传”的字样出现在自己的履历中，免得引起对方误解。

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张戎在《鸿》中，把她父亲宣传部长的官职改为“公共事务部长”，让国内出来的读者颇不以为然。

其实，我倒觉得我党关于“宣传”之解释非常正确：任何人在公众场合发言，必然具有宣传目的。所谓“宣传”，其实就是“介绍自己的政治主张，充分说明理由，以此打动说服听众”。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网上绝大多数政治宣传，统统都不及格。

“芦笛五戒”

高明的宣传，应该是让读者根本不觉得你在宣传，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你的观点，而要做到这点其实也不难，只需看看所谓“民运人士”的读物，反其道而用之，则你一定会变成成功的宣传家。下面总结一下那些人的特点，列成“摩西十戒”一类戒律，供有志于宣传者参考。

第一戒就是切忌当政治指导员。大家从国内出来，应该知道那是些什么人，海外土生华人没这福气，不妨去“民运”人士云集之地，看看他们的作品，立刻也就知道那是什么气息。

政治指导员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命不凡，高高在上，效法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高临下地向草民发布庄严宣告，今天号召你打倒这个，明天号召你打倒那个。老芦在国内对此早就深恶痛绝，因此和高寒闹翻是必然的——我实在看不下他那些“紧急动员起来，强力制止江泽民称帝”的大口气：您究竟算老几，敢用命令式跟我这么说话？就连我老板也不敢这么无礼！这种人连对个体的起码尊重都没有，还配谈什么民主自由？

第二戒就是抢占道德制高点，用所谓“道义”和“良心”来胁迫他人就范。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土匪式讹诈：你不听他那套，他就宣判你的道德死刑，认为你是丧尽天良的禽兽。老芦对某一度活跃在此坛上的某佛学女居士不宣而战，发起攻击，说来很可笑，竟然是她一篇《沉重的良心》引起来的。记得我当下一看那题目就直犯恶心：这世上就只有你有良心，非得上这儿来卖弄不成？真有良心的人都知道，良心是内向的、专门折磨自己的刑罚，不是拿来卖弄兼杀人的利刃。

第三戒就是切忌用阴暗心理来揣摩论敌，捏造出无数匪夷所思的阴谋理论来。想当初“民运”分子们在此坛大抓“特务”，想搞臭某爱党人士，最后搞臭的是他们自己，那人的人气反而扶摇直上。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海外华人都生活在文明世界，知道“无罪推定”的起码文明常识，厌恶那些心理阴暗、血口喷人之辈。经过文革的老网民更吃足吃够共党苦头，这种肆无忌惮制造网上冤狱的犯罪行为只能唤醒他们的噩梦。

第四戒就是大义凛然地发泄仇恨，甚至普遍扩散之，殃及一切胆敢不与自己同爱憎的论敌。楼下王希哲先生因为少年时代吃过地方主义的苦头，就从个人怨恨出发，反对台独，此乃世上最蹩脚的宣传。他居然就看不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此共鸣，你那种琐屑怨恨，说下大天来也是个人的事，难道因为你的个人屈辱，就可以号召台湾人民实行“武起义”，将宝岛陷于血海之中？

这其实是“民运”和台独人士的通病。邢网转来个郑义先生的帖子，题目似乎是“煽动仇恨者必然是独夫民贼”。从原则上来说，我同意这一提法，不过也请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反思一下，他们在网上的宣传，是否也有煽动仇恨之嫌？把对独裁制度的仇恨扩散到一切共产党人甚至同情者头上去，日日在网上攻击侮辱论敌，这种“民主运动”，究竟有何理智可言？请牢牢记住，中共党人及其同情者在大陆，少说也有上亿人。任何有点社会责任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同志，都该看出仇共心态可能带来的巨大灾难。

其实台湾目前就在给大陆人上最生动的一课。台湾根本没有实行过大陆式的恐怖统治，但一旦实行民主，积怨照样爆发出来，弄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如果大陆也实行民主，不难想见那是何等的噩梦。只怕高、王辈要组成还乡团，提着 20 响回去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血沃中原肥劲草”也，怕怕！

最令人痛恨的，就是许多“民运”人士或同情者似乎还觉得仇恨限于大陆人中还不够，还要把它扩散到海峡对面去，其中如吾儿开溜、沈彤辈更搅进蓝绿之争中，激化矛盾，让本省（或本国？）人更痛恨大陆人。

第五戒乃是忆苦思甜的“祥林嫂的汤”，这种汤灌多了，迟早要倒了众人胃口。对此我已写在同名文章中，此处不赘。

要言之，您若想成功进行宣传，恐怕先得从那高台上走下来，学点平民作风，实行伟大领袖教导的“启发式，废除注入式”，在尊重人家的人格和智力的平等前提下，和人家娓娓谈心，平等讨论，不要给人家开道德课，更不要把对方视为仇敌侮辱之。你就算成功地骂跑打走了对方，那又便如何？失去的是大量原来可以争取过来的同情者，最后损失的还是你自己。

论打架，老芦是作恶累累的战犯。上面这些话，饱含着我自己的痛苦教训，请各派宣传家们吸取我的反面教训。

最重要的是，宣传家们必须看到，真正要争取的其实不是对话者，而是潜水员们，他们才是主要听众。而要把人家争取过来，靠道德批判毫无用处，因为不是所有人的感情取向和价值观念都和你一样，真正的说服力在于功利分析，这才是人类唯一的共同语言，谁都能理解，这就是老芦一再主张“告别正义”的理由何在。

洪老的失误

如果明白了上面所说的浅显道理，则立刻可以看出洪老先生是怎样把我成功地策反了的。其实我在此前写的几篇文章，已说得非常清楚了，无奈他似乎还是不理解。只好再在此结合“芦笛五戒”重复一遍。

在我印象中，洪老倒似乎没怎么犯第一戒。但其他戒都在不同程度上犯过。他从来不从利害分析入手，去说服大陆人台独对中国只会有好处，却永远只知道在道义上作文章，强调民族自决。这是第一条错误，虽然它并不引起我反感，但起码对大多数大陆人来说毫无说服力。

他的最大错误，还是让人觉得台独运动就是不顾全民整体利益报私仇。换言之，民进党人的整个政治立场，就是出于对国府那“外来政权”和国民党那“外来政权残余”的痛恨，发誓一定要消灭之。昨天老断木请他用一句话说明蓝绿的本质差别，他答道：

“蓝：独裁政权的残余；害怕中共；绿：民主运动之子，敢于保护主权。”

我看不下去，乃插嘴评论：

“所以，蓝党是必须无情消灭的敌人？您如此精通我党的两分法，倒让我始料不及。”

他答：

“民主的消灭与民主的颠覆，不同于暴力的消灭与暴力的颠覆。它用的仅仅是言论与选票。请勿先歪曲再批评。”

任何现代文明人都看得出来我根本没有歪曲他的意思。洪老的主张和共党的唯一区别，只在于手段不同。我党使用暴力手段，而民进党人走的是“议会道路”，但出发点和目的毫无不同：都把政敌看成是必须加以消灭的敌人，对之充满仇恨，毫无共存共荣意愿。

这是民主么？谁听说过民主建立在仇恨之上？谁听说过议会政党把对方当成敌人，试图“民主颠覆”、“民主消灭”之？人类发明民主的目的，就在于找到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使两派谁也吃不了谁，谁也无法获得全面胜利、完全压倒对方，顶多只能轮流占上风。这就是“双赢”的基本原则。

两党政治是英国人发明的，其时辉格党人痛恨皇家统治，而托利党人则是君主主义者，乃道道地地的“独裁政权的残余”，政见如此冲突，可谓水火不相容，可人家也没有试图“和平颠覆”、“和平消灭”对方，两党共存共荣，历时近四百年，一直存在到今天（托利党人即今日之保守党，而辉格党人变成了自民党）还日日在议会吵闹不休。这种生动的示范，洪老先生何以就看不见？

更何况仇恨是魔鬼，一旦从葫芦里放出来就再也收不回去，没有共产党那样的严密组织，群众运动根本就是不可控的。您用文字煽动仇恨，当然可以说是您的言论自由，可到时您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果变成大众的暴力表达，您难道能辞其咎？

洪老先生的最不知趣之处，是他根本不知道大陆人的隐恨，专拣咱们的痛处戳。我这里乾脆把话挑明了说吧。

这网上现有三个老三届毕业生，那便是我，老郑，王希哲。我们的政治立场根本不一样，其中以我的现代文明程度最高，毛共党文化清算得最彻底，“大一统”情怀也最淡薄，可有一点是共同的：咱们都痛恨中共，对国府和蒋公感情殊深，而且都痛恨日本人，因为他们毁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您就是不知趣，专拣咱们的痛处戳，以为咱们这些饱受共党荼毒、曾经沧海难为水之人会为您的忆苦思甜打动，跟您一道去痛恨国府的“白色恐怖”！

如果我不点破，或许您再过十年也无法领悟为何老王和老郑势如疯虎般和您撕咬，而老芦这个原来最同情您的同志也基本反水，唯一残存的就是对一位年老志士的尊重。您自己看看，您的宣传该有多糟糕吧。照您这路子走下去，恐怕最后只会剩下个看不上国府、也不讨厌日本人的马悲鸣作您的盟友，可惜他又对台独不买账。所以，您还是安心作孤家寡人算了。

算了，懒得写了，我说洪老，您最好辞网一段时间，闭门思过，把我写的全部有关文字打印下来，去认真系统总结一下重大策略失误。如果还不醒悟，您将成为网上最伟大的曲线反台独志士，真的。

2004 年 4 月 9 日

写给洪哲胜老先生的“天问”

洪老先生一再向大家介绍，说他为民主事业奋斗终生，这的确很难得。而且，我还时时看到老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介绍台湾民进党人上台的成功经验。不过恕我直言，这些经验似乎没什么普遍指导意义，因为台湾从来也不是大陆那种极权国家。像老先生那种对此毫无感性认识的同志，你就是说得唇敝舌焦，他也决不会明白国府和中共的本质差别，更不会理解为何台湾经验不可能照搬到大陆去。

最近老先生的网上言论似乎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更是毫无助益。他似乎完全陷在台湾一地的党派政治中，除了颂绿诋蓝、和大陆内外的“爱国者”们打口水仗、助长两岸民间敌对气氛外，就没怎么干别的事。当然，这些话他绝对听不进去。而且，光是批评也不是个事。已故邓拓有言：“堵塞不如开导”，所以，莫如提点对两岸人民都有教益的问题，把他的“民主努力”引导到建设性的渠道上来。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民主究竟给台湾人民带来了什么具体好处？

记得去年在《星岛日报》（还是《世界日报》？记不得了）上看到一位姓杨的著名台湾作家的文章（该同志有点像老芦，政论文学通玩，洪老先生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在那文章里，他说，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实现后颇感幻灭和怅惘，觉得社会秩序反倒更乱了。唯一的好处就是给了台湾人民一种心理上的优势。让他们觉得

和大陆那个黑暗的专制国家比起来，他们毕竟享有一种大陆人还有不起的先进社会制度。

我看了那篇文字，不禁觉得凄然：如果民主就只给台湾人民带来了这点廉价的心理优越感，那还值得这么多的人花费这么大的心力、前赴后继地去争取么？

最近台湾大选乱成了这个样子，好好一个国家的人民给分裂成了两半。我上次提的思考题就问了这问题，洪老先生照例不答话，倒是老断木出来接了腔，据他说，这是从专制到民主必然付出的代价，却忘记了我的问题是：这种代价是否真的必要，是否确实无法避免？如果能避免而出现了，到底是哪个党的过错？

我想，目睹这般乱局，说不定台湾人民心目中原来美好的“民主”形像会进一步缩水了吧。的确，连我这个真诚相信民主制度，对民主的认识也远比一般大陆人（特别是那些“民主专业人士”）更深刻的人都禁不住要问自己，除了带来了分裂和仇恨之外，民主究竟给台湾人带来了什么好处？

洪老先生恐怕立刻就要告诉我：它结束了蒋家王朝那“外来政权”的恐怖统治。行啊，这话跟我党的“阶级教育”一样，咱们早就听得耳朵起茧子了。只是我不明白，蒋家王朝的“恐怖统治”除了对一小部份主张独立的人士是一种恐怖之外，到底怎么个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毕竟，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容忍颠覆主权、分裂国土的阴谋活动，是不是？国府的“恐怖”难道超过了麦卡锡时代的美国？起码它没有像后者那样株连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吧？

那天有人转来个台湾人的帖子，说日本入侵台湾后，杀了三万八千多台湾人，而且，日据时代，台湾人不许念法政一类专业。同是“外来专制政权”，国府比起来如何？二二八杀了那么多人没有？陈水扁难道不是名律师出身？日本人当然花了大量精力经营台

湾，可台湾最快的经济成长难道不是在国府时代实现的？为什么洪老就是不能用简单明白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何民进党人如此崇拜感激真正的外来政权日本、仇视起码有一半台湾人认同的国府政权？

不谈这些也罢，还是来谈主题。在我这粗人看来，现今的民主台湾和过去实行开明专制的台湾的区别只有一个：公民多了个政治自由（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言论自由）。除了这条，公民所享有的自由其实和过去完全一样，因为国府统治下的台湾也是自由世界的一部份，人民享有高度的经济自由、人身自由包括迁移自由等等，否则洪老先生当初根本就没有出国的可能，而对普通人而言，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

换言之，要说台湾的民主带来了什么好处，也就是给那些热衷于作官的人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上台机会。但不幸的是，具有权力欲的人毕竟只占社会成员的一小部份。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政治言论自由其实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最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的事还是国民经济。对此，大概普通人都不会有异议吧？“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舍自由而何求”之类大而无当的伟大屁话，只在劣等话剧舞台上有意义，这也是大多数庸人能同意的吧？

那么，洪老先生能不能给咱们列个一目了然的图表出来，显示一下日据时代、国府时代和民运党统治时代的经济成长率，直观地证明一下民主确实解放了国民经济，使大众的腰包更加丰满了呢？

我想，洪老大概不会认为我这请求属于一种刁难吧？咱们都是搞科学的，讲究的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洪先生当然决不会闹出个不证而论的“事实证明，民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的笑话来，我相信。

之所以要问这些俗问题，不是想跟洪老过不去。我还没那么无聊。我说过多次了，台湾是大陆打着灯笼火把也找不到的“实验田”，那儿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主实验，对大陆人民有极大的示教作用。不知从中总结汲取经验和教训、只知和蓝党或绿党打口水仗的大陆“知识”分子，不是弱智就绝对只会是“民运”分子。

据唐德刚老先生介绍，当年有人向孙大炮推销社会主义理论，孙答曰，好阿，将来咱们革命成功了，可以把崇明岛划给你，让你上那儿去实验社会主义。现在台湾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客观上成了大陆的“民主试点”。民主制度在那儿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大陆人民对民主的观感，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决定是否实行民主的最高权威，不是一小撮职业“民运”分子。

据我所知，洪老先生非常希望中国实现民主，既然如此，与其在个别人身上下功夫，莫如现身说法，列举大量无可辩驳的翔实材料，雄辩地向大陆人民证明民主制度的实现、特别是民进党人上台确实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为此，哪怕是导致人民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也是值得的。

这就是我写此文的初衷，相信洪老先生一定会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实行民主确实值得大陆人民艳羡和效法，而实行民主又为何非得消灭“外来政权残余”、消灭“专制制度残余”不可。谢谢！

2004 年 4 月 15 日

就“一个中国”问题请教葡萄皮网友

刚才在楼下看见老葡和老杜的讨论，忍不住拍案叫绝：这才是摆事实、讲道理、毫无意气用事的理性辩论的典范。

不过有的问题我不明白，或更准确地说，我觉得有些问题葡网没看到，所以不揣冒昧请教一下。其实这些话都在《丑陋的大陆人》中说过了，这里不过是重复。

你说：

> “按祖国人均领土来说，中国的领土太小了，所以需要统一。请注意领土不光是土地还包括了领海。有了领土就有资源，所以你说的调工资、上岗等问题就有了更多解决的本钱。”

你说得太对了，不过，光是经济考虑，似乎不能构成统一依据，否则与希特勒“开拓生存空间”有何差别？当然下面你指出了统一的法理依据，这里只是提醒一声。

另外想提醒毫无第一手大陆生活经验的葡网，我党乃是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吃子孙饭、使后代钱、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甚至竭泽不渔、杀鸡砸蛋的高手，凡是客观的大陆人都可以证明我这话绝非厚诬之词。所以，领土领海与其落在共党手上，倒不如留在台湾人控制之下。

大陆人得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台湾和大陆在现体制下统一，则中共必然背上香港式的心理包袱，为了向全世界证明“台湾的明天会更好”，在台湾出现经济危机时往里面疯狂倒钱。台湾的ＧＤＰ可不是区区香港能比的，那岂不是要坑死了大陆人民？

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台湾独立，大陆悍然动武，则中华帝国必然立刻崩溃，两岸同归于尽，这可是“急统派”不能不考虑的严重后果。

现在来看你和老杜的辩论，在你俩的对话后加上我自己的评论：

> 杜：“2.‘台湾的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日本，菲律宾，印度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莫非我们都把他们统一过来？别的问题摆乎不清，这一条似乎没有说服力。”
>
> 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至少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日本、菲律宾、印度是中国的一部份则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多没有说服力。”

老杜的例子举得并不妥当。我早在《丑陋的大陆人》中说过了。更恰当的例子是越南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和中国统一的历史依据要比台湾有力到不可胜计——早在秦朝时，中央政府便在北越和北韩设立了直接管辖的郡。其战略价值也比台湾大得多：朝鲜半岛扼我渤海湾出口，使我北海舰队成了瓮中之鳖，越南窥马六甲海峡，威胁重要的国际水道。所以，在我看来，收复这两个国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收复台湾名正言顺得多。

国际上从来都是承认既成事实，尊重实力，其实没什么道义可言。例如苏联解体前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不但由国际公认是苏联的一部分，而且老布什为了安抚戈尔巴乔夫还特地表态反对它们独立，而今怎么样了尼？更何况有将近 30 年之久，中共都不被联合国承认，难道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么？

在我看来，如果要兼顾历史和现实，世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从日本人手上接收了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叛乱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相干。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还有什么理由去收回台湾？我早在旧作中说过，台湾是日本人交还给中华民

国的，不是交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中华民国的后身，因为后者并未因前者的诞生而停止存在。大陆政府究竟有什么法理依据提出对台湾的领土要求？

> 杜："3.'台湾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搞不清这个"古"以哪儿为界。如果以成吉思汗为古，那么属于中国的领土多了。二战以后，也有刚独立的蒙古。为什么只统台湾呢？"
>
> 葡："应该是明清两朝代为界吧。至于蒙古则不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第一，台湾至少在日据时代不是中国领土，后来当然是中国领土，不过那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前面已经说过了。

第二，难道内蒙古也不是中国领土，不获得世上大多数国家承认？须知成吉思汗是内蒙人而非外蒙的。

> 杜："4.'台湾是美国扼制中国的跳板……'感觉是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说出来的，跟'国外反华势力'口气差不多。为什么他们整天要算计中国呢？即便美国要扼制中国，跳板多的是，日本、韩国、新家坡、越南、印度，……，为什么我们的敌人就那么多呢？"
>
> 葡："因为地球只有一个，资源有限。其中美国最强，是他扼制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否则怎能控制地球上绝多的资源。自从战略核导弹、航空母舰队…等先进武力后，"跳板"一说早就落伍了。若说是美帝的势力范围还比较接近。"

首先，是"遏制"，而非"扼制"。其次，这里关于台湾"是美帝的势力范围"的说法，不知有何证据？难道台湾不是主权国家？莫非日本、南韩也是"美帝的势力范围"？

杜："5.'大部分台湾同胞是反对台独的……'不知道是谁统计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怕民主投票？肯定会把台独投下去的。"

葡："我敢说美国绝对不敢让全世界的人，民主投票来公平分配地球资源。国家的存在是武力所造成，由古及今没有例外。我是台胞，我赞成统一，而且是一国一制也无所谓。"

这公民投票决定地区归宿，跟投票决定资源分配怎么会拉扯在一起？难道国家不是历史形成的，而是为抢占资源的动武结果？如此说来，美国现在武力最强，应该吞并了世上所有的国家才对阿？

由公投决定地区归宿，国际上已有不止一次的先例，最近的例子就是加拿大魁北克。美国以前也在日内瓦会议同意过由越南人民公投决定是否统一，但后来又无耻变卦了，难道我们要学美帝的下流样子？

这么说，你是支持中国动武解决台湾问题了？真让人无话可说，难道你就不怕同胞包括你的亲人死于战祸？你大无畏，我可是怕得要死，生怕战争毁灭了大陆，让 900 多万方土地变成"无国无制"，死上几亿人，乱个把世纪才完事。

我看还是采用李光耀的办法好，愿意一国一制的人，统统发给机票，让他们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

杜："6.'我们不放弃使用武力……'如果这样，就别再亲切的喊他们'台湾同胞'了，听起来别扭，打起来也下不了手。干脆就叫'台湾鬼子'得了。"

葡："喊我台湾同胞让我感觉我还是个中国人，令人无比骄傲。尤其是在现代复兴中的中国的时代。"

这种感觉能强烈到拥护中共武力犯台么？这种"精忠报国"比岳飞的愚忠还令人佩服！

杜："7.'联合国ｘｘｘ号决议规定……'联合国不是被美国操纵的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听联合国的了？要参与世界，不自闭就要参加全世界都接受的游戏规则。联合国正是现在世界上各国都玩的最大的游戏。"

葡："美国国力超强，游戏被他所操纵也是莫可奈何之事。不光是中国听联合国的，世界上绝大多数都不得不听联合国的。"

是么？那美国无法让联合国在其侵略伊拉克战争行为作背书，法国外长扬言要动用否决权否决英美联合提出的联合国决议是怎么回事阿？

最后要说明的是，从感情上来说，我无法摆脱"大一统"的传统观念束缚，希望台湾最后能回归祖国，但我不愿意看到台湾人民生活在万恶的共匪统治下，去吃我和亿万中国人吃过的苦头。但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也反对台湾独立，因为那必然导致战争，而战争将一定使中华帝国解体，使两岸人民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所以，我主张维持现状，让时间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2004 年 6 月 18 日

美爷不能走

楼下贴出老美准备撒手不管台湾的帖子，觉得老美有可能走这步，抛弃盟友是他们的传统，其实强国都如此，不会为了无关小国牺牲太多，影响彼此之间的均势。当初慕尼黑协定不就是这么回事么？打伊拉克无非是因为老修垮了，摊在 70 年代，借老美个胆子他们也不敢！

所以，就算此人现在说的话不被当朝者听取，他毕竟代表了一种专家的声音，迟早要起作用，随着中国实力增加，老美放弃“模糊立场”是必然的。

但老美一撒手，问题就来了。这可能的反应无非是两种，第一，大陆胆子壮了，而台湾胆子虚了；第二，大陆胆子壮了，台湾心横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台海战争的爆发机会都极大增加，因为如果台湾示弱，势必引起大陆咄咄进逼，引起台湾反弹，而如果台湾犯横，又会引起大陆反弹，迟早要弄出战祸来。

所以阿，暗扣山姆，“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留下来，“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你留下来，留下来。

犹记 1996 年台湾大选，政府发空包弹威吓，我日夜焦虑，电视忽闻美派舰，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呆胞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衷心感激暗扣救了台湾，维护了两岸和平，如果老美撒手，民进党那夥沐猴而冠的猢狲再加大陆的流氓痞子，绝对没有那政治智慧更没有人道胸襟和妥协精神解决自家的问题，迟早要涂炭生灵。

中国人似乎就是没本事治理自己，40 年代就需要老美调解，现在也需要人家介入，只要人家一撒手不管，咱们立刻就是大难临头，唉！

2004 年 7 月 17 日

台海危机基本上是民进党制造的人为危机

这文字算是学习了网友推荐的ＢＢＣ节目引出来的感想之一吧。当然，那节目不过是个触发剂，想法早就有了，而且说过多次，不然怎么是“轱辘笛大师”尼？

先作个题外的交代：感谢网友贴出日本人抢走中国文物的资料。可叹的是，老芦对此一无所知。这也毫不奇怪：在我出国之前特别是毛共时代，我党从来只宣传杜撰出来的“阶级仇”（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四川大邑县的“水牢”和“收租院”），从不调查并如实报导真实的“民族恨”，甚至连抗日烈士的坟墓都有本事平毁，这才导致几代人选择性的知识缺失。

看到网友转贴的那份材料，感情复杂到难以言状，仿佛又回到当年在大英博物馆参观陈列的中国国宝的时刻。这感想我早写在《传统文化与四不像》里了：又是痛心，又是愤怒，又觉得耻辱，又有三分无可奈何的如释重负：幸亏鬼子抢走了那些宝贝，否则难免要毁灭在“破四旧”中。小芦当年自行作主，毅然烧毁祖上传下来的价值连城的赵子昂和八大山人的字画。先父后来得知，不但没心疼，更没责备我，反而连声夸我有勇有谋，当机立断，避免了祸延全家呢。这种复杂的感觉，不足为没进过那“圈圈”者道。

还是来说台湾吧。

座谈会上，“巴顿将军”（即前港督彭定康）对最近国内公布的《反分裂法》发表的观点耐人寻味。据他说，那法律其实是中共在去年台湾大选前制定的。当时我党预测民进党会获得大胜，所以准备了这法律应变，万一台湾真的宣布独立，动武也就有法理依据

了，但没料到民进党弄的那么糟糕，那法律其实一时也用不上，不过既然已经制定了，自然也就拿出来通过，云云。

我看这分析颇有道理。我党目前的中心注意力其实是“和平崛起”，主要还是聚焦于内政上，无力外骛，去武力征服台湾。只要台湾的“针”过得来，大陆的“线”就过得去。

这的确是非常理智的方针。用我党的术语来说，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不是对外用武，开疆拓土。再蠢的人都能看出我在 5 年前写的反战文章中指出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如果贸然对台兴兵，则经济建设必然要因战争和国际制裁受到严重打击，本已无比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我党早就不是当年那个野心勃勃的革命党，而是个守成党了。太平天子用不着去无事生非。老马前两天作的动武预言，我看可能性并不大。

换言之，眼下其实是台湾取进攻势态，我党被动因应。这格局从李登辉当国就形成了，于民进党人上台后更是越演越烈。

再说明白点，如果比较一下海峡两岸的态度，似乎可以说，大陆对“统一”的热情，远远不如台湾对“独立”的热情。

那么，台湾当局为何这么有意反复折腾？真是想独立么？否。

在我看来，目前的现实情况是：

一、台湾本来就是个事实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台独是 50 多年的国际现实。台湾要争取的“独立”，不是什么老马那概念混乱的“真正独立”，而是名义上的独立。这名义独立并无什么具体好处，反倒会带来战祸。

二、由于中共几十年的外交努力，台湾名义上的独立不可能获得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认可。请记住，美国可是签订过三个公报的。人家是文明国家，不会轻易撕毁协议。

三、因此，台湾取得名义独立既无必要，也无实际可能。

四、如上所述，中共并不急于统一台湾。

五、因此，台海按理不该出现危机，但危机频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只能用执政的民进党的人为努力来解释。所谓台独的喧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政治秀，而我党却傻傻地被人家穿上了牛鼻子，牵着去钻一个又一个的火圈，跟马戏团的动物也差不多。

民进党人为何这么作？我早在旧作里吹过无数次“轱辘笛”了：完全是为了党派私利。

请同志们去仔细攻读洪哲胜老先生在本坛贴的那些宣传材料。如果您下点功夫，便不难看出：所谓台独宣传攻势的真正重点，并不是取得名义上的独立，而是“台湾本土化”。

所谓“台湾本土化”，或曰“去中国化”，简单地说，也就是“台湾是本省人的台湾”。那矛头其实是内向而不是外向的，瞄准的不是大陆，而是台湾的“外省人”。其战略目标很简单：让本省人组成并支持的民进党千秋万载，一统江湖。

这计算其实再简单不过：民主政治乃是多数政治，一人一票。本省人在台湾占绝对大多数。如果全部本省人都支持民进党，则民进党将永远包揽选票，变成类似过去日本自民党或印度国大党那种万年执政党。而要达到这目的，最简单的就是制造族群分裂，煽起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仇恨。

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篡改历史，谴责“外来政权”，模仿大陆弄个“解放”前后出来，以李登辉当政为划线标准。在此之前乃是“解放前”，台湾不过是外来政权的殖民地，此后则是“解放后”，台湾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既然“解放前”台湾由“外来政权”统治，那么45年以后去台湾的大陆人，当然统统都是跟随“外来政权”侵入台湾的外国人。如今台湾好不容易“解放”了，那些人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印度独立后留在印度的英国人。即使入了籍，也无非是归化人士，

如同我等假洋鬼子似的，永远也不会让人家当成自己人看。一旦这种说法成了全民共识，外省人及其后代便永远成了社会心理上的二等公民，永远无法翻身。如此一来，则国民党、新党等等，便再不是民进党的对手了。

这就是民进党人一定要反复在历史上作文章，坚持“外来政权”论、鼓吹“本土化”的真正用心所在。哪怕脑筋不太灵光的人，去台独网站访问几次或是耐心攻读洪老在此坛留下的干巴文字，恐怕也会悟出这点来。

这也就是我为何从民进党的强烈同情者变成了坚定的反对者——我痛恨那些为了一党私利，不惜制造族群分裂，煽动人民内部仇恨的无耻政客。在我心目中，这些烂仔才是真正的台奸，其短视政策必将引起远期恶果，让民主的台湾沦为第二个北爱尔兰。

这也是民进党人不断刺激玩弄我党的基本原因：要煽起台湾人对“外来政权”及其遗孽的仇恨，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刺激大陆，让对方作出武力恐吓的姿态来。

可笑的是，我党人家一晃红布，他就如西班牙斗牛一般瞎顶一气，最后把自己顶得五痨七伤，与阿扁配合得丝丝入扣，为他不遗余力拉选票。

党官僚们不懂，用武力恐吓台湾，只能引起绝大多数台民的反感和憎恶，为民进党妖魔化大陆的招贴画提供丰富的油彩，驱使台民转而认同民进党。在这点上，我党和“民运”垃圾犯的是同样的策略错误：那些人也正是通过对异议人士的下流整肃教育了广大群众，让他们觉得和“民运”垃圾比起来，我党还要正派得多。

有鉴于此，我给我党的建议是：认清上列五点客观形势，认清民进党人的真实动机根本不是谋求不可能的名义独立，而是“以独助选”，停止为人所愚。其实，对台湾当局实行的“本土化”政策，我党根本就无法阻止，唯一可做的就是停止积极配合，采取

“晾干”（也就是不理睬）的策略。由于我党愚蠢运作，台湾问题在国内舆论上一直占了可笑的比重，这对我党其实非常不利，理由我早在旧作中反复论述过了，应该迅速淡化之，不要再配合台湾当局加以炒作，制造出一轮又一轮的人为危机来。

2005 年 3 月 12 日

国民党访问大陆抹平了中共惊天动地的愚蠢？

刚才又看见马悲鸣大发宏论，谓国民党访问大陆抹平了中共的白痴黔驴外交错误。真的如此么？

马悲鸣性喜卖弄。谈政治就谈政治吧，他偏偏要把进化论拉进来，说什么：

> “对策论是对局二人各出奇招，看谁的策略错误少，谁就能赢。进化论是指不同生物性状之间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看起来进化论和对策论无缘，其实两者是一回事。”

这话当真是天外飞来。对策论是有智力的生物的主观决策选择分析，进化论是自然界把最适生存的随机突变选择出来，一是主观决策，一是客观筛选，挨得上边么？

“看谁的策略错误少，谁就能赢”，“错误少者胜。”

老马又改口了？楼下才说“己方策略正确率越高，获胜时间越短。”当即被我痛骂一番，这改得倒快阿！

拜托你别把进化论不伦不类地拉扯进来，那完全是随机事件，随机突变。可人类社会根本不是如此。关键错误可以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引发一连串瀑布式事件，互为因果链。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拿破仑如果不因为决定进军俄国尽丧大军，后来也不至于寡不敌众，这关键错误就是无法弥补的。又如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如果希特勒听了古德里安的话，扔下步兵闪击未来得及设防的莫斯科，或是在保留斯军团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后同意他后撤，或是在库尔斯克会战前听了曼施泰因的话，二战史都要改写。其中最后一个错误最致命，如果不发生，则德国

决不会彻底失败。发生后德军便再没精锐和盟军周旋了，这都是无从弥补的大错。

又如今天我和某网人争辩的问题也如此。连他到后来都不得不承认，中共毫无理由地卷入韩战是一系列重大外交灾难的最关键一步。如果不这么干，后来决不会陷入 30 年的国际封锁制裁，更不会被关在联合国门外。为了弥补这一关键错误，共党头子不得不用大片领土、金钱去打破他们自己亲手造成的孤立状态。这过错最后总算在 30 年后大部分给弥补了过来，但是中国从此错过了最佳的起飞机遇，至今后人还在享受那一愚蠢造成的灾难的后果。中国始终无法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盟国，不能不说就是当初那致命错误的恶果。

至于国民党访问台湾，也只有你这会看成什么了不得的事。李登辉当政时早就和大陆开始部长级会谈了，我记得似乎叫做“汪辜会谈”，那难道不是对“三不主义”的否定？难道也是民进党上台促成的?

谁都看得出来，国民党虽然坚持“三不主义”，但人家认定是大中华民国的正统政府，台湾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共最愿意听到的调门。而民进党上台后大搞所谓“台湾本土化”，也就是“去中国化”，短短五年光阴就使得台湾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丧失了对中国的认同，这才是中共白痴外交造成的最大灾难，再过几十年也未见得能弥补回来。

如果当初中共不尥黔驴之蹄，阿扁不上台，能有今天这种变化么？哪怕是在民主国家也罢，政府总能利用其权力塑造影响民心。如果中共当初不竭尽全力帮阿扁拉票，朱总理不开记者招待会恐吓台湾，激使不想选阿扁的人都投了他的票，无论是国亲哪家当选，都决不会造成台湾本土化泛滥到如今这个地步。

如今共党黔驴政策的受害人国民党被民进党人逼得铤而走险，不得不去大陆访问，这其实对解决台湾问题并无什么好处。现在的问题是台湾许多人对大陆深怀戒心，“台奸”、“共特”成了攻击对方的最常见帽子。国民党这么干，除了授人以柄、在选战中被政敌诬陷之外，我还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来。除非他们能得到我党的丹书铁卷，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不攻台。但这根本就不可能，即使中共愿意发给这种免死牌，也只可能是暗盘交易，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而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变成国民党的公开政治资源。

必须说明，我最近一直没关心台情。以上不过是马文引起的一点根据常识的判断而已。当然可能是错误的，但更可能的是马悲鸣太看重了形式，把国民党访问大陆看成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任何常人都能看出，现在台湾已经是民主国家，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赢得台湾人民的心，靠收买某个政客甚至政党根本就无济于事，可惜迄今为止，我党就是死也悟不出这个简单道理来，专干黔驴尥蹄恐吓对方，不但无效反而一步步把台民推开的蠢事，现在竟然把日本也当成了黔驴之技的施展对象，当真是让人为我党惊天动地的愚蠢徒呼负负。

2005 年 4 月 19 日

且看我党如何动作

——评连战北大演说

连战昨日在北大发表演说，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的意图正式曝光，成为两岸中国人以及全球华人关注焦点，但连战访问大陆是否会成为两岸关系的转折点，还看我党如何应对。

从风格来说，连战演说体现了民主政客的特点。他以平民一员身份发言，娓娓动人地诉说心愿，毫无大陆那种由命令式语句组成的专横霸道的“红头文件”党八股臭味，应该给大陆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值得海外那些自封人民领袖的“民运”分子学习。当然，习惯了威权指挥的大陆人民是否会把民主政客的平易近人作风当成庸懦，还是个问题。

尽管风格儒雅平和，连战在演说中还是明确地提出了两岸人民的共同努力方向，那便是：

> “以善意为出发点、以信任为基础，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为民族的长远的利益为考虑”，“人民为主，幸福优先”。

这努力方向更进一步总结为两句口号，那便是“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而这个努力方向必须通过“多元与包容”，“互助与双赢”，“现状的维护与和平的坚持”来实现。

于此，连战向两岸的统派、独派以及维持现状派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他们是维持现状派，既不赞成在现阶段统一，也反对独立，理由很简单：无论是统是独，都不是“以善意为

出发点、以信任为基础，以两岸人民的福祉为依归，为民族的长远的利益为考虑”，不是“人民为主，幸福优先”。

这正是老芦上网五年来的一贯主张。的确，从两岸实际差距和国际环境着眼，无论是急统还是台独都只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政治家们唯一的明智选择，就是靠大陆的和平发展，逐渐减小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差距，靠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逐渐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期以半到一个世纪的时期，实现自然的和平统一。

我深信，这战略符合两岸三地即美中台人民的共同利益。如果国民党宣传有方，一定会以此逆转民进党人以省籍矛盾制造的族群分裂，赢得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

老芦乃小小草民，知道寻常百姓的心事。如果我是台人，我根本就对是统是独毫无兴趣，只求大陆不要来打，也不要生活在万恶的共党制度之下。名义独立必然招致战祸，让我丧失现有的自由；名义统一则会让我日夜担心迟早被大陆那极权国家吞并过去。对我这小草民来说，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大陆和平进化成了民主国家，则统一也无妨；如果大陆内乱碎成七八十块，则台湾正好安全地独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人的“独立牌”，完全是无事生非，哗众取宠，出发点完全是一党私利，根本就不是李登辉标榜的“民之所欲，长在我心”。

因此，无论从道义还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连战的演说揭示的国民党的大陆政策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

有的网友认为这演说太消极，反映了国民党在大陆毫无进取之心，确乎如此。

记得网友跛脚僧曾建言，国民党应趁此机会向大陆发展，扩张为全国性政党，推动大陆实行多党政治。这次网友安魂曲也提出了类似建议。

愚以为，他们这是表错情了。明眼人一望即知，连战那演说虽在大陆作出，其实主要是向台民交底。那演说的主旨再清楚不过：人家并不想统一大陆，只求“维护现状，坚持和平”而已，这彻底改变了经国先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陆政策。

一言以蔽之，今日的国民党乃是“台湾国民党”，并非昔日的“中国国民党”，敬请诸位在审时度势之时注意这两者的差别。连主席关心的是如何安抚台民并赢得他们的心，以期在下次大选中获胜掌权，并不是雄心勃勃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美陵”。那谒中山陵一幕，不过是出于历史包袱不得已的作戏而已。对此他其实已经在演说中讲得很明白了：

“我们不能一直在过去，就像丘吉尔讲的，永远的为了现在和过去在那里纠缠不清的话，那你很可能就失去未来。逝者已，来者俱，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认为我们的愿景要回到自由的思想，发源地，今天北大我们再谈一谈。这就是多元与包容，这就是互助与双赢，这就是现状的维护与和平的坚持。”

我党对此似乎也心知肚明，这才敢让台湾国民党主席访问大陆。其实谁都看得出此举必然带来的政治上的尴尬：你既然承认连战是国民党主席，那大陆的“民革”岂不统统成了人家的下属？如果人家来名正言顺地收编旧部，在各省开设党部，您还能有什么理由去阻止？

但台湾国民党绝对不会这么作，而我觉得这非常明智。大陆局势险恶，我党从上到下，官僚们无一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凶神恶煞，岂是台湾来的小白脸少爷们可以对付的？介入大陆政治必然引起极权政治中的许多险恶变数大发作，吉凶难测，台湾人用不着来赶这趟莫名其妙的浑水。

更重要的是，连战现在已是民主国家的在野政客，他的出发点必然只能是如何赢得台湾大多数民意支持。他自己已披露，政敌攻

击他此举是“联共治台”（芦按：似应为“联共制台”），他自己增补了一字，坦承那是“联共制台独”，等于承认此行的目的在于获取大陆的保证，借此解除台民对大陆的敌意、反感与猜疑，釜底抽薪，一劳永逸的击败民进党人的“独立牌”。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轻率躁进，实行经国先生的“三民主义登陆”战略，不但会引起大陆当局的猜忌，更会在自家后院点燃火药桶，授政敌以口实，坐实“台奸”罪名，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丧失了他籍以和大陆当局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他这次是挟国民党立法院选举大胜之余威而去的，可以说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那才是输光当尽，同时为台民和中共抛弃。

综上所述，我认为，连主席演说昭示的国民党大陆战略，完全符合两岸实际状况以及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确实是国民党面对民进党的严峻挑战下唯一能作出来的合理应对。但他冒了许大政治风险，这战略是否成功还在未定之天。“联共制台独”的工作前提是能得到我党的全力合作与协助，而我党是否有足够政治智慧看出这点来还大成问题。

其实哪怕蠢如我党领袖也该看出，这是挫败民进党“本土化”的最后一个战略时机。过去我党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力拜物教，根本不知道民主国家的运作机制，只知一味以武力恐吓，逼反了国民党的支持者和中立者，导致民进党人顺利上台，当真是愚不可及。如果这次再糟蹋了连战主动送上门来的“联共制台独”的千载难逢之机，死不放弃僵硬的政治立场，专门拆台而不是补台，让连满腔热望而来，两手空空而归，无颜以对台湾父老，让民进党人趁机大肆反扑，从此再难扼制，那我党就是对中华民族再次犯下大罪。

我党领袖必须学会的最起码常识是，台湾现在是民主国家，政客由人民选举，国事由民意决定。因此，要和平统一台湾的起码前提，就是大多数台民必须心甘情愿。

说句难听的：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政客与人民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主国家领袖只能“诱奸人民”，而专制国家领袖只知“强奸人民”。可叹的是，过去几十年内，我党一直用对付大陆子民那套手段对付台湾人民，这结果便是直接配合民进党人，在台民中制造了巨大的离心倾向，加剧了普通台民对大陆的憎恶、反感和仇恨，当真是愚不可及。

从过去的沉痛教训中，应能看出未来应取的正确的台湾政策，那就是胡适博士在日本侵华前夕给日本政府的劝告：停止军事侵略的威吓，反过来征服中国人民的心。这就是我党现在面临的历史任务，停止武力恐吓，反过来征服台民的心。

因此，我党现在必须为连战主席补台，让他满载成果而归。胡温必须在公开场合作出明确承诺：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则大陆绝不进攻台湾；大陆政府同意连战主席提出的“多元包容，互助双赢，维护现状坚持和平”的主张，赞成尊重现实，维持两岸现状，加强两岸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为最终实行和平统一创造各方面的条件。与此同时，大陆应该作出一系列善意和解姿态，诸如取消导弹对台湾的瞄准，停止在国际社会中围堵台湾等等，以此赢得台湾人民的心，并用实际行动直接对国民党进行政治投资，使得国民党在日后大选中能大败民进党，停止旨在制造台民分裂的“本土化”运动，维系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感情纽带。

如果党国领袖能有足够远见卓识采取以上步骤，则连战这一大胆的政治赌博也就赢了满贯。否则连战的访问无非又是一场毫无意义、反倒为国民党促寿的政治秀而已。

2005 年 4 月 29 日

可圈可点的连战“破冰之旅”

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已近尾声。对此历史性事件，世界各地新闻媒体都有评介，这里说点票友之见。

胡中央可打满分

本人虽不喜欢敬爱的胡主席，觉得他在内政上比起更敬爱的江主席是个大倒退，但不能不承认，此次国民党访问大陆乃是他当国以来的大手笔，充分体现了他比前任更灵活，更有弹性，更具有前瞻能力与政治智慧。

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胡连会谈公报确定的五项共识：

一、促进尽速恢复两岸谈判，共谋两岸人民福祉。

二、促进终止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三、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四、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五、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

对这五条我都极感满意，觉得确实是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特别是其中第二、三、四条完全瞄准了台湾民意，应能赢得台民好感。

其实登辉、阿扁搞台独的民意基础无非是两条，第一，中共不遗余力地在国际社会上封杀台湾；第二，多次对台湾进行武力恐吓并以大批导弹瞄准台湾。如果我是台湾人，生活在大陆导弹的阴影下，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痛恨大陆，更别说大陆封杀台湾的外交生存

空间，一定会极大地刺伤我的“民族自尊心”。如果大陆把这两条拿掉了，也就极大地去除了台独的民意基础，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

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胡甚至比我想像的还灵活。他提出只要台湾当局回到所谓“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原则”），则大陆就会取消瞄准台湾的导弹。关于台湾参加 WHO 的问题，他表示，只要用“中国台湾”的名义参加就没有问题。当对方提出无法接受这名称时，他当即指示下属再作研究，拿出个双方能接受的名称来，云云。如果这些谣传是真的，那当真是两岸人民的福音。起码，它说明中共新领导有了点世界文明常识，知道该如何去“诱奸”（seduce）台湾人民了。

那第三条更是精彩，可以看成是胡送给连的具体而微的礼物。台湾现在是发达的工商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无平等可言，资本家放的哑屁要比百姓用高音喇叭喊话更震耳欲聋。普天下的商人都是见利忘义的家伙，把那些人用金钱吸引过来，台独的经济基础也就给蛀蚀得差不多了。阿扁最忌讳的就是台湾被我党用经济纽带捆死在大陆身上，当国以来一直在压制两岸经济交流，台商对此已啧有烦言。如今中共这步棋已经陷阿扁于被动，不能不说是非常高明的。更何况两岸经济是互补互惠的，密切的经济合作只会造福于两岸人民。

当然这些诺言是否能兑现还在未定之天。和解最大的障碍，网友异乡客已经指出了，那便是台湾决不会接受“一中”原则。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解不开的死结，连搁置都无可能。例如你要允许台湾加入国际活动，那名义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中国台湾”无异于承认台湾是地方政府，大陆是中央政府；而使用“中华民国”大陆又绝对不会同意。不解决这难题，中共再作允诺也是空的。而如果台湾重返国际社会问题不解决，台独便永远有民意基础。

尽管如此，愚以为，胡中央已经在其底线内尽力而为了。它当然是我党“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用、刚柔兼济、分化瓦解，在敌人内部打入楔子的传统统战功夫，但在客观上却极大改善了北京政权因《反分裂法》出笼而被严重抹黑的国际形像，不但显示我党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而且向国际社会证明《反分裂法》甚至在台湾都有民意基础。因此，这次连战访华，不能不说是胡个人的精彩表演和巨大的外交成就。

连战死里逃生

我对小白脸连少爷素无好印象，不过此次倒让我大吃一惊。他此行的巅峰之作，当然是在北大那个演说。就算他此行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幻影式的政治秀，光那演说本身，恐怕也要垂诸中国历史，如同丘吉尔、罗斯福、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著名演说一般。

当然，作为一个台湾政治家，那演说也有很显眼的瑕疵，那便是他居然失口承认“联共制台独”。这种只能在幕后讲的话，此公居然抬到台面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策略失误，完全是授政敌以不必要的把柄，给他们大作文章的机会，可能诱发中立台民不必要的猜疑，在一定程度可能抵消此行能唤起的民众共鸣。

正因为这一点，连战就此成为大陆民众心目中的新星。或许就是因为被大陆人气冲昏了头脑，连少爷才会讲出那句极为失策的话来，忘记了他的基地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好在他这失误给了继他而去的宋楚瑜一个教训。估计宋到大陆后当会更着眼于台湾民众的反响，有意和大陆拉开距离，这才是比较明智的党派政治策略。

无论如何，连主席这次破冰之旅，估计会受到台湾民意欢迎。我早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老百姓总是务实的，大多数台民只会是

“维持现状派”，无论“统派”还是“独派”都是少数人。登辉和阿扁蓄意“草船借箭”，靠“边缘政策”频繁刺激大陆，人为导致两岸关系紧张，以此借助我党帮他们拉选票，这种政策只能收效于一时。骤发的危机当然会在短期内激起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但如果两岸关系持续紧张，百姓迟早要腻味，渴望能从这种紧张中解脱出来。所以，以常理度之，台民应会肯定连战此行。当然，是否能把一时的民意支持兑换为 2008 年大选的选票，端看国民党日后的运作。

民意支持似乎也能从阿扁的微妙的态度改变中看出来。据说他出访某国之先正式表态，针对民进党高官作出的“连战犯法”指控，指出连此行没有超出在野党底线。可见这个机会主义分子本能地感到那些指控太过荒唐，不会赢得民意支持。此外他还透露自己已托宋楚瑜给胡锦涛传话。这一微妙表示似可解读为他为日后贪天功为己有预先埋下伏笔。凡此种种，都和登辉以及民运党干将的咒骂形成鲜明对比。

正因为此，连主席刻下在国民党内人气大增，甚至有人开始谈论他的连任问题。连王金平都表示如连战愿意连任，他一定服从，只是小马哥不同意。

此前国民党当真是流年不利，百年老店被登辉窝里反，短短几年间就给砸得落花流水，不但濒临边缘化危险，而且党内颇有“三家分晋”之虞。如此迅速的衰落，连当家的不能辞其咎。现在他在政治生涯最低点上突放异彩，为他本人也为国民党扳回了许多分。以区区在下看来，他最明智之举莫过于在这政治成就的巅峰急流勇退，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打上个圆满的休止符，犯不上再去干少爷不宜的肮脏政治活。

阿扁和老美的心事

连战此行，给阿扁带来了无比严峻的挑战。我党绕过他向在野党下手，不能不让他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共党的和平攻势远比军事恐吓难对付。后者只会激起台民同仇敌忾之心，而他这民选总统也就理所当然地变成全民团结的代表者，而前者则会使得民意多元化，使他处于动辄得咎的地步。如果他显得消极无为，就会引起渴望缓和紧张局势的民众的反感，如果他过分积极，又要让他丧失死硬派的支持。

在这种情形下，阿扁的正确应对，应该是表态欢迎鼓励在野党与大陆接触沟通，乐见中共放弃武力恐吓政策，欢迎两岸紧张局势缓和，同时敦促中共与代表台湾民选政府直接接触。在我看来，这是他抵挡我党和平攻势的最佳着，不但强调了台湾的“主权”，而且表明了他也是和平积极分子，无论从左中右哪派看来都无懈可击。

这其实就是狡猾的美国佬公开宣布的主张。我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不统不独的现状最符合老美的国家利益，因为独立要使美国陷入不必要的战祸，而统一则使老美丧失了一个挟制中国的筹码。那话说得还不够具体。其实，最符合老美国家利益的是中台之间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这样他们便具有主导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使自己变成双方都必须相求的仲裁者，而这正是老美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在中东玩这一手玩得不亦乐乎。

如今国共的突然和解大出老美的预料，意味着事态的演变有可能脱出他们的掌握。老美当然不好反对两岸和解，因为这历来是他们的官方表面主张，唯一可做的就是强调要尊重台湾民主政权，敦促我党和台湾政府谈判。

不能不承认老美这一着非常高明。台湾问题的死结就在这“正名”问题上。中共可以以党对党的名义与阿扁谈判，但碍难接受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和中华民国政府谈判。所以，如果阿扁坚持这一招，难免要封死我党的和平攻势，使得我党后着再也使不出来，无法把与在野党的接触扩大为与台湾政府的正式谈判。而只有这种官方谈判才会产生实质性后果。

如此一来便出现了一个潜在的严重危险，也就是我党刻下进行的和平攻势可能达不到原设计目的，反倒变成加深促进台民进一步分裂的局面。如果这种僵局真的出现，那真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不幸。

其实我早在三年前就为台湾当局想出既能保持台湾内部统一，又能抵挡我党的和平攻势的高招来了。那便是痛痛快快地承认我党如此强调的"一中原则"。在《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中，我说：

> "台湾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是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但能让大陆心花怒放，更对自己有利，增加了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大陆再来谈'回归'，您就说：行啊，我是正统的民选的中央政府，您是叛乱坐大的地方政权，请您来回归我，只要您一点头，我马上派出官员去层层接收，好不好？看他们还有什么后话可说？
>
> 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仅能让中共心花怒放，保住了对方最重要的面子，而且能让海外华人归心。而台独除了能吸引部分（不是全部）本省人的支持外，还能有什么好处？要冒的现实风险可是大得多。权衡利弊，我真不明白陈老扁来的是什么劲，而呼应他的人为什么还那么多。
>
> 此文当然不是只为台湾当局献策，而是着眼于化解两岸之间毫无必要产生的戾气。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中说过，现在的实情是，大陆没实力去'解放'台

湾，台湾也冒不起独立的风险。既然如此，就干脆让后代子孙去理清这乱麻。这的确是唯一的对两岸人民有利的解决方式。在这期间，大陆可以拼命发展和台湾的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在大陆身上，而台湾可以从这经济关系中一边牟取合法暴利，一边等着看，就这么拖上半个世纪几十年。到那时大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变成了一个更自由、更发达的民主国家，就是让共党腐败政权、民族分离分子以及暴力‘民主’革命党人联手搞垮，碎成了七八十片。如果是前者，台湾就和大陆统一又何妨？如果是后者，台湾要独立还有谁来拉得住？”

三年后来看这段话，我觉得仍然成立。只是小岛上毫无人材，那群沐猴而冠的竖子自己没本事想高招，也听不懂高人的指点而已。所以，估计阿扁最可能的应着，还是坚持实行必须进行政府间谈判，以期解决实质问题，而中共的和平攻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此触礁。

前景

综上所述，台湾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所谓“名分”，两岸都要坚持自己是主权政府，此乃无法退让的底线。在这种情形下，两岸关系便如异乡客网友说的，只能“求经济之同，存政治之异”。但政治名分问题不解决，则两岸关系永远也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台湾无法重返国际社会，大陆瞄准台湾的导弹也不会撤销，两岸关系就会始终紧张下去，进而导致中国与美日关系日益紧张，台民离心倾向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

要解开这死结，需要双方的大智慧与大容量。在我看来，折衷方案是双方都改国名，共同采用“中华共和国”的名义，实行“一

国两府”，共同参加联合国，分享理事会席位。不过这种实质性让步绝对超出了我党底线，完全是草民票友扪虱空谈而已。

2005年5月1日

悲观者说两岸关系前景

在楼下看了一阵帖子，见王司令盛赞安子大有进步，当下忍不住揶揄了他老人家一番，告之曰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即反共”乃是天下比较搞笑的发明。如果成立，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种种，全是反共大业了。司令不忿，笑话我是不可教之“竖翁”，那也说得是：如果我成了“横翁”，进了棺材，当然再也无法回话，岂不就此成了“不违如愚”的可教子女？

我当时就跟了司令一个帖，现略作修改，引用于下：

> “如果你看过我的《可圈可点的连战“破冰之旅”》，就该明白，鞍子此文说的意思早在那文章里讲过了。我五年前就给台湾支过招，要他们坚持让大陆承认中华民国，在此‘一中’前提下谈判，那本意不是要统一，而是以此剥夺对方的统一法理依据，推搪对方的和平攻势，击败大陆矮化台湾为地方政府的企图。之所以支此招，是因为那时我不希望看到独裁的大陆吞并民主的台湾。但登辉和民进党人当国后倒行逆施，激起我的反感，让我逐渐认识到，他们根本就不两岸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台湾问题再拖延下去，势必变成毒化中外关系的一个毒瘤。可现在的问题是，不管动机如何，阿扁现在最有力的反击武器，就是用‘一中是指“中华民国”’去封死中共攻势，并争回在岛内的主动。如此一来，则两岸关系势必进入僵局，而台海的紧张局势也就无从缓和，中国和美日的关系也无法真正改善，这才

是可忧虑的。这些话早写在我那《圈点》帖里了，鞍子此帖不过是展开重述一遍而已。”

随即又看了“炉门”网友《一中概念如何突破》的大作，琢磨半天也没明白他的具体主张到底是什么，因抄袭柳宗元《捕蛇者说》之题而为此文，候教于各位施教贤达。

两岸关系可有如下解决方式：

1、共同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

2、共同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的主张。

3、承认两个中国并存的客观事实，但双方同意在将来统一为一个国家。

4、双方同意改变自己国号为同一名称，诸如“中华共和国”或“中华联邦共和国”之类，大陆政府称为“中华共和国大陆政府”，台湾则是“中华共和国台湾政府”，双方是平级的。

以上诸案中，第一第二案根本不会被海峡一方接受，因为那意味著有一方必然要沦为地方政府。第三案台湾倒可以接受，但大陆决不会同意。第四案台湾占了许多便宜（例如必然因此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如改名为“中华共和国”，则英文国名依旧，等于未改名），估计会同意，除非阿扁的“头壳”真的“歹掉”了。但大陆绝对不会同意。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陆绝对不会接受台湾为对等的主权政府，不会同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进行谈判，更不会同意承认“一中”指的是“一个中华民国”，甚至也不会同意双方共同改国号，只会坚持以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湾地方政府的谈判，而这台湾绝对不会接受。所以，可以有相当把握断言，别看两岸现在热乎，政党之间的谈判最终还是无法进展为政府之间的谈判，而没有政府之间的谈判，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名分”问题终将成为颠覆连宋破冰船的冰山，而连宋破冰

之旅最终难免导致台民的进一步分裂。倘真若此，那才是两岸人民的共同不幸。

但愿本竖翁是杞人忧天。

2005 年 5 月 5 日

两个中国并存是不容否认的国际现实

适才在楼下请教诸位，“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到底和“事实上有两个中国并存”究竟有何区别。异乡客网友乃贴出陈林先生《两岸关系的法律事实现状》来，问我有无参考价值。我觉得，该文没有什么价值，口谈法律，却毫无法律常识，竟然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好比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母亲，北方人喊作娘，南方人称作妈，不会变成两个人”的昏话都有本事说出来。

其实现代文明人都知道，生物学上的“妈”，并不一定等于法律意义上的“妈”。“中国”不但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民族概念、文化概念、政治概念、法律概念，而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国家乃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正是用地理概念偷换法律概念，自欺欺人。如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当然就有一方的政府是地方政府；如果双方都自称中央政府，则必然有一方是伪政府。如果是前者，两岸政府都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如果是后者，则一方必须放弃伪国号，归降正统政权，此乃国际社会的共识。

从历史法统来看，中华民国不可能是叛乱政权，因为它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世上绝没有先出现的中央政权去颠覆一个后起地方政权的咄咄怪事。而且，它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因为她并未因后者问世而消失。更何况撤退入台的中华民国政府是 1947 年国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民选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从

未进行过大选。所以，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武装叛乱坐大的地方政权。

问题在于，might is right（强权即公理）。为了国际政治能实际运作，国际社会不能不奉行接受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承认对实际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版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结果便造出了“现实的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法统的中国”（即中华民国）两个中国并存的尴尬局面。

其实我党领袖对此也不是心中无数。据说老毛后来曾追悔不该另起炉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应该继续打著中华民国的旗号。如果这官方披露的信息是真，则说明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肾国父自己都知道，他老人家生出来的乃是个上不得席面的私生子。

说这些话，不是想重温老蒋“反共复国”的残梦，而是想提醒那些气壮如牛的同志，不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看成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真理。那其实不过是国际社会向实力无可奈何屈服罢了，其实并没有同志们幻想的凛然大义在其中。

更重要的是，我想提醒海峡双方的高官们注意，这自欺欺人的法术没有什么实际操作内容，必然要在现实中触礁。不澄清这模糊表述，政府间谈判就无法进行。兼顾现实和法统的作法，便是承认“一国两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降级”为“中国大陆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也“降级”为“中国台湾政府”。在我看来，这才是解开历史死结的唯一办法。可惜大陆政府绝对不会同意。

2005 年 5 月 7 日

中共对台统战策略初见成效？

刚才去《多维网》看了一阵新闻，越看越觉得好笑。中共那手分化瓦解的统战策略，虽然说穿了一钱不值，却居然又一次奏效，台湾绿营乱了阵脚，真真笑话百出。

最混帐的是“阿辉伯”。此公是当仁不让的搅局专家，专业就是窝里反。过去任国民党主席时把百年老店搅得云落星散，如今又在绿营兵中带头作乱。他左右开弓，既骂连宋卖台，又骂阿扁没有诚信，违反了“制宪”的竞选诺言，改为“修宪”，甚至要选民在即将到来的国大选举中不要投民进党的票。

幸亏是国会选举，如果是总统大选，登辉出来这么折腾，只怕要推出台联自己的候选人来分民进党的票，让泛蓝阵营渔人得利。

即使如此，这么折腾也绝对只会影响国大选举——它同样有分票效应，让选民把票投到没希望的台联候选人头上去，使得原来可以当选的民进党候选人落选。如果民进党人采取报复措施，也会起到类似结果，更不必说自乱阵脚会严重影响士气，使那些没打定主意的人纷纷易帜。

当此严峻时刻，台联本应和民进党人紧密团结在扁总麾下，可笑的是登辉胡来一气，让扁总发作不是，不发作也不是，如鲁迅所说，成了“侧站着作战”，既要对付连宋以及两人访问大陆带来的巨大压力，又得安抚内部造反派，真够这小子累的。

平心而论，阿扁确实很优秀，当此危局，应对颇为得法。

他的第一招我早预言过了，就是祭起“政府谈判牌”来，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中国政府必须和台湾政府谈判才能解决问

题。如此一来既向台民表明他不是蓄意把国家拖入战祸的顽固派，愿意与大陆和解，又满足了台民的“民族自尊心”，更成功地封死中共的和平攻势，使得中共后着再也使不出来，他便可反过来指责中共毫无和谈诚意。可以说，针对台湾目下的大陆热，这确实是民进党人可以作出的唯一正确对策。

此子第二招我也早猜到了，那就是抓住连战演说中的失言“联共制台独”大作文章，煽起台民对国民党的猜疑与反感。但他身为总统，并未越界，举止非常得体。针对民进党某些立委指控连战犯法，他表态说，台湾是民主国家，公民有言论自由，不能因为谁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把他抓起来治罪。这表态漂亮之至，其实他还可以再增加一句，即与大陆缺乏言论自由相对照，当能更加凸显台湾民主制度的先进。

类似地，他针对宋楚瑜“台独不是选项”的主张，指出是独是统，必须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决定，不是谁可以随口乱说的。他更发挥律师寻瑕抵隙的专业特长，指出“台独不是选项，那不是说只有统一才是唯一的选项了么？”质问宋有何法理资格代台湾人民在此问题上作主。

漂亮哉，阿扁，你的头壳真的没有“歹”掉。只不过，侬个“律师逻辑”瞒不过明眼人去。根据排中律，你只能说“如果独立不是选项，那么不独立就是唯一选项”，而“不独立”可是包括着“统一”和“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两个选项的，我深信大多数台民倾向于后一选项，也就是和国民党主张基本一致，你可别靠诡辩把这一笔抹去。

阿扁的第三招则是民主政治家常用的诡计，那便是散布谣言，抹黑连战形像，说连战赴大陆前曾在美国秘密会见中共高官，其大陆行是奉命之行，目的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捞选票。

国民党发言人对此已经作了反驳，但谣言在民主政治中的杀伤力不可低估。谣言就算得到澄清，总会在疑心重的选民心中留下阴影。难办之处还在于辟谣不能太起劲，否则只会强化大众记忆。明智的方法还是低调反驳，指望大众被宋的大陆行吸引了注意，忽略或忘记该谣言。

不容否认，比起民进党那起自草根的“民粹”党来，国亲公子少爷党玩民主脏政治确实不是十分称职，许多机会都白白放弃了。例如前段某个民进党高官赴大陆访问，在上海参加了什么会议（细节忘记了，甚矣吾衰矣），民进党发言人竟然说他是给中共劫持到上海去的。可笑的是那人后来自己辟谣，说他本来去的目的就是要到上海去开那会。国亲两党竟然不会抓住这事作足文章，在人民心目中揭露民进党人欺骗公众，毫无公信力，可谓迟钝之至。

总而言之，中共甘冒台湾“精神污染”的巨大政治风险，邀请连宋访问大陆，其目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其实并不是在近期内争取两岸统一，而是打击台独势力，让主张维持现状或统一的国亲党获得民意支持，在民主政治中击败民进党。

这一策略目前看来已经初见成效，绿营确实非常被动，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连宋之行确实赢得了民意支持，在台湾兴起了大陆热，更是内部不稳甚至分裂，后一问题更加严重。如果绿营不迅速解决这问题，让“阿辉伯”再胡闹下去，则国会选举一定会受影响。目前阿扁已经是尽力而为了，问题还在于台联是否顾全大局，和他共度难关。

我想，关键问题，还是绿营必须认识到，蓝营首脑人物出访大陆带来的高涨人气，说明普通台民已经厌倦了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希望能有所缓和。须知在发达国家，中庸派从来是大多数，激进分子可能蛊惑大众于一时，但绝对不会有长期号召力。民进党人只有认识到蓝营人气高涨的深层原因，相应修改自己的大陆政策，放弃

过去靠刺激大陆来唤起民意支持的短视作法，才有可能成功地对付蓝营挑战。

2005 年 5 月 8 日

中共接受了“一国两府”？

刚才见到网友转贴的亲共两党会谈公报，感觉其中四条和国共两党的差不多，多出来的两条一条是谴责台独，再一条是有关“九二共识”的正式表述，原文如下：

> “促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谈判。
>
> 一九九二年两岸达成的共识应受到尊重（一九九二年两会各自口头表述原文：海基会表述--‘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
>
> 在前述两岸各自表明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既‘九二共识’（‘两岸一中’）的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协商谈判，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务实解决两岸共同关心的重大议题。”

在此之前，关于是否有“九二共识”成了台湾争议焦点之一。民进党政府坚持认为没有，甚至赌咒发誓地说可以去查会谈记录，就连老洪也跑到此坛来，重复此说，而国亲党似乎认定确有这“共识”。

根据这个公报，所谓“九二共识”，似乎只是“口头表述”，这未免透着蹊跷：何谓“口头表述”？难道没有文字记录？如此重要的会谈，岂会没有记录？如果有记录，那似乎就不再是“口头表述”了吧？

其实在这上头折腾似乎没多少意思，就算真有口头表述，没正式签字画押就毫无法律约束力，此乃生活在现代契约社会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凭“中华民国政府代表曾口头表述同意两岸一中”，是不足以要求民国现政府回到原来的立场上去的。

倒是宋楚瑜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还有点意义。他指出，1992年台湾政府制订的《国统纲领》就表达了类似立场。此话不错。我记得那时李登辉甫上台，颇对统一热心了一阵子（他似乎是93年千湖岛事件后立场才来了个U转，从统派变成独派），指示手下制订了那国统纲领，那文件全文在《中央日报国际版》上登载过，确实是宋主席说的那个基本立场。那可不是什么“口头表述”而是书面文件。我记不得它是否经过立法院批准。倘若此，则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立法之一，后继政府可不能无故违反该法确定的政府基本立场。

当然我只是模糊记忆。不过愚以为，中共和国亲有如去争那“口头表述”，不如把《国统纲领》刨出来细细研究，看有没可以用来打击阿扁“一边一国”论的重武器。

看来宋把中共首次正式同意“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当成了他此行的外交成就，言下颇为自豪。如果按王希哲的单相思思维方式，那又是崔莺莺“行去几回头”，须让王生怦然心动，“指头儿告了消乏”也（司令休得生气，我不过是喜欢你的幽默感，略施嘲谑而已）。

的确，中共此举，可以当成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同意“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否则谈何“共识”？接下来的推论便是，那也就是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再接下来便立刻进入逻辑死胡同：OK，“两岸一中，各自表述”，台湾认为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大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代表中国，两岸都允许对方从政治上如此解释“中国”，也就是默许对方自称中国中央政府，那岂不是等

于同意“一国两府”？“一国两府”当然可以，但那成立的前提是要么一方是中央政府，一方为地方政府，要么是没有中央政府，双方都是地方政府，绝对不会有双方均为代表全国的中央政府的咄咄怪事。

公报第一句话更支持这解读：“促进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速恢复两岸平等谈判。”请大家注意，这儿的关键词“平等谈判”。所谓“谈判”，当然只会是政府间谈判，不是两党间谈判，否则没有什么“恢复”一说，更没有台湾人说的“公权力”。政府间谈判而能平等，那自然是平级政府，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却又不是国际谈判，乃是一个国家内的两个中央政府的谈判。天下再没比这更大的逻辑笑话了。试问那会谈公告该怎么落款阿？

当然，若思和其他网友早已指示，台海问题只有靠“模糊政治”才能解决，不可能也不宜过分清晰，我完全同意这英明指示。3年前我就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中指出，要维持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家装糊涂，都装成自己是两岸人民的合法代表。从历史和现状来看，要清晰地突破两岸“萌芽状态瓶颈”根本就不可能，只能靠模糊政治去解决问题了。

公平地说，老宋也倒没吹牛，大陆居然变相同意“一国两府”，同意把台湾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如此重大让步，在我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过。不管他在内政上怎么个铁腕法，小胡的务实外交交关漂亮，值得表扬哉。

如此说来，原来我对中共的预测还过于保守了些。我认定中共不会同意两岸政府间的平等谈判，所以阿扁可用坚持政府间谈判去推搪中共和平攻势。如今这公报暗示我党可以同意此举，阿扁还有什么戏？

当然，即使中共作出了这史无前例的重大让步，那也不意味着“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如果同意“一国两府”不过是我党孤立打击阿扁代表的台独势力的统战策略，那倒没什么要紧，反正我党只需使出个“拖”字诀来，不跟阿扁谈判，不兑现一再作出的帮助解决台湾重返国际社会的诺言，拖到他下了台就完了。但如果我党真有诚意兑现诺言，则那意味着“一国两府”的让步将是全面的，恐怕大到我党无法承受的地步。

最直接的难题就是台湾重返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诸如ＷＨＯ。请问台湾以何名称进去？如果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则无异于在国际上承认两个中国。如果以“中国台湾”，那就不符合“平等原则”。要台湾人接受，除非中国代表团改名“中国大陆”才行。以此类推，最后必然发展到连安理会的席位都得两家分享，我党会同意么？即使小胡愿意，军内强人也不会干吧？

我想，小胡以及手下高参不会想不到变相承认“一国两府”，而台湾政府接招后必然引发的链式反应。所以，那“促进协商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的表述就有意含糊不清，只说了个“促进”，并没有作出具体承诺。政治家这么糊弄百姓当然是家常便饭，问题是，这问题一天不解决，许多台湾人的独立之心就不会死，毕竟，“大陆军事威胁”和“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乃是许多台民心中永久的痛。

如此看来，两岸形势未可乐观。我党邀请连宋访问大陆，如果能说有什么作用，那也顶多就是分化瓦解了台独势力，在党派政治中助了国亲两党一臂之力，但这只是短期效果。从长远来说，如果我党不作出实质性让步，全面承认“一国两府”，则两岸关系非但不能取得实质性改善，反倒会促进恶化台民分裂，使得岛内政治局势动荡，反过来引起中共的恶性反弹，造成两岸局势紧张，进而恶化中美中日关系，无助于实现“维持不统不独现状”的战略目标。

2005 年 5 月 12 日

阿扁究竟托宋楚瑜向胡锦涛传了什么话？

上次文字贴出，小英子跟贴发感慨道：每次看信翁评台湾的事，都觉得不到位。东京博士乃笑道：他也怕一棍子打死阿！

其实我倒不是怕把话说死不应验，到时下不了台。咱本是票友，又没“开天目”，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哪有那本事每言必应？人家杨力宇教授吃这碗饭，2000 年预言连战当选露了怯，好像也没砸了饭碗。我是票友我怕谁？

关键还不是台湾两岸变数太多，而是死结太深，我实在看不出以中共之僵死，如何既能避免“一国两府”或“两个中国”，又能做到他们允诺的政府间平等谈判、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西乞术网友说，有的事能做不能说。是啊，我也同意，可你不举行政府间谈判，就没法签订有效协议；如果举行政府间谈判而不用政府名称，同样没有法理约束力，而且连公报都没法出；但若要举行政府间谈判，中共起码得退到承认“一国两府”上去，这样公报就可以用“中国大陆政府和中国台湾政府会谈公报”发表，和平协议也可仿此办理。

所以，两岸的事，还真得又做又说。我还真想不出怎么只做不说，光偷偷摸摸野合，不花花轿子明媒正娶。我本人当然赞成中共接受“一国两府”，可就算小胡愿意这么做，军界强人又愿意么？在这种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我就是想一棍子打死那草里的游蛇，也没地方下手哇！

闲话说了许多，还是来猜阿扁托宋楚瑜捎了什么话吧。

先抄几段书：

>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天说，陈水扁总统在他赴中国大陆访问前，托他向对岸高层传话，关于扁宋会十点结论，无论说的、写的都「一定作得到」。他表示，他无意此刻引述中国大陆领导人胡锦涛的说法，但胡锦涛在宋胡会六点共识，提出不独不武的承诺，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
> 宋楚瑜表示，他也对陈总统说，胡四点曾提及，台湾不搞法理台独，遵守二月二十四日公开承诺等问题；陈总统则重申，关于扁宋会十点结论，他说的一定作得到，写的也一定作得到。
>
> 宋楚瑜说，陈总统要他到中国大陆传话，就是传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是扁宋十点基本精神，希望对方了解台湾的用心。
>
> 他表示，胡锦涛没有问他有没有传口信，也没有要他传话；只是讲，「不知扁是否会遵守这些承诺」？”

请注意，这些话肯定是真的，因为如果宋撒谎，立刻就会被总统揭穿，为宋本人引来不必要的政治灾难。

上面这些话泄露了什么天机？似可总结于下：

一、扁托宋传给胡的话，乃是此前“扁宋会十点结论”，或曰“扁宋十点基本精神”。

二、扁向宋保证过：“关于扁宋会十点结论，他说的一定作得到，写的也一定作得到。”

三、很明显，这十点结论一定符合大陆官方的意愿。这是因为第一，宋是主张统一的深蓝派，而那是与扁会谈的精神，不可能是表示台独的坚定决心；第二，小胡听了毫不反感，反倒非常关切阿扁是否会信守承诺，说明阿扁的承诺让中共颇满意，这才会问：“她会不会信守诺言，不打离婚？”如果阿扁说的是台湾要和中国离婚，小胡岂还会担心他不守信用？

四、那么，阿扁的诺言是什么呢？很明显，他不会答应和大陆统一，否则无法向绿营交代。除此之外还能让大陆满意的只有一件事：答应在任期内绝不搞“制宪”，宣布名义独立，而是遵照“一中”立场，让大陆面子上过得去。

这正是大陆最盼望的事。不仅如此，这也是阿扁可以而且应该答应的事。

我早在旧作中多次指出，台湾宣布名义独立根本不可能，最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大老板不答应。我还建议过大陆少去正面打压台湾，而是请美国出面去弹压台独势力。

阿扁也深明此理，他知道台独根本不可能，每次闹这名堂，其实都是搞“草船借箭”，靠引起中共反弹刺激台民自尊心，帮他拉选票。但他上次弄得太过分，遭到老美修理。而且闹多了也就不灵了，引起百姓腻味，上次立法院选举绿营变成少数党，他这才想改弦易辙。他现在已是第二任总统，犯不上故伎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答应大陆“在我担任总统期间，绝不制宪宣布独立。”

看来小胡也接受了阿扁这一立场，作为回报，答应了“不独不武”。宋不但直接说出胡的这一允诺，把它说成是自己“很不简单”的成就，而且进一步披露：

> “宋楚瑜转述，胡锦涛说，中国大陆绝非要以大吃小，台湾与香港、澳门不一样；所以胡锦涛才谈到求同存异等问题。

宋楚瑜接受年代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他与对岸高层对谈时，提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以及「不要吃紧弄破碗」，也获得了正面回应。未来只要台湾严守分际，爱乡、爱土意识与台独区隔越清楚，台湾与中华民国的空间越大。”

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咱们再怎么强调“本土意识”都没关系，只要“严守”“一中”的“分际”，人家就不会来打咱们。

更耐人寻味的是根据宋的披露，阿扁在未来谈判中扮演主角简直是呼之欲出了：

> “宋楚瑜说，陈总统如看到宋胡公报，以明确态度去做，扁胡会当然可能；毕竟亲民党一向支持九二共识，中共也说支持九二共识，「两岸一中」讲给谁听？恢复两岸平等谈判后谁出面？大家「心照不宣」。”

那当然是讲给阿扁听，是阿扁出面罗。看样子小胡似乎向宋交了底，下一步准备与扁谈判。那看来他还真有决心作出空前让步，接受“一国两府”，舍此无从谈什么“两岸平等谈判”。苟如此，则是两岸苍生之福。如果胡扁真的举行会谈并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全世界华人应该去死得哥儿摸鼓噪呼吁，请求把挪背儿和平奖发给他俩。

不过，难测的不仅是小胡能在党内反对声浪中走多远，也是变化无常的阿扁能走多远。迄今为止，阿扁对连宋访问大陆似乎没作太多攻击，最近还表示了与蓝营“和解”意愿。不过最近台湾国大选举绿营又占了多数，这会不会让反复无常的阿扁再变回去就难说了。

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再怎么变也不敢真闹名义独立，因为老美不会同意。而没有美国支持，阿扁再闹也只会是作戏。大陆根本不用理睬他，反正有了个《反分裂法》表明了基本立场也就够了，可别又再次中其奸计，实行武力恐吓，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因小失大，恶化中日、中美关系。

2004 年 5 月 18 日

贺小马哥当选国民党主席

早就想写篇文字捧捧小马哥，顺便发表我的预测，可惜前段没功夫。现在马哥果然如我所期当选为国党主席，免不得写篇应景文字祝贺之，虽则我并非什么社会贤达。

我喜欢小马哥，乃自枪击事件起。当时连战听说枪击案是舞弊事件，脸色一沉，随即率领大众上街抗争。我在西方生活多年，还从未见过这种在野党搞“街头民主”的，当下就在网上大骂。虽则我非常盼望蓝营胜出，但这种无风度的举止，实在让我觉得连当家的乃是扶不起的刘阿斗。

小马哥本也在场，此时却溜之乎也，不去参加那种只能显示自己无风度的骡马大会。这说明该同志没有白白留美一场：凡是留美生都该知道，政党民主的主战场是在议会和法院，不是在大街上，那套本是民进党人当选前的绝活，岂能跟着对方没出息？

从那时起我就看上了小马哥，觉得此子不凡。后来又看到《多维》记者对他的采访，从头到尾流露了难得见到的政治家的睿智，和陈水扁堪称一时瑜亮。论机智与说话得体，他绝不亚于阿扁，论个人魅力（鬼话所谓 charisma）则远远过之。后面这条非常重要，因为西式民主乃是一种 show business（演出），政客的个人风度魅力完全是一种雄厚的政治资源，在电视时代尤其成了决定选票的重要因素，证之以西方政客无不如此，克林顿、布莱尔都是帅哥猛男。

因此，当时我便觉得，国民党如不想逐鹿则已，若想从民进党人手中夺回总统宝座，非小马哥挂帅不可。这次马哥果然胜出，算是给国民党带来了咸鱼翻身的机会。

老洪在难民营那边写了篇文字，对马颇有好评，并将连战等人痛责了一番。在我看来，该文难免党派政治的色彩。其实连战破冰之旅确有历史意义，那就是使得中共第一次在官方声明中接受了对等立场，不再把台湾看成一个地方政府了。何况连战在北大的演说，虽有明显瑕疵（最突出的就是“联共制台独”），仍应作为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治家在大陆作的演说载入史册。在我党闭关锁国半世纪后，大陆人民第一次有幸听到如此委婉动人、毫无教训语调与咄咄逼人的霸权话语的平民政治家演说。它打开了百姓视野，让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发现，原来政客们也可以不是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动辄呵斥教训子民的天王老子，照样可以是有求于己的“选票乞丐”。光凭这一点，连战的北大演说就当永垂中国文明史册。

但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太成问题，可以说是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我从网上看到，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兼发言人张荣恭竟然在上月底说什么：国民党与共产党才是“和解共生”。与民进党间没有和解问题，只有斗争问题。

此话不知真假与否，倘若是真，则我认为这完全是台奸理论。任何一个具有西方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在野反对派是所谓“忠诚的反对派”，争权夺利的前提乃是忠于国家利益。两派无论怎样狗咬狗，到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便团结一致。过去英国在二战期间如此，美国在发动侵伊战争后也如此（战前反战的民主党参议员在战争爆发后便停止抨击政府），英国在伦敦被炸后也如此。哪见过张荣恭这种里通外国的内奸！

由此可见连家班的王金平（台湾人真没文化，取不出好名字来，不是“水扁”，就是“大重九”，要么是“金平”、“大发”

之类，相比之下“哲胜”算是雅的了，“葡萄皮”就更别说了，乃天下第一雅名）一旦当选，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堪忧，那就是舍本逐末，不把出发点放在为本岛人民谋利益上，却指望“迎外安内，借共制独”，将民进党看成是必欲摧毁的对象，不是共生关系，没有和解问题，却不知我党乃是过河抽板的高手，病好打太医的专家，成心步当年大陆“解放”前那些通共资共资本家的后尘。当真是江山代有蠢才出，21 世纪的台湾政客，连三国时代张鲁手下谋士的政治智慧都没有。

好在小马哥如今当选为主席，此类台奸大概从此无以售其奸了吧。小马哥当选后便表示无意近期内访问大陆，此举非常明智：如果去了，不仅要引起台民猜疑，更要让大陆和国际社会看轻了，难免把台湾政党选举看成是“金瓶掣签”一类把戏，还得去求北京背书，那真是上海人说的“骨头轻”了。

在此寄语小马哥：日后国民党如当国，一定要做到“台民祸福，长在我心”，看到的不光是政党利益，更是全民利益。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应该以“一国两府”为争取目标。在这基础上谋求统一，也就是争取北京让步，退为“中华民国大陆政府”，台湾也降为“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大陆和台湾形成类似独联体那样松散的邦联关系，双方以中国地方政府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使台湾能顺利重返国际社会。

从现实情况来说，此乃台湾人民能争取到的最好前途。须知“道义上合理并不等于现实可行，更不等于功利上合理”。以“住民自决”的民主基本教义而言，台湾人民当然有权决定统独。但国际现实决定了台湾根本不可能获得名义独立——光美国那关就过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最好前途就是在维持事实独立的现状下，争取重返国际社会，而突破中共围堵封杀的唯一途径，在我看来就是接受“一中”，维持“两府”。这既照顾了中共的“大一

统”错觉又为台湾争到了实惠。应该是理智的台湾政治家的努力目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马儿阿，你走好了！

2005 年 7 月 19 日

喜见台湾晴空一碧如洗

——贺小马哥选战大捷

台湾“三合一选举”（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三项合在一起举行的选举）县市首长选举结果最近揭晓，全台 23 个县市中，国民党赢得 14 个县市，亲民党、新党、无党籍各占 1 席，后者为台东县吴俊立为国民党员自行参选，因此也被外界视为泛蓝阵营。

至此，国民党由原来的 8 席跃升为 14 席，泛蓝阵营囊括 17 席，民进党则由原来的 10 席跌至 6 席，台北县、宜兰县、嘉仪市三个重要选区都被蓝军占领。台北县一直由绿营控制，这次首次被蓝军攻破。蓝营不但赢得多个县市，而且得票率也大幅度飙升。民进党惨败，苏贞昌宣布辞去党主席。据说还有人闹到要切腹自杀的地步，当真好笑得紧。

闻此捷报，老芦至感欣慰。最高兴的还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已经初步成熟了。

民进党本是选战高手，治国低手。阿扁之所以成为选战高手，那策略说破了一钱不值：全靠打“统独牌”和“族群牌”，刺激庸众愚民的肾上腺。偏偏又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江泽民，他为阿扁拉选票，呼儿嗨哟，他是台独的大福星！又是“空包弹”，又是军事演习加朱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让阿扁草船借箭，船都几乎给曹丞相慷慨赠送的箭压沉了，岂有不当选之理？江主席如此热心于台独大业，按某些网人的逻辑，必是ＣＩＡ或台湾间谍无疑，建议中央迅速立案审查，呵呵。

可惜我前年就说过了，刺激百姓的肾上腺，如同揪张士贵骑的“呼雷豹”头上那撮毛（关于呼雷豹的来历，请参考史学巨著《说唐》），揪上一两下倒非常灵光，老揪下去，迟早要把那毛揪下来。所以，就算是我党继续为他拉票，百姓的肾上腺素也总有耗竭一时，何况胡中央终于悟出了前任的愚蠢，力破陈套，开展笑脸攻势？

据台湾某位李先仁先生评论，选民们对地方候选人的情况和主张并不是很清楚，其实是扁马对决，应该解读为对民进党的期中投票、不信任投票。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郑安国则认为，民进党在选前一直为泛蓝候选人贴“卖台”、“红帽”标签，选举结果显示，族群牌、统独牌已退烧，云云。

我认为这些评论都很中肯。小马哥在选前效法阿扁玩悲情，发誓国民党如果不过半就辞职，国民党在报上登广告，呼吁选民不要让小马哥就此从政坛上消失。双方党魁如此这般做戏后，百姓的选票当然就反映了民意对两党的亲疏，而这恰是国民党大捷意义最重大之所在。

本人不相信什么“人民的眼睛是贼亮的”式共党媚俗鬼话——请问民主的南斯拉夫的人民是不是人民阿？为何什么伤天害理的烂事都干得出来？民主本是绅士游戏，成熟了的人民才配玩，起码大众必须是中庸的，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有恒产者有恒心”，而台湾人民纷纷弃绿投蓝，正好说明了他们在折腾了 5 年后终于开始成熟了。

西方国家的选民，一般不会上阿扁之类浅薄政客的当。人家花钱雇佣政府，不是来让他们刺激自己的肾上腺，更不是让他们来蓄意挑拨离间，分裂族群，是让他们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所以，民众主要关心在于内政而不在外交。老布什领导盟国打赢了海湾战争，让美国人民在创深痛巨的越战之后首次恢复了民族自信心。即使如

此，因为国内经济不景气，人民照样开了他的差。英国人民在赢得二战后立即罢免了他们的民族英雄邱吉尔就更不用说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百姓才是成熟了的百姓。

我痛恨阿扁，不在于他是台独分子，而是因为他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去反复刺激大陆，不遗余力地分裂台民。本来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台湾本来就是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因为有美国人保驾护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没有被武力统一的危险，有什么必要去反复揪那撮毛，恶化两岸关系？为此在台民中制造分裂和仇恨，酿下无穷后患就更不可饶恕了。阿扁的所作所为，在在显示他根本不是全民总统，而是鼠目寸光、私利熏心、不择手段、不顾全民安危祸福的党派政客，完全是事实台奸。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台湾人民总算开始明白这浅显道理了。希望台民牢牢记住：最重要的选举标准，乃是政客的治国才能和他的具体治国方略，不是他煽动百姓的能力。相反，越是蓄意刺激百姓肾上腺的政客，越是没有治国的本事。

这其实是民主政治的一大弊病——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和口才其实和治国没什么关系，但恰是选战优势，因此弄不好就会选个祸国殃民的戏子上去如阿扁然。好在小马哥个人魅力超过了他，如果国民党早把他推出来，恐怕上次早就赢得大选了。

小马哥如果能当选为下届总统，则我看是两岸的福气。他既不像阿扁那样只知为一党私利作“坑民秀”，又不像连战那样饥不择食，毫不讲究身份体统，连什么“联共制台独”的话都说出来。而是不卑不亢，执两用中，以台湾全民利益为国策出发点，有原则，有身份，有远见，有理智。这样的总统，才是台民真正需要的，也才能为两岸人民造福。

许多网友对国民党寄托了太不着边际的希望，盼望台湾民主实践能够播散到大陆去，甚至盼望国民党以民主统一大陆。这种心情我当然能够理解，可惜这不过是想入非非，鬼话说的 pipe dream 而已。

国民党上台的意义，不在于实现统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两岸根本没有统一可能，也没有什么必要统一，当然台湾也不会宣告独立，这乃是中美实力对比决定的。只要这实力对比不改变，台湾的现状就绝对不会改变。无论是阿扁的独立高调，还是中共的统一大话，全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只有傻子才会去弄假成真，而我党偏偏就是这种傻子，起码江主席是这种傻子。

要改变我党的智力绝无可能，所以，清醒的中国人还是只有寄大的希望于国民党上台。不是指望他们去统一两岸，而是指望他们停止阿扁式的坑民秀，结束从李登辉开始的西班牙斗牛把戏。

请诸位去看看中国地图，论幅员，台湾不过 3 万 6 千平方公里，人口不过 2 千多万，在大陆不过相当于一个专区而已。可就这么Ｐ大点地方，竟然成了面积广达 90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至 13 亿的泱泱大国的注意焦点，两者的比例，绝对超过了西班牙斗牛士手中的红布和公牛相比。我党竟然被李登辉、陈水扁乖乖牵住了牛鼻子，引得团团转，似乎那晚上出去一不小心就要掉进海里去的弹丸之地，竟然成了中央帝国的国威所在，全民生死系之的命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神智错乱到了这种地步，当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红色幽默。

我党忘记了，自己是世界第三大国的执政党，眼睛不能只盯死在眼前那片菜叶上，得抬起头来看看全球，学着作个世界大国，再回过头去看看本国的土地，有多少大事需要你们去解决！如果把鼻子永远穿死在台湾那钓鱼钩上，党国便永远没有顶天立地的一天。再纠缠下去，不但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在内政外交上将死

自己的军。在内政上，这无异于把文官政权的存亡毫无必要地押在收回“台湾专区”上，鼓励军界强人的崛起，授他们以挟制中央的政治资本和借口；在外交上，这完全是跪送美日等国一个宝贵的外交筹码，让人家坐收渔利。

这就是国民党此次选战大捷的第二个重大意义：希望小马哥 3 年后能上台，好把那红布从我党头上解下来，让我党稍微恢复点神智，停止作短期内统一台湾专区的无聊春梦，就此明白统一只能于无意中求之，绕过美国干涉的唯一手段，就是改善两岸关系，淡化国民的“台湾意识”，以缓慢渐进的“经济统一”代替迅速的“武力征服”。特别要避免把自己逼到“不收复台湾无以对国人”的绝地，从而鼓励党内军内野心家潜生一逞之心，更要避免无意之间把台湾炒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带头羊，平白无故地为党国制造潜在危机和重大隐患。

更重要的是，我党必须认识到，和台湾修好，乃是增强我党对日、对美外交地位的重要措施。中日之间的利害冲突是千丝万缕的。不改善对台关系，中国对日本就根本硬不起来。哪怕仅仅是为了争夺东海资源，我党也必须迅速和台湾修好，两岸同心协力向外人争权益。

很明显，以我党众所周知无庸置疑的鼠目寸光，持之以恒的愚昧炒作手腕，以及享誉全球的切腹自杀好身手，绝无希望独力爬下自己搭起来的那个高台。所以，这帮助我党下台的重担，就历史地落在小马哥双肩之上了也。盼小马识途，不负众望。

2005 年 12 月 4 日

评马悲鸣的“台独利弊分析”

马氏“利弊分析”

马悲鸣前段发表大作，先是把外蒙独立算成罪，抓“首恶”抓到冯玉祥头上，据说是因为他杀了徐树铮，云云。我立即出来请教老马，外蒙独立到底与苏联有无关系，是不是如果徐不死，则一定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老毛子，挫败他们肢解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

马悲鸣立刻改口盛赞伟大领袖毛主席。按他那意思（当然他没敢这么说，但只能作此理解），伟大领袖早就预料到他日后要让中国人民涂炭，所以起了不忍之心，一当国就放了外蒙古人民一马，让他们逃过了我党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苦难。这就是老马眼中的“功利分析”。

此后老马越出越奇，居然说中共出卖外蒙就是有大功于社稷，因为外蒙成了夹在中苏之间的“中立缓冲国”，中苏就此避免了直接冲突！这种昏话都能说出来，似乎只证明凡是人类使用的概念，到老马那儿都会被理解得面目全非。

其实我早在《恩仇》系列里解释过这“缓冲国”是怎么回事了，那是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把所有的邻国都变成附庸国，这样就等于把苏联的边界远远地向外面推了出去。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在洲际导弹发明之前，任何国家想进攻苏联，就得先进攻那些国家，于是那些国家也就此成了保护苏联的缓冲带。等战线推到苏联境内时，侵略者的交通线就极大地拉长

了，成了强弩之末。这就是“缓冲国”的意思。它其实是捆在苏联身上的保护海绵，如同坦克驾驶员带的海绵头盔似的。

不意在老马眼中，这“缓冲国”不是苏联的保护带，却成了中国的保护区！既然如此，为何中国要把“从外蒙撤军”当成中苏邦交正常化的三前提之一呢？如果外蒙是中国领土，苏军装甲兵团还能朝发夕至，一鼓而下北京么？

更有趣的是，我说，按老马的逻辑，外蒙因为逃脱了毛共的荼毒，所以是有利的。既然如此，则中国干脆响应方励之号召，自行解散好了，那不是让所有的人都逃出了共产地狱了么？特别是眼下就该放人家台湾独立。人家那还不是变成苏联殖民地、由“民族他决”制造出来的被迫全盘苏化的伪独立，是住民自决的真独立，是不是？老马何以又不敢写篇“台湾独立的利弊”呢？

他回答说，他早写过多篇文字分析过台湾独立利弊了。这话再一次证明，他这辈子大概永远也拎勿清什么叫“功利分析”。

本人记性尚可，老马的“台独利弊分析”，在此把他开列的“利弊”列出来：

1、国府在“解放”前夕把中国的黄金储备悉数运到了台湾去；

2、国府在“解放”前夕收税一直收到了 60 年代。

3、国府把故宫博物院的所有文物国宝都运到台湾。

因此，台湾如不归还这些债务，则无权独立。如果还清债务，独立后应该以台湾海峡主航线中心为国界。如果拒绝还债，中国就该动武，早打比晚打好，不然苦大仇深的老八路都死光了，失去了取胜把握。

请问马悲鸣，这是不是你在 7、8 年前在《华夏文摘》上发的宏论？那文章题目我记得是《台海评述》。我当即写了批驳文字寄去，但你那是是名人，老芦是无名小卒，所以华夏文摘拒绝刊登。

但两三年后我在《多维》把该文贴出，你才看到了。在看了我那文字之后，你怎么还有脸喋喋不休至今尼？

其实我写此文，完全是陷入马发动的“伪讨论”，因为它谈论的乃是只有马悲鸣才想得出来的伪问题。按马悲鸣那意思，台湾独立与否，其实只是个财务纠纷，如果债务算清了，则中共就可以放台湾独立；如果台湾拒绝归还，中国就有足够理由武力讨债。

7、8 年前我就问过他，成年人说这些废话到底有什么意义。莫非他是胡锦涛亲戚，确知如果台湾归还了那些债务，则中共就会放台湾独立？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成年大陆人都知道：我党并非绑匪，漫说是归还那些东西，就算是在此外再加上十倍的“赎台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台独照样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令人惊讶的是，就是有成年人出来成全老马的人来疯，老洪同志就是一个。看多了这种无聊伪争论，我忍无可忍，决定出手，以求一了百了，耳目清静。

要回答老马那三条“利弊分析”，先得落实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如果老马和随便网友一样，认为中国乃是他家的私器，而且也信奉狼羊律，认为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道义，那好，我认为中国根本就不该和台湾争那点东西。反正根据狼羊律，谁抢到手就是谁的。只能怪你中共没本事控制住国宝与黄金，让人家先下手为强抢走了，如此无能，只配让世人笑话唾弃。

即使中共要为此去抢台湾，则那也不过是富人强盗之间的内讧，跟穷棒子们一点相干都没有。穷棒子们错认他乡是故乡，傻傻地为不存在的“民族大义”热血沸腾，绝对是白痴行为。至于为强盗头子去卖命送死，参加“解放台湾”，去为主子抢夺自己一分都捞不到的领地财产，就更是超级白痴才会干的事，是不是？

总而言之，根据阿随发现的宇宙运行规律，除非中国也是马家私产，抢回那些金银财宝后，马悲鸣能分上一杯羹，否则他以局外穷棒子之身出来多嘴，完全是犯贱。

不知对根据这一宇宙运行规律作的分析，马悲鸣有何意见？你是否也认为中国是你家、随家和其他大灰狼们的私器？全民财富乃是你家、随家和其他大灰狼家的私产？

如果马悲鸣认为国家乃是全民公器，而台湾抢走的那些财产乃是全民财富，那好，7、8 年前我早就回答过你那几个问题了，可惜你没能记住，所以只得再重复一遍，希望这次你拷贝下来，日夜背诵，省得将来再出丑。

1、国府在“解放”前夕把中国的黄金储备悉数运到了台湾去。

没错，但中共也没收了大量“官僚资本”，也就是国民党达官贵人们留在大陆的私产。不仅如此，中共还没收了大陆所有私人财产，如果要讲究“厘清产权”，则只怕中共赔得倾家荡产也赔不出来。他们有什么财产？除了卖南泥湾出产的大烟所得的那点钱，其他的不都是抢来的么？你鼓吹这个，难道不是鼓吹穷棒子翻身，跟我党算变天账？

2、国府在“解放”前夕收税一直收到了 60 年代。

昨天你又改口说是收到了 70 年代。七八年前我就告诉你了，不好造假账，重复收费。就算国府收税收到了本世纪，那又怎么的？不是全花在大陆打内战上去了么？莫非带到了台湾不成？

3、国府把故宫博物院的所有文物国宝都运到台湾。

七八年前我就告诉你了，为了这抢救中华文化的丰功伟绩，全国人民每个人都得向台湾政府写封感谢信，一共 13 亿封，否则那些国宝早就毁灭在“破四旧”里了。国府为全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须知那是两次抢救了：第一次是在抗战爆发前，国府组织人马，从即将沦陷的北平，把故宫博物院的国宝万里迢迢地抢运到大西南，一件都没有损坏，更没有遗失。第二次乃是刚从西南运回北平不久，再次装箱抢运到台湾去，又是一件都没损坏或遗失。这种事，在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今日大陆上根本就无法想像，那些冒着敌机轰炸扫射，万死千伤，茹苦含辛，千里辗转抢救国宝的无名志士仁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壮举，才是真正值得全民世世代代歌颂的万里长征！

现在你也同意中国人民应该向台湾政府写感谢信，我很高兴你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不过你说，收到感谢信后，台湾就必须把文物国宝交还给大陆。对此我原则上赞同，不过，这儿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提出这要求的前提，是认为那些国宝是大陆全体人民的财富，可惜我党并不这么看，阿随已经代表他家老大人说了，普天之下，莫非党产。所以阿，如果台湾今天归还这些国宝，则明天它们就一定会出现在国际黑市文物市场上。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不信请去看几年前的《星岛日报》，该报其实是亲共报纸，但即使这样，人家还是报导过出现在欧洲的某神秘高干子弟，专门出售最高级的文物，全是《三希堂法帖》那个档次的，吓呆了收购商们。所以，你要台湾归还那些文物，绝对不会落到全民手上，只会变成强盗们的私产。

即使有部分国宝逃过了贪官们的侵夺，那又便如何？谁敢保证那“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反复无常、翻云覆雨的我党不会再来一次“破四旧”？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人，起码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没有能力护住老祖宗留下来的一点家当，不是要自己亲手毁了，就是要盗卖到国外去。

因此，我看最明智合理的办法，还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海牙法庭提起告诉，请中华民国政府归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

财产的文物国宝，但鉴于我党一贯把全民财产非法窃据为党产，为确保判案的法理依据不被我党在结案后私自颠覆，特请国际法庭指定一个国家代为管理这些国宝，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每年支付保管费，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抢劫全民财产的犯罪行为，并向法庭宣誓保证一定不再发动暴民运动、全面系统地摧毁文化遗产为止。鉴于我党从不信守诺言，还必须将当国高干子弟悉数押为人质，由国际法庭每年派出检查团，查对归还国宝安全，才可放心让文物国宝落入狼爪。

怎么样？我这答复如何？倘有什么不合适，请你这就立刻提出。如果什么都说不出来，则请你以后不要再用伪争论来渎人清听，好伐？

台独的真正利弊分析

要说的话其实早就说过无数次了，完全是轱辘话。无奈这世上糊涂虫太多，例如那老石就连“民族独立”与“向外国出让土地”都分不清，而铁木居然会认为外蒙就是应该独立，因为那是“民族自决”！

所谓“卖国”，我早就根据真正的民族主义价值体系给出了定义，其中一条就是向外国出让土地，这根本就不覆盖因民族或住民自决引起的帝国分裂。外蒙独立根本不是民族自决，而是第三国以武力威胁中国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顾外蒙人民请求甚至反抗苏联侵略者及其傀儡的武装起义，被迫向苏联出让土地，使得那块土地变成了全盘苏化的苏联殖民地。干这种事当然就是卖国行为。

民族或住民自决就根本不是什么“向外国出让土地”，否则占世界 1／5 的大英帝国变成如今的 24 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应该是创世界纪录的卖国行为了，那么英国恐怕抓卖国贼到今日还抓不完。

但人家的态度就非常明智：北美战争之后，如果是帝国内部闹独立，则一般不留难，几年前澳大利亚曾全民公投决定是否留在英联邦内，对此事英国人民远没有澳洲人民感兴趣。但如果是外国要来抢夺领土，则哪怕是为远在南极洲附近的福克兰（即阿根廷所说的马尔维纳斯）也要大打出手，这和咱们“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优良传统完全相反。

所以，这种奇特浆糊，也只有摩登红卫兵们能捣。

按现今文明世界通行的价值体系，住民自决是合理的，其他地区的人民无权干预。这其实是私有制决定的产权界定精细化：某地区的国籍归属应由居住其上的人民决定。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两块殖民地，夏威夷和菲律宾，前者投票决定加入合众国，后者决定独立。

但这只是价值判断，法理上正确，不一定功利上就合理。我早就说过无数次了，台独尽管在法理上有充分理由，但真要实行起来，一定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这原因很简单，中共的愚蠢炒作，使得他们绝无可能从“统一”立场上后退。如果台湾宣告独立，则中共一定不惜一切动武。这是他们把自己逼进了绝境：倘若文官集团毫无动作，则朱成虎将军那些丘八立即发动兵变。无论兵变发生与否，中共都会出兵台湾，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来就两家都没好果子吃，台湾成了焦土，大陆帝国就此崩溃，碎成补不起来的七八十片。由此触发的民族间大屠杀，只怕要闹个几十年都无法收尾。

我还记得马悲鸣七八年前的昏话：“（大陆若）败了，也吓他一跳，看他还敢轻言独立否？”当时我就问他，既然大陆打败了，台湾为何还不敢独立？天下有这种道理么？

不过就算大陆因内乱而失败，台湾也必然毁于导弹袭击，更不用说不能排除大陆狗急跳墙，真的使用中子弹或其他核武器轰击台湾。真是这样，就算获得了独立，那又值得么？老洪口口声声“不自由，毋宁死”，说的乃是世上最没劲最不值钱的煽情话。

所以，我看大家别无选择，只有维持现状。6 年前，我提出“亡国三段论”，预言了中华帝国的崩溃，此乃历史大趋势（所谓“历史潮流”），无从逆转。咱们的最好前途就是像苏联那样，做到和平解体，千万别像南斯拉夫那样血流漂杵。

因此，我党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开疆拓土，建万世不拔之伟业，而在于如何化解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争取以美国式联邦代替旧式帝国。就算做不到这点，起码也要为消弭日后帝国解体释放出来的破坏力殚精竭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处理好中台关系，建立维护两岸人民的友谊，争取台湾民心，才该是我党对台政策的重心。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中台之争必然影响中日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

我在《中苏恩仇》系列里已经反复指出，同室操戈乃是老毛子轻取外蒙和东北特权的基本原因。可悲的是咱们从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奴颜婢膝，对内斩尽杀绝，这光荣传统到了我党手上更是发扬光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围堵台湾，两岸竞相实行金元外交，扔给外人的钱只怕超过了毛时代的外援。

5 年前我写《为什么要了解日本》，预言地缘政治决定了中日国家利益冲突是千丝万缕的，如今这种冲突已经成了紧迫的现实，东海之争不过是开场锣。如果中台关系再紧张下去，唯一能坐收渔利的就是小日本。

所以，我建议，中共政府应该考虑大幅度修改对台政策，搁置统一问题，实行联台制日，对东海资源和钓鱼岛，一定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当今这世界上，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没什么可客

气的。做到这点，才配称为真正的民族主义政府。就算做不到联台制日，起码也要大幅度改善两岸关系，决不能再让台湾变成美国和日本对华外交中的有利筹码。

以上所说，当然是阿随指出的自作多情：中国本是他家和其他大灰狼们的私器，我等穷措大的本分，便是俯首帖耳让人家来吃，配管人家的私事么？不管中听与否，阿随这话确实是残忍的事实。所以阿，本文和其他妄议强盗家事的政论一样，全是废话。

2005 年 11 月 16 日

新编《倚天屠龙记》[1]

却说火工道人因为受了监寺的羞辱，一口鸟气咽不下去，从此安下了报仇雪恨的心思，平时劈柴挑水之时，得便处即偷窥寺僧们打熬力气，放对过招。他虽目不识丁，却如魏忠贤一般，记性忒好。如此忽忽过了十几年，少林寺武功的招数已全然记在心中，演得精熟。只是苦于不知如何搬运周天，打坐吐纳。他虽无学，却也知道没有内功，就算是招数再熟，也不是低辈弟子的对手，当下心一横，某日不辞而别，离了嵩山，北上去投辽狗。

不一日到了大辽北京，适逢皇帝萧列斯开了个“逸贤堂”。这“逸贤”本是扶桑浪人，姓龟孙名逸贤，跑到大宋去冒充中国人，平生以爬上“大宋马泊六总钻风”的高位为夙志，专向东洋嫖客拉纤，兜售淮扬美人，奋斗四十余年始终未能如愿，终在一次拉纤中肝病发作，死在北京协和堂，移柩西山碧云寺。死后大辽皇帝感其精忠，便开了这家“逸贤堂”，专门收养训练从大宋跑出来的卖国痞子，指望他们学会龟孙的马泊六精神，回国后去把大宋灭了，做大辽的儿皇帝。大辽皇帝粗知汉学，那“逸贤堂”的名字就是他想出来的，自觉一语双关：既使用了龟孙的名讳，又暗含李林甫“野无遗贤”的善颂善祷之义，心下甚为得意。

火头道人到后不久，逸贤堂便开了一年一度的演武大会，他在大会上把少林寺偷学来的那些招数使将出来，夺了头筹。皇帝召见，“两忆三查”，垂问阶级出身，火工道人便忆苦思甜，将在少

---

[1] 这篇游戏文字中的角色余大郎是胡安宁的网名，周同是王希哲的网名，两人都是民运人士，也是《海纳百川》网站的网友。

林寺受的种种肮脏鸟气说将出来，令皇帝不胜同情，当下恩赐了地方进贡来的长白山千年老山参半吨，百岁蟾蜍酒 80 加仑。火工道人服下去后，立刻就获得了无量神力，成了天下外门功夫第一人。萧列斯龙颜大悦，又赐给赤金 2 百万，18 般兵器无量，毛子壮丁百万，并亲授“逼毛神功”。此功练到化境，即能运掌如利刃，掌风到处，毛发纷纷而下，能将天下百姓刮得寸毛不剩，比初生婴儿还光滑，端的厉害。

获此重赏，火工道人大喜，他本是扬州丽春院出身，连亲生老子都不知道是谁，胡乱认过一个大茶壶为干爹，跟着那人姓，现蒙大辽皇帝亲授神功，索性以此为姓，取名“逼毛则动”。当下到户部取了赤金，到兵部点了毛子兵团，率领百万貔貅，浩浩荡荡，杀奔嵩山少林寺而来。

玄慈长老率全寺僧众出庙接仗，先是罗汉堂长老轮番上阵，都败在火工道人的大力金刚指下，达摩院长老接着上去，无一不是断臂折腿狼狈而退，玄慈鼓勇上阵，却被火工道人使出大辽皇帝亲传的逼毛神功来，把玄慈的两道眉毛刮得精光，还捎带上了半截鼻子，让玄慈成了哈迷蚩。他丧魂失魄，使僧袍侮着鼻子，撒鸭子落荒而逃，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一口气跑到蓬莱，登船出海，到了冰火岛，才惊魂稍定。环顾左右，也就只有四五十人追随在左右，其余都留在嵩山，投降了火工道人。

则动把降僧们全弄到达摩堂里去养起来，形同软禁，好在比起嵩山百姓来，倒也不失养尊处优。此时众僧才悟出，逼毛功的主要施虐对象，其实并非与火工道人作对者，首先遭到清算的乃是他赖以起家的乡民们，最后就连扶持他的辽狗都被他狠狠咬了一嘴。天下未受过这逼毛功荼毒的人，还真难找出来。

却说玄慈逃到冰火岛后，当真是寺破家亡，幸得有人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仓惶逃命之时还记着把“敕建少林寺”大招牌摘

下来扛着，准备渡海时作为漂浮器材。玄慈一见大喜，当下就在冰火岛上建造寺庙，把那金字招牌打将出去，做张做致，施施然又以执天下武林牛耳自居起来，哪管他扔下的嵩山一带被逼毛刮得赤地千里。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又过了 50 年，玄慈长老和火工道人都相继谢世。火工道人占据了少林寺之后，开头完全是蛇鼠一窝的强盗巢穴，江湖闻之摇头。但火工道人死去后，继任长老觉得老是做强盗也不是回事，于是便决定由黑转白，再次把“少林寺”的招牌打出去，坦然自称他们才是少林寺的嫡系传人，。他们占了地利，财大气粗，时间久了，江湖上也就忘记了那篡庙夺位的丑事，更想不起来真正的少林寺并未被斩草除根，渐渐也就把嵩山少林寺当成了武林正宗。

冰火岛这边也今非昔比。建庙之初，玄慈还时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醒僧众千万不要忘记寺破家亡的斑斑血泪仇，亲书“毋忘在莒”，高悬寺内，勉励大家卧薪尝胆，打回老家去。

但这些轱辘话说多了，僧众最后也就由麻痹而反感，再加上冰火岛山清水秀，日子好过，大家渐渐觉得，作江湖领袖似乎还不如在这小岛上过散淡日子快活。那江湖本是“粪坑”的别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又何必好日子不过，非要去惹那一身骚？于是便有人成立了“少女帮”，商量干脆废了庙名，改为“少女寺”算了。这好处乃是庙名还保留了“少”字，大家都姓“少”，省去了无数口舌官司，再则庙以少女为名，只怕要引动天下的少女前来投奔，好处大大的有。

这本是两家寺庙争风吃醋，和俗众毫不相干。噫！天下却有这等怪事。两家少林寺练武，常有闲汉去观看，在东少林寺卖呆的有个闲汉名唤周同，自称是岳爷爷师父的嫡传子孙。在西少林寺帮闲的某个闲汉名唤余大郎，见周同夸耀自己来历，便也想找个古代名

人沾光，他不识之无，分不清“余”和“佘”，便自称是佘老太君后代。两人看热闹看久了，便“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起来，自以为是少林寺记名弟子，分别打着“天下唯一正宗大少林寺”和“天下最妙少女小寺”的招牌招摇。

忽一日，两个骗子狭路相逢，在无锡松鹤楼碰上了。大郎刚为某个花季少女画了水粉肖像一幅，获得润笔若干，灌饱了黄汤，因在酒楼上说嘴道：“古人造字实在有道理，天下最妙之事，无出于少女，天下最好的去处，乃是冰火岛上的少女小寺……”

也是合当有事，其时周同先在楼下旷地上使了一番枪棒拳脚，直把胸膛拍紫了半扇，方卖出了几张狗皮膏药。他喉中火出，便踱进酒店喝上一杯，恰在大郎说嘴时撞上楼来，听到那汉奸言论，当即圆睁怪眼，暴跳如雷，提起醋钵也似的拳头，对着大郎的玳瑁边眼镜就是一拳，厉声喝道：

“汉奸狗子胡说什么？我就是冰火岛来的，哪有什么少女寺！天下姓少的只有一家，乃是我大少林寺。我大少林寺不但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且还要尽收失地，将朝鲜、安南、缅甸、琉球、钓鱼岛、外兴安岭以南、外蒙、克什米尔统统收复，使我大少林帝国尽复旧日盛况，西到葱岭，东到琉球，北到西伯利亚，南到曾母暗沙……”

那大郎却丝毫未被周同这番豪气干云的大言壮语打动，他先去地上把那秀郎眼镜捡起来看了看，见镜片全碎了，不由得心疼万分。好在他本来是平光眼，戴眼镜本是为了冒充有学问，好去和少女厮混，所以也倒不影响视力，当下戴上空镜框，以柜台上的玻璃酒瓶权当镜子，对着酒瓶搔首弄姿一番，理了理铮光瓦亮的油头，这才扬声冷笑道：

“好威风！好杀气！但不知大将军今晚当在贵大帝国的何处安歇？不会又是求那草庵居士请来的济公活佛周济一晚上吧？曾记吾

尊师——也就是旧金山中国城那生祠供奉的大成至圣民运现师芦公讳笛——有言曰：‘屁股还让海风吹着呢，要救国，似乎也轮不到您这光腚党。’惜乎不佞才疏学浅，至今尚未查出这‘海风吹屁’出于何典，悲夫！憾甚！噫于戏！博乎深哉！吾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那周同乃是跑江湖卖解的粗汉，哪懂大郎说些什么，见他摇头晃脑泛着积年酸醋，还以为那是西藏密宗咒语，当下不敢怠慢，摆了个旗鼓，双足不丁不八地站定，使出“胖鹭鸶神功”来，把周身真气从脚底涌泉穴开始，悉数搬运到头顶百会穴去。那功夫果然了得，约有半盏茶时分，便见他下肢越来越细，上身越来越肥。

大郎不识此功神妙，拍掌笑道：

“嘻嘻，这是什么功夫？倒也有趣得紧。阿，我知道也，你这是高哗众首创之‘接力绝食减肥神功’不是？”

周同不理会他说什么，只顾自己运功，但听得他浑身骨节如同爆豆也似劈劈啪啪地响了一阵，头顶百会穴阵阵冒出油烟，如同唐人街的厨房似的，一闻即知头晚草庵居士请他吃的乃是康师傅方便面，接着便是排山倒海而来的一掌。

到了此刻，大郎才知道人家不是跟他开玩笑，当即取出两枝大号水粉画笔，猱身而上，左笔直点周同右臂的曲池穴，右笔直取他腹部的膻中穴。这两穴最是人身大穴，点中了非死即残，同时还以准女高音的尖细嗓子大喝一声：

“今日让尔见识见识我家少女寺正宗功夫！”

说时迟，那时快，但听啪的一声轻响，周同那势挟劲风的熊掌（我所欲也）扇到了大郎粉嫩白腻的俏脸蛋上，与此同时，大郎的两笔也无声无息地点在周同的两个生死大穴之上。

可奇怪的是，周同那惊天一击，并未把大郎的头从腔子上打下来，只是在他那雪白粉嫩的小白脸上留下了 5 个红带子——那红带

子如果是挂在脖子上，便是悍匪张太雷手下的“红带友”了。而大郎点中周同的死穴，周同也安然无恙，却如少女一般，嘻嘻哈哈笑得花枝乱颤。

原来，周同练的乃是“银样蜡枪头神功”，非但毫无内力，就连正常成人的力道都没有。他修习“高哗众接力绝食减肥神功”，头晚只吃了一碗草庵孝敬的康师傅方便面（或加州牛肉面，待考），其中十停精华又从百会穴里冒出去了四五停，哪里还有什么杀伤力？

大郎那点穴神功倒真是货真价实的少女神功，专门用在爱情游戏场上。他的成名绝技就是用那水粉画笔爬搔人家的脚底，逗得对方嘻嘻乱笑。这门神功练习久了，使到周同身上去，便点中了膻中穴也如同爬骚脚底涌泉穴一样。

周同腹中空空，本来就虚弱之至，如何禁得住效豆蔻少女作花枝乱颤状？他笑着笑着便脱了力，背靠柜台慢慢瘫了下去。

大郎惊魂稍定，对着酒瓶照了照，见脸上戴上了英子姑娘当年在小学戴的“三条杠”，又气又急，尖声骂道：

“本好逑君子今晚和窈窕淑女约会于西厢之下，现在脸上装了幌子，如何还能见人？！”

他咬碎银牙，一扭身，一跺脚，使出兰花指来，指定瘫在柜台下的周同尖声叫道：“你赔我！你赔我！”接着便低下头，一头撞进了周同怀里，又咬又掐又揪头发，足足把周同的满头白发揪下了四分之一弱。

两人滚打半天，轰隆一声，柜台被他们拱倒了，马爹泥、人头马、拿破仑、死个透威士忌、朗姆、伏特卡等等如冰雹一般砸下来，两人当场在这从天而降的鸡尾酒淋浴中醉死过去。

等到两人悠悠醒转，已经是在警察局的监牢里。过了三天，才被提去过堂。到得轻罪法庭，两人正要向法官诉衷情，道冤枉，却见法官高踞堂上，醒木一拍，厉声喝道：

“兀那一对天造地设的糊涂虫！休得嘈嘈多言！汝二人的来历，本官早已查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大陆还是小岛上的少林寺，都不承认尔等是他们的记名弟子，拒绝为尔等给酒吧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作赔，说尔等乃是比正主还积极的积极分子，只合乱棒打出！现在你们要么掏钱赔偿酒吧损失，要么服刑三个月，何去何从，由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所幸大郎最近画了不少油头粉面，周同也曾从草庵那儿领取了大量画饼，两人腰包还算充裕，当下只好掏出支票本来，开了支票，对半分担了胜利果实。法官将支票对着阳光看了看，又掏出手机来给银行打了电话，确认了那并非马悲鸣、胡平、高寒等人最爱开的空头支票，于是令庭警将二人手铐打开，轰出堂去。

周同越想越气，走到门口那儿又冲了回去，质问法官道：

“爱国何罪？天下难道有让爱国者为爱国革命行动赔款的道理？”

法官本来痔疮发作不能久坐，正准备退堂，却见那糊涂虫又来生事，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爱国？你爱的是哪家的国？在庐山会议清算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的滔天大罪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国？爱哪家的国？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抗战胜利早了些，对中国革命胜利不利，要是再推迟几年，革命形势就对人民更有利了。’你糊涂一生，难道就死也不明白这国家不是你的？人家阿随早就教育你多次了，中国是共产党的私器，轮不到你这穷棒子去管人家富人俱乐部内的私事！”

周同头一扭，高高昂起，举起右手作入党宣誓状，大义凛然地从牙缝里迸出钢浇铁铸的八个字，字字掷地有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嘿嘿，你倒以为你是谁阿？”法官冷笑道，“旧金山中国城那生祠供奉的大成至圣民运现师芦公讳笛教导我们：

> ‘在专制社会中，君王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君贤则国治，君昏则国亡，党廉则国治，党乱则国亡。所以，首先需要思想改造的就是君王或独裁政党，这才是重中之重。君君，只有君君，才是决定治乱的根本大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根本是Ｐ话，除非那“匹夫”指的是皇帝老儿。’

你一介山野村夫，能爱国、配爱国么？你爱国，党不爱，你又能怎么办？我党执政后出卖了那么多河山，你怎么Ｐ都不敢放一个？向印度秘密出让两个邦的领土，与俄罗斯签订卖国密约时，你怎么不说话？保钓运动时你又在哪儿？敢情本事全在对付自家人头上阿？人家要独要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这外省粗汉底事？难道把万里河山拱手让给异族，却不允许炎黄子孙选择自己的国籍归属，就是您那不得了、了不得的爱国主义？

再说，这是独是统，根本也就不取决于少女帮，取决于美国大老板。老板不放话，谁敢独，谁又敢统？少女帮无非是一群中学女生，因为没人请她们跳舞，不甘寂寞，嚷嚷上几声，余大郎那小白脸跟着起哄可以理解，你一个大男人跟着来劲算什么事？

滚吧！以后再因这种无聊事使酒骂座砸酒吧，本大人就要将你二人刺配宁古塔！

退堂！”

2006 年 3 月 9 日

小马哥孺子可教

最近小马哥在公开讲演中重申“大中华民国”论，引起了某网友的不满和担心，生怕中共籍此渗透甚至颠覆台湾的民主政府。我看他过虑了，没明白小马哥说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小马哥那“大中华民国论”乃是政客的障眼法，是为了安抚糊弄国民党内的统派。如果他不在嘴上背诵两句国民党僵死教条，则国党迟早要分裂。难道聪明如他者，还会看不见那昭如日月的事实，还在做梦去光复大陆？以为他会引狼入室，让中共大举渗透，不战而屈台湾，那就更是把他看成幼儿园大班的宝宝了。

他那些Ｐ话，乃是说了就准备让它随风而逝的，无论东西方政客都兴这套，根本作不得真。眼下明摆着，就拿那“中华民国国籍法”来说，绝对是聋子耳朵——摆设。如果要较真，则老芦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问世前出生，则当然应该是中华民国公民。不但如此，既然大陆至今还是中华民国，则小芦出生时他爹还是中华民国公民，所以连他也该有台湾护照。

可如果咱们真要去向台湾当局申请护照（台湾使馆或领馆在哪儿阿？），你当人家会给么？绝对不会。这口子一开，小岛就得让大陆难民压沉了。89 年学运逃到台湾去的人，似乎无一人被当局收留，尹进同志还在“靖庐”里吃了一麻绳，给捆了个寒鸭浮水。这是民主政府对待本国同胞的态度么？

所以，政客们的话，当不得真。小马哥的真话，已经在网友转来的那个帖子里了。人家在那里说得明明白白，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正是按照我几年前提出的英明方略设计的，那就是维持现状，不统

不独。这不但符合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心愿，而且其实也是大陆和美国巴之不得的。大陆没本事、没胆量、也不想在现阶段动武“解放”台湾，老美更是巴不得台湾永远维持现状，好让他们有个挟制中共的利器。

不统不独更符合台湾国家利益。任何正常人都看得出来，要和大陆联姻，起码得等那烂污国家的尘埃落定。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的前途未卜。不是因深重的社会危机而崩解，碎成七八十片，就是变得更健康些（当然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前者，那台湾便可轻松从容地独立，正如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一般，连人都不用死一个就能换来国家的轻松独立。如果是后者，则和一个比较健康的（不说是民主的，因为无此可能）大陆当局打交道，也要比和眼下这流氓政府谈判容易得多。

小马哥的谈话表明，他不但悟出了这些简单无比的道理，而且聪明到利用美国人的态度去指责阿扁“绝统乃是害台湾”，当真有趣得紧。这些运作都聪明之至。我看国民党有马哥领军，民运党算是好日子过到头也，嘻嘻。这道理很简单：他在坚持维持现状的实质立场时唱点“大中华民国”的不痛不痒、一钱不值的高调，实在是最利于整合各派政治势力，争取最多选民的高明立场。

当然，这谋略是否成功，还取决于台湾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成熟的民主国家的选民更重视的是内政而非外交，且痛恨阿扁那种作秀的政客。他们挑选的政客多是小马哥这种持中庸现实立场的人，而不是阿辉、阿扁那种走偏锋、搞极端，可能因哗众取宠而给全民带来灾难的人。台湾人民是否成熟到了这个程度，还得拭目以待。

从马哥非难阿扁的言语中也可看出来，台湾人根本没有自立精神，凡事唯老美马首是瞻。所以美国人的态度这才会变得生死攸关，而“开罪美国”或“美国人不支持”竟然成了政客间互相攻讦

的借口，实在好笑得紧。由此进一步证明了我在《新倚天屠龙记》中借法官骂王希哲的话：

> “再说，这是独是统，根本也就不取决于少女帮（注：指民进党），取决于美国大老板。老板不放话，谁敢独，谁又敢统？少女帮无非是一群中学女生，因为没人请她们跳舞，不甘寂寞，嚷嚷上几声，余大郎那小白脸跟着起哄可以理解，你一个大男人跟着来劲算什么事？”

台湾就这点民气，还做梦独立？趁早歇菜吧。耍嘴的花活当然可以干干，勿过，不但小马哥，就连小胡弟也听了本国师的教诲。如今阿扁再揪那“呼雷豹”脑后的毛，大陆当局是再不会中计了，只会躲在《反分裂法》的盾牌后相应不理。统独这场无聊戏唱到最后，便只有王希哲和洪哲胜效法《没头脑与不高兴》上的武松打虎，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一直打到网上所有的网站都倒闭而后快。

2006 年 3 月 29 日

台湾局势令人忧心忡忡

早在两年前“枪击事件”发生前，我就察觉了台湾民主逐渐暴露出来的文革气息，那特点就是两派严重对立，把民主政治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不是求同存异、合理妥协、共存共荣，把街头抗争、民众施压讹诈政府看成是民主运作的唯一杠杆，而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运作，把国会和法院当成民主斗争的主战场。

记得在枪击事件爆发后，我虽然憎恨阿扁那无耻流氓，同情国民党，仍特地写了专文，呼吁连战等人放弃街头抗争，诉诸法律程序，以免将步履维艰的民主政治领入歧途。好在国民党还老成持重，没有发生我担心的人民严重分裂、对峙街垒的恶性局面。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跳出来个施明德，无所不用其极，将民主政治淋漓尽致地搞成了准文革的暴民民主（也就是喜欢用“大话语”写文章的文人们说的“民粹主义”）。

据多维网报道，倒扁阵营拟于 15 晚上号召少则 30 万、多则 50 万人包围总统府和陈水扁的玉山官邸，“围城逼扁”，策划者还组织了两个敢死队，准备在围城发动时，攻击总统府和玉山官邸！台湾黑道竟然也卷入这次倒扁行动，其中包括竹联帮“白狼”张安乐与“中国统一促进党”林正杰组成的“天使队”，曾于日前到场支持静坐，受到警政署严密监控云。

更令人痛恨的是，倒扁总部副总指挥简锡阶竟然向报界披露，他们准备招募 5 千“精英”，加以“密集训练”，届时站在第一线包围总统府！他竟然还强调，这种做法并不符合集游法，他和施明德身为首谋，已做好被逮捕的准备，也会承担责任云。

这就是说，倒扁总部的决策小组明知此举犯法，还要公然藐视法纪，以身试法。这难道还能用“争取自由民主”的借口加以原谅？台湾又不是大陆那种专制国家，有的是法律保障的正当途径罢免总统，舍此阳关大道不由，却去使这种奇门遁甲，明知犯法，还要声称“到时候如果民众流任何一滴血，都要陈水扁负责”，企图以此制造事端，耸动国际国内听闻，逼扁下台，这ＴＭＤ和绑匪讹诈到底有何区别？！

另一方面，民进党人也不是善类，同样以暴民对暴民，拟动用游览车，从南部调民众北上，于16日发起针锋相对的挺扁。如此对立下去，国民被一分为二，成了类似文革中那种仇恨熏心、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还有什么合作可能？民主政治赖以运作的基础何在？施明德等人干出来的这些烂事，难道不是以滥用民主权利的方式来颠覆民主政治？

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亲民党党魁宋某人竟然也不顾大局，跃跃欲试，想亲力亲为地跳进这污泥浊水中去。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小马哥似乎还没失去头脑，没有利令智昏地去作民意秀，捞稻草（这是文革语言了，对不住），刻意处于低调，不愧为台湾第一民主政治家。

台人如此乱干一气，令台湾政客们陷入两难维谷，为依法罢免阿扁反倒制造了难题。事到如今，就算阿扁“识做”，自己愿意辞职下台，那也形格势禁，在所不能了：如果他真这么做，那无异于向暴民讹诈屈服，从此为暴民政治开了绿灯。暴民尝到甜头，以后动辄就要来这一手，那民主政府还有什么权威号令天下？如果他恋栈不去，双方如此对立下去，何日是个终局？

与此同时，百姓日常生活秩序必然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政府成了跛脚鸭，阿扁可能狗急跳墙，再使“以陆制台”的惯伎转移国民视线，生方设法刺激大陆，

藉此转移政治危机，使本来就是波谲云诡的两岸关系甚至中美关系产生许多变数，这最后结果是谁也没好处。

这事之所以闹成这样，当然是宪法有漏洞使然。阿扁家族如此严重的贪污犯罪，如果发生在美国、欧洲、日本甚至南韩，早就循合法途径下台甚至坐牢了。可他不但岿然不动，甚至还能动用总统权力干预妨碍司法过程，使得他本人和太太得以逃脱法网。如果这种事发生在美国，光是妨碍司法调查一个罪名就足以让他丢掉总统的桂冠，而他小人家堂而皇之地干而又干，却什么事都没有，当真是咄咄怪事。

因此，台湾人民若有充分的现代文明意识，就该认识到，在民主国家，程序高于一切。阿扁劣迹累累，政绩毫无，当然不配当国家总统，百姓有充分权利炒了这种渎职枉法的雇员。但这必须按规矩来。如果无法按程序达到这目的，那就应该仔细审视现有法律程序有些什么漏洞，并设法弥补之，然后再通过法律程序请他卷铺盖，并追究刑事责任。

在做到这一切之前，哪怕再有天大的怨气，也只能接受现状，承认阿扁和他代表的民选政府权威，决不能为了达到驱逐渎职总统的目的，干出践踏司法程序的错事来。否则民主政治就一定会迅速蜕变为毛共土匪山寨式的“强拳政治”。

换言之，当前台民的诉求，不该是直接倒扁，更不是什么无法无天的“进攻总统府”，而是以此为契机，推动台湾宪政的完善，促进朝野来个“宪政大检查”，以阿扁玩法枉法的生动实例为实战教材，翻箱倒柜，发掘出所有的法律漏洞来，造成舆论压力，推动促进立法机构修改完善现行法律，确保以后类似情况不至于再发生，即使发生也能使得犯罪的总统和家人无所逃罪。

这才是亡羊补牢的千秋大计，也是人家南韩走过的路子。若民众舍此不由，只图痛快，为施明德等人当马前卒，就算如愿以偿，

把阿扁搞下来了，那又怎么的？搞下陈阿扁，法律漏洞在那里，未来还会出吕阿扁，王阿扁，难道每次都得靠进攻总统府去把他们搞下来？

说到底，台湾民主政治蜕变成今天这个烂样子，阿扁和民进党是罪魁祸首。

众所周知，6 年半前，我是海外华人中最同情民进党人、甚至台独事业的论者，写下了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那完全是出自独立知识分子超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自由发言。但后来我却越来越对阿扁以及民进党人倍感失望。那还不光是因为阿扁是个贪污总统，更是因为从他的施政中很快就闻到了在大陆闻惯了的那股革命党人味。

对此恶臭，本人有无比敏锐的感受力，我从欣赏阿扁到唾弃他，和我对民运分子的情绪转换的发生机制毫无二致，乃是闻到了同样的恶臭。

阿扁和许多民运分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彻底缺乏现代民主意识。“民运”分子乃是民主专业人士，偏偏是中国人中最不懂民主为何物的老恐龙。类似地，阿扁是华人第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来的总统，可偏偏是台湾最缺乏现代民主意识的败类。

早在几年前我就指出，阿扁当的不是全民总统而是“派性总统”，他心目中的人民根本就不包括“国民党残渣余孽”。从本质而言，民进党人上台其实是一种靠和平途径实现的传统的改朝换代，它和西方政权更迭的区别在于有着明确的“解放”意识，也就是把支持一方的人民看成是代表正义的革命者，把对立一方人民看成是邪恶的反革命。

这就是阿扁上台后为何要大搞“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把前朝统治描述为十恶不赦的专制恶魔，不遗余力地撕裂族群，分化人民，蓄意制造“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隔膜对立与互相

仇恨，与此同时却美化赞颂日本殖民者，以此来蓄意刺激具有仇日情结的“外省人”，完成台湾人民的彻底分裂。

洪哲胜老先生把民进党这一罪恶政策表述得很充分。他效法 60 年代大陆的那些老工人老贫农，在网上连篇累牍地忆苦思甜，控诉蒋氏父子的“白色恐怖”，甚至还毫不讳言地告诉大家，台湾一切问题的来源，在于其解放的不彻底性，民进党人是和平上台的，因而没有清洗“外来独裁政权余孽”。据说，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些阶级敌人造成的。

就是这种再熟悉不过的令我毛骨悚然的宣传，让我认清了民进党人以及阿扁的革命党人真实面目，看出了阿扁其实是通过和平途径“打江山，坐江山”，和共产党人的心态其实并无什么差别，所差者无非是手段不一样——靠民主程序上台，当然也就得受其约束，无法像我党那样建立清一色的党天下，而这就是洪老先生的恨事。

的确，在我看来，这种心态就是台湾民主政治迅速蜕变为暴民政治的根本原因，它能完美解释阿扁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制造人民分裂，煽动族群对立——与境内“中国人”相比，“台湾人”当然占选民的绝大多数，总统一旦变成这强势族群代表，把对立面打成“外来政权余孽”，把民主政治斗争化为民族斗争，江山当然也就永远是民进党这“台湾民族的中流砥柱”的了。

它也能同样完美解释阿扁为何会那么不成体统的贪婪，竟然不要脸、不讲身份到了去伪造收据报假账的无耻地步。在这里，阿扁显示出的乃是一切“坐了江山”的新贵的共同特点，从项羽到中共，每个乍获江山的同志都因为过去没见过钱，捞起来就一定会比被推翻的旧统治者更贪婪万倍。幸亏阿扁毕竟还是通过“和平解放”上台的，若是通过革命手段上台，建立了一党专政，只怕台湾的地壳都要他们刮穿了。

这也同样能完美解释阿扁为何会干出枪击事件那种不要脸的超级烂事来——和权势和金钱相比，身份和面子一钱不值。这种上不得台盘的下作事，老统治者也是绝对没脸干出来的。无论中外，凡政治家都是流氓，但同样是流氓，毛有毛的段位，蒋有蒋的段位，扁有扁的段位。在我看来，华人政治史中的流氓，当数阿扁段位最低，不但有本事在肚皮上造假伤，更有本事造三角两元的流水假账！

既然是这种内心永葆革命流氓本色的同志当国，台湾不变成今天这烂样子何待？阿扁和民进党乃是华人（不说中国人吧）民主事业的千古罪人，不但亲手毁掉了 6 年半前大有希望的民主改革事业，而且在 13 亿大陆同胞面前砸了民主的招牌。

“祸兮福所伏”，从阿扁到施明德等人的胡作非为，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为未来大陆民主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一切真正有志于大陆民主事业的同志，应该从政治仇恨和经济利益中超脱出来，跳出统独之争的陷阱，不带情绪地客观观察分析台湾民主实践经验。我觉得起码应该总结的一条就是要防止革命党人以“和平解放”方式上台，在执了国柄后利用手中权力搞阶级斗争，反攻倒算，为此煽动仇恨，分裂人民，使得民主政治迅速蜕变为族群斗争或阶级斗争的搅肉机。这才是比什么贪污舞弊都还可怕的恶政。

好在胡温政府在此事件中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据《苹果日报》披露，大陆当局已经从江共愚昧的“促统”改为现实的“遏独”，那意思就是只要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随便阿扁怎么跳梁都不理睬他，否则难免为他利用。不仅如此，据《自由时报》报道，国台办主任陈某最近访问了美国，请求美国不要坐视阿扁为了逃出困境再在两岸关系上搞小动作。

如所周知，上述对策是我几年来的一贯主张。早在江泽民当国时，我就多次抨击他的台湾政策的惊天动地的愚蠢，劝我党不要再

为阿扁慷慨“草船送箭”。无论他怎么挑衅刺激都采取“晾干”政策，只能釜底抽薪，通过美国政府去压制他的过火行动。无论哪派当家，美国都是呆胞们的定心丸与脊梁骨，只要大老板不放话，借阿扁一个胆子他也不敢搞独立，而台湾独立对美国利益毫无好处。老美决不会听任阿扁一意孤行。

江戏子在台上时，这些话有如东风射马耳，如今小胡当国，总算放弃了那些愚不可及的自伤国策。不管这是否因为“摄政王”听了本布衣帝师的指点，都说明了共党头子在国际政治中的成熟。而这大概就是台湾风云中唯一让人感到欣慰的事吧。

2006 年 9 月 15 日

劝台民见好就收

提心吊胆了足足一天，刚才去多维网看了一阵，这才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昨晚游行一切都好，那什么“敢死队攻击总统府”的闹剧并未发生，参与大游行的民众体现了良好的公民素质，令行禁止，及时解散，令人无限欣慰。

由此觉得施明德真是群众运动专家，深知怎样才能刺激群众心理，专门使用热辣火爆的刺激语言。这“围城逼扁”的口号就是这样，“敢死队”之类刺激名堂就更不用说了。这当然对群众肾上腺有强大刺激力，但此类暴力语言也同样令旁观者反感：游行就是游行，绕城游行也是游行，非要弄成耸人听闻的名不副实的军事术语“围城”，为了壮声势，不惜误导文明读者，败坏他们的观感。这种无聊招数，以后还是少使的好。真要提这种虚劲，何不使用更血腥刺激的“屠城”？

不管怎样，没出事就好，但愿今日的保扁游行也不要出事。我最怕的就是出流血惨案，一旦死了人，这仇恨的种子就在人民心中布下了，来日后患无穷。和这比起来，阿扁究竟倒不倒，反倒还成小事了。

愚以为，昨天晚上的游行，已经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了。游行示威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表示民意，以此引起媒体注意，形成压力么？现在这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根据多维网，环球主要媒体对此举都极大重视，跟踪报道了有关消息。做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民主政体下的群众运动能到达的峰值，再闹下去也不可能超过了。

毕竟，总统是否退位，端看他本人和党内党外政客的暗盘交易，“围城”只能起到间接施压的作用，是不可能把他直接弄倒的。如果党内外大佬们这暗盘交易业已达成，再闹下去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不仅如此，群众当然容易被正义感煽动起来，但那激情难乎为继。反复刺激参与人的肾上腺，迟早要耗竭他们的激素储藏。长期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引起的社会生活紧张，也迟早要引起警员、市民的厌倦和反感。因此，凡此类活动迟早要再衰三竭，当年大陆 89 学运就是如此。过了峰值还不收兵，就连已经取得的成就都难免要失去。

更重要的还是，眼下的台民示威和 89 学运还不一样，而和文革颇相似。89 学运没有分裂人民，只促成了人民的空前团结。尽管那是虚幻的也罢，毕竟不存在双方对立的恶性局面。如今台民示威却具有明显的两派对峙的性质。这种群众运动要长期搞下去，擦枪走火的风险很大。万一酿成两派暴力冲突，那冤仇就难以化解了，必然要连累日后民主政治的健全运作。

从实际政治后果来看，趁胜收兵也不失为上策。其实，事情闹到了今日这规模，倒扁反而不如留扁。

这道理是明摆着的：阿扁看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与总统宝座共存亡了。这其实是好事：他留下来，注定是跛脚鸭一只，彻底成了虚君，以他为首的民进党政府根本就失去了威信。而他不走，副总统充其量只不过是个阁员，不可能违宪出来独揽大权。如此一来“朝小野大”的局面就更加严重，这只会有利于反对党。民进党政府一旦瘫痪，该党内部矛盾必然激化，起码秀莲就忍不住要和阿扁关起门来打相打。再加上阿辉伯猛搅一阵局，绿营只怕要四分五裂，云落星散。就算到不了这地步，起码也要元气大伤。

如此折腾下去，两年后大选民进党还有什么戏？等到阿扁卷铺盖滚蛋，国民党当了国，要拿问一个普通公民还有什么难的？到时

不但他本人，就连他那些什么一妻二秘三亲（记不住他那些贪污亲属了）作的奸犯的科也统统翻箱倒柜倒出来查个明白，正义不就能轻而易举地伸张了么？

我猜，正是因为看出了这点，小马哥才不惜失去民意，刻意保持低调，国民党人也没有公开去参加所谓“围城”。而阿辉伯和秀莲之所以持明眼人一望即知的曲线倒扁态度，恐怕也是看出了阿扁再赖下去势必坏了民进党的大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要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就千万不能做；凡是敌人怕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一定要去做。”（说明，他原来的白痴语录被本人化腐朽为神奇，改成了智力正常者的表述）权力斗争当然也就是这一套，所以，希望国民党掌权的同志应该反阿辉、秀莲的心愿去做，那才聪明。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现在这种群众运动很不正常。老芦在西方生活了 20 年，百姓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令政府首脑滚蛋的事见多了，但还真没见过台湾那种群众运动。它和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群众示威有两个明显的区别：

第一，西方民众示威具有明确的草根性，乃是自发的，没有政客卷入。而台湾现在的群众运动乃是民进党前党魁、群众运动专家施明德操纵的结果，且有宋楚瑜等人直接卷入。这种现象极不健康。民主政客绝不能变成群众运动的幕后推手，否则迟早要走上暴民政治的邪路。

第二，西方民众示威从来只有一派，决不会两派针锋相对地同时上街游行示威。这原因很简单：上街游行是为了宣泄不满而不是去表忠心。所以，上街的只是反对政府政策的人，同意者从来不兴上街去跳忠字舞，顶多只在电视采访时对着镜头发言，但绝对不会去组织反示威。哪怕是非常敏感的事也是这样。例如 60 年代美国以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反战示威等等，引起了保守民众的强烈反

感，但那些人也就只是电视记者采访或电视辩论时表示反对，不兴组织反示威去和对方对着干。

台湾则完全不一样，竟然会有支持政府一方的反示威，而正是在这里它显示出了与文革的相似之处。如刘国凯先生写给老王的公开信说的那样，一边是造反派，另一边是保皇派。正是这种不祥的相似，引起了那两位造反派元老肾上腺素的紧急分泌，同时也引起了我这老反革命的极大忧虑：他们理解的民主就是革命人民无情镇压反革命人民，而我理解的民主则是全民一边争吃打闹，一边和衷共济。如果人民破裂成两片，那只意味着民主的毁灭。

这里面反映出来的国情民俗很值得注意，愚以为，它似乎折射出东方人民（不说是中国人民吧）对国家元首和政府的心态和西方的完全不同。西方人民从来对政府和领袖持一种猜疑态度，而东方人民从来信赖崇拜政府。所以，当国策引起争议时，人民如果不同意政府决策，当然会上街抗议，但同意一方只会觉得是政府尽了应尽的职责，决不会感恩戴德地上街去表忠心。

正因为此，我才觉得台湾出现这种奇怪现象，说明了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距离西方成熟民主国家还相当遥远。这当然可以理解和原谅，但我毕竟还是希望台湾人民能逐渐学会民主运作，把注意力从街头抗争转移到对政府施政的日常监控上来。

老实说，对阿扁的腐败，台民有着直接的道德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人民纵容出来的——如果台民也像美国人民那样，有大量的自愿监控政府廉政的民间义工组织，虎视眈眈地日夜监视政府的一举一动，形成对领袖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威慑局面，阿扁就是有那贼心也没有贼胆。

总而言之，在此呼吁台民见好就收，不要再闹下去了。施明德为胜利冲昏头脑，还在策划什么连续三天大围城，完全是瞎胡闹。明智之举还是在峰巅上停步。

至于什么罢工之说更是Ｐ话，完全是祸国殃民。罢工只能是工人为了维护自家经济权益的斗争，岂能被政客用为政治斗争工具？如此乱来，与敬爱的刘少奇主席（或毛主席，待考）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工人斗争的熊熊烈火，敢问又有什么区别？

还有一点昨天忘了说：看到以阿随为首的党朋对此事的反应（只看了标题，没兴趣打开看），我只觉得乐不可支：阿随似乎是主张台湾人民有静坐示威的神圣权利，是么？既然如此，请问 89 年的“反革命暴乱”又怎么说阿？遮莫人台湾人是人，咱大陆人不是人？

这就是我党最大的尴尬。党朋们鼠目寸光，只知道跟随我党痛恨阿扁，因此“凡是敌人倒霉我们就要欢庆”，却不知道阿扁的遭遇对我党成了绝佳的反讽，对大陆人民起到的震撼性启示作用无从估量。

论贪污，阿扁那点贪污，到大陆上去只能算超级小儿科，恐怕连个县委书记都不如。可人家贵为总统，让 50 万人民“围城逼扁”，却只敢躲在深宫里索索发抖，大气不敢出。丧心病狂主张推翻国家元首的“反革命暴乱分子们”，既没有在现场惨遭坦克装甲车的血腥屠杀，又没在事后背靠背、面对面揭发，揭发完了铁窗侍候。台湾人能享受的权利，为何大陆人就不能享受？若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咱们先天低贱，不配享受白人的待遇，那一衣带水之东的同胞具有和咱们完全相同的种族背景和文化历史传统，为何人家又可以作高等华人？

2006 年 9 月 16 日

民进党运动群众分裂人民忒也无耻

据《苹果日报》报道，今天挺扁游行，乃是民进党中央公开下令动员组织起来的。该党中央为此竟然下了动员令，号召党员参加。有民进党党工组织及“立委”批评党中央决策不当，强烈要求取消发动民众参加该集会的动员令。但民进党副秘书长蔡煌琅强调，动员令是中常会的决议，所有党公职、党工都应遵守，更须忠诚执行，全力完成任务，“没有抗命空间”，更不应有个人英雄主义。蔡煌琅还威胁说，如果党工未落实党的决议，将依党工服务办法中规定的权利义务办理. 据说陈水扁本来也准备上街，只是因为党内意见分歧而打消了念头。云云。但据ＢＢＣ中文网报道，包括民进党主席游锡坤在内的许多民进党官员与地方首长都出席了这场活动。

这当真是无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算得上是在环球民主政治史上写了崭新的一页吧。

我昨天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民主国家的民众示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政客一般不卷入，完全是民间自己组织起来的。除了纳粹党，西方国家的民主政党从不敢直接卷入群众运动，更不会下什么动员令去运动群众。有谁真要这么干，那就和堂堂正正的拳击比赛时去踢裆抠眼撒石灰一般，立刻就要在政界身败名裂。第二大特点乃是只有人民抗议政府，从未见过人民抗议人民，更何况是政府动员一部分人民去抗议另一部分人民。老芦迟钝，这之前还从未想到过鬼子发明的人民抗议政府的民主权利，到了华人手中竟然会化神奇为腐朽，变成政府抗议人民！

这具有台湾特色的民主，当真有点令人吃勿大消。

民进党此举，充分暴露了该党虽然执政六年，至今是个共产党式的革命党，当国完全是沐猴而冠（为猴子洗头后给它戴上帽子），仍然用在野草寇的思维定式去治国。难怪阿扁会迅速被权力腐败，干出为太太的内衣造假账的超级迷你烂事来（建议倒扁指挥中心以此去向吉尼斯大全申报世界纪录，好让扁总大大地扬名五洲四海，这比发动 5 百万民众围城还更有效）。

怪不得施明德要指责阿扁如同墨索里尼、希特勒一般，我看此语不诬，只是拉下了咱们的共同领袖毛泽东。民进党确实有点共党气味，别的不说，党主席游某人公开对报界诬蔑倒扁行动和毛泽东有关，唯一根据竟是那行动是在毛的逝世周年九月九日发动的！难得阿游从未经历过咱们的文化大革命，居然无师自通毛共那套指鹿为马、强行入罪的文字狱功夫到了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看来天下的下三滥都差不多，并不必非得经过我党那革命大熔炉陶冶不可。

相比之下，倒扁阵营这边倒光明正大得多。总指挥乃是民进党叛将，虽然是过气政客，运动毕竟没有国民党背景，党派政治色彩淡得多了，基本可称人民运动，比起挺扁阵营用党内行政命令威吓动员起来的御林军光明正大到不可胜计。

反对党这边也比执政党有出息。虽然宋某人去捞了一把稻草，那毕竟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似乎也不曾下过什么动员令。人小马哥就根本没参加，国民党中央也不曾下什么动员令。这才像个民主政党的样子，不是民进党那种窃了国的土匪党。

民进党本是从搞街头和平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政党，这在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还情有可原。但即使是那阵，执政的国民党似乎也不曾如同今天的民进党一样，针对民进党的街头暴力，组织御林军，运动群众，打击对方，保护自己。不但李登辉如此，当年蒋公在大陆处理学潮时也如此，都是由国家有关机构依法解决诉

求，从未像毛共那样利用群众去为自己作政治炮灰，操纵群众斗群众，肆意分裂国民。后来国民党在竞选中落败，当即乖乖下台，从未像阿扁这样举国汹汹指斥贪污，还要死赖着不走。

由此看来，绅士毕竟是绅士，痞子终归是痞子，后者是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绅士的 decency 的。如今的台湾倒有点像 40 年代的大陆，国民党还是国民党，民进党则颇堪与毛共竞雄长。

不过，痞子只会玩得逞于一时的猫腻，没有大智慧。陈水扁为保权位，不惜干出这种超级烂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

首先，此举什么实质性意义都没有：难道 10 来万人上街保扁，阿扁的地位就此能得到巩固，没这些人上街，他就只有卷铺盖？当年文革两大派为打倒谁保住谁争吵不休，后来竟然打个你死我活，我就死都无法理解：难道老干部是尔等打得倒的，又是尔等保得了的？那还不是伟大领袖乾纲独断？尔等自作多情发什么疯？

不意当年的蠢剧闹剧，今日又在台湾复现。当然，台湾是民主国家，情势与大陆当年迥异。但阿扁的去留，也不是街头吵吵能决出来的。弹劾案既已失败，他只要横下心来使出钨钢脸赖下去，便用起重机也无法把他从总统宝座上吊起来。民众不甘心上街抗议可以理解，阿扁到底吃错了什么药，竟然要毫无必要地去组织保皇军上街？

其次，此举属于实在太不按常理出牌，就连民运党内部都有人不以为然，加剧了民进党的分裂。据《苹果日报》，民进党的动员令在中常会上受到秀莲反对，苏贞昌、谢长廷都表明不会参加。民进党新生代党工组织“绿六组”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表示，民进党中央一面要求民众尊重司法，一面又违背“不挑衅、不对立、不动员”原则，发布动员令，陷民进党于不义，就好像一边吃镇静剂，一边吃兴奋剂，让党工无所适从。该组织强烈要求民进党中央撤除动员令，并表示不希望周六的挺扁活动有任何激情或可能造成

台湾社会分裂的言论，也希望陈水扁不要参加活动。民进党立委林浊水对民进党中常会的动员令表示遗憾，因为陈水扁及家人确实涉及弊案，倒扁民众有其正当性。就连陈水扁家乡的父母官、台南县长苏焕智也明确表示不会北上参加挺扁集会，同时也劝陈水扁不要参加，以免激化民众的对峙，云云。

由此可见，在此全党面临严重危机时，阿扁竟然以这毫无实质意义的“民意秀”进一步触发深化本党危机，自动陷入党内孤立，当真是愚不可及。

第三，如今两派对峙，很容易擦枪走火，万一出现暴力冲突，阿扁是必须承担罪责的唯一党派政治家。国民党和亲民党都没有下动员令组织民众上街，倒扁指挥中心乃是施明德那过气政客，出了事连累不到反对党头上，但民进党可是公开下了动员令的。真要出了事，阿扁绝对跑不了，反对党大可抓住这良机彻底把他搞臭。

第四，民进党主席游某人和副秘书长蔡某人铁心挺扁，竟然以党中央名义发布动员令，从此将民进党的命运和一个贪污总统死死捆在一起，无异于以全党名义为总统的贪污犯罪行为作背书，自行剥夺了日后相机行事、舍车保帅、为挽救本党挥泪斩马谡的机动余地。这必然要授政敌以可乘之机，对民进党自身的政治前途造成了恶劣自伤。

所以阿，如果我是泛蓝阵营的笔杆子，一定要为日后大选拟定一个强有力的口号：“不要把台湾（或某县某市）的命运交在一个不惜发动群众保护贪污的政党手中！”

这幕台湾悲喜剧，端的越看越有趣，看来看去倒觉得，其实流氓痞子白痴倒也不光出在大陆。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无论中外，领袖们都不是孔孟之道教育咱们的可以无限信赖、全知全能的父母官，不过是道德和智力都比较低下的异常生物罢了。倘若两岸人民不牢牢建立这一真正的当家作主心态，如防贼一般日夜提防领袖

们，则永远无望真正站起来，扬眉吐气地做一回堂堂正正的文明公民。

2006 年 9 月 16 日

小马哥出手，此其时矣

据多维网报道，“百万人反贪腐倒扁静坐”进入第 15 天后，施明德身边的大将纷纷“出状况”（这是什么台湾特产的文盲话语？），先是贺德芬的失言，到决策小组意见的摇摆，再到王丽萍因过去的贿选案而辞决策委员，副总指挥许博允到中国参加亚洲文展会议又被“抹红”，指挥中心只剩下施明德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广场贵宾席上。问题还在于，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广场 27 到 29 三天的路权已被民进党抢先申请，却并未筹划举行任何活动。施明德非常愤怒，决定 26 日“决不撤”，与民众守住广场，还说：“要抬就抬走”。他们还准备于 10 月 10 日发动“天下围攻”、“百万人反贪腐倒扁”，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人民的决心，云云。

这种群众运动我早预言过了，难以持久，旺盛的士气不可能永久保持下去。更何况对手民进党完全是权谋一流的痞子党。如毛共治国充分显示的那样，痞子党建国无能，组织民众捣乱夺权乃是一等一功夫。

的确，这次倒扁运动就充分提示了这点。民进党不光是突破党派政治常规，煽动组织民众搞反示威，堂堂总统陈水扁还竟然打破全世界文明记录，公开向示威群众作出侮辱性手势（再次建议倒扁中心去向吉尼斯申报陈总统的三项世界记录：用假发票给太太内衣报账；组织一部分人民为保卫总统向另一部分人民抗议示威，开创“民主政府抗议人民”新篇章；公开在公众场合以手势侮辱抗议民众），而且还专门狙击政敌，转移公众视线，上述贺、王、许等倒扁大将都纷纷倒在他们枪下。就连始终持温和克制态度的马英九都

躲不过冷枪，民进党居然抓住他公款领养流浪狗“马小九”的P事大作文章，用来冲淡阿扁的丑闻。

如此搞下去，目前轰轰烈烈的倒扁群众运动迟早要烟消火灭。陈大总统将如同上次枪击案一般，再度化险为夷。那时尘埃落下来，恐怕就要免不得尽数落在有洁癖的小马哥身上。不用说，充满挫折心理的民众一定会对小马哥隔岸观火心怀不满，把怨气发泄在他身上，那么，两年后国民党掌权的希望，恐怕就没有现在那么笃定了。

小马哥的确是台湾素质最高的第一民主政治家，没有辜负他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受过的法律教育。他对这次群众运动的态度可圈可点可赞：坚持通过宪政程序解决问题，自己作为反对党党魁回避参与倒扁行动的谋划与指挥，等等。最难得的还是，他深知民主国家“忠诚的反对派”的真谛，在对《亚洲周刊》记者的访谈中说：

> “我们这个党不是要以反对党的立场把政局搞乱，而是要做一个负责的反对党，所以我们提出的任何想法应该是要能使政局更稳定，有人认为反对党只要反对就好了，因为我们是最大党，当然不能这样不负责任，这些是很多人听不懂的，如果这样想的话，人家从我们身上无法期待一个不一样的执政党，不但对我们二零零八年是不利的，对台湾也不好。”

反对党党魁具有这种水平，便拿到西方国家也不遑多让，又岂是民进党那夥痞子政客可以望其项背的？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搞政治，素质高其实是个致命弱点。早说过了，政治是天下最肮脏的把戏，政治家乃是智力和道德素质比较低下、甚至心态都有可能失常的异常生物。哪怕在西方都这样，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那儿决战决胜的最重要的主观

素质就是政客的流氓度。没有足够的流氓气质就一定会被对方搞下来，然后还要被政论家如林思云辈笑话“书生气十足”。

所以，我的确非常赞赏马英九的翩翩绅士风度，但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政治的污浊，更不要忘记即使在西方，两派夺起权来也是相当心黑手辣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美国右派为了搞倒克林顿，制造了一桩又一桩的冤案，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而且严重削弱了美国政府的施政能力，涂污了美国政府的国际形像。面对这民进党这种无所不为的痞子党，“书生气十足”只怕要事与愿违，反倒害了台湾。

这当然不是教唆小马哥去做阿扁那样的流氓罪犯，而是想告诉他，只要严格按法律程序来，不是无法无天，该强硬就得强硬，该心狠就得心狠，这就叫所谓“政治家的魄力”，用台湾歌曲来说就是“爱拼才会赢”。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瞻前顾后婆婆妈妈，不过是害人害己的妇人之仁而已（请女士原谅我使用这成语，这并非性别歧视，而是说女同志比较仁慈善良）。

受过美国教育的英九同志应该看得出来，无论是倒扁还是挺扁阵营，共同的错误是没有 exit strategy。看过美国拍的军事史电视连续文献片的读者都该记得，那上面很强调这 exit strategy，也就是“收场的战略”，无论是进攻，是包围，是坚守，战略家们事前都得筹划好这“收场的战略”，否则一定是骑虎难下，损失惨重。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弱智之邦日本（大约仅次于中国吧）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大本营的白痴们的错误如同 89 年的学运领袖一样，就是丝毫不考虑如何收场，把结束战争的希望一厢情愿地全押在对方因恐惧而自动屈服上。

施明德和阿扁的个人决斗又何尝不如此？比起来，扁比施还更高明些：他只要赖下去，谁能有什么办法？施则完全不同，如此沾在对方的手掌上，势必要耗竭内力倒地。他倒下去没关系，政治后

果却全由见死不救的英九承担了。难道英九还能指望那些向他高呼“马主席硬起来”的民众在 2008 年把票投给他不成？

我过去之所以呼吁台民见好就收，就是因为看出他们缺乏这“收场策略”，坚持到最后必然只会对蓝营不利。国民党落选还是小事，备受挫折的倒扁民众恐怕从此会对拥扁阵营心怀难以化解的怨恨，使得台湾陷入进一步族群分裂。

好在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小马哥完全来得及扭转乾坤，那办法就是向双方提供这 exit strategy。

小马哥本人是主张让罪犯总统卷铺盖的，但他却天真到去与虎谋皮。他曾一本正经地建议，由民进党立委出头提出罢免总统案。在与《亚洲周刊》记者的谈话中，他把那动机说得明明白白：

> “不过最关键还是国内因素。所以国民党一方面支持倒扁运动，我们从来没有说陈水扁要一直做下去，让民进党有一个扛不起的包袱，这样就可以占很多便宜，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之所以要民进党提罢免案，不是要推卸责任，我们随时可以提，问题我们一提，又变成蓝绿对决，又变成政治斗争，民进党又会出来勤王、挺扁。所以，如果我们来提，民进党来跟，就没有意义了，由他们主动来提，会给选民非常不一样的印象，表示民进党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政党，愿意在这个时节站出来清理门户，跟阿扁划清界线，他这样做的结果，表示愿意让总统接受检验。”

他更具体说明了这构想：

> “民进党不是很喜欢公投吗？那就公投一下，你要公投，先要在立法院成案，过三分之二门槛，目前以国民党、亲民党，加上无盟，只有一百一十九票，还需要三十票，民进党现在八十五席，只要三十个人赞成，就过了，过了你还是可以公民复决时继续挺扁，而且公民复决也不是那么容易

就过的，选民总数大概会达到将近一千七百万，需要半数八百五十万以上的人出来投票，中间要超过一半支持，罢免案才会过。一旦过了，就要按照宪法程序，由吕副总统继任，立法院再来补选副总统，当然还是由吕副总统提名，阁揆应该总辞，内阁就要改组，就这样子而已，国民党也不会执政，也不可能夺权。另外一点，如果罢免案不过的话，陈总统就可以安稳做完他的任期，而且在任内不可以再提罢免案，这也很公平啊。”

他这意思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由 30 名民进党立委反水，自己提出罢免总统案，如此即可获得 2 / 3 多数通过，有权提交全民公投，让百姓决定阿扁的去留。之所以要让民进党提出罢案，好处第一在于避免了蓝绿对决，以免反贪腐运动堕为党派政治斗争，第二也有利于民进党改变形像，通过此举告诉公众，他们并不因党派私利而护短，而是敢于坚持原则，和贪污总统决裂。

这策略当然也可说很高明：英九有大陆人后代的“原罪”，有无法抹去的“中国猪”基因。他的顾虑是，如果他出头，则民进党一定要抓住这借口来炒作省籍矛盾，将其说成是“外来政权余孽复辟大阴谋”，促进台湾族群分裂，此乃民进党拿手好戏，所以，为了国民团结，当然只好寄希望于 30 名民进党立委的良心。

可惜这只不过是与虎谋皮，只反映了英九同志的善良和天真，决不会有高达 30 名的民进党立委反水的。那道理很简单：民进党前身是革命党，至今保留革命党的许多特色，而革命党和议会政党完全是两回事，讲究的不是对国家而是对党的忠诚，指望革命党立委为国家背叛其党魁，完全是琼瑶小说里的小女生才会说出来的梦话。

根据最近台湾的民意调查，将近 7 成的被调查者同意由全民进行公投决定总统去留。这和英九的构想不谋而合。既有民意依托，小马哥何不停止瞻前顾后，扔下重重顾虑，放手一搏？

英九应该干的，乃是让国民党立委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发起倒阁案，亦即表示对内阁的不信任。根据台湾宪法，只要有过半立委赞成，该提案就能通过，门槛要比罢免总统低得多。现在国民党加上亲民党和其他无党派人士早已超过立法院半数，要通过此案毫无困难。如果该案通过，内阁又不想总辞，那就只能解散国会，重新大选。民进党此时民意处于最低谷，一定会在大选中惨败，使得泛蓝阵营获得国会的 2 / 3 的大多数。新国会再提罢免案，交全民公投复决，让台湾全民决定是否让阿扁滚蛋。

不难看出，这才是从容化解刻下台湾政治危机的正道：

第一，它严格遵循了宪政程序，将争权夺利的主战场从大街上转移到国会里。

第二，国会大选必然消融云集在大街上的两派民众，把他们吸引到票箱前去干正事，使得当前难以解开死结的群众运动名正言顺无疾而终，而且无一方丢了脸，双方都是体面下台。

第三，它防止了台民的进一步分裂对峙，维护了台湾真正的安定团结。

第四，从党派政治而言，蓝营必将在国会大选中及时收获民意果实，获得绝大多数席位，成立蓝营内阁。即使最终倒扁不成，阿扁也给彻底废了武功。而小马哥因为立此汗马功劳，必然重获百姓青睐。

第五，由全民公投决定阿扁去留乃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决策。如果全民赞成阿扁滚蛋，则他再没任何理由赖下去。如果全民赞成他留任，则施明德再无理由赖在凯达格兰大道广场上。这的确是拆解高手比拼内力的最佳 exit strategy。

勿过，阿拉伯估计小马哥不敢这么做，他没有这个魄力。如果这事摊在阿扁那流氓手上，他决不会犹豫，可轮到英九那公子哥儿就完全不同了。这说起来就是痞子相对公子的优势。过去阿扁战胜连战的主观原因就是这个，如今看来同一主观原因还将保证他赖到 2008 年，而马公子很可能如同连公子一样，傻望着痞子逍遥法外，自己却害了重症肌无力。

这猜测依据很简单——他毕竟吃了多年政治饭，手下谋僚也一大帮，岂有想不到这高招上去，还要等老芦耳提面命的？他的担心已经告诉天下人了，生怕人家说他是“外来政权余孽抢夺台湾统治权”，这种自觉低人一等、动辄缩手缩脚的心理障碍，我这个资深“黑崽子”再熟悉不过了：）

马的另一担忧可能是国会改选所动的手术比较大，改选期间，所有立委统统要成待业老中青。事涉人家的粮道，公子不比痞子，在这种事上难免婆婆妈妈，流露出妇人之仁来。

我这里跟小英九（勿是侬家的马小九）打气：小马哥，黑崽子，你大胆地走吧！老芦哥的文革经验之一是：高帽子一经戴滥，就再没威慑力了。黑帽子如此，红帽子也不例外，君不见现在连施明德都作了游揆痛骂的该“滚回去”的“中国猪”，“糟蹋台湾人”的“中国人”？你还怕什么？

至于立委暂时失业更非大问题。你当然难免断了人家一时的粮道，但你必将给更多忠实党员创造粮道，这代价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荣国团同志教导我们：“人生能有几次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小马哥，放手搏吧，老芦哥有厚望焉！

2006 年 9 月 25 日

国民党大胜带来了和平统一曙光？

国民党在立法院选举获得大胜，成了国会多数党，民进党则遭受自建党以来的空前惨败，陈水扁引咎辞去党主席职务。这消息乐坏了党朋们，有人竟然据此预言和平统一有望，让我笑落了残存的大牙。

党朋们不是从来反对民主么？该如何判断台湾人民根据这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做出的决定？请问这是不是应该肯定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哪？为什么民主选举竟然也会有好结果？这次“狼羊一点菜律”为何又不起作用了涅？

倒是立志把泛蓝阵营染红、一贯在网上以新时代毛泽东的口吻挥巨手指航向的王司令希哲，这次却非常难得地没讲昏话，指出在国民党治下，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前景更加微茫。党朋蠢到连这点都看不出来，难免要猫拾猪尿脬——空欢喜一场。

司令这次发的那份红头文件（文革余孽怎么永远自命不凡，只会用中央领导的身份与口吻向广大人民发指示啊？），基本上是抄袭我这些年来反复强调的台湾问题要点：

一、 民进党人搞台独是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为的是“出口转内销”，以中国为假想敌，煽起台湾“本省人”对“外来政权残余”的仇恨，把民主政治变成族群之争，把国民党变成“民族敌人”，借此独霸选民资源。

二、 因此，民进党搞的民主具有浓厚的法西斯气味。陈水扁放着全民总统不做，只做“本省人”的总统，把党派政治搞

成种族斗争，靠制造煽动族群仇恨实现私人目的，有使台湾变成第二个爱尔兰的危险。

三、 陈水扁吃准了大陆是银样镴枪头，不敢动武，因此使用草船借箭的烂招数，靠实行边缘政策，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来转移选民对内政的注意，换取人民对他的政权的认同。此策虽然一度有效，但很有限。老是揪“呼雷豹”头上那撮毛（典出《说唐》）迟早要让台民的肾上腺处于衰竭状态，反而引起逆反之心。

四、 陈的边缘政策很可能擦枪走火，引起大陆武力犯台，对两岸人民都是巨大灾难。它更会惹恼山姆大叔，后者追求的是维持现状。因此，我曾多次建议中共不要再为陈水扁送上满船的箭，应该低调处理陈的种种表演，在幕后运作，通过山姆叔去实行“三娘教子”。

以上各条乃是我这些年来谈台湾问题时反复吹奏的主旋律。除了给中共献策外，我也对台独元老洪哲胜多次专门痛陈过利害，要他们放弃立足于制造民族分裂的下流政客手段，真心为台民谋利益。我党倒是似乎听进去了，民进党则蠢不可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惨败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立法院大选之后还有总统大选。但民进党声望跌落到有史以来最低水平，我看当选总统的希望实在渺茫。即使当选，也是个“朝小野大”的局面，只能选出个跛足总统来。因此似乎可以说，台湾政局已为国民党控制。

那么是不是如弱智党朋们欢呼的那样，两岸和平统一就此有了希望？

如果国民党还是那群陷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的 “老而不死是为贼”当家，则这话还有三分依据。可惜啊，如今的国民党和老贼们当家时的国民党的差距，恐怕并不亚于江胡共与毛共的差距。国民

党那伙老贼我看与共匪也没什么差别，乃是国民党最需要摆脱的历史包袱。

这区别从二蒋移灵问题上就能看出来。前段民进党命令慈湖头寮陵寝撤哨封园，蒋家媳妇蒋方智怡竟然对媒体表示，将遵照蒋经国遗愿，将两蒋遗体移到浙江奉化安葬。蒋经国之子、立委蒋孝严闻讯坚决反对，他表示，蒋经国生前说自己是台湾人，此时讨论移灵大陆并不适宜，“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不会这样主张”。而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国民党中央对此事持低调态度，强调完全尊重家属，外人无从表达意见。但高层私下忧心表示，民进党故意炒作两蒋议题，蒋方智怡的“移灵大陆说”虽然代表家属心声，但却称了民进党的意，反而变成陈水扁批斗的工具，云云。

我看了这段新闻，只觉得怒气勃勃。近年由于民进党的刺激，许多国民党老贼争相朝拜大陆，无耻媚共，其中竟然被中共残杀的抗日名将张灵甫的遗孀王玉龄！王某人于 1997 年返回大陆，在上海定居，并参加了中共在 2005 年组织的抗战胜利 60 周年庆祝大会，与谋杀了她丈夫的日寇事实友军罪犯后人同堂欢庆。张将军泉下有知，不知道该会为这种背叛丈夫背叛民族的败类如何辗转反侧！

更有甚者，当年的抗战英烈后代，诸如戴安澜将军之子戴复东、戴澄东；彭士量之子彭纪俊；胡靖安将军之女胡葆琳；刘杰将军之子、陈立夫之外孙肖松林；谢晋元将军之子谢继民；侯镜如将军之子侯伯文；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王滋华之女王波如等人，竟然伙同毛泽东之女李敏，及外孙女孔东梅；陈毅之子陈丹淮；任弼时之女任远芳；左权之女左太北；罗瑞卿之子罗箭；萧克之子萧星华；叶挺之子叶正光；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煦；周恩来侄子和侄女周秉钧、周秉德；彭德怀侄女彭钢等组成所谓“著名抗战将领亲属团”，在全国各地考察。历史上还真难见到这种英烈之后与汉奸国贼之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辱没祖宗的丢脸事！

所幸今日国民党并不由这群败类当家。蒋孝严的响亮回答就证明了蒋家有后，国民党后人并不都是为我党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白痴们。小马哥更是个明白人。他这些年来已经把话说得朗如天日了："统一"不过是个策略口号，鬼话说的 lip service，但绝非近程目标，大陆一日不改变制度，就一日不跟大陆统一。与此同时也要避免毫无必要地刺激大陆，以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为长策。

这在我看来乃是台湾人民能做出的最佳决策，同时有利于两岸三地。台湾有什么必要迫不及待地光头钻刺丛，自由的主权国家不做，却去找个顶头上司（而且还是毫无信义，反复无常，连自己人都要残杀的土匪上司）来管束自己？统一的高调当然不妨唱，而且要高唱入云，唱得共党又气又怒又没有理由发作：没错，台海两岸确实是一个国家，但那是 1912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你们要统一，那太好了，这就请你们放弃持续半个世纪的武装叛乱，向民选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投诚，至少要同意我们进入大陆公开竞选吧？作为对等措施，欢迎你们也来台湾参加竞选。看我党还能有什么第二句话？这比阿扁的独立秀能更有效地击破中共的狼子野心，而且能剥夺他们动武的"道义立场"。

总之，国民党这次控制了台湾政局，向中共内部的强硬派证明了胡锦涛采取的和平攻势是有效的，取消了他们向胡中央发难的借口，有助于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对两岸人民都是福音。需要告诫国民党当家人的是：一定要牢牢把住"维持现状，不统不独"这个底线，把那些当初把五亿人民抛弃给共党、现在又想出卖台湾、甚至想玷污二蒋英名的老而不死是为贼们统统无情清除出去。

2008 年 1 月 13 日

我党又蠢到再次为民进党拉选票？

适才看到网友转贴的中评社的某个白痴评论员锺维平大放厥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民进党会因立法院大选惨败狗急跳墙，为“必保总统”制造社会动乱，诸如煽起暴力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该白同志还根据共产党的土匪哲学，批评“国民党的柔性政策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据说那是因为民主国家的政权交替也和共产党山大王的权力斗争一样，是你死我活之争，所以，“无论如何柔性，在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政权争夺与保卫战中，政局恶变未必不会形成”。为此，他再度恫吓台湾人民，扬言“如果台湾真的发生大动乱，无法收拾，大陆决不会退避三舍，绝对不会不干预”，云云。

此外据香港媒体报道，共军刻下正大规模调兵遣将，摆出一幅要武力犯台模样。外交部甚至还通知各驻外大使馆，知会各国政府，大陆方面将被迫对“台独”作出反应。据香港商报引述相关报导称，在知会过程中，中国外交官员特别对菲律宾政府提出，不要接收台独分子或为其提供逃亡路线，以免威胁到菲国的安全。

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那套，竟然武力威胁到了邻国菲律宾头上去。那么，如果台独分子真的逃亡菲律宾，共军就胆敢攻击该国了么？有那个尿脬么？美国难道能坐视？朱成虎的蠢病疯病，什么时候才会断根？

挑动群众斗群众乃是民进党人的拿手好戏。上次施明德搞街头民主，民进党就曾发动人民上街搞反示威。我已经强烈抨击过了，指出民主国家的示威从来是针对政府，还从未见过拥护政府针对另

一部分选民的民众示威。但这又如何？酿成了动乱没有？难道天下的百姓都如同生活在共党高压统治下的中国百姓，逮住第一个机会就要动乱不成？台湾人民是成熟了的文明公民，不是我党辛勤哺育出来的土匪苗子，轮得到我党操心么？

山大王们只知道关起门来血肉横飞地进行“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政权争夺与保卫战”，其御用写手又岂配指手划脚，教导文明政治家小马哥怎么进行民主运作？土匪哪可能懂民主政治？小马哥在大胜之后戒慎恐惧，低调柔性行事完全是对的。

须知立法院选举从来不是民进党的强项，在立法院大选中惨败，并不等于他们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正因为泛蓝阵营此次囊括了立法院的绝大多数议席，才有可能诱导选民出于对“一党独大”的担忧，把票投给民进党总统侯选人，来获取某种平衡。小马哥低调柔性处理大胜，扬言要等总统选出后才组阁，正是针对这一担忧使用的化解手段。此中奥妙，岂是极权制度哺育出来的“拜拳教徒”锺某人可以理解的？若小马哥听了这种白痴教唆，只怕要丢了本可到手的总统宝座！

最混帐的还是，大陆又愚不可及地实行武力恐吓政策。这势必引起美国的反弹。这结果就是效 2000 年故事，动用大陆的民脂民膏去为民进党拉选票。

台湾人这次在立法院大选中把票投给国民党，无非是因为阿扁走得太远， 把“呼雷豹”头上那撮毛揪下来了（请参考学术专著《说唐》），使得山姆叔老大不快，不能不给阿扁个颜色看看，让台湾人民知道老美并不支持台独。美国的保护是台湾人民的主心骨。老美既然放了话，台湾人民当然识做，迅速抛弃了民进党。再加上民进党执政一塌糊涂，贪腐丑闻迭出，这才招致此次选战大败。

如今共军却又蠢到去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这势必引发美国在远东显示实力，以体现协防台湾的决心，安抚台湾民意。如此一来就会使已经向国民党这边摆过来的钟摆再度摆回民进党那边去。中共耀武扬威必然引起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感，而老美被迫显示实力又会给台民壮胆，这两条加起来的客观效果，便是帮已现败势的民进党拉选票。如果民进党人这次再次夺得总统宝座，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中南海写封感谢信，感谢解放大军为民除害。

其实台湾的事，凡是有个脑袋的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大陆不敢打，台湾不敢独，大陆的“打派”是做戏，目的是瞄准胡总书记那“投降派”；而台湾的“独派”也是做戏，真正的靶子乃是国民党那“外来政权残余”。双方玩的乃是一模一样的把戏，双反都明白若真的打起来，大陆和台湾都得同归于尽。

把戏虽然是同一个，但智力有高低。陈水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而过去扮演强硬角色的江总完全是下套给自己以及接班人钻。偌大的国家把自己的全球战略扣死在一个弹丸小岛“台湾专区”那套子上，把自己一步步逼进“不打无以谢天下”的围城中去，使得小小的台湾成了庞大的大陆的“牛鼻子”，让陈水扁牵着乖乖团团转。这么蠢的政客，历史上还真少见。

解套的办法，就是实行“三不主义”的小马哥当选台湾总统，起码八年内双方可以“和谐”一阵子。大陆不敢打的底其实早就向台湾人乃至全世界人民交代过了，那就是前些年制定的《反分裂法》，那意思就是告诉台湾人：针过得来，线就过得去。你们尽管维持事实独立好了，但请不要把台湾共和国的牌子打出来，让我们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下不了台，被你们逼得非动手不可。而这一打，辛苦 30 年积累下来的一点家当就全砸了，只怕还要引出大陆全面叛乱来。

所以，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乃是两岸三地（不说是三国吧）共同盼望的好事。对我党来说，国民党上台的伟大意义，不是他们能促进国家统一，而是他们免去了我党不能不铤而走险的难堪。

这就是何以大陆如此盼望小马哥当选，他小人家本是江总布下的“自绞索”的解套人，使得胡总躲过了被军内强人逼宫的大难，可谓胡总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这心情我老人家完全能理解而且极度同情。

不过阿，请我党领袖牢牢记住这个铁的事实：尔等智力比较低下，而且天生了一双狗杂种石破天的毒掌，沾上什么什么完蛋（请参考学术著作《侠客行》，金庸著），此乃不为尔等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喜欢它是那样，不喜欢它也是那样。诸位能为小马哥作的最大好事，就是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说，否则他只会死在尔等善意的毒掌下。

2008 年 1 月 17 日

欣见台湾民主制度走向成熟

3 月 22 日，台湾总统大选揭晓，马萧配以两百多万张选票胜出，创下台湾总统选举史的最高纪录。闻讯以来，曷胜欣慰，倒不完全是因为持比较稳健合理的大陆政策的小马哥当选，更是因为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成熟。

陈水扁自 2000 年当选上台以来，完全是个鼠目寸光的政客。他唯一的本事便是营造整合竞选资源，特别精通“草船借箭”，让我党为他殷勤拉选票，多次为了政党私利，不顾两岸人民福祉，毫无必要地刺激大陆，恶化台海关系。这种边缘政策再搞下去，总有擦枪走火的一天。

更混账的是他的祸国内政举措。他拒绝作全民总统，刻意分裂台湾人民，按省籍划线，效法共党，把自己化为“台湾”化身，谁反对他的政策主张便是“不爱台湾”。如此倒行逆施下去，迟早要把台湾化为第二个北爱尔兰。与这后患无穷的恶政比起来，陈治下八年台湾经济成长停滞，贫富两级分化，失业率剧增，贪腐丑闻频频爆出等等，反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因此之故，许多台湾人早在投票前就打好主意，决定“换个党做做看”。正是这点最令人欣慰，它说明比起 2000 年那阵子来，台湾人民已经极大地成熟了。如今他们已不会再被阿扁的“大陆牌”、“恐共牌”、“省籍牌”等选举花招哄骗，知道什么才是挑选竞选人的标准，那就是从自家实实在在的利益出发，看竞选人提出的政纲是否能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因为自家的肾上腺被他们的煽情表演刺激起来。

所谓“绿卡风暴”的效应就最能显示台湾选民的成熟。那场“风暴”让我感到极度恶心，觉得一场光明正大的政治竞技，竟被谢长廷变成了黑社会踢裆抠眼的下作扭打。当时台湾某电视台邀集“专家”们讨论此事，更几乎让我对台湾人民的素质丧失信心。那些“专家”们似乎都认为此事很严重，可能成了马英九的滑铁卢，云云。

老芦当下忍不住对着网上视频大骂：NND，这都什么烂事啊？为何不去追究孙中山当年在夏威夷冒充美国出生的华侨，加入美国籍的历史？为什么不追究陈水扁、吕秀莲、谢长廷加入国民党，并发誓效忠三民主义的“历史问题”？连民主竞选都有本事搞成共产党的“抛档案”！这还算什么民主社会？！谁敢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么干，只会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不意那些“大腕”们还在那儿郑重其事地讨论马英九的“失策”，看来台湾选民的素质还真不怎么样。

然而事实证明，台民的素质不但远远高出了谢长廷，而且高过了那些在电视上讨论“风暴”的“专家”们。尽管谢长廷的突然袭击越演越下作，最后竟然连马英九过世的老先生都侮辱进去了，但他得到的只是进一步丧失人心。据台湾学者说，中国人有厚道的传统，侮辱人家的父亲这种下作事谁都看不下去。

因此，尽管谢长廷“奇兵”迭出，马英九仍然一直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只是后来谢长廷改攻马英九的“两岸共同市场”政见，再加上西藏事件的刺激唤醒了台民的恐共症，谢这才勉强扳回几分。但民进党毕竟失去了民心，即使有了天上掉下来的西藏事件帮忙，也终于无力回天了。

CNN 报导引述马英九的话说，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台湾人民要一个乾净的政府，唾弃贪污政权；他们要一个繁荣的经济，想过好日子；他们厌恶政治恶斗，希望台海和平，不要战争。

马英九此话与多数台湾学者的看法一致。例如高雄大学政治法律系副教授廖义铭认为，民进党大败“是绿色执政团队所代表的人格特质（不佳）及应有的经济表现出现衰退的相乘结果”。绿色执政期间，让人民看到太多绿营权贵不可被信赖的特质，包含聪明、伶俐、擅于整合选举资源，但实际治国的人格清廉度低，“谢长廷、（现任总统）陈水扁可以说是代表人物”。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傅恒德则认为，选民彻底厌恶大选操作的省籍情结与统独议题的老调重谈，以选票表达唾弃民进党锁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两岸关系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冲动式的国际外交政策。国民党提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两岸关系和缓、以更弹性方式加入国际组织等政见，则获得选民高度青睐。

如果这些学者说的话确实反映了选民心理，那说明台湾人民的确变得相当成熟了。民主制度不但在台湾牢牢扎下了根，而且它的合理运作也开始为人民掌握。这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极大的福音，其令人欣喜又也何如！希望民进党能从立法院选举和总统大选的惨败中吸取深刻教训，彻底“切割”陈水扁的祸国殃民政策，抛弃那种立足于一党私利，以撕裂族群、离间人民的邪恶方式营造政治资源的竞选方针，在四年后推出以作全民总统为己任、为全民福祉实实在在谋利益的总统竞选人来。

小马哥当选，许多人都认为对两岸三地来说都是福音。美国人尤其高兴，过去陈水扁搞边缘政策，反复刺激大陆，让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的美国人夹在两岸的“交叉炮火”中（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美台关系为此恶化。因此，马当选必然导致美台关系的改善，却有一定可能给大陆带来新的难题。

前段我写文章抨击大陆又在干为民进党拉选票的蠢事，有的网友跟贴告诉我，说我完全猜错了我党的意图。中共其实想让民进党

留在台上，以此作为假想敌，藉此转移大陆人民对内政注意，维持人民对政权的认同。

如果此理论成立，则 2000 年朱镕基总理在台湾大选的关键时刻，毅然召开记者招待会为陈水扁拉选票，也就不是愚蠢失误，而是有意为之了。而中共领导今日也肯定不会乐见马英九当选。

然而窃以为，这并非中共最高领导的意图。他们完全知道大陆内部危机重重，根本不敢对台用武。过去阿扁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才敢频频刺激大陆。如果民进党留在台上，免不得还是要走那轻车熟路，这就意味着不断地把我党放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过去大话说多了，胸膛也早就拍紫了，真不动手，必然要让百姓小看，将多年煽起的民间仇台情绪转移到自己头上来，更别说一个“软弱无能，丧权辱国的中央”只会引来军人的逼宫；但若真动手，会引发出什么雪崩效应来，谁都不知道，“太平天子”们绝对不会蠢到去冒那个险。因此，似乎可以说，阿扁及其可能的民进党继任人已经成了我党的“庆父”，不除去则党无宁日。

但该理论也不是毫无道理。小马哥上台当然可以缓和台海紧张空气，改善两岸关系，把胡总从左右为难的困境中救出来。但我党也失去了一个转移人民对内政的注意的理想的假想敌，失去了煽动人民仇台的借口。“仇台爱国主义”宣传就算不停止，也会失去原来的势头。长此以往，大陆人民对台湾的印象就会逐渐改善，对台湾民主实验的偏见就会逐渐消失。此时台湾就会作为民主改革成功的榜样，在大陆人民心中引起强烈艳羡。这对我党统治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小马哥当选对我党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还真是难说。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大陆人以为他当选会促成两岸统一，这未免太过于乐观。从长远来看或许如此，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台湾绝不会

被我党不战而屈人之兵地轻易吞并过去，无论是谁在台湾当家都如此。

2008 年 3 月 23 日

伤阿扁

阿扁终于进去了，心里不说很难受，起码有点不自在。

8 年前台湾总统大选，我激动万分，饱蘸激情，连夜写下《我欲因之梦琼台》，盛赞民主实验终于在台湾成功。阿扁当选后，我一直怀着殷切的期待，指望阿扁走好民主之路，为中国作出个表率来。可惜随着时光逝去，我越来越失望，那小子乃是个鼠目寸光的政客，精通的乃是祖传的龟孙子兵法，看得到的只是蝇头小利。

本来，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上，都会想到自己代表的历史意义，力图把自己的当政化作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为和平化解两岸冲突，通过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与特殊地位，为大陆施加良性影响，给大陆人民带来另类生活方式的启迪。

不料那狗东西只看得到狭隘的政党私利，操心的是如何独霸台湾的政坛，于是放着全民总统不做，专在省籍问题上做文章，制造族群分裂，煽动族群仇恨，把自己当成台湾和台湾人民化身，把国民党当成“外来政权残余”，更把两岸关系当成选票资源，一再刺激大陆，恶化两岸关系，实行“草船借箭”，最后更弄出个蹊跷的“枪击案”来，不明不白地获得连任，让任何一个正直中立的旁观者都没法不恶心。

到此地步，他还嫌不够丑，竟然如同牢里放出来的积年老囚一样，把老母猪当成了眉弯眼笑的西施貂蝉杨玉环，如同我党那些翻身痞子一样，充分流露了没见过钱的穷小子的贪婪，体现了“不择细流的海纳百川情怀”，什么钱都要捞，什么钱都敢捞，不但贪污竞选基金，洗钱卖官，竟然连搜集发票报假账的小偷小摸都有本事

干出来，于兹雄辩地向全世界人民显示，阿扁的政治生涯，就是对“狗肉上不得席面”的俗话的生动证明。

等到东窗事发，给捉将官里去之后，阿扁还不忘最后恶心大众一把，那高举手铐的烈士状，那“司法迫害，民主退步，台湾加油”的呼喊，那乏味的绝食表演，无一不让人从心底厌恶出来：

看在上帝面上，前总统阁下，您难道不能换个戏码？谁不知道您的专业就是把民事和刑事案件愣往党派政治上扯？当年您主办《蓬莱岛》杂志，诬蔑某教授剽窃，被人家诉以诽谤罪，本来您只需道歉就没事，可您拒绝认罪，被判监禁几个月。这本是民事案件，可您就是有本事点石成金，把它化成无限提取的政治资本，动不动就要用来证明您为台湾言论自由坐过牢！

看您的意思，如今您又为台湾民主殉难了，是不是啊？您这是殉的什么道？通过自己的受难，为大众宣讲了什么民主的真谛？是不是台湾的民主，就是总统可以任意偷盗选民而不受惩罚的特权，而台湾的言论自由，就是任意诽谤他人而不必承担后果的自由？

阿扁，省省吧，你为台湾、为台湾民主、为台湾平民百姓丢的脸已经够多了。你本来代表着民主给台湾平民子弟带来的机会，可惜你经过你八年的现身说法，只怕大众从此要认定“宁选不在乎钱财的世家子弟，绝不选没见过钱的贫寒子弟”，这是不是就是你给大众留下来的唯一教训，唯一启迪？

这就是阿扁最令人痛心、惋惜、乃至愤怒之处：你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人物，可你却糟蹋了这宝贵机会，只不过因为你的器太小了些！

虽然阿扁为台湾民主政治抹了黑，但我认为那只是台湾人民看错了人，监督政府的制度也不够完备，这在一个处于民主初级阶段的国家很自然。民主制度需要一个发育成熟过程，人民也需要一个发育成熟过程，而阿扁的入狱在我看来恰是这发育的生动演示。它

证明了只有在民主制度之下，才能做到陈毅标榜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位极总统，如果贪污照样能锒铛入狱，这对大陆人民来说必将起到警示启迪作用，于是阿扁终于不负我望，以“反面教员”的滑稽无奈方式，向大陆人民演示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2008 年 11 月 18 日

台湾人与大陆人的文盲笑话

几个月前，我在某个网站看到一位大陆青年的台湾游记，他骑车作环岛旅游，沿途拍摄了大量照片与录像，让我这没去过台湾的人看得津津有味。什么忠烈祠，卖国父纪念堂，中正纪念堂等等，还是第一次看见。特别搞笑的是那卫队换岗仪式。这套把戏完全是从鬼子那儿趸来的。国共概莫例外。国军过去是学日本人，后来则是学老美。而共军学的自然是苏联。服饰、队列等等，全都这样。

追本溯源，这套玩意似乎就只有两家原始祖宗，一家是英国，一家是普鲁士。英国人不兴正步走（鬼话称为 goose step），与众不同的是立定时要跺脚。而德国人的特点就是阅兵时以正步通过检阅台。两家敬军礼也不一样，都是手指并拢，但英军是掌心翻向前方，而德国人则是掌心向下。两家都在世界上有影响。英联邦国家的士兵搞的都是英军那套，印巴军队搞阅兵或换岗，完全是英军拷贝。而普鲁士那套则影响更广，似乎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老毛子。从老毛子那儿又传到所有的共党国家中去。如今最爱以正步通过检阅台的，大概就只有中国和北韩两家，尤其后者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只是北韩军官的服饰比较搞笑，特点是一顶硕大无朋的大盖帽，把人压得矮矮的，头衬得小小的，凸显了该国大众因营养缺乏而发育不良，精壮汉子长的还是半大孩子的身躯。相比之下，中共军队似乎要好得多。美军则既有英军传统，又受了普鲁士影响。其军礼完全是普鲁士的，并不是英军那种掌心向前式。

台湾军队明显是学老美。只是那军装比较搞笑，尤其那裤子，跟女人穿的连袜裤也差不多，显得十分娘娘腔，有点娘子军的感

党。舞弄花枪或指挥刀那套似乎也是英军传统，就连跺脚都没拉下。依我看，其军容似乎还不如学苏联的中共。当然也可能是习惯造成的偏见。勿过，据我一点管窥蠡测，大约黄人学俄式军规军服比较合适，因为男性身材比较娇小玲珑纤巧，有点“我见犹怜，而况老奴”的意思，不适合穿老美的紧身衣尤其是连袜裤。

以上都是废话，无非是人老话多的表现。我要说的还是，在那游记上，我第一次看见台北市中心的广场，那儿居然有个什么“白色恐怖纪念墙”！当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天哪，世上竟会有这种无知的文盲国度，居然在首都市中心斥巨资建个文盲丰碑，向全世界游客彰显该国全民的无知！

稍识两个字的人都该知道，什么红啊，白啊，完全是老毛子那套。因为马克思最喜欢嗜血的红色，于是红色便成了革命色。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特党（the Bullshit Party，特点是所有的言论都是bullshit，无一例外。通译“布尔什维克”，误）的旗帜是红旗，人称赤党，夺权靠的是红卫兵（Red Guards，通译“赤卫队”），后来建立的军队称为“红军”。夺权后有意效法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大规模推行“红色恐怖”，实行惨绝人寰的“阶级灭绝”。反革命军队则称为白军，对红党实行的红色恐怖报之以针锋相对的“白色恐怖”。此乃人类历史上最丑恶、最血腥、最恐怖的一页，超过纳粹万倍。我已经在《野蛮的俄罗斯》里介绍过了。该书也在台湾发卖，请台湾读者这就踊跃前往购买，网购也成，庶几从此扫盲，以后少贻笑于大方之家（国）：

博客来书籍馆：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94534

三民网路书店：

http://www.sanmin.com.tw/page-product.asp?pf_id=99f155y9v106U84g104s67I104C124hKOiHVi756KvK

灰熊爱读书：

http://www.iread.com.tw/search_results.aspx?Condition=0&skeyword=%E8%98%86%E7%AC%9B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中共乃是俄奴党，起事后便把主子这套原模原样地搬到中国来。中共也称红党，成立的军队也叫红军，把苏俄的国徽当成自己的党徽，把马恩列当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父，还在江西大搞“红色恐怖”、“红色清乡”，杀人如麻，作恶累累，端的是“冤埋城阙暗，血染党旗红”。因为屡屡在城市发动暴乱，他们遭到国府镇压，便抄袭主子那套，反诬国府搞“白色恐怖”。

这只反映了那群俄奴不假思索的邯郸学步：国民党也是革命党，与中共同为鲍罗廷那“双国父”下出来的孪生怪胎（我在新书《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里指出，鲍罗廷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国父，是他首次将国民党那个没有政纲、没有组织、没有党员名册、没有党刊党报，不会宣传政见也没有什么政见的乌龙杂烩作了脱胎换骨的再生手术，才让它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势力。又全靠他提拔了蒋中正作党军统帅，国民党才得以上台。因此他才是货真价值的“双国父”：中华党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父。而孙文一生唯一的业绩，就是卖国嫖妓而已，可谓“卖国父”），只是国民党及时改邪归正了，而中共至今怙恶不悛，1966 年 7、8 月间还由高干子弟红卫兵掀起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将全国化为魔鬼世界，至今思之胆寒。

但国民党毕竟是依法镇压中共那武装叛乱集团的，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冤杀的并不多。正

因为国民党比较注重法令，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傲的毛泽东才会讪笑之。据《毛泽东年谱》，1940 年 3 月，毛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多次讲话，作如下批语：“全部讲话表现三点：（一）军队是暮气沉沉；（二）国民党是靠法令吃饭〔3〕；（三）讲的还是抗战。”又据该书注释，蒋介石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九日的讲话中指责说，十八集团军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 “靠法令吃饭”的批语。既是“靠法令吃饭”，还能是俄国那种无法无天的白色恐怖么？

在“恐怖”前冠以“白色”二字更是莫名其妙。与俄国的反革命不同，国民党从不自称白党，国军从不自称白军。白色在西方被认为是纯洁的颜色，是故新娘穿的婚纱都是白色的，表示那是纯洁的处女。若是再嫁，则只能穿粉红色的婚纱（当然这是旧习俗，如今哪怕奉子成婚，也是“白色恐怖”）。但白色在中国历来是凶色。传统丧服从来是白色的。这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当年荆轲刺秦王，去为他送行的人都穿着白衣冠去，辛弃疾才会在词里写：“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胜雪”。国民党吃饱了撑昏了，要像俄国反革命那样，去自称孝子党，实行白色恐怖？

台湾民进党诸文盲就可笑在这里：你要骂国民党，fine，“暴政”啊，“恐怖”啊，什么不行？怎么会拾共产党牙慧（其实是食其牙秽，比较恶心），去骂老蒋搞“白色恐怖”？这不是承认尔等也是俄奴，是老毛子在台湾的传人，是中共开在台湾的分店？这就是尔等鼓吹的“台湾本土化”？陈水扁辈不学有术不足奇，怎么举国竟无一通者，不仅容许那文盲党在首都市中心建造文盲纪念丰碑，而且至今还让它傲然屹立，尽情嘲笑台湾全民的无知！

勿过，大陆人也好不到那儿去，恐怕更糟糕也未可知。我但凡见到官方或准官方媒体（如凤凰台与凤凰网）报导台湾新闻，总要鄙夷地冷笑，盖那上面提到台湾的国防部、行政院、总统等名称，必定一律冠以引号，表示那是“伪”的意思。

这就奇了。难道中华民国是个伪国家，其政府是叛乱政权？可中华民国好像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8 年前就有了啊？还曾是联合国的发起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那以来一直也就没有灭亡过，今年据说还要庆祝建国百周年，只不过其治权从全国收缩到台湾一省去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事实。先出现的政府还能是叛乱政权，先成立的政府的传人可以是伪政府，这可实在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力。

所以，看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或华人，全 TMD 统统是文盲，专门以国家级别、全民规模闹文盲笑话，唉。

2011 年 5 月 15 日

共军进藏可以与日本侵华相提并论么？

——马悲鸣大作评点

在《谈马悲鸣现象》和《再谈马悲鸣现象》中，笔者曾指出马悲鸣现象的特点，是丝毫不知逻辑为何物的混乱思维，其表现包括概念混乱，不证而论，荒诞类比等等，其他特点是见木不见林的隧道眼和充满稚气的直线思维等。下面要评点的马文，便充分地表现了这些特点。

——————————————————————————

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马悲鸣·

读了都人在《枫华园》副刊（ＦＨＹ9806ＣＳ）上发表的“种族灭绝、文化灭族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心日’”，对其观点实在不敢苟同。

开发美澳新大陆殖民地者的后代并没有否认自己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况且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南北战争就是指著美国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号召废奴的。而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日本几个和尚在上海遭到中国人殴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结果还没等收到道歉信，日本军队就对上海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攻击。

——————————————————————————————

【芦笛评点】什么是荒诞类比？那就是不顾比较对象之间毫无逻辑上的可比性，仅根据某些外表上的相似就把两者拉来作不伦不类的比附，然后推出荒谬的结论。上面这段话就是典型表现。

马说："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真的可相类比吗？马先生忘了，中日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在历史上从无互相隶属的关系。国际社会也从未把中日当成一个国家。而西藏由于地理上的隔离，虽然在政治上形同独立，但自清代起，一直在名义上臣服清朝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一种类似朝鲜、越南的藩属。民国后这种关系虽然削弱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但西藏从未宣布过独立，国际上也从未将其视为独立国家。即使是达赖本人，到现在也没有打出独立的旗帜来，并且多次表示他要求的只是高度自治，并不是独立。

更重要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 1951 年 5 月与中央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所谓"十七条协议"）。正如题目所标明的，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自己是地方政府，同意中央政府派兵入藏，进驻西藏边防重地。同年 10 月 24 日，达赖本人致电中央，表示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由此可见，解放军进藏是由条约保证，得到西藏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欢迎（哪怕是表面的也罢）的，而且入藏时根本就没有受到武装抵抗。部队入藏后拉萨一度骚乱，达赖本人还下令撤销了卷入骚乱的两个司曹的任务，噶厦政府还取缔了主张修改"十七条"的"人民会议"。

上述这一切，和中日之间的国家关系究竟有什么类似性？哪怕是伪满和汪伪政权，也从来不曾声称中国是日本的一部分，更不曾以条约的形式同意日本进军中国“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无论是溥仪还是汪精卫，到东京去都是以“友邦元首”的身份，并不曾如达赖般入京晋见伟大领袖，并荣封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

——————————————————————————

最近王力雄著《天葬》里讲到藏民游击队袭击驻藏汉人的汽车，杀死工作队员；这大概和《红高粱》里“我爷爷”用土制炸药袭击日军汽车，《铁道游击队》飞车搞机枪，还有《敌后武工队》和《小兵张嘎》的行径一样。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破袭，到处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日军据点，结果引来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藏民游击队袭击入藏汉人，也引来了解放军“平叛”。两者如出一辙。

中共以武力胁迫、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么能叫“平叛”呢？这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难道日军的进攻也是“平叛”不成？

——————————————————————————

【芦笛评点】马先生要么在这里诡辩，要么炫耀他的无知。解放军进藏是 1951 年底根据协议和平进入的，并不是什么“攻入”，更没有“逼走西藏原政府”。西藏暴动是在 1959 年发生的，这其间有七八年的间隔，达赖还曾在此期间内上京晋见中央。谁都能看出它“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来。至于藏民后来的暴乱，虽然是官逼民反，但除了游击战的表面相似外，因为西藏并未独立并取得国际承认，所以只能说成是人民起义，决不能把它跟国与国的交战胡乱拉在一起。

——————————————————————————

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只承认在华军事损失五十万人。二战结束时的统计，苏联损失人口第一，大约是一千六百万。中国第二，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人员损失三百万。也就是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国要牺牲六名军人。若以中国人死亡一千两百万计算（这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双方人员损失比为 1：24。最近中国的二战人口损失总数已经自己给追加到四千万了。这等于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赔八十条中国人的命！1：80 的死亡比率只能证明“皇军神勇”：我们一名皇军能拼掉你们八十个支那人！中国人真是没用！杀中国人真如屠宰场杀猪羊一般。

当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杀四千万，相当于杀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怎么个杀法？按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规模，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苏联阵亡不过百分之八，就已经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国损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还到处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

【芦笛评点】这才是本文的文眼。在马先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糟蹋丑化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民族圣战，已经成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偏执狂。可惜他越是这么做，便越暴露了思维的超人混乱。

马的第一个笑话是隧道眼加概念混乱。在他的隧道眼中，“抗战死亡人数”要么等于“战死人数”，要么等于“被屠杀人数”，这两者竟然连加都没法加在一起。上面第一段中，他用的是第一个公式，因而得出“皇军神勇，华军怯懦”的结论。第二段里，他用的却是第二个公式，问出“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的蠢话来。

在马的隧道眼视野之外的，是无数死于间接战祸的平民百姓，诸如轰炸、炮击、扫射、火灾（如长沙大火）、细菌战导致的瘟疫、水灾（如花园口决堤）、三光政策造成的饥饿冻羸、千里逃难辗转流离的艰辛、冻饿和疾病、后方经济崩溃引起的灾难，等等。考虑到彼时中国的贫困、防空工事的简陋、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的阙如、中式木结构建筑的简陋、步兵连钢盔都没有（炮弹溅起的碎石如正中太阳穴就得丧命）、部队防御工事的原始，光空袭和炮击导致的军民伤亡就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马的第二个笑话是隧道眼加直线思维造成的，他居然连战争在哪个国家境内打、哪个国家就要承受特别沉重的人命和经济牺牲的常识都没有。而且，以他拿手的直线思维，历时八年的抗战居然成了瞬间完成的“一条日命换八十条华命”的“外汇交易”，由此得出“杀人越多越神勇，死人越多越怯懦”的妙论来。至于这八十个中国人不但可以死于间接原因，而且哪怕是死于与敌人的面对面肉搏，也可以被分期分批地杀害，这些可能性，居然就不会在他脑袋里闪过哪怕一刹那！

马的第三个笑话，是以为自己是大科学家，动不动就要用他那点小学算术知识来解决据说文人无法胜任的社会科学问题。可惜他连算术似乎都无法胜任，上面那个“性别比例失调”说就是证明。就算死了 9％的人口，就算炸弹专捡未婚男性炸，死的人中既没有一个女同胞，也没有一个已婚男人，但抗战过去已经五十多年，就算全中国死得只剩夏娃，只要其中一部分生下遗腹子女，到现在那性别失调恐怕也给稀释了吧？而且，马连基本概率观念都没有，居然会认为中国男多女少。按他的高深数学理论，大概那是因为死于战祸跟死于难产似的，只有夏娃们才会遭殃。

——————————————————————————————

中国进军西藏“平叛”，藏人说是“全民抗战”。藏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一百二十万大概就如中国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四千万一样。王力雄《天葬》一书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统计的内部保密资料中，正式“歼敌”就有九万三。“平叛”始于 1959 年三月的炮轰卢布林卡，直到 1962 年才最后肃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个藏区的强制“民主改革”，估计中国在西藏地区总共杀害和迫害致死了十万藏人不是太离谱。整个西藏人口不过两百万，汉军入藏所杀藏人的人口百分比绝不会比日军侵华低！

“平叛”的当时，入藏汉人全部都是武装的。有的汽车队并未受到攻击，也象打黄羊似的见到藏人就停车狙击；甚至把化装成藏人的解放军侦察员也当成游牧的藏人给猎杀了。藏人看到汉军进驻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文化习俗正在受到汉人的限制和强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袭和杀害进藏汉人的事件自然层出不穷，而且也很残酷。“打击侵略者”当然要如雷锋日记所云：“对待敌人象严冬一般冷酷无情”了。这和中国人痛恨日军进驻，愤而袭杀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给藏人送去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日军当年侵华何尝不也是让中国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怀抱”，给中国人送来大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大跃进的破天荒，饿死生民无算，总数倒真有四千万人之谱了；而设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看彩色电视，夏威夷土著在空调房子里打游戏机一样。中国人咽不下当亡国奴的这口气，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抗战了八年。那人家藏人可愿意因为城镇里能点上个电灯，就咽下毁家亡国，破坏文化传统这口气？！而如果不毁家亡国于汉

族，又安知西藏城镇到现在还点不上电灯？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多少万的行政拨款是否能买得下藏人毁家亡国之恨先且不说，如今日本每年给中国的贷款比这笔钱数要多得多。中国人还愿意邀请日军入侵，重回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吗？

——————————————————————————

【芦笛评点】这里的高论完全是开头那个荒诞类比的延伸。中日不但是两个民族，而且是两个主权国家，而根据国际法，在西藏独立前，汉藏只能算成是一个国家的两个民族。藏族奋起抗暴，反抗强势民族强加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其中道义上的合理性必须承认，但不能与国际之间的民族交战混为一谈，此其一。

其二，汉人进藏“给自己找的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不假，但这个理由毕竟是经西藏当局首肯并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以马先生那样尊重法律、为此挺身出来为六四屠城辩护的法律专家，似乎不难看出藏民暴动和六四之间的异同。相同的是两者都是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不同的是前者是武装暴动，后者是和平请愿。如果八九学运是“牛二卖刀”，那么请问武装暴动的藏民们又是什么呢？先生何厚彼而薄此耶？可否赐告这采取双重标准的理由？

其三，藏人暴动虽然具有反抗压迫的正义的一面，但不仅在法律上输了理（那个协议剥夺了武装抗暴的合法性，暴乱等于是单方面撕毁合同），而且使西藏人民遭到惨痛打击。除了大批藏民被屠杀之外，因为合同被单方撕毁，它便给了北京“加快民主改革”的充足借口，导致西藏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被强行摧毁。这固然是北京的暴政，但也是达赖的失策。

当时达赖应该使用一切和平手段抗争，并争取国际同情和声援，敦促北京信守协议，尊重西藏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抗争无效后，达赖可以流亡外国，但不该卷入暴乱，并应公开宣布他与暴乱

无涉，呼吁双方克制。如果他能充分发挥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呼吁人民停止徒劳的武力反抗就更理想了。如果他这样作了，藏民就不会遭受毫无必要的牺牲，西藏问题也就不会成了解不开的死结。说不定他今天也就能顺利和北京达成协议，重返西藏。

总之，我觉得，留给中共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不多了。达赖一死，西藏流亡政府的首领未见得会是他那样明智的人。中国日后不乱则已，一乱西藏必然独立，而留藏的汉人势必成为牺牲品。中央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政治智慧看到这一点，迅速接纳达赖的建议，从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退出西藏，只负责外交和国防，让西藏重新变成类似于清代的藩属。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的汉藏两利的解决办法。

————————————————————————————

中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即使游击队偶尔偷袭得手，也于大局无补；只好到处请求国际援助。过去这叫“以夷制夷”。最后日本的海空军主力是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陆军主力关东军是被苏蒙联军出兵东北消灭的。中国人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同样的道理，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单凭藏人自己抗战也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藏人和抗战时的中国人一样，自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助。现在西方对藏人处境的同情和对西藏流亡政府基本上仅限于道义上的援助，远不能和当年西方给中国抗战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相比。更何况当年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正是借用西藏领空开辟的驼峰航线运抵中国；途中仅坠毁的飞机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见援助数量之巨大。中国抗战胜利，翻手就灭了西藏，这不叫“恩将仇报”又叫什么？

————————————————————————————

【芦笛评点】这里第一段胡说，网友有关文章已将其彻底驳倒，此处不赘。

第二段如果读者眼睛花，还以为是西藏人而不是老美给了中国人抗战时期的巨大援助。马先生忘了，开辟驼峰航线之前，就连老美也没想到要去征求西藏政府的意见。

——————————————————————————————

即使如都人所言，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都是真的，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连瑞典的优生政策也在 76 年结束，政府正在对这项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赔偿。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祖宗干的事都对，并且正在尽力弥补祖先所行的不义。比如克林顿总统前几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国颠覆了当地土著部落统治的事件道歉。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英雄”称号。如今美加政府给每个印地安人每月五百美元到七百加币的终生津贴，以示对占用他们故土和过去所行不义的补偿。美国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族的贵贱，谁也没有理由歧视他人！”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可曾为文革冤死的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道歉、赔偿，和追究过凶手的刑事责任吗？

日本民间有不少个人对当年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过歉意。其中有状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华内容者；有著书《恶魔的晚宴》，揭露驻日本关东军 731 细菌部队拿中苏战俘做实验者；有集会宣布“中日不再战”以示忏悔者。但中国朝野至今无人对当年入藏“平叛”的行径认错，却不乏都人者流一见到国际间指责中国在西藏的劣迹，立刻反唇相讥，大骂西方人祖上也行过同样的不义。就如一个歹徒，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边一个绅士看不过去，出面

指责这歹徒的所行不义。该歹徒听罢，翻过脸来指著绅士的鼻子大骂："你们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过弱小吗？你们不也经历过野蛮时代吗？你们不也是从猴子变来的吗？你又有什么资格假装绅士来指责我？！"

都人文中提到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赛人的恶名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这种恶棍遗风。

退一万步讲，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甚至歧视仍在暗中继续，也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别人的三分不义，自己就有权行七分不义。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勃兰特曾遭受纳粹通缉而流亡国外达十三年之久。他在战后担任西德总理访问波兰期间，出人意料地当众向纳粹入侵的波兰死难者纪念碑跪了下去。而其实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称："我和这些死难者一样，也是纳粹的受害者。我也是抵抗战士，凭什么我要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敌认错？！"勃兰特可没这么不知趣，他这主动的一跪，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可是反观汉族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运分子如刘国凯者流，一说到共产党的阶级压迫就喊冤叫屈，一说到共产党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就叫好。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畸形人格。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国家。虽然日本后来"脱亚入欧"，主动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但儒家的传统影响还在。德国则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教策源地。从德国发动第二次欧战，日本侵华，中国进藏三方对自己侵略行径的反省上来看，德国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赔偿了。日本政府虽然没道歉，但民间

不乏同情惨遭本民族侵略残杀的他民族者。中国则是政府和民间一致抵制国际间对中国进军西藏的指责。

儒家传统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对待本民族所行不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地大相径庭。

（《枫华园》9807 B）

——————————————————————————

【芦笛评点】这些话我基本同意，也在《丑陋》系列的《决不忏悔》中讲了，可见汉奸辈还是有暗合之处。想提醒马先生的是，在台海危机中他和我发生争论时，似乎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

2001 年 6 月 19 日

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亡国三段论”

在2000年台海危机中，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了《化干戈为玉帛》一文，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平等的加盟共和国联合组成“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九点方案。提出这个主张，是想寻找用和平与理性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探索一种介乎美国和英联邦的模式，即让事实上的两个中国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又结成一个共存共荣、不可分离的实体。为此，两国将没有退出联邦的自由，但也不得互相损害。这个方案照顾了中国人的“大一统”情结，不要求中共立即还政于民，也照顾了台湾渴求与大陆平等的心理，没有对台湾的实际利益造成任何损害。如果中共真的以民族利益为种，应该说这是一种解开死结的办法。

此文发表后，引起了普遍的强烈反对。反对者们指出，这个方案是“两个中国”的翻版。此话不错，但两个中国已是既成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坚持没有现实可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用文攻武吓，只会逼上梁山，最终弄出个“一中一台”来。自“一国两制”提出以来，中共已经这么干了二十多年，干出了个李登辉，干出了个陈水扁，越干台湾离大陆越远。如果再不迷途知返，继续袭用老谱，莫非当真要不见棺材不掉泪，要干到“台湾共和国”真的成立那一天？实行“一个联邦下的两个中国”，无论是和现状相比，还是和辛大战略家的“打烂了重建”的前景相比，岂不

是一大进步？何况这个方案还为将来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美国或瑞士式的联邦政府铺平了道路。

反对者们也正确地指出，实行这个方案会引起香港、澳门、西藏、新疆、内蒙的效尤，最终导致“七个中国”的出现。自李登辉提出“七个中国”说，凡大陆人无不切齿衔骨，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其实我倒觉得，李登辉此说，其实是给我们国家结构的良性演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组成，无非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瑞士式的联邦，由讲四种语言的不同民族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国家；一种是帝国，如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日本帝国、苏联帝国等。到过西方的人都知道，所谓帝国（empire），并不一定有个皇帝作国家元首，它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近代法国一直是共和国，但我们仍会常常看到“法兰西帝国”这个词，它指的是法国本部及海外殖民地的总和。帝国一般由某个强势民族用武力征服多个使用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地区后建成并用武力维持。世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有联邦才能长治久安，而帝国无论怎样盛极一时，迟早都要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帝国主义已成昨日黄花时的、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因此她的最终解体也就是必然的。

正视现实的人都得承认，新疆、西藏、内蒙地区，在历史、语言、文化、生活制度、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与汉族居住区域几乎没有甚么联系和共同点。秦朝在北韩和北越就已设郡（相当于省）。这两个国家在以后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或作藩属，或处于直接统治下，完全被汉文明同化，接受了孔孟之道，使用同样文字，建立了包括开科取士在内的与中国一模一样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中国姓氏和地名。但最后它们还是独立出去了。新疆、西藏、内蒙人民

对中华文明的认同程度，比起日本来还远远不如。在毫无共同文化背景提供民族内聚力的情况下，我们究竟有甚么理由认为他们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我们呆在一起？连同文同种的台湾弟兄都还要闹分家，何况那些“非我族类”的“蛮子”？

如果说台湾之于大陆犹如澳大利亚之于英国，新疆、内蒙、西藏就如同当年大英帝国中的印度、缅甸。所不同的只是英国人没有在缅甸造过中共那样的孽。他们没有废除人家的宗教，没有捣毁人家的神庙，没有烧掉人家的经书，没有剥夺人家的私产，没有强迫人家放弃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没有“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强迫喇嘛还俗、回民养猪，更没有“镇暴平叛”，杀得血流漂杵。罄南山之竹，写不尽中共作的孽；倾东海之波，洗不去汉族的耻辱！

上面这些话，我写在《要帝国，还是要联邦》一文里。此文一出，又是群情汹汹，众口嘈嘈。老芦但听得一片叫骂，却没有见到任何迹象表明咒骂者们看懂了我的文章。为此，我写了《“党同伐异”论》，用演绎法的“三段论”将我的意思清晰醒目地总结于下：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反驳

这个“亡国三段论”挂出去请天下人痛驳，至今已经快有两年之久。说来可叹的是，大多数讨伐者们似乎只证明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有多高，水平就有多低。他们的反应大致说来有四种：

第一类是与那三段论毫无关系，专门针对本人的各式各样噪音和恶毒咒骂。文明者说老芦是玩票的外行，没资格就此专门问题发言；说老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状况一无所知；说老芦是本行的“二把刀”；说老芦“偏激”。不文明的就甚么好听的都骂了出来，使用国骂来代替标点符号，以增强说服力。

最有趣的是一位文明网友，他在公共论坛上苦苦逼我承认是“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似乎我一旦低头认罪，认下这几顶帽子，那“亡国三段论”也就立刻不攻自破，冰消瓦解。我知道那位先生也没有甚么恶意，只是脑袋封闭得太久，消受不了我这种“骇人听闻的常识”。面对他的苦苦追逼，出于同情，我有几次都想回答“是的！我就是X独分子！”好让他大获全胜而归。

第二种倒是针对着老芦的观点而来的，否认中国是帝国，认为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得比美国还好。可惜这些网友忽略了我指出的“解放”后我党在民族地区造的孽。有意思的是，没几天一位蒙族网友就在《多维网》上发表文章怒斥汉族，鼓吹“蒙独”。我当然不赞成他文中流露出来的对汉族的仇恨与鄙视。但有这种情绪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党民族政策的伟大成果。敝人孤陋寡闻，不知道美国的黑人是否也如此“偏激”，准备分家出去另过。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甚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

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甚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第三种反应是默认中国是帝国，但认为那是应该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文明落后，必须由汉族领导。而且认为我们有百万雄师驻在那里，少数民族造不了反。对此说法，我只想指出两条事实：论文明的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恐怕没有英国和津巴布韦之间的大；论煌煌武功，我们恐怕连前苏联的一个小脚趾都比不上。这两个帝国如今在哪儿呢？时至21世纪，我们中间竟然还有人效法当年欺负咱们的英国殖民者，恬不知耻地宣称汉族文明比少数民族的“优越”、“先进”。倘若这也算个道理，中国有甚么资格收回香港？难道我们的文明比人家先进？

第四种反应是认为老芦建立联邦的建议是速祸之道，只能导致中国解体，陷入内战。虽然此论仍然毫未批驳我的基本观点，好歹也算是一种批驳。不过，如果我那个三段论成立，国家解体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我们可以作的，只能是努力化解民族仇恨，将帝国和平过渡为民主的联邦，避免将来中共突然垮台后造成政治真空，触发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民族间的大屠杀。

直到最近《海纳百川》网成立，为网友们提供了一个理性讨论的园地，我才见到了一些水平较高的质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一类网友说，古代中国也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但一个朝代动辄延续几百年，可见我“凡是用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都要崩解”的说法不能成立。

第二类网友说，“亡国三段论”不错，但忽略了时间坐标。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延续几百年，我们现在何必操这个心？

第三类网友同意我那个三段论，但认为我以联邦取代帝国的主张是自杀，只能加速中国解体。与上面第四种反驳的提出者不同的是，这类网友建议咱们应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使当地民族在当地也变成少数。这样，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汉族地区，多民族的帝国也就成了单一民族的国家。

和过去那些毫不讲理的辱骂不同，这些质疑都是理性的，全都瞄准了本人的观点而不是堕落到去潜心研究论敌的人品。能和这样的读者心平气和地讨论，是老芦的荣幸。要答覆这些质疑，就得从那个“亡国三段论”的出发点说起。

“王道”与“霸道”

上面所说的第一类网友提出来的疑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确，古代中国确实是以暴力建成的多民族国家，但动辄就延续几百年，直到人口严重超载或外敌入侵倾覆了它为止。这是怎么回事？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统治术的设计，反映了老祖宗的聪明。儒家在汉代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偶然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用法家主张的严刑竣罚治国，企图用暴力维持一个历万世而不朽的伟大帝国，结果二世而亡，成了历史上历时最短的朝代。这个教训一直为后来的统治者记取。此后他们采用的治国之

道，便是汉宣帝说的“霸、王道杂用之”，亦即文武两手。文的一手（亦即“王道”），是用孔孟之道去给子民洗脑，把每个人的“反抗基因”阉割了，变成只知服从权威的俯首贴耳的奴才。这就是所谓的“教化”；武的一手（亦即“霸道”）即用武力镇压去慑服反抗者。它只起到辅助和补充的作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一般只在王道失灵时才使出来。这就是“崇文”与“宣武”的真实涵义。因此，秦朝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确是用暴力建成的，但并不纯粹靠暴力维持，主要还是靠“德治”，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德”服人。

必须承认，对统治者而言，这是一个伟大发明。除了近现代的苏联帝国，外国的帝国建立者们似乎从来也就没想出这聪明的一手，以此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而苏式共产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空前成功，在我看来也主要是靠这个中国特色。老祖宗发明的王道，在毛时代变成了“思想改造”和“用毛泽东思想育人”，一直发展到后来的“三忠于四无限”，而霸道则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手被伟大领袖发挥得淋漓尽致，而那时的中国也的确成了“万方乐奏有于阗”的空前团结的多民族国家。

这里面的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光动用武力恐吓镇慑，当然行之有效，然而正如伟大领袖指出的：“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以力服人只能让人口服心不服。被镇压恐吓者虽然一时不敢起来反抗，但怨气无从宣泄，仇恨便只会越积越深。等到中央权威削弱之日，便是变生大泽乡之时。如果人民反抗造成全国大乱或是极度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边隅地区就一定会趁机独立出去。直到一个新生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形成，再用武力去把那些失去了的地域抢回来。从历史上来看，这就是反复在中国发生的事：在历史上，越南和朝鲜就曾为中国多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因此，为了维持帝国，推行“教化”就不能不是第一位的大事，而这就要求高度的民族融合，让少数民族汉化，起码得“化”到能懂汉语，可以接受“再教育”的程度。老祖宗们确实也在中国腹地做到了这一点。从种族的角度上来说，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五胡乱华”不必说，就连中东来的白人甚至犹太人也让咱们“化”在那酱缸里了。英国人呤唎曾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观察到中国人在外貌上的歧异，并指出李秀成的面孔看上去颇像白人。

但“化胡”的前提是让他们和腹地的汉人拥挤地生活在一起，而这对北部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纵观历史，清朝以前，老祖宗们从来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倒不时被北方的勇猛凶悍的蛮子打得头破血流，只是在对付西南部的非游牧少数民族比较成功。因为那些地方汉族稀少，无法推行有效“教化”，老祖宗们便想出了类似西方今日联邦的政治设计。看过《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读者想来都记得，诸葛亮征服南蛮后，文武百官曾就如何治理云南辩论过。诸葛亮最后决定朝廷不设官，作出的论证大概可以算是最早的联邦制合理性论证的经典范例。此后一直有所谓“流”与“土”两种政策之争。所谓“流”，就是由朝廷派官，像内地一样地实行统治；而所谓“土”，就是让当地的土司去统治，中央政府不加干涉，只要求该地区名义上接受朝廷的君临（reign，not rule）就行。

因为这“化胡”的成功，所以以文明而论，古代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汉族国家，直到我大清入主中原，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大清统治者的高明，是突破了以孔孟之道作为唯一“教化”方式的既定框框，把这“教化”推广到“旁门左道”上去。不管白猫黑猫，能让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就是好猫。于是大清便在实际上成了一个一国多制的联邦：蒙古由当地王公统治，西藏由活佛统治，真正实行“流”、由朝廷命官治理的只有汉族地区。除了新疆的回

部一直是个问题，每个民族基本上都能崇拜自己想崇拜的东西：汉族有孔孟之道，蒙藏有藏传佛教，而大清皇帝为了维持民族和睦，所有这些教都信。于是汉族官员统统成了天子门生，而蒙藏的活佛们也在北京备受礼遇。北京的雍和宫不必说，就连承德也有个“外八庙”。这种气度恢宏的大手笔，也只有不受愚昧虚骄的大汉族主义影响的少数民族皇帝才能施展出来。清朝之所以是中国疆土最辽阔的时代，也是民族政策最成功的时代，我看和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这一点分不开。有趣的是，“汉家制度，霸、王道杂用之”本是汉人的发明，却在“蛮子”手上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

可惜，王道为主、霸道为辅的统治方式的实施前提，是国家必须是一个封闭系统，不受系统外的“王道”或“霸道”影响，才能去推广全民洗脑的“教化”或“思想改造”。大清统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当时在地理上的孤立，而毛泽东的空前而短暂的成功，也正是因为他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密封罐头。等到国门一开，这一套就再也行不通了，官方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思想化作了一钱不值的蛛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教材”，何以“化胡”？而如果“化”不了“胡”，“王道”那手没有了，就只剩下了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此而能长治久安，岂非痴人说梦？

后毛时代的统治者们想出来的弥补办法更使形势雪上加霜。他们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毛思想，用谁也没见过的黄帝的照片，悄悄地换下了天安门上的主席像。这么做确实能唤起汉族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心，刺激出他们对政府一时的效忠之情。可惜，这所谓“民族主义”也者，其实是“汉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中让汉族同胞血液沸腾的“民族骄傲”，根本就打不动少数民族的心——人家跟你那四大发明有何相干？知道张衡、祖冲之姓甚名谁？

不仅如此，这“民族主义”宣传反倒对他们施加了强大的离心排斥力。毛泽东思想能“化胡”，是因为它只讲“阶级”，不讲民

族，所以放之各族而有效。可这“民族主义”的强调重点恰好是“民族”，等于是鼓吹“汉族优越”论。在一个重组的大家庭里，作家长的如果只吹亲生儿女怎么怎么了不起，非亲生的儿女心里好受吗？更严重的是，这“民族主义”思潮，使许多汉人变成了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不将少数民族视为“亚人类”，起码也要把人家看成是二等公民。这种种族歧视态度，日后必将遭到惨酷报应。不幸的是，这报应不会落在那些远在内地甚至国外的法西斯主义者头上，而只会落在千千万万边疆汉族人民的头上。

于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唯一手段，便只剩下了两手：武力威吓和金钱收买。我党现在的民族政策，就是一面以铁腕镇压少数民族骚乱，一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倾倒金钱，想通过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来赢得他们的欢心。这种作法在西藏特别明显，全国哪个省接受的中央财政资助也没有那儿的多。但如果这能奏效，老美也不会被人家从越南和伊朗赶出去了。论钱包的容量和出手的大方，有史以来还没谁能和那个金元帝国比。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金钱只能买来仇恨。当初咱们举全国之力，如孝敬父母似的赡养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后却买来了对方的刻骨仇恨。

中国需要民族和解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危机是何等严重。外部危机是“民族自决”的文明世界共识已经越来越普及，而中国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封闭系统，“境外敌对势力”如达赖集团特别是中东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声音再也无法隔断。总之，今日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时代，强大的帝国崩解于旦夕之间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简直就成了一种时代潮流，前苏联和

东欧的一些国家分崩离析就是证明。这种时代潮流，构成了帝国覆灭的“国际大气候”。

比起外部危机来，更严重的是内部危机。这首先是意识形态危机，它导致各民族失去了原来由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的黏结力。其次是国家潜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诸如土地和资源再也无法承受的人口压力、国有经济垮杆、下岗工人已逾千万、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而形成“盲流”大军、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引起的民怨沸腾……。总之，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无处不显示出王朝末年的一切迹象。一旦战争、大饥荒、严重经济危机等危及中央政权生存的事件爆发，民族间积下的血海深仇就要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而无辜的广大汉族人民，特别是居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人，就得为中共偿债，变成任人屠宰的羔羊。

因此，那种“帝国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乐观估计，我认为并不符合实际国情。就算帝国能撑过我们这辈子去，那积累下来的报应只会更惨。我们总不能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总得为子孙后代想想吧？

那么，我们能不能按某些网友建议的那样，趁帝国还没垮，赶快大量向边疆移民，把当地少数民族稀释到安全程度呢？在我看来，撇开道义不讲，光从权术上来说，这方略也毫无可行性。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确定稀释到何种地步才到达安全值。据我所知，塞族在前南斯拉夫诸民族人口最多，但照样没能避免血腥屠杀。因此，要保证少数民族不起来造反，必须做到三条：第一，汉族人口比例必须达到压倒比例，即数量得超过当地所有少数民族的总和。第二，汉族必须全面占领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只是集中在大城市等几个容易被包围的点上。也就是说，这种占领，不能是唐朝对西域的那种点和线状的占领，而是面状占领。第三，必须确保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交通线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使当地汉族在

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得到内地的人力物力增援。而这最后一点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存在，但这个前提本身就否定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即内地发生动乱、中央政府丧失了权力。

依我看，以上诸要求中，咱们连一条都做不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蒙、藏、疆。内蒙似乎不是太大问题，因为当地汉族人口比例似已超过蒙族，而且民族融合也比较理想，蒙汉通婚率大概只低于满汉通婚的比例。多事之区是藏与疆。这两个地区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不但基本没有像内蒙那样的民族间通婚，而且汉族极度鄙视当地民族，引起当地民族的痛恨。更严重的是，新疆当地民族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很容易受到境外原教旨主义者煽惑而以恐怖手段争取独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的恐怖分子在国内搞过多次爆炸案，甚至在北京都得手了几次，而且伊宁地区数次发生骚乱。西藏就更不用说了，大部分藏民不但在59年起来武装反抗中共统治，在后毛时代该地区也多次发生骚乱，以至一度实行军管。凡是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情稍有点认识的人都能想见，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这两个地区首先就要独立。

难是难在这两个地方都是不毛之地。新疆除了少数地方外，基本是寸草不生的大漠，谁愿移民上那儿去？当初我党动员内地支边，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到了那儿搞军垦，结果“献完青春献子孙”，不但自己一辈子得呆在那个鬼地方，就连子孙都永无出头之日。后毛时代便再没人上当。前段三峡移民，动员人家上那儿去，结果人家领了安置费，上那儿看一眼又跑回内地来作盲流，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确，“人往富处走，水往低处流”乃人之常情。不到繁华城市去淘金，却去戈壁滩上受苦，这种流动谁愿干？从长远来看，中国的人口流向跟江河也差不多，因为西高东低，西贫东富，于是便江河滔滔，盲流滚滚，尽皆“大江歌罢掉头东”。

西藏的问题就更严重。大多数汉人根本就没法适应那儿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汉人上那世界屋脊上去永久定居，其希望比动员人家去新疆落户的希望还渺茫。后毛时代进藏的汉人主要是商人，打的并不是永久移民的主意。

这些无情的现实，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汉族不可能变成这两个地区的主要居民。咱们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让汉人集中住在拉萨、乌鲁木齐这些大城市，而那些地方在全国大乱时便成了必然陷落的孤岛。那儿居住的汉人越多，无辜的牺牲者也就越多，如此而已。

其实，少数民族对汉族移民非常敏感而且反感，新疆闹了几次事，理由就是反对汉族向那儿移民，达赖也多次抗议汉族移民。所以，移民不但是杯水车薪，反倒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如果真要实行汉人对边疆的全面占领，恐怕立刻就要激起民变，不光是少数民族，就连被强制移民的汉人，恐怕也要起来反抗。

退一步说，假定我们成功地大量移民，把边疆少数民族稀释到了安全程度，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在这方面，科索沃的教训值得注意。如所周知，阿族在当地是多数居民，但如果不是北约插手，恐怕早就统统作了米洛塞维奇“种族净化”政策的牺牲品。新疆的少数民族如维族和哈族，和周围邻国居民在种族、宗教、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很高。当地居民收看收听的都是境外的电视电台，看的读物都是境外流进来的。就算汉族全面占领了那块地方，如果全国大乱，人家为了赶走和他们没有甚么文化联系的汉人，完全可以宣布和邻国合并，使汉族立刻成了少数民族，延颈以待境外开进来的“民族解放军”的屠宰。

这就是现实，不管咱们喜欢不喜欢，有没有汉奸出来捅破那层窗户纸，它都照样存在。采取鸵鸟政策，使用不承认主义，只能为

来日的惨祸积蓄大难。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来解开这一团乱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补救办法便是实行民族和解，采取措施，逐步地、平稳地化帝国为联邦，让那些地区实行真正的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只派出驻军负责国防和治安，剩下的一切事务由人家自己去作主。这里的关键是民族自治，并不一定非要用“联邦”这个名称，在实施也必须非常慎重，采用逐步过渡的平缓办法，否则一定会反而触发大乱。

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得迅速放弃祸国殃民的“民族主义”宣传，唾弃在汉族中盛行的种族主义态度，放弃形形色色的过时的“王道”与“霸道”，向美国学习，用真正先进的生活方式和繁荣发达的国民经济来提供吸引力，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产生民族间的内聚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各民族的大熔炉。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算最后努力不成功，国家解体了，也能极大地消弭、减轻民族间疯狂屠杀的惨祸。

2002年2月11日

令人绝望的汉族的愚昧

据网人“老金在线”转述他人发现，十三经中没有“真”字，说明古人根本没有这个概念。我没有老金博学，不过在我模糊印象中，似乎老祖宗连因果关系都没本事参悟出来。这“因果”律似乎是从印度进口来的，首见于佛经。光这一点，就足证许多国人的思维能力的低下。

当然，老芦不过是个毫无学问、浅尝辄止的自学老年。以上所说，或许不堪识者一击。我敢肯定的是，许多现代中国人也不懂因果律。眼下ＸＸ先生引起的风波就是一例。

上周末我第一次在《说道》见到某位蒙族网友ＸＸ先生的文章，非常非常地钦佩。因为人家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主张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南乡子的土法西斯主义。少数民族能有此襟怀，不能不让老芦这个汉族钦服。不料昨天见到转贴过来的他的文章，态度却非常激烈。虽然人家的根本立场没变，但却流露了对汉族的轻蔑与鄙视，以致让多数汉族读者看了都心里不舒服，有的论者居然因此放弃了民主理想，主张对民族地区实行专制！

老芦死也想不通这些论者何以看不到那再彰明较著不过的事实：那位先生的态度骤变是果，网上那些法西斯壮士的侮辱是因。大而言之，网上见到的那些“Ｘ独”分子的激烈论调，又何尝不是咱们的“民族主义”激起来的回应？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容忍不了那些法西斯国贼的侮辱：斥人家为“奴”，为“猪狗”，诬蔑人家“文化落后”，是“野蛮人”……。我早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为了上海外滩公园上的一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咱

们仇恨帝国主义快一百年了。将心比心，我们如此侮辱少数民族，还怎么能去指望人家拥抱咱们？看不见那原因，却只看得见人家的激烈反弹，为此大幅度修改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拥护“民主”“飞跃”到拥护专制上去，我真想不出世上还有比这更愚昧的事来！

不幸的是，这种态度不是个别的。我在新疆的时候，特别为那儿的汉族担忧，觉得他们迟早要死在自己的愚昧上头。汉族与当地民族特别是维族的对立情绪特别严重。汉族只看见人家的恐怖活动，看不见自己的傲慢态度正在为那些活动火上加油。随便跟那个汉族谈起来，对方流露出来的对维族的轻蔑与鄙视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我常常想，哪怕是以傲慢著称的 19、20 世纪的大英殖民者，对殖民地土著智力的蔑视，恐怕也到不了我那些汉族同胞的水平！

最可笑的是汉族愚昧到根本就没能力了解人家的心态，这在网上看得特别明显。汉族打人家的番天印，就是说人家是 X 独，破坏祖国统一。可你怎么就不想想：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您那“祖国”。世上有的人不但不认同，而且还认为“统一”是耻辱。对这种人，您那魔术武器有什么用处？如果“破坏祖国统一”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罪，那前英殖民地的独立解放战争又如何说？

作为汉族一员，我内心当然盼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上网发言，就是为的这个目的。但捆绑不成夫妻，一面鄙视人家，一面要人家效忠，天下焉有是理？可惜就连这么个简单道理，许多汉族就是死都不明白！

那位蒙族网友和某些其他论者指南乡子是日本间谍，因为只有日本人才会盼望中国变成种族屠杀的修罗场。对这种无根据的指控，老芦不敢附和。我可以说的是，其实少数民族同胞对敝族的愚昧估计过低。有如说那些人是敌国的间谍，莫如说他们是愚昧糊了心窍而已。如今网上不论左中右，尽在干“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专门拆自己的台。所以，“民族主义”“爱国志士”们生

怕国家不陷于战火；“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们专门用毛共那套吓跑中立的潜在同情者，让人家以后一见“民主”二字便作三日呕。在没他们那么蠢的人看来，这些奇怪举动当然只能用“阴谋论”解释，是用心险恶的间谍机关的杰作，其实它们不过反映了汉族那令人绝望的愚昧而已。此中道理，我已经在 《关于“第五纵队”的困惑》里讲过了。

2002 年 8 月 6 日

谈某蒙族网友的“盛世危言”

蒙族网友ＸＸ先生的长文，说了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可咱们的许多读者就只能看见他对汉族不友好的态度，以及作者本人自称的共产主义倾向。

要挑那篇文章的毛病再容易不过。首先那贬低汉族和汉文化的说道就根本无法成立。尊重历史的人都得承认，在古代中国，汉族确实是众民族中文化最先进的一个民族，用少数民族中的个例如蒙哥、康熙来推翻这一事实根本说不过去。如果不是因为汉文化先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诸如北朝、五代、元、清根本就不会汉化。何况他举的个例也大大的夸张了，例如说康熙的数学造诣跟莱布尼兹差不多。此话不知有何根据。据我所知，康熙的数学知识全是西方传教士教的，最高就到掌握对数的水平。不管怎么说，此二人在数学史上籍籍无名，就算他们个人的数学造诣真有那么高，那也在当时的学术界毫无影响，客观上等於不存在。

尽管有这些一目了然的错误，那文章仍然是振聋发聩、醒世骇俗的。何也？它说出了许多汉族没有胆量和智力正视的难堪的事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一统”在意识形态上的穷途末路。

这第一个事实就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在历史、法律、道义上缺乏根据。中国现在的幅员，基本上是从清帝国那儿沿袭下来的。在清以前，除了唐代一段短暂的时期曾对西域进行过线状占领外，汉族从未领有过北满，新疆、西藏。清帝国崩解之时，汉族作为帝国内的一个民族，有权争取自己的独立，但毫无法理权利去接收满、蒙、藏那些地位比汉族地区还高、从未被汉族实行过

有效统治的民族地区。因此，所谓中华民国，从降生那天起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沿袭民国版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继承了这法理上的先天缺陷。

这第二个事实乃是现政府背叛共产主义使得多民族国家失去了意识形态黏合剂。论述苏东帝国的崩溃的文章可谓多矣，可我还从未见到过谁有ＸＸ先生这样的洞察力。我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指出，长治久安的帝国必须为各民族提供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共产主义理论作为各民族平等的共同国教，的确在历史上一度起到了这个粘合剂的作用。如今当局抛弃了这套东西，就等於扔去了意识形态的“桶箍”，那桶子的散板就是迟早的事。

最尴尬的是，民主国家没有什么官定的意识形态。所以，民主总是和“住民自决”连在一起的。你要搞民主，就得尊重人民的自由意愿，政府无权充当教会，提出个政治宗教来让各民族崇拜。所以，共产帝国开始民主化之日，就是国家分崩离析之时，这一点已经为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

这当然不是鼓吹“民主亡国论”。在我看来，即使中共不搞民主化，也已经并将进一步失去了少数民族的心。这里危害最大的就是眼下的替代国教“民族主义”，这套东西或许可以煽起愚昧汉族的仇外情绪，但它更有效地离间了各民族关系。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不出世上还有比这种对自己脚背放枪的更蠢的事。不过这其实也怪不得当局。马列主义既已破产，以汉族的低下的想像力和政治智慧，你让他们除此之外还能想出什么玩意来救命？

第三个事实则是告诉土法西斯主义者他们那套从国外抄来的狗屁理论行不通。你要学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先得证明汉族是个血统纯粹的高贵民族。不幸的是，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我大汉民族乃是个混血混到一塌糊涂的大杂烩。汉族其实是连自己祖宗都不知道是谁的混血儿，十来亿人居然分享百多个姓氏，其中还有“令

狐”、“独孤”、“慕容”等泄露消息。相比之下，倒是少数民族的血缘纯粹得多。世上哪有“杂种法西斯主义”？兀的不让人笑掉后槽牙！

第四个事实是最让人痛苦的。毋庸讳言，在古代，汉文明的确是周边诸民族中最先进的。正因为此，汉文化作为一种融合剂，把无数次入主中原的蛮族同化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先进的汉文明将多个民族融和在一起，形成了后来这个称为“汉族”的文化共同体。可惜盛筵不再，如今汉文明根本就不是什么先进文明。和西方文明相比，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始、消极、落后的文明。我在隔壁答易明先生的文章中说，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可以看成是一部西化史，而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不过是一种文化殖民化运动。就连如今的汉语都成了夹杂了大批西方语言成分（单词、句法、语法等等）的西崽式语言。正如ＸＸ先生指出的，如果国内几乎每个汉族学生都在那儿头悬梁、锥刺骨地学英文，考托福鸡阿姨，争先恐后地跑出国门去，那么谁还能指望落伍的汉文明对少数民族发挥过去那种吸引力？

这第五个事实是最让人痛恨的。那就是ＸＸ先生之所以写出这种情绪激烈的文章来，完全是给那些土法西斯国贼给刺激出来的。最令人愤怒的是，中国的事，有如说是坏在政治家手上，莫如说是坏在愚民手上。那些网上愤青其实不过是一小撮智力低下的懦夫。论胆气，你就是递把刀子给他们，他们也没那胆量杀人，可就是这些人 911 时在网上狂吠，抹黑了中国的国际形像，如今又在网上任意自慰，肆意侮辱少数民族。这些人只图自己发泄得痛快，到头来却要让边疆汉人用鲜血为他们那张臭嘴偿债！

最后说两句自己的看法。我坚定地认为，不管咱们主观意志如何，中华帝国迟早要崩解。所谓联邦制，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边庭流血如海水”的民族惨剧不要在我有生

之年发生。在此呼吁对少数民族怀有偏见的中国人和华人，你们能对汉族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民族问题上住嘴。如果你们实在要开口，请先去边疆民族地区安家落户。

2002 年 8 月 6 日

外蒙的启示

前段在网上看到某些人说外蒙古想回归中国，不禁啼笑皆非。稍微知道点那个国家的情况的人都明白，外蒙人特别痛恨鄙视汉人（也就是他们说的“中国人”）。人家不来认领内蒙就算上上大吉，还指望人家来“回归”！

奇怪的是，外蒙人对俄国人却一往情深。他们的文字是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重新设计的新蒙文，学者专家都基本上是苏联训练出来的，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军队组织，处处都留下了老大哥的模式，就连首都乌兰巴托也点缀着许多苏式建筑。从政府官员到学者，普遍的情绪是亲苏反华。60、70 年代的“反华大合唱”中，“蒙修”从来是老大哥最忠实的小喽罗。

更奇怪的是，苏联在东欧也搞这套，“无私的兄弟援助”比对外蒙更慷慨，然而金钱只买来仇恨。你只要跟东欧的学者聊过天，立刻就能发现这仇恨竟然延续到了今天。如果不是苏联坦克的威慑，东欧瓦解根本用不着等到 90 年代。

这表面上的矛盾非常耐人寻味。无论是从人种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苏联人和东欧人特别是其中的斯拉夫人才是一家子，和蒙古人倒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可东欧人处处对苏显示离心倾向，而蒙古人对苏联人却谈得上格外亲，对同为蒙古人种的汉人却只有满腔的仇恨和鄙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发现了这个奇怪的现像后，我琢磨了这个问题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文明的吸引力可以打破种族间的障碍。不管东方西方，人在本质上是势利的，谁也看不起弱者、穷鬼、没文化的人。比起

游牧民族的文化来，俄罗斯文明当然灿烂辉煌到无以复加，当然要对蒙古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东欧那些国家从来对俄罗斯文明怀有偏见，总认为自己是先进的欧洲的一部份，而俄国不过是个由大量鞑靼人组成的亚洲国家而已。当年有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笑话最说明这个问题。据说有人上书中央请成立海军部，其他人斥责道：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陆国家，连海都没有，成立什么海军部？那人说，那苏联连文化都没有，凭什么要成立文化部？

因此，文明的吸引力的有无，构成了东欧和蒙古对苏联的不同态度。类似地，“文明吸引力”也可以解释和中国一度同文同种的越南人的亲苏反华态度。该国为了统一，不惜让国家被炸回石器时代，然而美国人一走，越共立刻就将金兰湾献给老修作海军基地，证明那“民族解放战争”不过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这理论同样能解释西藏人为何迅速抛弃满清皇帝和后来的民国，抱上英国人粗腿。我模糊记得，连 13 世达赖都变成了卖身投靠英国鬼子的藏奸。

不仅如此，这理论还能解释同文同种的台湾人对统一的抗拒心理。我想，要在台湾做个民意测验，问问当地人民究竟是喜欢中国还是喜欢美国，恐怕后者绝对是压倒多数。的确，西方谈论台湾的书籍常说，论生活方式，台湾人对美国人的认同远远超过了对大陆人的。至于大多数香港人宁愿作大英皇民而不愿回归，则更是公开的秘密。

明白了这一点，似乎给咱们这个垂死的、腐朽的、摇摇欲坠的、朝不保夕的老大帝国带来了一线希望。我过去总觉得，因为各民族人种不同和文化缺乏同源性，要长期维持中华帝国不垮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看来希望还是有的。那就是埋头不管他人闲事，把中国建设成个经济繁荣富强、文化高度繁荣的国家，靠提供先进的生活方式来提供民族的内聚力。最起码的，大陆人的生活品

质必须高出于周边国家诸如哈萨克斯坦等国，决不能输在和邻国的“和平竞赛”里。不难想像，如果大陆远比台湾富裕，统一的障碍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大，反过来，如果外蒙生活水平赶上并超过内蒙，则“蒙独”就会变成一个现实问题。今天“蒙独”之所以还没“疆独”那么严重，说穿了全靠内外蒙经济繁荣度的对比。

这当然不是鼓吹“经济决定论”。经济发展当然是生死攸关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素。但凡有点血性的人都不屑于接受嗟来之食。最起码的前提，是汉族必须迅速变得聪明起来，脱下那层沐猴而冠的痞子皮，学点泱泱大国国民应有的心胸气度。说实话，就凭中共以前作下的那些孽，咱们再让人家痛骂也是应该的。光一个“内人党”、一个“西藏平叛”结下的血海深仇，人家就是像中国人仇恨日本人一样仇恨汉族，咱们也只有乖乖道歉！有什么道义资格去“反对仇汉主义”！如果这“仇汉主义”靠“反对”就能消除，则“美帝国主义”也能靠口号打倒了。只怕这种“反对”越搞越造出大批的仇汉者来。如果日本人也来个“反对仇日主义”，咱们又将有什么感想？中国人之缺乏认罪忏悔精神，于兹可见一斑。

以上说的，当然只在理论上可行，现实是无情的，因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共是不可思议的愚蠢。当务之急，是当局必须立刻停止干对自己脚背放枪的蠢事，迅速停止所谓“民族主义”宣传，立法严惩在公共媒介上宣扬大汉族主义的蟊贼。在民族地区，必须把是否有大汉族主义这一条当成招工招生提干的重要淘汰标准，彻底把这祸国殃民的东西搞臭。

坦率地说，即使做到了这些，恐怕也是缓不济急。帝国的垮台是必然的。咱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向前苏联学习。鄙人认为，前苏联算得上成功地处理了复杂的民族关系，所以崩解之后没有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上次开会碰上了一位漂亮的乌克兰姑娘，我问她独联体会不会有朝一日又变成一个统一国家，她坚定地说不可能。但她一点也不懊丧，反觉得这是应该的。她告诉我，虽然她父母都是俄罗斯人，但乌克兰独立后她们全家并未遭到歧视，让我羡慕不已。的确，如果中国以后崩解了能像今日独联体那样太平无事，那就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不过如果那些在网上肆意辱骂少数民族的壮士不立刻住嘴，则我看这前景也不过是个渺茫的白日梦。

2002 年 8 月 6 日

再谈某蒙族网友的文章

那天看到ＸＸ先生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作，情不自禁跟贴喝彩，由此引出了网上关于民族问题的辩论，这位先生因而光临本坛。我对他的文章的理解以及自己对民族问题思考结果的阐述，已经在前文中说过了，但仍然有遗漏和语焉不详之处，这里再扼要补充说明一下。

首先，拙作《“盛世危言》文遗漏了ＸＸ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那就是所谓华夏文明并不是汉族独自创造出来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汉族的贡献固然是最主要的，但少数民族也功不可没。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古代汉族连椅子都没能耐发明，一直到唐代都还席地而坐（这风俗让日本人学了去，一直保留到今天），所谓“胡床”（又名“交椅”，即如今叫的椅子）大约是在宋代才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更重要的是，古代汉族的基本乐器除了古筝、琴、瑟之外，便只有简单的打击乐，如今咱们国乐的主力乐器例如琵琶、笛子、二胡统统是少数民族的贡献（据说前段考古发现汉族制作的笛子，但那毫不证明它曾在羌笛传入前在汉族地区流行过，充其量只能算成是失传发明）。甚至就连葡萄酒（葡萄这两个字其实是外来语音译）、胡椒一类东西都是从西域传进来的。蒙古人在华夏文明中打下的印记就更不用说了，北京地名如“北海”、“中南海”的“海”字其实是蒙古话，据说就连“胡同”都如此。老实说，我怀疑李约瑟那书报导的有不少其实是少数民族的发明，例如马镫大概就是这样。在古代西方，“中国”其实常常是“远东”的同义语，古代西方人根本就弄不清中国的准确疆域。例如俄语的

“中国”其实是“契丹”。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中国人把那本书揭示的所有的技术发明都算在汉族头上未免失之武断。

指明这一点，我觉得有助于消除愚昧的大汉族主义心态。如同汉族本身是一个血统极度混杂的多民族融合体一样（元统治下的第三等公民“汉人”其实是血统上混融了契丹、女真、汉族的前金国国民，只有第四等公民“南人”即前南宋国民的血统还相对纯粹些），华夏文明也是多民族文明互相融合形成的，并不是由一个什么血统纯正的伟大的汉族独力创造出来的。如果哪位大汉族壮士对此有所怀疑，请他在家里挂一幅北海白塔的照片（其实连塔【浮图】本身都是从印度传进来的）。

我那些文章没说到的更重要的一条是ＸＸ先生提出来的“换位思考”。我觉得这是民族和解的前提，也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将心比心”，即放弃自己头脑中的固有偏见，把自己放到人家的位置上去设身处地地看问题。能否做到这点，我认为是汉族是否获得了泱泱大国国民应有的气度和心胸的标志。

现在的问题是，从整体而言，汉族只记得洋鬼子的“华人与狗”，自己却可以放肆侮辱少数民族。如果我们不学会这种“换位思考”，则虚骄祸国的大汉族主义永远无法根除，中国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总而言之，我觉得，要实行民族和解，汉族必须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彻底与大汉族主义决裂。这绝对是实现各民族团结的前提，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是空谈。

我没提到的ＸＸ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主张是，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和习惯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南乡子的“强制同化”的法西斯主张，在道义上极度无耻，在理论上彻底错误，在实践中毫无可行性，只会激起少数民族的暴力抗争，导致国家提前进入内战血海。这种祸国主张，和文革中当局逼迫回民养猪一样丧天良！而且，随便哪个头脑没有错乱到极端程度的人都看得出

来，要逼迫每个哈萨克牧民放弃自己的母语，放弃方便的拼音文字，去学会复杂的表意文字究竟可行不可行。要抓住不断流动的牧民教会汉语汉文，这种事大概只有疯子才会想得出来。我看南某人不如干脆提倡把他们全部杀光，那还更有点“可行性”。就算我们强迫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忘了自己的母语，学会了汉话，那又怎么样？难道台湾人和大陆人不是同文同种？难道“爱尔兰共和军”使用的不是英文？

ＸＸ先生一个重要论点我已经指出过，这里再度重复：所谓“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完全缺乏历史和法理上的依据。在清帝国崩解时，汉族建立的中华民国根本就没有权利去接管汉族从未实行过有效统治的民族地区诸如北满、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正如越南无权在法国人撤走后去接管同为法国统治过的柬埔寨和老挝一样。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是，所谓“Ｘ独”并不是什么吓人的打神鞭。如果这玩意有效，那么成吉思汗的现代子孙们也可以去认领从多瑙河开始，历俄国、波斯直到中国的广袤领土，至少这些地方人家曾经有效占领并统治过（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达四百多年，比大元统治中国长多了）。

这当然不是鼓吹Ｘ独。我觉得ＸＸ先生指明这一点，无非是解除那些愚昧的土法西斯的精神武装。不幸的是，连中共当局都迷信这套“历史依据”，硬要把文成公主的下嫁说成是中国对吐蕃的领有。这种笑话连希特勒都没有闹出来过，人家并没因为英国王室来自于德国便宣布大英乃第三帝国的神圣领土。

作为汉族一员，我当然希望祖国统一能够维持下去，上网呼喊，就是怕帝国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土法西斯和愚昧政府联手弄垮了，导致南斯拉夫的惨剧在 960 万方土地上大规模重演。我想说的无非是这么一句话：“历史依据”一分钱都不值，国际社会从来只尊重现实利益和既成事实。要维系国家统一，靠的不能是这种只能

煽起大汉族主义祸国思潮的诡辩，靠的只能是各少数民族的心甘情愿。连千年前的古人都知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何况是生活在“住民自决”已经成了时尚的当今世界上的现代中国人？

正如ＸＸ先生的大作表明的，少数民族其实也希望国家统一，但这种心理根本不是因为拜服在咱们的“历史法理依据”或者举世无双的汉文明之前，而是本能地害怕帝国崩解带来的大祸。如果说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惨剧有什么正面意义，那就是它向全世界表明民族矛盾可以演变到何等惨烈的地步，可以给普通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杀身大祸。因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管是什么民族，都必须竭尽全力预防未来中国出现类似的大难。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实行民族和解，然后逐步把中国建成一个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得到充分尊重、能够充分发展的和平、宽容、人道、民主、繁荣、富裕的联邦国家。只有让少数民族真正从心底爱这个国家，觉得独立出去是一种沉重损失，而不是什么为获得民族尊严所必须做出的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变成长治久安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

2002 年 8 月 11 日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

——驳刘国凯先生

民运人士刘国凯先生最近光临本坛，推出了妙文《对芦笛的“中华民国从降生那一天起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论之批驳》。老芦先看了刘先生贴出的谈中华民族的相关文章，虽然水平有限，但持论态度还算公允平和。受此鼓舞，这才决定来拜读一下他那篇长文，不料一看大失所望：敢情刘先生流亡海外这么些年，居然一点现代文明人的知识都没学到，还是当年那个写大字报的水平啊！批驳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诽谤的那段我已另作文章贴出。此文谈谈我那“讨伐中华民国和华夏民族”的叛国罪。

一点预备知识

该文首先打动我的是刘先生似乎看不懂人家的文章，凭自己的错误理解就放言高论，而且底气还不是一般的粗，不能不让我想起当年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红卫兵来。有鉴于此，我这里写个一目了然的提纲，先向刘先生介绍一点预备性的现代文明知识。

1、“历史法理依据”是鼓吹“大一统”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的实质是强调某块领土自古以来就是某个国家的，所以现在该国有充分的权利治理。该理论完全无视该地域的民意，服务对象完全是统治者和（或）多民族国家中的某个强势民族，在本质上是违反民主的，在实践上从来是沙文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惯用的工具。

2、在国际政治的实际操作中，这“法统”论不值一分钱。国际惯例是尊重既成事实，根本不管你这个民族或国家过去统治过什么地方。例如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本是一个国家，后来孟国独立后先未获得国际承认，现在不也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之一？前苏联和东欧出现的那些新独立国家就更不用说了，统统都被国际社会按国际惯例承认了下来。这种国际惯例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否则如果“历史依据”能算数，则如我所言，今日内外蒙可以联手去认领从多瑙河起直到中国的广大领土了。如今许多国家的历史上的国界都是重合的，奥斯曼帝国当年几乎吞并了整个东欧，难道那能说现代土耳其人有收复失地的权利？

3、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赖以存在的唯一的“法理依据”不是历史的，而是现实的，这现实依据就是现在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在实行有效统治。为了维持起码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便不能不尊重这一现实。这一现实可以让中共当局有权镇压境内的暴乱，但对不受当局控制的台湾则不在此例。所以，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为理由去“解放”台湾完全是笑话，正如哪位蒙族兄弟要去“解放”莫斯科一样荒唐。

4、更可笑的是，中共当局宣传的许多“历史依据”完全是捏造的。如我所说，汉族从来就没有统治过西藏、内蒙、北满以及新疆的大部份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的“法统”是从中华民国那儿延续下来的，根本就经不住推敲。下文将对此点作详细说明。

5、尽管如此，这并不是说中共现政府丧失了统治全中国的法律资格。上述第 3 条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现实依据比什么“历史依据”更有现实意义。说“中华民国缺乏治理民族地区的法理依据”更不是“中华帝国必将崩解”的论据。刘先生毫未看过我的文章，却能根据读过的片言只语作此“飞跃推理”，进而“证明”我是当代“张学颜”、“方从哲”、“梁庭栋”。这种毛共文字狱功夫，

实在是让人瞠目结舌。老芦这汉奸帽子是拥共的土法西斯扣上去的，不料却由民运人士来作“理论论证”，倒也难得之至。只是在下这里要斗胆提醒刘先生：您把老芦这思想犯（或言论叛国犯，待考）打入天牢之前，恐怕先得去把黑材料收集完毕才是。这里建议您去看看我那著名的“亡国三段论”。它写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一文中，是那个三段论而不是您想像的“缺乏历史法理依据”说是我“中华帝国必将崩解”说的依据。

预备知识谈完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塑胶胸脯朦胧胎”

中华民国是什么玩意？整个名不正言不顺、由大卖国贼孙文（即刘先生的“中山先生”）催生出来的私生子。我提出此说的时候，早就料定有人要用“五族共和”来打我，没想到的只是刘先生缺乏近代史知识竟然到了这种惊人的地步。谓予不信，请看刘先生说了些什么。

刘先生先问我：

> “那中华民国‘毫无法理权利’之论亦不知章出何典？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其他什么法典？”

接着又说：

> “有必要向芦先生请教的是：1、中华民国什么时候宣称它仅仅是汉族的政权。中山先生不早就明确它是“五族共和”吗？2、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游牧于贝加尔湖、阿尔泰山杭爱山之间的地区，从来没有对神州大地‘实行过有效统治’，怎么又可以在 1264 年建都燕京，君临全中国？十七世纪以前关外的女真社会本身都还是一片混乱，更遑论对中国‘实行过有

效统治’，怎么 1644 年又可鼎定北京入主中原？这些都是依照哪家的‘法理权利’？”

刘先生对一纸空文的“宪法”的崇拜，简直让人无话可说。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是“五族共和”，所以那就真是五族共和了，据说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理权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请问刘先生，中共的“宪法”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工农的乐园，您怎么还往外逃呢？难道那抓你的警察，也真的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不成？而您真的是犯了颠覆国家政府罪？

这里想请教刘先生：那“五族共和”的宪法是谁制订、谁批准的？是否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同意？既然号称是民国，未经人民选举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未经人民批准的“宪法”就是伪宪法。更何况一直到中华民国逃往台湾为止，除了个花瓶式的“蒙藏委员会”，中华民国从来就没在事实上变成什么“五族共和”的乐园。中央治权始终未达西藏，连东北和新疆都在军阀统治下，莫非军阀统治也是人民批准的，是宪法规定的重要施政方式？

先生那第二问，我想大概思路正常的人都摸不着头脑。的确，我实在看不出那跟我的说法有什么相干。谁说过蒙古和女真有资格入侵中国？您举这个例子，是不是想证明中华民国接管民族地区和蒙古与女真入侵中国的本质是一样的？

这里说句题外话：我发现问这种问题似乎是您特有的思维方式。例如你在文章开头硬派给我的“扫荡三名”，从头到尾就是这种刘式逻辑：共党干得，民运干不得？所以，共党内斗，民运当然可以内斗；共党争财，民运当然可以争财；共党卖国，民运自然也可以卖国。既然如此，您还有什么理由让人民抛弃共党来选择你们呢？

下面这些话就完全是胡言乱语了：

> “ 中华民国系辛亥革命之结晶。辛亥革命同时具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内容（还有改善民生）。民族革命系推翻满清的民族压迫及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民主革命系终结满清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因此，辛亥革命根本不是芦氏所称 的仅仅是汉族追求独立的武装行动。”

“中华民国”这个词我记得是章太炎捏造出来的，而辛亥革命不过是蒋翊武组织的武昌新军的“文学社”搞起来的兵变引发的蔓延到全国的骚乱。孙中山起到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是他靠莫名其妙的声望，事后来摘胜利果实而已。此前他一直在鼓吹“排满革命”，兴中会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孙中山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所谓“抵御帝国主义列强”是孙中山后来在 20 年代勾结苏俄帝国主义者时从洋主子那儿学来的，由此发展出新“民族主义”。刘先生以孙文传人自居，却连他祖师爷干过什么都不知道，居然用新民族主义去偷换旧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整个是伪政府，窃国大盗不是袁世凯而是孙文，建议刘先生赶快去恶补一下有关历史知识，特别是请您去看看那夥土匪起事后去明孝陵的照片，这比什么都具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孙文诸丑类就是以继承明太祖驱逐“鞑虏”的事业自居。在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席卷下，各地军政府纷纷命名为“大汉军政府”、“大汉都督府”。辛亥前后，许多旗人受到了迫害、骚扰、甚至屠杀，只是没敢把这些历史记录下来而已。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卖国贼孙文搞的这些丑剧，完全是利用汉人的狭隘嫉妒心理换取人民支持，和后来毛共煽动“阶级仇”毫无二致。毫不夸张地说，他这种下流作法开了后来种族不和的滥觞，是挑拨民族分裂的始作俑者。民国初年汉族出版了大量的出版物污蔑满族，连同治皇帝之死都要污蔑成是去嫖娼害梅毒死的。在这种

压力下，许多旗人改成汉姓，这是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刘先生下面的说法完全是无视历史：

> “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并非是狭隘的民族排他，而是终结满清贵族垄断政权。革命成功后，全国都没有发生排满骚动。”

有趣的是，刘先生问：

> “而且，汉族独立，独什么立？满清皇帝在大洋彼岸吗？满族在文化上早已融入华夏，清朝的国都是中国的千年古城。”

我真为刘先生扼腕：您为什么不早生几十年去质问您的中山先生呢？既然是搞民主革命，那就至少把五族同胞都拉进来一块儿干，为什么要公开打出“排满革命”的旗帜，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响亮口号？我在《答金碧煌老先生》中说：

> “可笑的是如今‘伟光正’还在年年纪念辛亥。如果孙中山是什么民主伟人，王炳章、柴玲、吾尔开希诸小丑就是伟人他爷爷他奶奶！至少这些人推翻我党的理由比老孙推翻大清的多一亿倍。大清再腐败，能比得上我党的万分之一么？大清卖国，除了台湾，哪一寸卖了的土地不是人家辨子兵打下来的？老孙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什么推翻大清后又不把人家驱回黄龙府，反而还要霸住汉族从未领有过的北满、蒙古、西藏、新疆？这‘排满革命’是什么无耻勾当还用得着说么？老清前脚垮，后脚民国就把外蒙丢了。以后老毛又明赠暗送邻国无数土地。当年辫子兵打下来的基业，如今这些不成器的接班人还保有多少？”

在《三驳金殿下》中说：

> “总而言之，我的基本态度早就说明了，这里再重复一遍：满人当年入关，是异族侵略，但在以后的三百年中，满人

早已与汉人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的一员。辛亥革命前后，外国都把中国看成是同一个中国，并未把她看成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所以，孙文的‘排满革命’，在理论上是无视现实的种族主义胡说，在实践上引发了长达近半世纪的战乱，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倒退了数百年，直到改革开放后又才逐渐从‘极权’（totalitarian）回到类似晚清的‘专制’（authoritarian）政体。这种胡闹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深入批判，以惩前毖后，慎终追远。”

而在您口中历史却成了：

“辛亥革命是以以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以民族和睦代替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满清皇室还受到礼遇供养。只是由于他们它不识时务，还搞什么张勋复辟，才被撵出紫禁城。否则满清皇室很可能会保持至民国三十八年。因此，中华民国怎么会‘没有法理权利’在原满清的疆域内实行一种全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制度呢？”

既然中国生活在这样的乐园中，那您今天还折腾什么呢？您未免也太小看天下人了吧？难道辛亥丑剧制造出来的真是“一种全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制度”么？那个“以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以民族和睦代替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人间乐园，真的在中国存在过一毫秒么？您连这种不顾起码历史真实到的话都敢说，我真是服了您的胆量了。莫非您笃信“为了神圣的民主事业，必须撒谎”的“真理”？或者那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表现？顺便拜托您确定一下这“历史潮流”是嘛玩意，是否适用于中东，而谁具有那“潮流”的解释权，好么？

综上所述，孙文等丑类无视清朝政府锐意改革、答应在十年内实行宪政的现实，居然主张在一个帝制实行了几千年、国民对民主

毫无认识、毫无准备的国家突然废除帝制，造成了社会发展的骤然脱节，引发了长达半世纪的骚乱。

不仅如此，孙文无视满族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的社会现实，居然提出以排满为唯一内容（即刘先生所谓“推翻满清的民族压迫”）的所谓“民族主义”，打出排斥其他少数民族的“中华民国”旗号（凡是略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所谓“中华”从来是相对“夷狄”而言的汉族地区）。在所谓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的口号是“光复大汉”，一直到“解放”后，官方出版物还在把民国成立后的历史时期称为“光复以后”。这种用语，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了辛亥丑剧在孙文为首的乱党心目中就是一场“民族革命”、一场“独立战争”。中华民国旗号的打出，象征着这些人自绝于少数民族。既然如此，中华民国当然也就在法理上丧失了继承满清版图的资格。

孙文等丑类干出这种分裂民族和国家的罪行来不是偶然的。亡命的革命家最操心的事不是社稷安危和人民福祉，而是如何才能迅速夺取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煽起一切可以煽起的仇恨。由于清帝国是少数民族作国家元首，当然最方便的煽动因素便是民族矛盾。这么做的恶果，是从此放出了潘朵拉盒子里的瘟疫，民族问题从此成了中国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再没达到过满清的水平。

幸运的是，行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能看到权欲薰心的革命家视野之外的东西。袁大总统就任后，摈弃了日本特务孙文仿照日本帝国国旗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使用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作为国旗（即鲁迅污蔑的“斑驳的洋布”。我觉得，如果今后中共倒台了，倒可以考虑恢复使用那个国旗），所谓“五族共和”的“宪法”似乎也是那时制订的。可惜，无论是所谓“民国”，还是所谓“五族

共和”，都不过是一个谎言。辛亥革命造出来的民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双重困境：

第一，它以排满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因而自动放弃了对清帝国版图的继承权。

第二，它以“民主”、“民权”为目的，却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非民选政府，制订了一部又一部非民订宪法。它以“五族共和”为标签，却从未实行过民族自治，从未在民族地区搞过选举，从未成立过以地域和民族计票的参议院或联邦议院。因此，它彻底丧失了民主国家应该具备的 legitimacy（合法性），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法的国家。

这还不是民国这个怪胎最有趣、最滑稽的地方。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成功。民国之所以成立，是老袁玩弄阴谋诡计，逼着清室把江山“禅让”给他的。和曹丕篡汉不同的地方，是逊清和民国签了个名为《优待条件》的条约，那条约规定，清室逊位给民国，换取民国的优待，包括民国待清室以“外国元首”之礼，每年供给白银若干万两，清室居住紫禁城世袭罔替，等等。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上说得清清楚楚，每年元旦，总统府要派人到紫禁城来，对逊帝致词：“中华民国大总统向大清国皇帝问安！”

这算是什么丑剧闹剧？这岂不是说民国和大清是两个国家么？既然是两个国家，又有什么“逊位”一说？而且，中华民国的 legitimacy（合法性）只能来自于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方式，要么是传统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形式（或曰“天命”），要么是现代民主制度规定的民选。清帝国以前的所有的政权的 legitimacy 都是第一种，而现在民国既然是民主国家，当然政权的合法性只能通过民选来保证，可这“全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却居然来自封建“禅让”！当然这从来是封建君王获得“天命”的

一种有效方式，但民国领袖怎能从君王手上而不是从人民票箱中领取江山治理权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袁世凯称帝倒还是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闹剧的一个合理结束。他当然是窃国，不过那国是从大清手上而不是从人民手上窃去的。如果他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桩上，则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先驱魏文帝等人又该享受不同待遇。

既然民国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毫无民意支持的怪胎，它又有什么人民授予的权利去接管民族地区？当然，要说这接管有什么合法性，那倒也可以说是有的，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传统合法性，而具体使用这枪杆子的便是辛亥制造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们，所以张老胡子（东北话谓“土匪”）接管了东北，而盛世才接管了新疆，只有西藏没给卷进这“全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社会制度”中，当真是菩萨有灵！

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民国接管民族地区的合法性，在本质上和当年忽必烈大汗接管南宋，和摄政王多尔衮接管大明完全一样，毫无二致。

民国的无耻还不止此。我在《答金碧煌老先生》中说：

> “最令人气愤的是民国食言而肥，签字划押同意供给的岁币有本事赖了不给（堂堂政府如此无耻行事，怪不得今天民间到处是气死‘黄世仁’的‘杨白劳’），害得宣统爷只得卖古董来维持家计。最后冯玉祥那个土匪竟然把‘外国元首’（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须待逊清廷以外国元首之礼）赶出老家去，把紫禁城洗劫一空。土匪孙殿英竟然炸开东陵，用刺刀把老佛爷的凤首割下来。难道这就是和平逊位的报应？老溥为了报仇一头扎进日本人的怀抱，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汉族逼出来的。”

根据溥仪的回忆，民国答应给的赡养费从一开头就没给足过，后来就干脆彻底没有了。那文件的效力应该等于“两国”之间的条约。如此赖帐，真不是玩意，连我现在打这几行字脸上都热辣辣的！民国毁约在先，还有什么脸去指责张勋挟制下的短暂复辟？何况溥仪根本是个不更事的少年，论权势比汉献帝都不如，为什么要他而不是张勋负责？真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有本事找“董卓”去啊，欺负个孩子算什么好汉？冯玉祥本来是清朝招安的大土匪，镇压辛亥乱党的先锋，此时想发洋财，趁机冲进宫去，把主人赶走，瘸分“革命浮财”，弄得中外哗然，他居然有本事召开记者招待会，让手下的丘八把衣服解开露出排骨，证明人民子弟兵没拿宣统爷的一针一线！

中国历史上有的是这种土匪行径，毫不足奇。奇怪的是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还没人谴责土匪（只有老毛和打手们在庐山会议上骂彭德怀是“冯玉祥”、“伪君子”），有的反倒是污蔑受害人的英雄。刘先生现在就给大家做了这个榜样，真是“黑白混 xiao、是非颠倒、世事昏乱，莫过于此”！莫非生活在现代法治国家美国的刘先生赞成流氓赖帐、土匪打劫？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民国”都是个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流氓痞子政权，跟朱温建立的后梁也差不到哪儿去。当然，它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算是高明到不知哪里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倒没有民国这么缠夹不清，这么可笑。它的“法统”完全是传统的那个。这点人家倒没隐瞒，说白了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不是人民选上去的。既然如此，你要讲合法性，恐怕就只能说那是刺刀下取得的现实合法性，用不着把什么“历史根据”拉扯进来。其实比起中华民国来，中共当局统治西藏还真多点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这就是我在《评马系列之三》中说的：

> “更重要的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 1951 年 5 月与中央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所谓‘十七条协议’）。正如题目所标明的，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自己是地方政府，同意中央政府派兵入藏，进驻西藏边防重地。同年 10 月 24 日，达赖本人致电中央，表示要‘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由此可见，解放军进藏是由条约保证，得到西藏最高领导人的公开欢迎（哪怕是表面的也罢）的，而且入藏时根本就没有受到武装抵抗。部队入藏后拉萨一度骚乱，达赖本人还下令撤销了卷入骚乱的两个司曹的任务，噶厦政府还取缔了主张修改‘十七条’的‘人民会议’。”

当然，说到底，那十七条也是刺刀下逼着签的城下之盟。不过好歹有个条约在那儿，你就是再不愿意也得信守到底。这大概就是达赖至今不主张独立的一个原因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统”上的最脆弱之处，还是面对台湾问题时显示出来的。我前面说过，你要讲枪杆子的传统合法性，就别把“历史根据”拉进来，伪善不是善，立牌坊只能给婊子带来说不清的麻烦。您要讲“历史根据”，行啊，台湾是满清割让给日本的，后来日本战败，交还给中华民国，并没有交还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因为它并没因后者的建立而停止存在，要讲“历史依据”比岁数，人家可是比你这个苏俄帝国主义豢养支持的叛乱集团更有资格更有合法性。要讲这玩意，得是你大陆去回归台湾才符合合法性。人家之所以放弃了这个要求，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怕了你的“历史根据”、“合法性”，而是怕了你的枪杆子。所以如果人还有点羞耻心，最好还是把那些

婊子牌坊扔一边去。少说那些“神圣领土”、“主权不容谈判”的屁话，那玩意只能哄白痴和别有用心的人。

伪造“历史法统”的徒劳

如上所述，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合法性都来自于武力征服造成的既成事实。在本质上，它们的建立和蒙古人、女真人先后入主中原毫无差别，其实和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如香港）也没有什么两样。硬要说有差别，大概只能说比起少数民族来，鬼子长的实在和咱们不一样。

这在过去也倒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问题是当今的时代讲究民选的合法性。为了抵挡这一招，咱们便不能不祭起两个法宝来，第一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论；第二个便是“主权国家不容肢解”（刘先生误为“支解”）论。

这第二个理论当然有充分的现实主义道理。我在本文开头说过，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国际社会采取尊重既成事实、尊重强权、息事宁人的态度，这就是为何国际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主权国家的根本原因。

可惜这玩意并不是永远靠得住。刘先生大概是国际法专家，在那篇文章里对这“肢解犯法”论作了详尽论述。老芦是票友，没那个耐心细读，只是觉得就算有那国际法，似乎也是反对一国去肢解另一国，并不指本国自动崩解。不管怎样，反正谁都知道前苏联给“肢解”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也给“肢解”了，可似乎没谁谴责那是犯法的勾当。所以，说穿了，这玩意无非是咱们老祖宗说的“成王败寇”：你要闹独立，中央政府有权镇压，国际社会也睁眼闭眼。给镇压下去也就算了，要是没给镇压下去，冒出来一个新生国家的话，那么国际上便等着看一段时间，没事了便承认该

国。孟加拉就是这么独立的。我记得 70 年代中国大嚷大叫，反对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该国成立后还坚持叫人家“所谓的‘孟加拉国’”，可到最后还是挺不下去了，不能不承认了人家。

因此，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即使真有什么“主权国家不容肢解”的国际法，那也决不是保障国家统一的法宝。要维持国家统一，只有靠自己努力。那说到底就是两种方式，要么靠枪杆子，要么靠自动产生的内聚力。我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指出，咱们现在只剩下了武的那手，而这就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连古人都知道武力不足恃，何况是现代人？要是咱们的枪杆子有朝一日不灵了，马上就是前南斯拉夫式的惨祸。所以，如何在这种各民族的大悲剧发生前就正视现实，想出办法来产生这个内聚力，这是摆在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管是什么民族）面前的最大的难题。

可惜华夏精英们不但没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君子见微而知著”的能力，对东欧的血的教训看不见不说，还专砍老芦这种报坏消息的“先知鸭”的脑袋。老芦为此被网上拥共的土法西斯污辱了足足两年半倒不去说它了，反正那些人的智商已被党文化降为负值，不能当成正常人看待，如同疯子杀人不犯法似的。让我想不到的是代表“中国光明面”（高寒先生语）的杰出民运领袖、优秀的民主理论家、国际法专家、历史学家刘国凯先生看到了我那“中国必将崩解”的警告后，愤怒得彻夜无眠，苦思冥想了一夜，忍无可忍，毅然出来宣布是我是个主张肢解中国的大汉奸！

可怜的是，为了抵消我这汉奸卖国言论已经造成并可能继续造成的危害，刘先生想出来的救国方略却是祭起我党反复使用的那两大法宝：“历史根据”论和“肢解犯法”论。大概在刘先生，这玩意如同老太太们念的“南无阿弥陀佛”一样，念的次数越多，成佛作祖的希望也就越高。

其实我早就在那几篇文章里告诉过读者，所谓“历史根据”不值一分钱。那玩意如同“冥间银行”发行的纸币，只有迷信的人才深信它有兑换价值。的确，论“历史依据”，北韩和北越早就在秦朝被征服设郡。那时别说疆、蒙、藏、北满，连云、贵都还是“化外顽国”呢。历史依据这么充足，不知刘先生可有那胆量去收复这两个失地？

不仅如此，刘先生还发扬光大了中共那套伪造历史和诡辩的功夫。他说的史实太多，老芦懒得去一一辩驳，随便挑东北的事来说说吧。我说汉族从来没有有效地占领过北满，说这话时我就料到有人要用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来打我。其实，文革前的教科书从来没提过奴司的话，那时的历史教科书上明朝的地图和现在国外汉学家们写的中国历史专著上登的完全一样，都只包括了辽东在内。这奴司是文革中和苏修新沙皇争地皮时才炒热的，这种学术依据的可靠性，大概和郭老那时的发现也差不多。记得那时他考证出李白生于如今吉尔吉斯的碎叶河上的碎叶，由此证明那块地方从唐代起就是咱们的。

老芦不懂历史，所以想请教刘先生，在我印象里，都司似乎是一种驻军单位。谁都知道，有军队在那儿驻扎过，不一定那地方就是咱们的。80 年代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越南境内好像也一度有过许多中共军队，似乎那并不能作为中国拥有那地方的证明，就象冈村宁次司令部曾设在中国并不能证明中国是日本的领土一样。您能不能给咱们举几个民事的行政单位和朝廷命官？例如，北满属于大明的哪一省，巡抚又是谁？要是举不出方面大员也没关系，哪怕给个县太爷的名字出来也行，成不成？

老芦无知，建洲卫倒是早听说过，不过那似乎在南满，当然您用的地图是特制的也难说。您其实还忘了说，努尔哈赤原是明将李成梁的家仆。您忘了这事实真可惜。如果您用上了它，我想在您论

证后金是个地方政权而不是什么独立国家时更有效。现在您只是忘记了皇太极称帝、和大明公开分庭抗礼的事实，未免有些美中不足。此外，我想您还可以用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证明格鲁吉亚无权独立，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证明德奥是不可肢解的统一国家。可惜只有一件事让您忘了：就算大清是地方政权变成的全国政权，那也不等于汉族统治过西藏、蒙古、大部份新疆啊？（当然，唐代国势强盛时曾对西域作过线状占领，可惜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短的一瞬。）

最出奇的还是刘先生的诡辩功夫，据他说，蒙古人不具备独立资格，因为他们一旦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定都，从此就丧失独立资格了。这么说，难道先生想去收复外蒙不成？朱元璋为何又不根据您确定的这条国际法去认领蒙古？英国人一度统治了五分之一的地球，是否人家就此丧失了独立资格？当然，大英没在别的国家定都，不过定都就这么重要么？这是什么道理？可否得而闻之？据我所知，普王威廉一世是在占领法国后，在凡尔赛宫镜厅加的冕，宣告统一的德意志就此诞生，那好像比定都还重要吧？为何德国现在还在厚颜无耻地冒充独立国家？就算只准算定都，那亚力山大大帝在亚历山大定都，东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定都，为何今日希腊人不臣服于埃及，意大利人不臣服于土耳其？

看看这就是优秀的民运理论家说出来的话，比中共无耻宣传的档次还低下！

可惜的是，类似的诡辩简直是数不胜数。例如他为了驳斥我的“汉族地区曾是清帝国的殖民地一说”，发明了两个“理论根据”，第一是满族跟汉族同化了，第二是满洲和神州之间没有隔着大洋。

如果第一个根据成立，则北美、澳洲、新西兰根本就无权从母国大英里独立出去。独立时，这几个国家的强势民族不但不是什么

被同化了的土著，完全就是文化同一、血统同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当然，它们和母国之间确实隔着大洋。可惜这大洋还是救不了命。英国和爱尔兰连在一起，两者的语言和文明完全是同源的。但尽管爱尔兰长期处于英国的有效统治下，该国还是在 20 年代独立出去了。请教刘先生，这些国家的政府是不是都是伪政权？

就连我那“汉族在辛亥后无法理依据接管民族地区，如同越南无权去并吞寮、柬”论，刘先生也要表示震惊，据说那是因为“法国……遥在万里之外”，所以，“把……法国于中印半岛诸国的关系胡乱拉来与满清和中华类比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看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倒是刘先生的思议方式。谁都看得出来，这里讨论的帝国崩解后紧挨着的前殖民地地区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原宗主国的地理距离到底有什么相干？你就是要强辩，扯越寮柬之间的文化差别还勉强能抵挡一阵子（即使如此，我还有美国无权去统一加拿大这个例子在那儿专门守候光临），不料却是弄个不可思议而又万能的大洋在那儿抵挡！就算这样，您那宝贵的大洋还是照样救不了命。眼下明摆着，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都是邻国，您说到底谁有权去统一谁？

老芦舍身出来作万民所指的大汉奸，戳穿这些伪造和诡辩，目的是想告诉比动物还要愚昧的华夏精英们：靠捏造和诡辩这种猫溺救不了帝国的命。如果说连我这样一个票友都能毫不费力地戳穿这些欺骗勾当，那么难道您能指望它们能难住 X 独分子中的专家们？更何况我早就说过，“历史依据”之类的宣传战功夫屁都不值，到时候国际社会不会为这些屁话而放弃尊重既成事实的惯例。与其花如此功夫和脑筋去编造这些猫溺，倒不如去好好想想，想出点切切实实的办法来，去化解深刻的民族矛盾与社会危机，维持住现有的国家统一，至少一定要避免民族之间的大屠杀惨祸。更重要的是，愚昧绝伦的精英们务必要明白这一点：“X 独”、“肢解主权国

家”的罪名吓不倒分离主义者，动不动祭起这个打神鞭来只能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感，原来人家不想独立的听多了都要改主意。某位统派蒙族兄弟让那些土法西斯逼得大骂汉族、以致许多人误以为他是蒙独分子就最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愚昧必将断送帝国

两年半前，我提出“亡国三段论”，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崩解。说这话的时候我刚上网不久，对全民愚昧还缺乏足够的感性认识，因此我忽略了导致帝国倾覆最重要的一条主观因素，那便是汉族那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不可救药的、令人绝望的低劣素质。

所谓“素质”，说的是两方面，一是道德上的，一是智力上的。令人悲哀的是，汉族在这两方面的素质都低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它实在是个愚昧的痞子民族。因为是痞子，所以毫无忏悔精神，却特别精通文过饰非，脑筋专门用在发明种种巧言伪说上。当少数民族不吃这一套的时候，则上焉者如刘国凯先生，专门去痛说革命家史，把几百年前的斑斑血泪帐翻出来，历数少数民族对不起汉族的事，还要责备人家没有忏悔精神，要人家向勃兰特学习，却只字不敢提毛共在少数民族地区犯下的滔天大罪。下焉者则“奴”、“猪”、“狗”不离口，什么粪便都敢从嘴里喷出来。说句天理良心话，我要是少数民族，就冲这些痞子流氓行径，我也要独立！

光是痞性十足也倒罢了，问题是咱们还是弱智痞子。这么多汉人里头，觉得委屈者有之，跟人家讲“公平”者有之，愤怒者有之，与人对骂者有之，却没多少人有那个智力看得出来，干这种事，正是在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亲手拆毁帝国大厦，日

后必遭惨酷报应！如果这种歪风再不迅速煞住，则中共枪杆子失灵之日，便是边庭流血成海水之时。

如果咱们稍微有几分神志，就应该能看出这昭如日月的现实：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是谁求谁？不是少数民族兄弟求愚昧的“大”汉族，而是愚昧的“大”汉族求少数民族！怎么个求法？求人家别跟咱们分家！现在的问题是，是我们要统一，不是人家要统一，是我们求人家呆下来别离婚，不是人家想赖在我们这个家里不走。您要开口去和人家算帐前，最好还是先把这最起码的国情看清楚再说。

为了照顾汉族同志的理解力，我这里打个通俗比方来说明问题：比方说，您是个奇丑无比、智力低下的老光棍，因为因缘际会，阴错阳差地混上了个漂亮老婆。结婚几十年，人家没跟着您享过一天福，却动不动就被你饱以老拳，甚至还被您逼着去吃过屎。因为您有把蛮力，人家只好默默忍受，但现在大夫发现您害了重病，几年后就要发作出来，到时您就完全得瘫在床上，甭说打人，连自理能力都没有。在这种时候，您那位太太看着隔壁的漂亮小伙子动了心，但毕竟又因为跟你夫妻一场，一时狠不下心来出走。在这种时候，您该怎么办？是跪在床前磕头如捣蒜，声泪俱下地忏悔自己以前作的孽，赌咒发誓以后您一定痛改前非，求对方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是亮出结婚证，证明法律赋予您的神圣权利，历数岳高祖父对不起您太爷爷的事，继而大骂出声，什么好听的都骂出来，喝道：“婊子！你敢走，就是违反婚姻法，我就有神圣权利打死你！”然后再扑上去痛打人家一顿？

我这么一说，恐怕愚昧如汉族者也能看出来，采用后者，当然一时能奏效，但重病发作那天，只怕人家要约了隔壁那个小伙子来收拾您，让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恨爹娘把您生了出来！

所以，哪怕光从策略上考虑，咱们和少数民族之间就没有什么“公平”可谈。这就像上面那比方说的，如果您检讨了，太太要出积下来的几十年的气，破口大骂，甚至左右开弓痛打您的耳光，您都该心花怒放。为什么？人家发作的越厉害，积下来的怨气和冤仇也就消除得越多，回心转意原谅您，继续和您过下去的可能也就越大。如果连这都看不出来，那您真是蠢到不可救药了。

这个比方其实并不能充分说明汉族所处的天然不利处境。因为汉族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密度都远高出少数民族，所以，自民国以来的人口净流动是汉族进入民族地区而不是相反。这就造成了两种潜在恶果：第一，它成了引起少数民族反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照顾汉族的理解力，我这里再打个比方：您的亲戚莫名其妙地挤进您家来住下不走，时间长了，您心里一定很不乐意）；第二，如果帝国在暴乱中崩解，被屠杀、被驱赶的主要是汉族而不是少数民族，因为在内地生活的少数民族数量远远不及在民族地区居住的汉族。

这是从策略上来看。从道义上看又如何？有许多人坚信“伪善也是善”，热衷于讲伪道义，所以老芦不得不用真道义去破那伪道义。

刘国凯先生的大作中就充斥了这种伪道义。他花了大量篇幅去回忆蒙族和藏族在历史上向汉族发动侵略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苦难，然后他说：

> “在当今文明社会中，不讲株连，不讲父债子还，那是对的。但那是对个体而言。而作为整体性的民族则不同。民族的后代须对其先民劣行予以善后。故德国政府给犹太人许多赔偿。勃兰特亲自下跪请求宽恕。”

这是什么混帐话？！勃兰特是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刘先生引这个例子，岂不是自绝自外于少数民族兄弟，

把人家看成是异国民族？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理由反对人家独立？！

这里的荒谬还不仅此。纳粹的暴行，由战后德国人民来补过是完全应该的，因为那血迹尚在，创口犹新，而刘先生举的那些例子，则完全是几百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数落这些事的唯一的客观作用就是炫耀自己的强词夺理，引起对方的痛恨。

更不能容忍的是，刘先生居然在网上广为散发描述文革时期汉人在内蒙受的苦难的帖子。如此倒行逆施，完全是在煽动制造民族仇恨。文革时期汉人当然受过罪，我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说过：

> “说句公道话，共产党人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老毛的名言是：‘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他们眼中只有阶级，没有民族，执政后也没有奉行民族歧视的政策。少数民族受过的罪，汉族也同样受过。但正如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汉族再受罪也不会想分家。少数民族跟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共同文化背景，人家本来就难得认同你是一家人，何况受尽你的糟害？人家又怎管你中共是不是代表整个汉族，人家只知道汉人来了就过上了祖祖辈辈没过过的好日子。更严重的是，汉族一般来说只有迷信，没有宗教意识。你毁了内地的寺庙，关了内地的和尚不要紧，咱们顶多找不到一个求子求‘888 ’的受贿机构。可你在佛国、伊斯兰国这么干，就比掘了汉人的祖坟还让人痛恨。何况还有‘平叛’、‘内人党’那些几十年也无法消弭的民族创伤！根据《华夏文摘》上有关‘内人党’冤案的回忆录，共干们向牧民们逼供时竟大叫：‘讲人话！（按：指汉话）不许讲牲口话！（按：指蒙古话）’为了当年外滩公园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们仇恨帝

国主义到今天。将心比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指望少数民族弟兄来拥抱咱们？”

这里没有明确指出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时代是自满清以来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控制最有效、最严格的时期，也是汉人有组织地大量拥入民族地区的历史最高峰。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当然要把共党给他们带去的苦难和汉族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第二，中共基本上是个汉族组织，不仅汉族成员占绝大多数，而且最高层决策集团全是汉族。“建国”之际王震指挥汉共军疯狂屠杀西北回民；1959 年汉共军血腥镇压西藏人民起义；文革期间汉共干训练、教唆、指挥民族地区的“红卫兵”在各民族地区“大破四旧”、“破除迷信”、非法囚禁、毒打、羞辱、迫害僧侣，平毁寺庙，焚烧经书，严重地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尊严和感情，最严重的是汉共干一手炮制了“内人党”冤案……。这种种滔天罪行可不是几百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不过是昨天的事，汉族不负责，谁负责？

如果刘国凯先生真懂西方基督教的忏悔精神，真明白勃兰特那个举动的伟大意义，他就该知道，忏悔是对自己的道义要求激发出来的自我认罪，不是一种责备他人的诿过手段。正如我在《决不忏悔》中指出过的，勃兰特本人是反法西斯志士，纳粹的罪行跟他毫无关系，但他还是代表德国人民跪下去了。如果是刘先生，请问您是否有这种博大恢宏的气度和高尚慈悲的精神？您怎么就不想想，少数民族并不是畜生，人家是和一样有尊严的大写的人。您这样专门用电子显微镜在人家身上找过错，甚至把几百年前的扯不清的烂帐都抛出来作黑材料，难道就不怕人家仿效？都这么互相指责，这民族和解还怎么实现？您是不是真担心各民族不会闹到最后打起来？

就是因为有这点刘先生以及许多愚昧汉人没有的见识，所以老芦作为备受共党迫害的汉人，尽管共党作的孽和我全家人一点关系

都没有，我还是一有机会就向人家少数民族兄弟道歉认错，承认在近现代确实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而这种旨在民族和解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努力，却被刘先生看成是“某些汉族士人以宽厚自诩，以仁人自况。凡汉族与外族发生争执，必认定汉人错，外族对。芦氏所为，使我忆及张学颜之参贾汝翼、方从哲之奏熊廷弼、梁庭栋之劾袁崇焕……”

世上竟然有这种混帐事，真是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能力！他自己作为所谓“民运”领袖，带头攻击少数民族，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却不允许别的理智的汉人去竭尽全力修复他造成的损害，甚至污辱这么做的人是出卖祖国的汉奸！将自己比成袁崇焕那样的民族英雄，而我是梁庭栋！众所周知，袁大帅是抵抗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后金当时就是外国，根本就不是刘说的叛乱的地方政权。否则熊庭弼、袁大帅、史可法都将变成内战祸首，这是对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的不可容忍的污辱！刘先生此比，再明确不过地表明在他内心深处，少数民族兄弟不是自家同胞，而是必须用武力加以歼灭的入侵的外国异族！一个据说是信仰“民主”的现代人居然能堕落到这种令人骇然的地步，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光从刘先生这个个例上来看，便能看出咱们要化解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和解有多艰难。因为汉族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心胸、气度和智力，所以帝国的崩解就是必然的。我唯一的希望，是民族大屠杀的惨祸不要在我生前发生。

2002 年 8 月 14－16 日

山重水复岂无路？

——试探维持中国统一之路

老芦昨天的文章贴出后，有的网友总算看明白了想传达的信息："帝国终将崩解，而愚昧的汉族现在正在加速它的崩解，加剧崩解后的大难"，于是提出，趁那灾难还没发生，赶快从少数民族地区撤出，听任那些地方独立。

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么？否！相反，恕我直言，提出这种主张的网友，似乎还没明白那问题的实质和难度。打个谁都知道的比方：汉族现在是骑在虎上，半路跳下来只会死得更早。

昨天的文章已经把汉族的困境说清楚了，这就是满清垮台后，有大量的汉族进入了民族地区。大规模移民活动首先发生于民初，即以山东人、河北人为主体的所谓"闯关东"。"解放"后，中共这个历史上最反动的政权把城乡划为三六九等，鼓励和组织人口从"高等级"向"低等级"移动，却严厉禁止相反方向的流动。这么做的结果，是大量的汉族以"支边"、"屯垦戍边"的名义进入了边疆地区。但与东北的情况不同，这种移民活动并未将边疆变成汉族地区。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既是历史的，又是自然的。首先，满清入主中原后禁止内地向关东移民，原住民却大量内迁入关，把关外几乎变成了一个无人区。因此，满清垮台后，汉族移民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那儿的多数民族。类似的情况并未在蒙、藏、疆发生过，那儿的原住民并未内迁。其次，和东北不同，蒙、藏、疆、青海等地的资源贫乏、生存环境恶劣，对自发移民缺乏吸引力。因此，除了

内蒙发生了相当大程度的“汉化”外，藏、疆基本还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区。

就是这基本形势决定了汉族的不利处境。是汉族进入人家的家园，不是反过来。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都知道“主客之势”的术语来说，人家是“主”，咱们是“客”，战略劣势先天就摆在那里，岂还敢气壮如牛？在东北汉族已经反客为主，而在其他民族地区，汉族在不同程度上仍居客位。这些汉族移民相当于战国时代各国之间交换的人质。一旦帝国崩解，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所以，是咱们求人家别分家，不是人家要赖在咱们家里不走。

让我愤怒的是，土法西斯们连看出这点国情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在网上肆意污辱少数民族。光是这夥无知竖子起哄也倒罢了，最严重的问题是就连居住在民族地区的汉族都不识好歹。我对蒙、藏的情况不熟悉，但新疆的汉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那种傲慢态度，让我不能不为他们捏把汗。一个民族愚昧到不知大祸将至，生怕未来的血光之灾不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去自杀”，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愚昧到这个程度，我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说过，有的网友提议趁帝国未崩解，大量向边疆移民。这种方略的不现实，我已经在那篇文章里作了详细证明。此次网友提出来的主张却正好相反，即趁大乱未起，咱们先从那些是非之地撤出来。

不幸的是此法不但同样不可行，而且是速祸之计。主张此说的人忘记了几个严重问题。首先，我不知道进入民族地区的汉人究竟有多少，但毛估一下起码是上亿。咱们要放弃民族地区，这些人怎么办？是撤还是不撤？要把他们统统撤回内地，他们倒是高兴了，但您能有本事在内地安置数量如此巨大的人口么？内地已经快要挤炸了，就业问题已经令当局一筹莫展，怎受得了如此雪上加霜？这

还不光是个就业问题，更是个族群间矛盾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拥进来和内地人抢饭碗，“强龙”和“地头蛇”之间恐怕立刻就要大打出手，恐怕全国立刻就要大乱。

如果不撤那些人，光是中央政府放弃对那些地方的统治又如何？同样是死路一条。你前脚走，人家后脚就独立，独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毛共以前搞过的“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把那积了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在当地汉人头上。到时成千上万的难民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地拥进关来，一直奔向中南海，您怎么办？让不让人家进来？进来后不但有个安置难民的严重问题，更有个民意压力问题。目睹这灾难，饱受“民族主义”宣传毒害的全国人民一定会愤怒至极，街上恐怕全是请愿的，游行的，示威的，逼着政府向那些新成立的国家开战。您说这仗是打还是不打？既然现在要打，何必当初要撤？政府作出这种荒谬举措来，威信何存？

其实，咱们根本不用假想这些事，因为中共一直在推行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彻底取消了作这种选择的可能。连台湾那个中共从未治理过的地方咱们都不肯放弃，提出主动放弃边疆地区岂非痴人说梦？如果老江敢主此说，恐怕次日就得让兵变推翻。

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一切都没发生，汉族留在原地，人家没有排汉，那又怎么样？中国内地的能源已经挖空，未来基本得靠新疆的大油田。现在突然丧失那地方，经济必遭沉重打击。这还是小事，只怕以后边界纠纷不断。王力雄的《天葬》早就指出，中国和欧洲国家不同，历史上从未形成过准确清楚的边界，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边界从来是一本糊涂帐。内地和新疆的交界还比较清楚（新疆是所谓“三山夹两盆”），内地和西藏之间就完全扯不清了。如果西藏独立，人家要讲究“历史依据”，提出恢复历史传统边界，把青海、川南、西康，云南北部统统收回去，您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哪？要干，那些地方汉族已经成了大多数，有什么理由放

弃？不干就得跟人家吵架，甚至爆发边界冲突。这么争吵下去，迟早要演成类似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的世仇。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最严重的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你只要放了一个地区独立，就等于鼓励其他地区起来闹事。如果疆、藏独立了，内蒙虽然现在以汉族为主，但人家见状肯定要起来争独立，请问您有什么理由拒绝？东北虽然已经成了汉族地区，但既然内蒙可以独立，少数原住民要求独立当然也就有了足够理由。无论东西方，老百姓的特点都是喜欢一窝蜂地赶时髦，现在独立既然成了时髦，则广西、宁夏、甘肃、云南恐怕都要跟上，到时中国的版图就连明朝的水平都没有了，在这样的急剧版图分割后，如果国民经济还能挺下去，那才真是不可思议！

所以说，汉族现在完全是骑虎难下，合则有远忧，分则速大难。

要从这个维谷中走出来，化险为夷，唯一的途经看来还是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主张的“化帝国为联邦”。帝国靠暴力维持，而联邦如美国、瑞士等国家靠先进的生活方式产生的吸引力与利害与共的经济纽带产生的内聚力，让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心甘情愿地呆在一起。

这维持机制的本质差别，决定了当帝国政府镇压暴力衰退时，弱势民族就要起来暴乱，最终导致帝国崩解，而联邦间的各民族却能和平共处，做到真正的长治久安。这一点在美国看得最清楚，该国国民由五花八门的不同种族和民族组成，但自由创业的生活方式与高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资本和人口的迅速流动，使国家成了浑然一体。因为人口处于不断的“趋利流动”中，也就不会形成某个民族集中居住的大片地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种族冲突，也决不可能出现某个民族地区要求独立的情形。我记得，60 年代美国种族冲突很尖锐，由激进黑人组成的“黑豹党”受毛主义影响，一度倾

向于武力抗争，但即使在那时，也没谁提出“分家另过”的不现实主张。

因此，咱们要完成从帝国到联邦的转型，其实就是从“暴力维持”阶段和平地过渡到“和平维持”。这个过渡非常困难，但从理论上来说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具体来说，这转变应该通过“帝国——半帝国半联邦——联邦”诸阶段。

在初始的帝国阶段中，当局和人民都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确信有此种根本改革的必要，谨慎地、有序地、有计划地、目标明确地、缓慢但坚定地进行改革。在我看来，改革必须包括以下重要内容：

一、立刻停止“民族主义”的官方宣传。通过相应立法，像打击“X独”活动一样严厉打击大汉族主义亦即土法西斯主义，彻底搞臭这种祸国殃民的反动思潮。如有民族纠纷发生，则一定要在秉公处理的同时，从严惩处大汉族主义心态驱动起来的事件。

二、当局应向全国各族人民客观介绍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屠杀惨祸真相，停止散布“美帝阴谋”论那种无稽之谈。与此同时，应该广泛宣传印巴、巴以结仇的严重恶果，使大多数人民都明白民族冲突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悲剧，对此怀有足够的戒慎恐惧之心。

三、加大对边疆地区的投资力度，逐步放开户口管制，促进内地和边疆的人口双向流动。通过特殊财政补贴和其他优惠手段，鼓励内地汉族前往边疆投资、创业、就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到内地投资、创业、升学与就业。

四、在民族对立情绪基本消除后，逐渐放权，将现有少数民族“自治区”逐步改造为真的自治区。人大应该逐渐改革为两院制，下院按人口决定议席数，上院即联邦议院的议席数则根据地区和民族数决定，现有 56 个民族中，每个民族都必须有其代表。各自治区

应该有自己的议会，自行决定涉及本土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演变的最后目标，是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财政预算、税收、国防、外交，其他一切事务由地区政府负责。

要完成这转变的客观前提是持久存在的安定团结。中央政府决不能丧失权威，失去对各地区的有效控制。即使出现了重大天灾人祸，为文官政府严格控制的军方仍应具有迅速动员、运送部队到国内任何地区的快速反应能力。简言之，在完成向联邦的过渡之前，任何时候中央政府只要丧失武力威慑能力，则民族独立就会发生，帝国就会崩解，改革就会前功尽弃。

从这个客观条件来看，要实现这个目标真是困难重重。毛共历时三十年的胡作非为，以及后毛时代的改革造成的副反应，导致社会矛盾重重，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当此国步维艰之时，国家决不能向外称兵用武，提前自杀，而人民必须知道利害，相忍为国，认识到所谓“暴力民主革命”主张和“X独”在客观效果上毫无差别，实际上是从左右两个方向合力夹击咱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多民族国家。一旦这些人得逞，国家立刻崩解，人民立刻陷入无边血海。“只有和平改革才能救中国”必须成为全民坚定的共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当局必须坚决抛弃崇拜暴力革命的一切官方意识形态，把孙中山、毛泽东这些祸国大盗从神龛上拉下来，扔到“五谷轮回之地”（典出《西游》）去。必须用辛亥丑剧造成的国家解体、军阀混战的生动例子教育人民，让人民认识到，尽管辛亥丑剧因为清室的理智退让得到和平解决，它仍然造成了外蒙的永久脱离和西藏的一度脱离，内地人民更饱受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内战之苦。总而言之，要把目前国民之中高涨的所谓“爱国主义”感性情绪，逐步引导到“坚持和平改革，反对革命暴乱”的理性轨道上来，最终使“反革命就是爱国”形成全民的坚定共识。

完成这个这个和平演变的第一个主观前提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统治者必须从理智上坚信有这个改革的必要，坚信我们只有两种前途：不是将帝国和平改造为联邦，就是南斯拉夫式的惨祸。人民必须认识到，中国和前苏联的情况不同，民族矛盾要比后者尖锐复杂到不知多少倍，人民的道德和智力素质不知比前苏联人民低下多少倍。因此，未来中国不大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和平解体，更大的可能是帝国骤然崩解后出现民族间的大屠杀。

第二个主观前提是汉族必须深刻认识到大汉族主义亦即土法西斯主义的祸国实质，认识到尊重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是让人家心甘情愿和咱们呆在一起的起码前提。那种貌似维护国家统一的主张诸如“强制同化”，其实是逼反少数民族，使国家提前进入动乱。而那种貌似袒护汉族，把主张“强制同化”的法西斯主义者吹捧为袁崇焕，把驳斥这种反动邪说的仁人志士诬蔑为害死袁的大汉奸的胡说八道，本质是将少数民族视为必须加以武力歼灭的入侵“外族”，实际上是自绝自外于少数民族。如果这种法西斯分子一旦窃了国，必然要因其种族主义方针逼反少数民族，导致全国大乱。总而言之，全体汉族人民必须建立“爱少数民族就是爱国”的坚定共识，认识到不跟大汉族主义亦即种族主义彻底决裂，中国就决不会实现民族和解，民族矛盾就无法消除，民族间的内聚力就无法产生，而等待着我们的就只有国家分裂、民族屠杀的世纪惨剧。

“祸福无门，唯人自招”，是祸是福，全在我们一念之间。

2002 年 8 月 17 日

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

欧洲的启示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不必合，合久不必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就在共产帝国纷纷崩解、甚至演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悲剧的同时，欧洲各国却组成了个什么“欧盟”。到过欧洲的人都知道，凡是入了那个贼夥的成员国公民，不但可以自由前往其他成员国家旅游，连签证都不要，而且可以随便就业，根本就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不但如此，人家还在那商量使用统一货币。如果这最终成了现实，则开在那些国家的外汇兑换局从此只有倒闭的份儿，而旅游者也再用不着孝敬那些兑换商大爷们了。

按理说，这种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应该让我们琢磨出个吸取教训、借以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正确方针来。可惜无论朝野，吸取的“教训”却只能让人哭笑不得。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美帝阴谋论”，据说，是万恶的美帝“肢解”了苏东那些主权国家。第二是“民主亡国论”。这两个理论合在一起，便成了“美帝民主阴谋亡国论”，也就是说，“民主”不过是美国人发明的一种类似原子弹的战略武器，谁要是挨上了它，则国家立刻崩溃。如同广岛长崎一样，躺在废墟里的苏联东欧帝国默默地控诉着这“精神原子弹”的罪恶。

世上再荒谬的理论，里面仍然可以有点滴真理。这“美帝阴谋论”未免太夸大了美国人的神通，违反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要说老美有什么阴谋

则未必，“阳谋”倒是有的，那就是当年尼克松副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在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打的赌兑现了：苏联和东欧人民选择了美国生活方式。在“和平竞赛”中，共产主义世界输给了资本主义主义世界。

比起“美帝阴谋论”来，“民主亡国论”含有的真理更多，更富于启示。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激进民主亡国论”。那就是说，在本国没有民主土壤，国民对民主毫无认识，从未在微观上实践过民主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就在一个古老的专制国家骤然实行民主国家制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立刻四分五裂。苏联东欧出现的事，其实不过是辛亥革命的重演罢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两个理论含有表观上的说服力，所以它们哄信了国内大部份人民。因此，这正确的应对措施当然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美，抵制民主，强化国家“主权”，用暴力去无情镇压一切分离主义理论和实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某些所谓“民运人士”也跟着共党重复这“主权”论，刘国凯先生最近的大作就最生动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

奇怪的是这些人迷信“主权”的同时，却会忘了欧盟的例子。欧盟成员国虽然都是独立国家，但彼此间的经济纽带非常紧密，成员国各民族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更得让我们这个统一国家垂涎三尺：我在欧洲的时候，还从来没看到德国人歧视法国或英国人，反之亦然，更别说那些辱骂其他民族是“猪”是“狗”是“奴”的煌煌文彩。

最主要的是，如今在中国走俏、红极一时的“民族主义”本是欧洲的土特产，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和实践整个是从那块土地上诞生的，咱们不过是拾人唾余罢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国际战争，恐怕加起来也没有欧洲多。可如今就是这民族主义祖师爷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这变化完全是自发的，不但没有个“欧盟联邦

军”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平叛”、“镇暴”，而且您要想退盟随时请便。有趣的是不但没人退，争着想进又进不去的国家还嘟嘟囔囔咒天骂地，说谁谁那穷鬼都给批准入了农会，我这富农怎么反倒不获批准？

说起来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住在美国的那些“主权”论者们只记得南北战争，却忘记了或是不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一个州要加入合众国先得申请，批准了才能成为那“主权国家”一员。这其实和欧盟也差不多，区别只在于结构的紧密程度不同罢了。这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自愿加盟”。

能看到这点的人，立刻就能明白西欧之路和东欧之路的本质差别。东欧共党帝国的形成和维持靠的是两条，一曰欺骗，二曰强迫。所谓欺骗，就是将共产主义这个弥天大谎奉为国教，以此为各民族提供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作为帝国内部的软性粘合剂，而所谓强迫就是“主权”，或曰枪杆子，它成了从外部强行箍住帝国的钢箍。这种维持办法当然有效，问题是，世界不是共党一家的世界，外面还有个参照系统。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在反复比较之后，迟早要鉴别出那神圣国教不过是一堆谎言。内部粘合剂给冲蚀了，外部的钢箍就迟早要被那离心力崩断。这就是东欧帝国发生过的事，而这也就是将要在中国发生的事。

那为什么西欧人民和美国人民又会自愿加盟呢？原因同样很简单：人不为利，谁肯早起？合在一起有好处，当然就愿意往一块挤。要和美国日本竞争，一个统一的欧洲当然比一个分裂的欧洲有实力。这说到底就是欧盟诞生的初始原因。

虽然逐利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但并不是唯一动机。例如，现在外蒙经济不如中国的平均水平，如果“回归”中国，不用说可以凭空获得大量金钱资助，而且还能让那内陆国家取得出海口。可

人家根本就不愿和你这“富农”挤一起。为什么？这里没有自由和尊严！就凭“民运”领袖带头污蔑少数民族兄弟是“外族”这一条，凡有起码自我尊严的人都不会和咱们打堆，更不用说还得效法勃兰特，跪下来为七八百年前的“纳粹”祖宗干的事向咱们悔罪道歉！

这也是苏联帝国崩解的原因之一。其实作为统一国家，独联体在经济上的收益更大，起码落后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可以得到财政资助和科技支持，可人家还是独立出去了。

因此，看来要维持国家的统一，唯一的正道是在充分保证各兄弟民族的自由和尊严的前提下，形成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纽带，使各民族地区心甘情愿地呆在这个大家庭里。舍此不由，却去讲什么“国家主权”、“领土神圣”之类的屁话，只会给人家留下一种恃强凌弱的感觉，逼着人家一有机会马上就独立出去。试问谁是天生的贱民，喜欢听您那“外族”、“猪狗”、“畜生”、“奴才”的“爱称”？

所以，在我看来，要维持国家统一，起码要做三件事：第一，全民建立“真爱国就必须爱少数民族”的共识，让人家享受应有的尊严，心情舒畅地留下来。第二，对国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将少数民族的自由逐渐还给人家，实施真正的民族自治。第三，发展经济，形成民族地区和内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强大经济纽带。

这其实也是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下文分别讨论西藏、新疆这两个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以及关注的焦点台湾。虽然台湾并不是民族地区，但处理策略在我看来是一样的，所以一块讨论之。

西藏问题

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达赖喇嘛。由于西藏是政教合一的佛国，不把他请回来，西藏的安定便永远没有希望。而且，客观地说，达赖喇嘛是我最佩服的国际上最睿智的政治家，不是一个不顾现实不讲道理的人。如果他能为民族团结效力，则西藏问题一定能够顺利解决。

更幸运的是，达赖喇嘛并不要求西藏独立，要求的只是西藏的高度自治。我看这要求不但可以、而且完全应该接受。从道义上来说，“民主”总是和“自治”联系在一起。既然民主被许多人认为是民众自己治理自己，那么民族自治当然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功利上来说，自治其实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消除地方对政府、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怨气的手段，中共在西藏执政的实践就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西藏资源贫乏，如果靠自己的努力，根本就达不到现有水平。中共从达赖喇嘛手中接管西藏后，注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技术援助，然而买来的却是仇恨。这当然主要是粗暴干扰、改变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的，但也是藏人没有自治权引出来的怨气。如果中央撒手不管，让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则无论人家是好是坏，都没有理由埋怨你。

照达赖喇嘛的说法，西藏是汉人的殖民地。所谓殖民地，就是被宗主国征服、对之大量殖民并掠夺其经济资源的地方。但西藏根本就不具备这自然条件。因为生理条件不同，汉族无法长期生存在该地，那儿更没有什么可以掠夺的资源。因此，放弃对那个地方的治理权，把进入的为数不多的汉族技术人员撤出来，对汉族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损失。

因此，我的建议是，回到当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上去，把达赖喇嘛迎回来，撤销该地的党政机关，由达赖的政府去接管。此外还可以考虑任命达赖喇嘛为中央政府副

主席或其他相应职务。待达赖政府平稳接管西藏后，撤回维持治安的武警部队，只留下驻军负责国防，同时停止对西藏的巨额财政补助。如果以后西藏出现经济困难，须公开向中央政府申请资助，再由中央明令颁布援助数额。

要这么做，就得像西方那样，公布联邦政府预算，而这正是消除民族间误会、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措施。中共之愚，乃是愚在“宁肯暗贴，不愿明给”上，这也是“花钱买仇人”的措施之一。如今放手让藏人自治，停止对西藏的暗贴，当地生活水平肯定会下降。这就给了普通藏民一个机会去认识过去被他们忽略的汉族的支援，有助于营造藏汉亲善气氛。当然，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该援助还是得援助，但必须先有这么个比较期，恢复援助后还得明给才行，再不能做那种暗贴买仇恨的事。

如果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使以后中央政府倒台，全国大乱，西藏趁机独立，则也不会给汉族人民造成什么生命损失。留在西藏的只是驻军，武装集团要逃出世界屋脊当然比平民容易。如果不这么干，那么将来国家不崩溃则已，一旦垮了，进藏汉民根本不可能徒步逃出那种绝地，只能延颈让人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就算人家不杀你，把你赶出家门来，你也绝对只会死在回内地的路上。

其实比起新疆来，西藏问题要相对容易解决得多，因为它基本是个单一民族居住的地域，而且绝大多数信仰和平的佛教，西藏完全是中共的愚昧操作逼反的。趁达赖喇嘛还在世，现在是赶快补过的时候了。他去世以后，手下的人可没有他那么通情达理。所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奉劝北京当机立断，迅速迎回达赖喇嘛。

也许，因为达赖喇嘛宣布自己不再转世，中共便暗自指望拖到他去世，靠自然过程来拔去这个眼中钉。他们看不到达赖在维护西藏安定团结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根本就不是什么世俗的政权可以取代的。所以，趁达赖还在世，赶快沾人家的光，借佛爷的金口

来确定西藏的地方政府地位。由活佛在世确定下来的东西，后世便再难反悔。不此之图，就算达赖喇嘛去世了，就算他不再转世，总会冒出来一个亚级别的活佛取代他。那人是否有他那个政治智慧完全在未定之天，而中共当局控制的“班禅”已被达赖宣布是伪劣假冒，根本不会有什么感召力。所以，奉劝北京还是趁早看清形势，早日迎回达赖喇嘛这个治藏的关键人物。

新疆问题

客观地说，要说“殖民地”，新疆比哪个民族地区都更像些。首先是大批汉族移民在那儿，其次是新疆的大油田在国民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解决新疆问题就比西藏复杂得多。那儿不但没有个达赖喇嘛式的人物，而且也不是由单一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和西藏接壤的外国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明与西藏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但新疆的许多少数民族在邻国中是多数民族，彼此之间文明同源度很高。更重要的是，那儿的少数民族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正如世界历史表明的，迄今为止，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伊斯兰教文明最能成功地抵抗外来影响。马列主义在全世界风行一时，对伊斯兰教国家却基本上没什么触动，而现在世界上正在轰轰烈烈上演着极端伊斯兰教徒暴力抵抗西方文明入侵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因为这些特点，新疆的民族问题大概该算最复杂、最难处理的。的确，清室是中国有史以来处理民族问题最成功的政权，但即使在那时，新疆回部也始终是个问题。鉴于这个具体“省情”，那个地方的改革必须慎之又慎。努力的最后目标当然是民族自治，但与西藏不同，决不能仓促撤出政权机构，骤然把自治权交还给当地

少数民族，否则一定会反倒害了当地的少数民族，让那个地区变成第二个前南斯拉夫。

尽管有这些特殊情况，但咱们仍不能放弃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两句话，“化强迫为自愿，化殖民地为生意夥伴”。换言之，就是用先进的生活方式去战胜极端伊斯兰教徒的影响，用“糖衣炮弹”去对付人家的“圣战”。说难听些，那就是把普通人的热情从宗教上转移到发财上来。当新疆在经济上变得繁荣起来并和内地形成了不可切断的经济纽带后，再逐渐放权实行民族自治。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共当局如今提出来的“开发西部”战略非常英明，但具体没有什么措施，力度更谈不上。其实，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新疆应该获得最大的财政补贴，拆沿海发达地区之东墙去补新疆之西墙，人为地扶植那儿的经济成长。只要经济起飞了，在取消户口管制后，该地自然就会吸引大量内地居民前来定居，而当地少数民族发了财后，也就有能力去内地投资，普通的原住民就能去“民族大款”开办的内地企业就业（必须立法规定优先雇用少数民族员工）。如同美国的榜样显示了的，这种基于自愿基础上的双向人口流动，有助于国家在自愿基础上的统一。

在经济还必须采取一个消极防御的应变措施，那就是无论是油田的勘测、开发和经营都应该私有化，国家公开招标拍卖，把外国商人、当地民族大款、内地商人统统拉进来作股东。这样，万一将来新疆独立了，内地也不会因此丧失控股权。而且，因为利害攸关，国际社会也就不会赞成那儿出现骚乱。

此外，要让新疆在经济上起飞，必须把石油工业当成龙头产业，建立一系列的下游企业诸如精炼、石化等子企业。这些企业也一定要像母企业一样，把外国人、少数民族、汉人拉进来作股东。这些企业如果办成功了，则一定会带动整个地区的起飞，完成从游

牧文明到现代产业文明的过渡，并把内地人口吸引进来。在当地的中产阶级成了社会成员大多数之后，也就再没多少人愿意舍身从事恐怖活动，杀人放火搞爆炸了。此时便是逐渐放权，成立民族自治区之时。

我在先前的文章中说过，要实现这个和平演变，软前提是一定要破除大汉族主义亦即种族主义。和西藏不同，共军并没有在新疆大开杀戒。民族关系紧张除了文明冲突特别是宗教冲突外，最主要的还是民族间的偏见引起来的。据我所知，当地汉族对少数民族普遍抱有一种轻视心理，完全意识不到这是在买祸，逼反少数民族。中共当局必须针对这个弊病痛下针砭，让“要爱国就必须先爱少数民族”的观点深入人心。做不到这一点，则上面说的一切不过是空谈。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少数民族问题。恕我坦率地说一句，那是个事实上的“两个中国”问题。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立即便要进入理论上的死胡同：您说是一个中国，好啊，那请问谁是中央政权，谁是地方政权？这“中央”与“地方”之分似乎不是比块头的事，谁更臃肿谁就是中央。

要明白这一点，有点常识就够了。所谓“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指的是上下级隶属关系，请问您大陆政府可曾管过台湾政府一毫微秒？所以，如果要维持这“一个中央”、“一个地方”之说，恐怕就得有一方是叛乱的地方政权。那您说究竟是谁叛乱啊？中华民国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38 年就成立了，世上哪有先成立的政权去背叛后成立的政权的笑话？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何两岸那么多人就无法看穿这一点，无法接受这“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大陆的统派不必说，台湾的独派也同样糊涂：您要打出“台湾共和国”的招牌去，就等于放弃了中华民国这最有力的法统依据，宣布自己是叛乱政权，听任大陆来“平叛”。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国际社会总是尊重实力、尊重现实利益，因而尊重既成事实的。根据这国际惯例，中央政府有权平叛。您自己放弃了“中央政府”权利，人家来打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大陆打败了，您当然获得了独立，但也焦头烂额惨不忍睹，大陆打赢了，国际上嚷嚷两声，顶多抵制十几年，到时中东暴徒去炸了哪儿的大楼，老美又得忙着解禁讨好中国，谁还记得您那小岛上发生的事？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为两岸计，我看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阿Q爷爷发明的“精神胜利法”，两岸都装作只有一个中国，而自己就是那中央政府，保留让对方“回归”的神圣权利。我想来想去，这的确同时符合两岸人民利益的唯一妙策。大陆现在练“易筋换髓功”正练到紧急关头，一不小心就要走火入魔，端的是危机重重，风雨飘摇，根本不是对外称兵用武之际，只要大面子上下得去，就不会去寻台湾的晦气；而台湾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是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但能让大陆心花怒放，更对自己有利，增加了与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后大陆再来谈“回归”，您就说：行啊，我是正统的民选的中央政府，您是叛乱坐大的地方政权，请您来回归我，只要您一点头，我马上派出官员去层层接收，好不好？看他们还有什么后话可说？

坚持“一个中华民国”的神话不仅能让中共心花怒放，保住了对方最重要的面子，而且能让海外华人归心。而台独除了能吸引部份（不是全部）本省人的支持外，还能有什么好处？要冒的现实风

险可是大得多。权衡利弊，我真不明白陈水扁来的是什么劲，而呼应他的人为什么还那么多。

此文当然不是只为台湾当局献策，而是着眼于化解两岸之间毫无必要产生的戾气。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利益》中说过，现在的实情是，大陆没实力去“解放”台湾，台湾也冒不起独立的风险。既然如此，就乾脆让后代子孙去理清这乱麻。这的确是唯一的对两岸人民有利的解决方式。在这期间，大陆可以拼命发展和台湾的经济关系，通过经济纽带把台湾捆死在大陆身上，而台湾可以从这经济关系中一边牟取合法暴利，一边等着看，就这么拖上半个世纪几十年。到那时大陆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不是变成了一个更自由、更发达的民主国家，就是让共党腐败政权、民族分离分子以及暴力“民主”革命党人联手搞垮，碎成了七八十片。如果是前者，台湾就和大陆统一又何妨？如果是后者，台湾要独立还有谁来拉得住？

从大陆这边来看，必须认识到当前统一台湾根本就不现实。越操之过急、越强调自己的“历史依据”、越用“民族主义”去煽起毫无实际作用的偏激民意，就越是拆自己的台，不但把自己逼到“不打就无以向国民交代”的死角中去，而且毫无必要地伤害对方的尊严和感情，完全是在逼反台湾。因此，中共当局必须全面修改对台战略，牢记“缓、渐、稳、宽、和”五字真言。

具体说来，这真言的操作原则是，切忌急于求成，急统只能逼反台湾。至少要以五十年为期，缓慢地、逐渐地、稳定地实行统一战略。在目前阶段，应该实行老邓定下来的英明战略，改善两岸关系，发展经济交流，营造经济纽带，同时还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民间的仇台辱台喧嚣，将“爱国必须爱台胞”的观念注入每个国民的心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对方的敌意，改善自己的狰狞形像，赢得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心。与此同时，必须立即停止“金钱外交”，停止

在国际上慢性绞杀台湾，以“最终必须实行统一”为先决条件，援引当年苏联、立陶宛、白俄罗斯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先例，允许台湾以中华民国身份加入联合国以及和其他国家建交。这就是“宽和”的攻心之计。它才是赢得台湾人民好感、剥夺独派民意基础的上策。

更重要的是，中共当局必须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国家逐渐改造为一个繁荣自由的现代民主国家，台湾人才会自愿来归。如果五十年后加入中国大家庭跟加入欧盟一样只有好处，人家自然会迫不及待地挤进门来。不此之图，想靠武力征服对方，就算打赢了，也不过是又弄来一个背不动的包袱，一有风吹草动，武警就得出动去“镇暴平叛”，还得像养香港似的把白花花的银子向那个无底洞里倒。请问那究竟有什么乐趣可言，嗯？

从台湾这边来说，如果大陆当局真的采纳了蒙面草民老芦的高招，那也是对台民有利无弊的美事。眼下咱们坛子里就有位主张台独的洪哲胜老先生，他要是乐意，不妨出来挑挑这方略的毛病，说说它究竟对台湾人民的福祉会造成什么危害。

2002 年 8 月 18 日

就民族问题答网友

拙作《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贴出后，网友 whopper_junior 先生发帖质疑。拜复如下：

先生说："在下出（初）来乍到，绝对无意向老芦挑战。"

老芦何幸，能蒙先生如此"挑战"！如果网民都像先生这种"挑战"法，则中文网河清有日，民族成熟有望。一个本是供人讨论的地方被化作咳吐大赛场，随便哪个洁身自好之士恐怕都要鹰扬。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眼下以 X X 先生为一方，众多汉族网友为另一方的争论，似乎没有多少意思，因为那些历史烂帐再刨下去，只会刨出仇恨来，丝毫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先生在此无聊喧闹中高标独调，令人钦服。

我得承认，无论是对西藏问题还是对其他民族地区问题，我都是个彻底的门外汉。写那篇文章的目的是抛砖引玉，为大家提供一条新思路，请大家讨论可行性而已。如今欣见先生回应，这番心血毕竟没有白费，在此谢谢先生。我的回答肯定是破绽百出，请大家指正。

关于维护祖国的统一问题，我的态度是，其实所谓统一或独立只对君王有意义。只要人民生活幸福，便住在比利时、卢森堡那样的小国里又何妨？但话虽这么说，人还是得尊重现实，而这里有两个最大的现实不能不尊重：第一是汉族普遍的传统的"大一统"观念，这种观念深刻入骨，连我这种明达之士都无法摆脱。如果一国国民不论政治倾向如何，对这个问题都偏执到走火入魔的程度，那么这就是考虑问题时不能不尊重的最基本国情，否则一定会引出大

乱子来。第二个现实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和民族间矛盾尖锐复杂之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维持统一，否则立刻就要变成南斯拉夫式的大屠场。正是从这两个基本国情出发，我才主张实行民族和解，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现在问题最突出的民族地区，在我看来是新疆和西藏。内蒙其实没有多大的独立可能，其他民族地区就更不用说了。两年前我写了几篇文章驳斥自称是金碧辉幺弟的网人，其中说：未来中国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民族独立，但我敢断言决不会出现满族独立。有位满族网友看了此话，上帖质疑，说是如果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照样会出现“满独”。那个帖子我没答，不过觉得这话太不现实：满独？上哪儿独去？美国黑人为什么不来个“黑独”？根本就没有个基地么！类似地，像宁夏那种内陆地区，独立的可能性也不大，至少是没有现实基础。所以，最有现实性、也最令人头痛的还是藏与疆。

藏和疆的价值又不同。西藏对中国只有两个价值，第一是精神上的价值，因为占地广大，能满足国人的“地大物博”的廉价优越感。第二是国防价值。失去西藏，就等于在中国软腹部打进个巨大的楔子。少数轻骑自高原上飞将军自重宵入，便能轻而易举地截断河西走廊，断绝内地和新疆的交通线。西藏独立后形成的战略势态很像外蒙独立。70 年代中国要和老大哥摊牌，让小芦忧心如捣。谁都看得出来，倘老修在外蒙的快速装甲部队倾巢而出，截断内地和东北、内地和西北的联络线 （那是中国最细的两个脖子，割断毫不费力），便是个“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的惨不忍睹的模样。

但西藏的价值也就仅此而已。那地方和月球表面一样荒凉，毫无资源，即使有未探明资源也毫无经济价值。又没有移民价值。在这点上，它和新疆还不同。新疆第一是有许多汉族移民在彼，一个

负责的政治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人的命运。第二是那儿的油田将在未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中起到重大作用。因此，处理这两个地区的策略便不能雷同。我的建议是，迅速放西藏自治，只留驻军。这样既保留了它的国防价值，又免去了后患和其他麻烦。但新疆就必须抓得很死，先把那些油田私有化了，变成不会因独立而丧失的财产。再人为搞富那个地区，以此冲消境外极端伊斯兰教徒的暴力倾向影响。当民族和解实现后，再逐步放权实行自治。从先后顺序而言，西藏应该是最先获得自治权的地域，而新疆应该是最后，因为那儿是最可能爆发民族间武装冲突的火药桶。

基本原则说完了，下面试着逐条回答你的问题：

“ 何谓‘西藏’？

老芦强调‘达赖喇嘛是我最佩服的国际上最睿智的政治家，不是一个不顾现实不讲道理的人’。依我看，在西藏的版图划分上，达赖喇嘛就很不讲道理。达赖喇嘛在‘五 点和平计划’中指出，‘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 藏’。所谓大西藏，不但包括今天的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整个青海，半个四川，半个甘肃，四分之一个云南以及新疆自治区的南部，面积将近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比西藏自治区面积大了一倍，不但涵盖了全部藏人聚集区，还包括了大面积的非藏区，有17个非藏民族在那里居住，甚至连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汉人的河西走廊也被划入了大西藏的范围。不知道达赖喇嘛这么划分地盘的‘道理’何在？

想当初达赖喇嘛出逃的时候，他的势力范围也不过就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即便是清朝和民国时期，达赖喇嘛的行政管辖范围也没有超出卫藏），如今他两手空空回来，却狮

子大开口，要的地盘比原先大了一倍，中共对达赖不理不睬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所以，要想让中共心甘情愿地把达赖喇嘛迎接回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版图划分上的巨大分歧。这个问题老芦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老实讲，我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达赖喇嘛有更大的责任，这正是他‘顾事实，讲道理’的一次机会。”

愚以为，达赖那狮子大开口认不得真。这正如 70 年代中苏吵边界问题时中方提出要恢复到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似的，不过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一种谈判策略而已。中方的应对策略可以很简单：亮出不容谈判的底线来：退回到 17 条协议时的状况，请你不费一枪一弹回来再作西藏王。西藏的边界就是现有的那个，你干便干，不干拉倒，请你继续去作流亡政府首脑。我敢担保，这条件开出去，他老人家一定会跑得脚后跟朝前！中国和他谈判从来就没提出过这种令人无法拒绝的优厚条件，你要让人家通情达理又有什么可能？如果达赖不是那么睿智，岂会获得诺贝尔奖？莫非那玩意真是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诡计？倘如此，人家为什么不发给民运人士？我有幸看过几次电视采访，对此人的智慧、风度、公关本事佩服到五体投地。无论国外国内，我还真没见过谁可以与之比肩。

“ 如何自治？

所谓自治，无非就是想用香港模式来解决西藏问题。不过，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实行，一个关键前提是必须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实现完全的隔离，只有隔离才能‘两制’，否则就是一国一制了。隔离的重要，在59年西藏叛乱中显露无疑。早在1951年中共进军西藏以后，曾在西藏实行过事实上的‘一国两制’（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和内地的社会主腹伫度）。然而，由于在’藏和青海、四川之间芓有实现严格的隔离，导致青海、四川的藏族贵族首先叛乱，最后事

情闹到拉萨，导致了1959年事件。鉴于这一教训，中共在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实行了严厉的隔离政策（主要是控制大陆人去香港），很多大陆人因而感慨香港回归以后更难进入了。

然而，香港地理上是一个小岛，隔离起来并不难，但要想在方圆120万平方公里、遍布高山雪原的青藏高原实现隔离又谈何容易？不事先隔离就‘一国两制’，完全有可能重蹈1959年的覆辙。”

愚以为，先生受王力雄那本书影响太深。那书说的当然不错，但现在时移世易，早不再是当初那情形了。当时中共在西藏周边的藏族地区搞“民主改革”，解放农奴，逼反了那些地区，终于波及到西藏去。但现在中共根本没必要再在那些地方搞什么运动。如果西藏高度自治，根本也用不着隔离。因为西藏是经济落后地区，不是香港那种发达地区。到时只会有想发财的西藏人往外逃，哪怕您跪下去给人家磕头，恐怕也没哪个汉人愿意偷渡进去。所以边界完全可以敞开，任人自由来往。藏民如想往拉萨或日喀则朝圣只管请便，愿意永久移居该地的更不反对。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隔离必要，先生说呢？

“藏人的内斗如何解决？

正如王力雄、徐明旭等人指出的那样，‘藏人’早就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而是有彼此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藏人。如今西藏的中共各级干部中藏人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基本上不学无术，且早已经被流亡藏人看作‘藏奸’。这些人别看正经本事没有，搞阶级斗争倒是十足的内行，再加上人员众多（保守估计6万多人，再加上家属应在二、三十万之众），西藏‘自治’后，这些人一定会与回到西藏的流亡政府发生对抗。很明显，西藏一旦独立或者高度

自治，首先倒霉的肯定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但有捍卫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动机，也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现成的组织体系，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与西藏民主政府作对抗。

这样，西藏将永无宁日。”

我看这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把这些人撤回内地来就完了。人数毕竟不是很多，完全可以在内地安插。愿意留下者，则请他们去和达赖政府谈判，以个人身份申请工作。一个跨国公司要倒闭都可以大量裁员，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让这区区少数人变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

“西藏的财政供养一笔勾销就行了吗？

老芦说西藏高度自治后，应该‘取消巨额财政补贴’，并且‘如果以后西藏出现经济困难，须公开向中央政府申请资助，再由中央明令颁布援助数额’。但问题是，西藏对内地的经济依赖性是相当大的，离开了财政援助，现在的西藏社会恐怕连几个月的运转都很困难。所以，即便在西藏实现了‘高度自治’，中共也有大量的手段可以对西藏政府施加影响。更何况，拨到西藏的钱都是内地百姓的血汗钱，中共当然有权利过问这笔钱的用处，不要说像中共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即便将来实现了民主化，选民提出‘监督我们的血汗钱的去向’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一个经济上不能自主的地区，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更何况，西藏现在成了中共的大包袱，对藏援助早已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承受范围。事实上，对藏援助很大比例都是以各个地方‘对口援建’的形式搞的（今天广东给弄个医院，明天福建给盖个工厂什么的），老芦提出的仅仅通过联邦政府预算来解决援藏问题，恐怕不太现实。

> 老芦豁达开明的民族观在下十分佩服，不过，正是一些看起来很琐碎的现实问题阻碍了民族问题的解决。也许还是王力雄说的对，西藏问题‘无解’。”

“一个经济上不能自主的地区，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这话很有道理，这也是西藏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西藏以前确实是自治地区，这似乎也是事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共接管西藏后，如同奉养双亲似地把藏人养了起来，惯出了他们比较现代的高生活水准。“由奢入俭难”，西藏高度自治后，这势必构成达赖政府最大的难题。

达赖其实对此心中也有数，他的解决方案似乎是靠佛教宣传使人民回归清心寡欲、安贫知足的精神状态中，由此来获得政权的稳定性。这玩意是否解决问题，我非常怀疑。不过，我仍然觉得我的方略基本是可行的。那是否“真正自治”，其实并不是什么“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问题，而是不要去管人家内部事务。所以，我主张放手让达赖接管，不管他怎么踢天弄井都是他的事，咱们管不着。如果经济大幅度跌落，人民不满，让他去尝尝那焦头烂额的滋味，也让老百姓知道内地各族人民以前对他们的援助。如果出现骚乱，除非达赖政府主动邀请，否则中央决不派兵弹压。等到他们实在吃不住劲了，再出来收拾残局，恢复援助，但除了不准官员贪污外，人家爱怎么用那钱是人家的内政问题。在这上面的处理原则，应该仿照当初共党国家之间的“兄弟援助”原则，不能去以任何形式“对西藏政府施加影响”。唯一例外的是国防和外交，这是联邦政府的权责，地方政府无权置喙。

联邦政府能否承担起西藏的经济负担来倒确实是个大问题。我觉得，解决的方法是，可以放手让西藏人去作国际丐帮。达赖是国际公关第一高手，我深信他有本事要到足够的钱来维持西藏运转。如果要不到，中央给了一定资助后，可以让他到内地沿门托钵，要

得到要不到那是他的事，咱们不必太为人家操心，说到底，是他要自治，求仁得仁又何怨？难道还能赖到汉族头上来不成？不管怎么说，应该相信人家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人家还不是活了下来。

总而言之。西藏问题必须解决，必须迅速解决，必须在达赖在世时果断解决。“西藏问题无解说”只是掩盖自己缺乏政治智慧的遁词而已。解决西藏问题不但有助于中国实现民族和解和长期的安定团结，而且能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中外关系。须知鬼子们一百个中有一百零零点一个站在达赖那边，谴责中国“侵略者”。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定能极大地消除中国那个“共产恶魔”的传统形象。

再次谢谢先生回应。

2002 年 8 月 24 日

写给出尘公子

刚才看见出家恶少的大作，免不得倚老卖老说上两句。

我说小出，你那篇文章提倡沟通的主旨我完全赞成，不过你写作的对象完全弄错了。如果一位不了解事情先后经过的人看了你那玩意，肯定要以为ＸＸ先生是个不讲理、无法沟通的蒙独分子。这可就离真相十万八千里了。

整个事情是这么起的：前三四个礼拜，ＸＸ先生在《说东道西》论坛贴出一篇综合性文章，收集整理了各个民族兄弟网友批驳南乡子的文章。那文章完全是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立场上的，但遭到了许多网上流氓的羞辱。我看了以后便情不自禁地出来喝彩，连我也被污辱进去。此后ＸＸ先生写了篇《夷夏之辨可以休矣》，那文章虽然情绪很强烈，但客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人家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还是坚持民族团结。那文章的主题是反对南“强制同化”的反动主张的，强调今日还要人为硬分“夷夏”、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荒唐。

可这么立意如此明确，如此正确的文章却惹恼了一干种族主义者，刘国凯先生为此写出一篇从头到尾充满着种族主义气息的妙文，一面歌颂明成祖那种汉族侵略者，甚至把奴儿干都司那种军事扩张基地当成中国神圣领土的证明，一面历数满族和蒙族那些“外族”在历史上的罪恶，要人家像勃兰特那样给咱们汉族跪下来道歉，甚至把南乡子那类法西斯分子说成是袁崇焕，把我说成是害死袁的梁庭栋。与此同时，刘还推出了《中华民族：一个善良的迷思（芦按：“迷思”乃 myth 音译）》，说所谓中华民族包括 56 个少

数民族完全是一种神话，所谓中华民族就只是汉族。根据刘在其他文章中泄露出来的种族主义主张特别是对中华民国的歌颂，不难看出他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把少数民族开除出中国的大家庭。可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像一切法西斯主义者一样，特别强调“国家主权”。这就意味着他要的其实是人家居住的地方。如果这种“民主领袖”一旦当国，那纯粹的“中华共和国”必然是汉族的一统天下，而少数民族那些“外族”肯定不是步二战前德国犹太人的后尘，就是像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黑奴一样给打入另册。

21 世纪有这种胡说八道不足奇，奇怪的是这种法西斯主张居然是从所谓“民运”领袖嘴上说出来的，更奇怪的是除了老芦之外竟然无人出来驳斥，更更奇怪的是那通篇污辱少数民族、造谣诬蔑污辱网友的垃圾文章居然给选入导读！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小出如果身临其境，能否还能做到与人心平气和地沟通？你只看见ＸＸ先生的激烈话语，看不到他蒙受的无数污辱。别的先不说，光那些先骂人家“德性”、污辱人家是北京小姑娘骂的“流氓”，后连人家整个民族都糟蹋进去的流氓话语，你小出能忍受吗？跟这样的网上流氓，请问你怎么个沟通法？现成话说起来容易，你当初为何不去跟骂你“小畜”的网上流氓沟通？

就连你自己也似乎不具备沟通资本，因为你连人家的基本主张都没弄明白就乱开口。我虽然和ＸＸ先生不熟，但人家才写了两三个帖子就赢得我深深的敬重。人家不但不主张独立，甚至还拥护台湾回归，而且最担心的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变成巴、以那样化解不开的世仇。如此忧国忧民的襟怀，刻下国内醉生梦死的同胞中又找得出几个来？你却不伦不类地跟人家说什么“你要战，便作战” 。请问谁要打仗啦？哪儿去找不怕死的共产党？而且，你居然看不出蒙族兄弟的汉化程度之高，已经使得他们对汉族文化有了一种难分难舍的感情。那么多的蒙族人在网上骂汉族，却没有几个藏、维族上

中文网，这本身其实就很说明蒙独不是什么严重的现实危险，是一种值得庆幸的事。蒙族兄弟那骂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结宣泄。不管怎么说，汉文明是一种很有魅力很美的东西。我深信ＸＸ先生也溺此不拔，内心深处恐怕对汉族及其文化有一种又爱又恨的情愫，只是他大概不愿公开承认而已。当然，你还年轻，看不出人家深层的思维活动来也难怪。

你对此坛网人特别是所谓“汉奸”们的一般评价也太高了。许多人出国后其实改变的只是政治主张，不是素质。不仅如此，这些人其实养成了三个新的“西崽劣根性”：一，逢美必赞；二、逢共必骂；三、自以为见识远远超出国内同胞。正因为他们到西方一场，却如入宝山空手回，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内里深埋的党文化和传统劣根性就暴露出来。这不是什么个人尊严的问题，只反映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在许多天天接受“糖衣炮弹”的海外华人中间还无法扎下深根，不过是个虚伪的点缀。那镀上去的一层薄薄的金，很容易便被种族主义的激情突破。在我看来，这就是ＸＸ先生光临此坛后遭到围攻的真实原因。

所以，你那“如果本坛汉奸容不了你，那么随便哪个地方的汉人都容不了你”的宣告毫无力量，至少代表不了我，大概也代表不了另一大汉奸老马。能一度和ＸＸ先生对话，是我上网史上个人值得纪念的一页。我也分享他对此坛的失望。此坛汉人对他群起而攻，在我看来，只反映了汉族的气量狭小，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民应有的气度和心胸差距实在太大太大。

我和大汉奸马悲鸣打过好几次架，不过这家伙有句话深得我心。那时他和一位蒙族兄弟在网上对话，说他最景慕的是那些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冒着危险，把南方的黑奴从“地下铁路”偷运到自由的北方的白人人道主义者们。老芦不敏，却也分享他这种崇敬，

愿意毕生追逐这些先贤的足迹，哪怕人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外”而又“外”的“外族”。

2002 年 8 月 24 日

关于民族问题一系列文字之补遗

最近比较忙，文章现写现贴，来不及从容斟酌，过后才想起来忘记了若干重要的内容，在此补充一下。

（一）关于台湾问题

我在《再探维护祖国统一之道》中建议中共当局容许台湾加入联合国并与其他国家建交时，说的是“应允许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一条根本没有现实可能，应该改为“中共当局应容许台湾以‘中国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并和其他国家建交”。

此外，我觉得在和大陆的谈判中，台湾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中华民国”作为统一的前提，提出来将大陆的军，我估计大陆虽然号称“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但绝对不会同意这一条，因为这个口子一开，就等于彻底否定了中共在已故魁首毛泽东领导下的长达半世纪的革命其实是叛乱活动。但这个要求在台湾来说完全是合理的，中共也无法从法理上驳倒：台湾是日本人交还给中华民国的，没还给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你既然要把台湾收回去，最起码的一条就是得证明你是中华民国那物主。如果你连个名义都不肯改，还怎么让世人相信你有实质上的诚意？

此招不过是教台湾有效地推搪大陆的统一攻势罢了。之所以献此策，是我觉得台湾应取的策略是个“拖”字诀，这最符合两岸人

民的利益。拖个几十年，如果大陆让共党腐败政权、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们联手弄垮了，碎成补不起来的七八十片，则台湾大可安全地独立。如果眼下大陆的腐败得到有效整治，改革经受了民族分离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们的两面夹击，国家转危为安，则大陆将变成更繁荣、更富裕的现代民主国家。到那时国民普遍具有了现代文明意识，一定会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到时是统是独，可以由台民投票决定。我相信，那时台民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消除了对专制政体的恐惧，很可能会选择加入中国这条路，就像如今的欧盟成员国似的。即使人家不愿加入，只要两岸结成了实质性的良好经济关系，台湾便独立又何妨？

（二）答 whopper_junior 先生补遗

一、关于“一国两制”和隔离问题

这个问题昨天已经谈了，但不完全。现在西藏境内和周边地区都是一个制度，即处在血腥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当年的封建领主已经基本化作了白骨，而农奴制再也不可恢复。所以，如果达赖重作西藏王，他面对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西藏。如果他真是像其公共形像展现出来的那个现实主义者，则他很不可能去复辟昔日的制度而带来社会大混乱。其实他本人对西方传媒一直说的是一旦重新当政，一定要实行民主制度。这当然可以看成是他的宣传攻势，不过我觉得流亡政府人数稀少，长期脱离实际政权机构，缺乏实际施政才能，他们的影响主要是宗教上的感召力，而不是世俗的力量。要靠那几个残兵败将，在西藏全面“反攻倒算”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达赖返藏，最大的可能是率由旧章，不可能改变根本的社会结构。

这当然不是说达赖不会改变西藏人的精神面貌。据达赖自己阐述的政纲，未来西藏人将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除了点旅游业外不发展什么工业。这就是说，“现代化”和西藏没有什么缘份，藏民将在宗教追求而不是物质追求中获得愉悦。我个人觉得这当然是很明智的纲领，因为西藏确实不具备现代化条件。但要在万丈红尘环绕之中营造这种“香格里拉”，恐怕比毛建立“理想国”还困难。当然，西藏的好处是它天生的地理隔绝。或许达赖能成功也未可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1959 年的情况不会再现。西藏和周边地区现在的社会结构没有多大区别，在达赖重返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也不会有什么高反差。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可能出现的差别只是富裕程度上的，而这并不会引起周边地区或西藏内部的骚乱，只会把某些宗教信心不够坚定，无法安贫守苦的藏民从西藏吸引出来。达赖可能会对此不高兴，但这并非内地或中央政府的错，就象福建农民可着劲地往国外跑似的，就连中共当局都没脸去赖帝国主义。

即使如此，在迎回达赖前，中央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到未来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关系问题。一定要在条约中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围。居住在此范围之外的地区（如青海、四川、云南）的藏民可以以自治县、自治州的等级实行自治，可以奉达赖为宗教领袖，但地域不归西藏世俗的喀厦政府治理。我看不出这种安排会为未来播下什么祸种。

这“一国两制”其实是我党发明的一个混乱无比的用语。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民族地区都实行民族自治，只是实施起来有先后之别，西藏不过是个先行试点而已（这是 17 条协议赋予西藏的特殊地位，别的民族地区没有，所以不能抱怨）。因此不但西藏实行自治，西藏周边的藏族聚居地区也实行自治，只是与西藏在行政上没有统辖关系。如果真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什么 1959 年间的制度差

别，足以引爆叛乱。所谓民族自治，就是让各民族自己去管理自己，人家爱怎么过就怎么过，爱实行什么制度实行什么制度，爱走资也好，爱安贫守穷也好，都是人家自己的事，外人无权强暴。如果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其实 whopper_junior 先生没意识到，香港的问题不光是个一国两制的问题。论经济制度，香港和大陆现在究竟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除了发达程度外，最主要的是人家是先进的法治地区，现在又在尝试实行民主。大陆隔离香港，除了杜绝那儿可能散发出来的不利的政治影响外，主要是怕全国人民一窝蜂跑那儿去淘金，把那臭岛压沉了，如此而已。类似的问题在西藏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民族心态的根本差别，达赖根本不可能变成汉人的活佛。中共没什么可担心的。

二、关于藏共干问题

徐明旭的有关文章我看过，我始终觉得他的主要论点经不住推敲。就算藏共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盘根错结的势力，总大不过苏共、蒙共、越共去吧？但苏联和外蒙都成功地实行了社会转型，并没见到既得利益集团起来暴力反抗。就连越南也这样，现在该国的政策和黎笋、范文同当政时截然不同。为什么在西藏就会变成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实对国内的情况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就像我在小说《虎子的天空》中写的，不知不觉之间，大款们不再是当年的大款，“公仆”也不再是当年的“公仆”，整个社会上层都在悄悄地更新换代。如同内地一样，1959 年以后培养起来的老藏共干不是退休便是进了西藏七宝山，现在当家的是一彩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出来的少壮派。那些人的汉文水平比网上汉族愤青水平还高，头脑灵活，具有

现代意识，不是什么冥顽不灵的文盲老共干，很容易就能和达赖手下那些精通英语、具有广泛的深入的世界知识的少壮派尿进一把夜壶里去。如果中共要从西藏全面撤退，势必要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达赖政府那点单薄的人力，又是人地两生，有的第三代连藏语都不会说，根本就不可能全面顺利接管。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为了平稳交接，达赖也会留用大量的旧政府人员，这就免除了藏共干的后顾之忧。现今的人都是实用主义者，到时忙着拍新上司的马屁都还来不及，哪里会去舍命打内战?

三、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

如同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一样，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是我党，而这就是令人最丧气的。要说愚昧，共党才是真正的惊天动地的愚昧。我敢断言：老芦这些方策完全是白写，绝对不会被共党采用，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胆识。

解决西藏问题和其他民族地区问题的关键措施是实行民族自治，而这恰恰是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条。你既然允许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当然接下来也就是汉族自己治理自己，这就意味着共党必须逐步还政于民。这种“亡党亡国”的事，哪个党魁敢拍板？

另外一个问题是宗教权威问题。共党之所以疯狂迫害法轮功，说到底是它的毛共残留性质使然。共党和历史上有过的专制政权不同的地方，是它本质上是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意识形态上的权威存在。因此，为了国际公关，它不得不容许天主教存在，但决不容许教会和梵帝冈有任何联系。不难想见，如果达赖真的返藏，势必要形成全藏人民以及周边地区的藏民的膜拜对象，成了独立于中共世俗权威之外的一个精神领袖。作为全国人民当仁不让的“教父”，中共最恨的就是这种事，而这正是李老师撞在枪

口上的原因。他们既然连对个吹小号出身的同志都会动如此干戈，兴许大风浪，又怎么能容得达赖隐然和北京分庭抗礼？

所以，我早在以前的文章中一再说过，中华帝国一定会崩解，神州大地一定会变成南斯拉夫式的修罗场。这不是说中国问题“无解”，也不是没人能想出解决方案来，而是说朝野两党，无论是当政的中共，还是民族分裂主义者或“民主”革命家们，都没那个眼力看出迫在眉睫的大难，更没那个胆识去解决那一系列的难题。

2002 年 8 月 25 日

关于西藏问题再答网友

谢谢whopper_junior先生回应，简复如下：

一、关于迎回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可行性

谢谢先生提供的详细信息，补充了我的知识缺憾。其实王力雄的书我看过，而且非常欣赏，只是没像先生看得那么细罢了。看了先生提供的信息，我的疑问是：中共真的按我的那个建议作过试探么？先生那“事实上，中共和达赖的巨大分歧，决不是谈判技巧的缺乏造成的”的断然结论，似乎完全基于王的这段话：

> “这本是常识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达赖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的，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来自卫藏，还有相当比例来自安多和康区。五十年代对中共的武装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区，大批反抗战士和百姓为了躲避中共军队的围剿而逃到卫藏。在达赖喇嘛出走之后，他们也随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构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西藏流亡议会的议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议会一共45个议席，其中30个议席是根据安多、康和卫藏三大地区分配的，每个地区10个议席 ，那么任何抛弃安多和康（哪怕是出于暂时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议会难以通过，在流亡藏人中更是会遭到激烈反对。无论从公正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利益出发，皆说不过去。仅此

一点，就决定了达赖喇嘛与北京的谈判，几乎永远无法找到共同点。”

但这段话不过是推测罢了，第一没有给出谈判事实依据，至少是没有介绍谈判的过程和导致流产的症结，更没有证实中共曾主动提出过我说的方案，只是根据流亡者的组成推测达赖不会采取“这种现实谋略和灵活手段”而已。第二是没有介绍达赖政府的民主程度究竟如何，亦即达赖本人是否可以不顾部下反对，作出决定。

这两个问题都构成了论断的严重缺陷。先说第一条，如果中共不松这个口，达赖当然不会这么提出来，因为如果提出来而又被中共拒绝，则达赖除了碰一鼻子灰后还要得罪他生死相依的部下，谁会干这种蠢事？相反，如果达赖确知中共中央已经下定决心退回到17条协议去，则那诱惑应该是很大的。毕竟，流亡在国外，跟回去重享丧失了的那一切完全是两回事 （达赖在西藏的夏宫非常漂亮，和他在印度的居所有天地之别）。

就算中共主动提出此案会被达赖拒绝，那总也起到了一个诱饵的作用。这诱饵从此潜伏在他的意识深处，当他在国外不如意的时刻就会产生一种动摇心理，把祖国当成一种他实在混不下去时的后路（凡是在海外混过的人恐怕都有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在潜意识中作用到一定程度就会起质的变化。就算达不到这种程度，总比断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死心塌地地转向独立好些，是不是？更不用说这可能在卫藏人和安多、康巴人中间造成一种分歧，增加主张回归的人的势力了。

第二条也有待推敲。据我所知，达赖对部下的控制力不但是世俗的，更是一种宗教上的，大概根本不能与民主国家首脑类比，或许和战前的日本天皇倒有些相似。如果不是达赖力排众议，他那个流亡政府早就宣布独立了。因此，如果达赖同意此案，手下恐怕也无法推翻，而且达赖可以把这些人安排到西藏新政府里去，并不必

抛弃他们。这些人早就离开老家，老一代死的已经差不多了，新生代整个西化，和故土没多少感情，我看不出他们为什么非要坚持回到安、康去。

所以，我认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达赖会拒绝此案、进而否定此案可行性，未免失之武断。

退一步说，就算此案不可行，仍然可以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处理，即把安多和康区分开，仿照卫藏的方案实行自治，只是在行政区划上各不相属罢了。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二、关于藏族共干问题

我认为，先生之论有几个问题：

第一是低估了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我本人曾经遇到过一位藏族市长，该同志很年轻，口才极佳，在讲话中随口引用汉语成语。而这并不是个例，如今提拔起来的那些少数民族干部大多如此。总之，不要小看人家少数民族。

第二是低估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离心倾向。在当今中国，无论是汉族共干还是少数民族共干，不但无任何人相信共产主义，而且所有的人都对时局满腹怨言，骂中共骂得比海外的人还厉害。我敢说一句，恐怕大多数少数民族干部都有离心倾向。在老一代少数民族干部眼中，如今的中共背叛了老毛象征的全民族事业（这一点ＸＸ先生已经讲了），而新一代干部则向往西方，看不上中国如今的腐败和落后。藏族干部当然也不例外。

第三是把人均收入当成了实际个人收入。藏干当然贪污，但恐怕那援助的大头还是花在各种建设措施上。我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干部的贪污要比汉族的严重。在内地看一眼就知道，共干并没有把所

有的社会财富都席卷入私囊。边疆地区也如此，这些年新疆和西藏都建起了许多新建筑。

第四，你那“横、纵比”说让我想起80年代的小温侯温元凯（玩笑），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逻辑缺陷。跟香港比是针对你那“一国两制”说的，指出两地的不同，所以无需隔离。跟苏联、蒙、越比是针对你那“藏共干必然掀起内战说”而言的，比较对象恰好都具有可比性，没有任何可见的逻辑缺陷。

第五，你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造反是需要勇气的，而贪污犯只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要让他们像当年那些安多、康巴勇士们揭竿而起，岂非笑谈？其实大多数人都是“风行草偃”，真正不怕死的勇士比例很低。达赖没来这些人当然反对改变现状，但如果达赖入藏真成了定局，恐怕他们是欢迎的第一批，忙著去组织“维持会”都来不及，岂会玩命造反？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会结成派系作内斗，但那并不是扯旗造反。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因此而废除一个合理方案。

第六，退一万步说，如果这些人真的成了极大阻力，把他们撤回内地不就完了？再说，真要是爆发内战，共军在那儿是吃素的？这种类似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不但会受到达赖欢迎，而且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赞赏。

总而言之，我读过作家徐明旭的一系列文章，而且还在80年代读过他的小说《调动》（ 他就是因为那短篇小说给流放到西藏去的。除了那篇粗糙的小故事，我没看过该作家其他文学作品），并不觉得他和王力雄是一个水准。

三、中国没有民族问题？

先生说：

> “我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民族问题，只有发展问题。在此我呼吁：不要把新疆、西藏、内蒙的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那样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最终更会危及少数民族的利益。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随著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力量会更强大，中国也必将最终走向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少数民族也必将与全体中国人民一起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但是，如果把少数民族问题‘民族化’并国际化，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民主力量的发言权，中共的专制暴政也会更加拥有市场，因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无法通过发展经济或者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来解决的。君不见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的民主国家照样遭受民族问题的困扰吗？另一方面，倒是中共对于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王震之对于新疆，张国华之对于西藏）更能说服民众‘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句话，如果我们真心想让西藏、新疆、内蒙各族兄弟姐妹过上好日子，就别再什么‘独立’，‘自治’的瞎折腾了。”

恕我直言，这里陷入极度逻辑混乱，先是说“把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发展问题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接著又说“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无法通过发展经济或者成立一个新的政权来解决的”。这互相矛盾的话竟然出现在同一段落中，实在让人遗憾。

其实先生是想说：“不把民族问题当成个问题，则它就不再是问题”。这种思考方式，在下期期不敢同意。如果中国真没有民族问题，那前几年新疆伊宁暴乱、西藏宣布戒严是什么问题？我们又何必在这儿谈据说是“无解”的西藏问题？莫非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发展问题？经济发展起来了，不是问题的民族问题也就冰

消瓦解了？“君不见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发达的民主国家照样遭受民族问题的困扰吗？”

坦率地说，先生这种否认现实存在的态度，和先生批评的中共“击鼓传花”、只要炸弹别在我手中炸了就行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我看没有什么两样，而先生居然说出“中共对于少数民族的强硬政策（王震之对于新疆，张国华之对于西藏）更能说服民众‘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这种话来，实在让我失望到极点。我坚决反对以屠民来巩固国家的铁血政策，不光是它践踏起码的人类最起码的道义与良知，而且后患无穷。如果没有王、张辈作下的那些孽，今天民族问题决不会变得这么复杂。

其实我看得出来，先生此论受王力雄影响太深。王在那书中解释藏民在“平叛”后对中共特别是毛的服膺态度时说，那其实是对强有力者的一种崇拜。此话当然有道理，但不能归纳成个永远成立的真理。最明显的问题是，那“强有力者”并不能永远强有力下去，而这就是今日少数民族纷纷显示离心倾向的原因。我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的，可惜到现在悟者寥廖，竟然看不出中共的枪杆子不会永远强有力下去，而一旦不灵之日，就是“不是民族问题”的问题变成大问题之时。

先生最后的结论是：

> “中国需要的是眼光现实的实干家，是像老朱那样的低著脑袋干活的人，而不是坐而论道，慧眼独具，能给中国朝野众多糊涂蛋们指出一条明道的仙人道长。如果一定需要这么一个人，那么我宁可打赌他会诞生在国内。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关注王力雄等人的言论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只有像王力雄这样的长期在国内生活，又不怕做共产党的大牢的人，才最终有可能提出真正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像我们这些

海外华人隔著个太平洋偶尔到网上写点东西发发牢骚，恕我直言，戏不大。”

此话当然有理。不过我觉得，如果改为“中国需要的是建设家、改革家、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破坏家、煽动家、捣乱家”就更准确，至于在国内国外倒不是什么根本的区别。没有根据说在国外的人就不能为中国的建设和改革献计献策，也不能说国内的思考者想出来的路子就一定可行，而国外的思考者想出来的全是垃圾。更不能说国外的思潮不会在国内起到影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还是中国的辛亥革命都是从国外输入的思潮引发的。我对王力雄先生非常钦服，不过他的《黄祸》所作的预言基本没有兑现，而他的 《关于达赖喇嘛的小说提纲》更是严重脱离现实。当然，不能如此苛求国内的论者，这里有个视角和视野的问题，而这正是国外论者的优势所在。

再次谢谢先生回应。

2002 年 8 月 26 日

就民族问题三答网友

Whopper_junior 先生：

谢谢答复。别说那“为认真感动”的话，老芦在网上混了两年半，深知这种严肃理性讨论之难得。此时不认真，更待何时？是我应该谢谢先生给了我这个“难得认真”的机会，省得我在网上只扮演两个角色：单向灌输和双向打架，嘿嘿。你要在网上呆久了，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

很对不起先生，我看帖确实很草草，这是老毛病了，虽然先生的文章算是非常认真地看的，还拷贝了下来（我一般不拷贝别人的文章，除非选中了作为撕货，先生的算是例外），但还是没看明白先生那对王胡子、张国华的评论的真实意思。我当然深知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用不着住到百万庄去见习采访。你如果看过我的《人民图腾》和《重述“民主恩赐”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就是我反对革命，力主渐进改良实行民主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老百姓就象未成年的孩子，如果让他们贸然当家，干出来的只会是吞刀、吐火、上吊、跳楼一类成年人不会干的事。许多人出国不久就忘了国情，以为西方那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真是奇怪。

其实，崇拜强有力者甚至屠夫，乃是人类的通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都有轻微的潜在的被虐狂倾向，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就充分揭示了这一点：被暴徒绑架的人质最后对暴徒产生了一种难分难舍的依恋心理。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崇拜屠杀他们的屠夫，这其实并不奇怪。

但问题是，中共乃至一切强权整体共有的尴尬，是它们无法永远强大下去，而它们面临的共同困境，是在强权消退，露出无能为力的迹象之时，引起的全民的普遍幻灭和离心离德，而这就是1989年发生的事件的实质。但当中共再一次向人民证明他们可以何等凶残之后，便再度赢得了人民的尊重。这说来非常cynical，但不幸人类就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是，随著社会转型，中共的极权程度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中央的权威、权力和精神上对国民的感召力都在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随著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这种趋势只会有增无减。改革大潮已经把中共政体带上了最终消亡的不归路。套句正宗马列的话来说，通过启动改革，中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所以，王胡子和张国华辈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象征著一个极权政体永难再现的昨日的辉煌。当这种铁血人物不再之日，便是少数民族幻灭而开始离心离德之时。

经济发展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加深危机。事实上，我过去已经多次指出过，很多时候，国民生活的改善反倒引起百姓普遍不满，“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人民的普遍不满很容易诱发革命，导致国家大幅度后退，伊朗的巴列维被革命推翻，让反动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取代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更何况咱们这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不公，更是火上加油。

所以，发展当然是“硬道理”，但是必须看到，它根本不能解决民族矛盾，反倒只会加深之。中国的民族问题远比前苏联的严重，至少前苏联的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没有出过什么大规模的叛乱。但发展程度远高于中国的前苏联一样崩解了。这就说明我们必须未雨缪绸，不要等到事情出了才去临渴掘井，必须在发展的同时先为之计，逐步地、有序地、谨慎地实行民族自治，在我看来才是

长治久安之计。如果民族间矛盾得到充分化解，即使国家最终解体，则也可以避免前南斯拉夫式的惨祸。自治和独立是两回事，其实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既然我们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恐怕这一条首先就得做到。

当然，和所有的重大改革一样，民族自治也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反而会引出大乱子来。但我认为西藏的情况比较特殊。拖久了，达赖喇嘛去世了，事情难度就加大了。而且西藏说到底根本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值得让中央紧抓住不放。国防军能驻扎在那儿就行了。天然的地理隔绝，也不会让那儿的改革给内地和其他民族地区带来什么不利影响。这就是我主张迅速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理由。

关于对王力雄先生的评价，是我没说清楚。我非常尊重和佩服此人，觉得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有见识有学问的实实在在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表率。但我并不认为他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相反，我觉得，无论看什么书，都要用一种批判的眼光看，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质疑的权威。这就是我提及王的预言没有兑现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你似乎把王的论断看成了final 的玩意。另外，一个人的道德勇气（例如不怕坐牢）和他的水平是两回事，魏京生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你说只有呆在中国不怕坐牢的知识分子写的书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此话我不敢同意。

匆匆就写这些，草率是免不了的，还望海涵。我非常喜欢和你对话，我看客气话就不用说了，好不好？

洪哲胜先生：

很对不起，没看见您那帖子就乱开口。先生说的原则当然是对的。问题是，“合理的”不一定是“现实的、可行的”。许多人奢谈权利，这当然在理论上没错，但如果我们今天强调人民有反抗暴

政的天然权利，最后就是重蹈辛亥革命和中共革命的覆辙，让人民连最起码的人权都丧失了。

类似地，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然而如果在现实中国真要实行这一点，恐怕只会给各族人民带来大灾难。我已经说过：这方面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两条不能不尊重，一是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那深入骨髓的大一统观念牢不可破；二是现今的社会矛盾、民族间矛盾尖锐复杂到了极点。如果不尊重这两个现实，贸然实行民主理论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利，那必然的结果就是天下大乱，在放大了百倍的规模上重演南斯拉夫的惨剧。不但人民享受不到什么自治，恐怕连生命安全都难保证。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台湾人民当然有神圣的自决权利包括宣布独立，可惜大陆朝野决不会让这理论成为现实。一个真正的以民瘼为念的政治家，在这种情况下，便只能寻找为现实状况容许的可以实现的最大限度的民权。这就是我为何主张在民族地区逐步实行自治，劝台湾不要把中共逼到不战无以对国民的死角，采取以软拖代替硬抗的策略。

从先生的帖子上来看，对民族自治这条，我和先生似乎没有多少分歧。但对两岸关系，我觉得我和先生的分歧不小。因此，我急切地看到先生对拙作的评论，真是不胜翘首企盼之至。

2002年8月27日

“中华民族”面对的困境

今天拜读出尘公子的“魔盒子”，寻思了半天，他那意思大概是说“民族”的观念是天然形成的，“民族主义”自然也就是民族利益冲突的产物，是客观存在，跟共党宣传无关。就这么个简单意思，他小人家却洋洋万言地写下来，杂以大批插科打诨，令人如行迷宫，找不到南北，咳咳（这毛病是从他那传染上的，咳咳）。

刚才去楼下逛，又看到了有人主张这“民族”本是个政治概念。既然是政治概念，当然这民族主义就似乎只是一种政治上的工具。现成的例子根本不用费神，希特勒、小日本就在那儿摆着。

接着又看到ＸＸ先生转贴来的“中华民族”考，其实那意思和刘国凯先生的《善良迷思》完全一样，都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虚构出来的民族，不可能包括 56 个民族，硬要说有这么个玩意，那就只能包括汉族在内。有趣的是，持此论调的人居然处于政治上的两极，ＸＸ先生转贴来的文章很明显是主张民族自治（姑不说独立吧），而刘先生的文章已经显示了他是个大汉族主义者（姑不说是种族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吧），可这两者居然持同样论调。这里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前者主张本族从中华民族的神话里独立出来，后者主张把少数民族开除出去。诸位可千万别误会刘先生是“汉独”主义者，人家口口声声强调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他要开除的大概是民族而不是人家住的地方。

更有趣的是著名的台独老先生洪哲胜也来赶这热闹。他那笑话我没怎么看明白，莫非是说连台湾人也不属于中华民族或汉族？那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上还承认台湾人是“华人”呢，莫非那“华”不是从“中华”那儿来的？您怎么不和贵总统保持一致？请问这“华人”究竟是不是“中华民族”？如果不是，请问那是什么玩意儿？如果翻译成英文，“华人”又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

这真是扯不清的糊涂帐。突然间，我连自己算什么民族都不知道了，算华人，还是算中华民族？抑或“非中华民族的华人”？看来还是英文好，一个 Chinese 就把什么都糊里糊涂、一包拢总地全给包了进去，谁知道那到底是指“中国人”、“中华民族”、“汉族”还是“华人”？想当年台湾要去开奥运会，两岸谈判半天弄了个“中国台北”出来，在大陆，那是“中国台北”，在台湾，那是“中华台北”，翻译成英文反正全是 China， 请全世界的汉学家聚在一起也没能耐分清“中华”和“中国”的区别。甭说他们，连我也没本事分清楚，更不知道这一字之差究竟为何如此生死攸关。

这就足以说明这“民族”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个政治工具。无论是那位少数民族网友还是刘国凯先生都是对的，“中华民族”确实是个政治上的编造，世界上并没有这种虚构的民族。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的经典定义，所谓民族是“居住共同地域，使用共同语言文字，具有共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人民群体”。如此说来，世上根本就没有“中华民族”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具体的生活在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行政区域上的一个个的民族。如果说“汉族”、“藏族”、“蒙族”是天然形成的群体，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个纯粹的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政治术语。

我在给刘先生的跟帖中，已经解释了这政治目的是什么，那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我在给出尘公子的回应中解释过，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咱们的老祖宗，甭管是什么族，根本没有西方人那种明确的观念。当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相同文化和风俗习惯作群体认同是人类的本性，但这种原始的人类

本能并没有进化到欧洲那种鲜明的程度。无论哪个民族立国，一般都是弄出个朝代名字来，从来不会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去依此建国。汉族不会针对女真族自吹老祖宗如何了不起，也不会把本族的某某立为该族骄傲。反之亦然。这与英、法、德、俄诸民族之间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建国并不以民族为基础，各民族之间很容易就发生融合。汉族在历史上经过无数次混血，这在欧洲是难以想象的，大概只有中南美可以与之类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古代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似乎也无不可，至少列入汉族正史、被后人当成“汉族”的隋唐皇帝都是胡人的后代。

欧洲的情况就跟这很不一样。所谓“国家”，常常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因此，在英语里，nation 这个词兼有“民族”和“国家”的意思，而 nationalism 就很难说清那到底是“民族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反正这双重意思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必然要拥护国家强权，也就是所谓“主权”，这发展到极端就是彻底否定个人意志的法西斯主义。

这一套由鬼子们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入中国人的脑袋后便造成了麻烦。古代中国人根本就弄不清境内有多少民族。有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本身其实根本也就没有多少民族自我意识。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中共执政后少数民族的数目越来越多就够了。从当初的笼统的“五族”变成了如今的 56 族，说明许多少数民族是给政府发掘出来的。

由此立刻出来一个问题：现代国家观念，其实是从西方进口的。你既然有这么些民族存在，自然就不能再是个民族国家，要把西方那套实行到底，接下来的便是民族自决。为了堵住这个口子，当局便不得不捏造出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来做这立国的根本。

不光是中国人玩这花样，苏修老大哥比咱们玩得还熟。和中国一样，老大哥从沙皇那儿继承下来的也是个多民族帝国。为了制造

内聚力，老大哥便发明了“苏维埃人”来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代称。但统治者心知肚明这套神话哄不了人，所以到关键时刻便免不得露出狐狸尾巴来。看一眼斯大林的《卫国战争演讲集》就知道这一点。那时苏联危在旦夕，老斯知道再靠官方宣传根本救不了命，于是在那段时期的演说中，他丝毫不用马列主义那套陈词滥调，完全诉诸于俄罗斯民族主义。他宣布苏德战争爆发的著名演讲是用“弟兄姐妹们，我的朋友们”而不是“打挖里死”（同志们）开头的，那演说里丝毫不提苏共的伟大功劳，却历数俄国历史上的文化、政治、军事名人，以此来煽起俄国人民的自豪感。此后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调子越唱越响，到战争结束时他居然在演说中“感谢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整个忘记了其他的“苏维埃人”！据西方学者分析，那是他身为少数民族的一种自卑心理，所以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俄罗斯人。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中国今天发生的事。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外界参照物，马列主义的陈词滥调再也无法骗人了。为了维持统治，中共便不得不转向“民族主义”，如同斯大林在危急存亡之秋做过的那样。但这里的尴尬是共同的：你要打民族主义这张牌，就只能打出具体的民族牌来，不可能弄一个“苏维埃人”那种抽象政治概念。所以，斯大林歌颂俄罗斯民族，而中共只能吹汉族，因为这两者都是构成国家的主体强势民族。这么做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得罪少数民族，离间了民族关系。

中国“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困境甚至比苏联还严重。“苏维埃人”丝毫不带有地域倾向，是个纯净的政治术语，而“中华民族”摆明了指的就是“中华”，亦即相对与“蛮夷”的文明腹地。如此形成的国号便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只会加重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它的出现我已经在驳斥刘国凯先生的文章中说过了，反

映了当时革命乱党的狭隘排满倾向。在今天继续沿用这一过时称号，堪称不识时务。

更不识时务的是“炎黄子孙”的胡说八道。这我已经在以前的多篇文章里抨击过了。但你要中共放弃这些政治术语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是人家拉拢海外非中华民族的华人（包括台湾港澳）的统战口号。所以，我党使用这些过时神话，实在也有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苦衷。

这还不是最大的难题。您要让中共废除“中华民族”这政治术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把“中华”二字挖去，那请问用什么来作这个国家的名字啊？我看只有一条路，使用英文 China 来代替。但真要这么做，一个堂堂大国还去请鬼子作取教名的教父，岂不要腾笑万邦？

所以依愚见，要说天下有“无解”的题，这“中华民族”和“中华ＸＸ国”的难题就是一个。在这上头挖山不止，最后只会刨出个大家看着都不舒服的骷髅来，还是少去伤那些无用的脑筋好些，发扬咱们（汉族）阿 Q 爷爷的传统，全当这些问题不存在，糊里糊涂混下去算了。既然咱们 56 个民族要生活在一起，脑筋还是从建设性的方向去动，想想咱们怎么才能和和睦睦、共存共荣地活下去。

2002 年 8 月 27 日

答出尘公子

关于新疆、西藏、台湾的“馊主意”

西藏问题已经和Whopper_junior 先生讨论过，文章在那里，你自己去看，我的感觉是似乎并未被证明是馊主意。关于台湾问题，洪老先生至今还在放我一马，在他的马冲过来并把我撞倒前，似乎也未被证明是馊主意。关于新疆问题，你放过来的马其实是纸马，大概是七月半烧给祖先骑乘用的，赫赫。我看你和我也差不多，不怎么看人家的帖子，你那反驳其实只证明了你没能领会我的指示精神。

在我看来，中国要保持永远不散板，必须向美国学习，让人口自由流动起来。老美号称是“各民族的大熔炉”（melting pot），这话不是白吹的，我的感觉确实是如此。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全靠他们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提出搞富新疆的目的是二重的，第一是稀释当地回教教徒的宗教情绪，第二是让内地人口自发涌到那儿去淘金，让里面的人自发流动出来到内地去觅食。

当然，这样作的前提是取消反动的户口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新疆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原始农耕和原始畜牧业束缚在土地上的人民解放出来，流动到城市以及内地去。这样一则有利于民族融合，再则可以退耕退牧，还草还林，保护生态环境，符合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这么做的可行性问题老克和英明已经质疑了 （在此谢谢二位），完全是经济上的，亦即此计划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就是

“人为搞富”一个地区是否在经济学上可行。这是我见过最有力的质疑，可不能和你那纸马相比。老芦不懂经济学，不敢打著“伪经济学家”的牌子现世，只是凭感觉觉得可以，因为该地有丰富石油资源。当然不能跟着感觉走，所以还请内行高手指点。谢谢！

民运人士的“咸鱼翻身”

我从来没弄明白过，到底该是“翻身”，还是“翻生”？两者都见过，一样的莫名其妙。

你观察到，某些民运人士的种族主义主张投合国内土法西斯小青年的胃口，因此他们如果这么干下去，可能有成功希望。我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这就是我“扫荡”伪民运的基本原因之一。

我早就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无数次，今日中国非常像晚清，面临的两大威胁是“北拳”“南革”，亦即被官方宣传煽动起来的仇外思潮导致对官方“软弱”的不满和对海内外革命乱党们煽动起来的人民暴力抗争。我也说过，革命乱党们关心的不是国民的福祉和社稷的安危，最关心的其实是如何有效地、迅速地夺取权力。因此，他们一定要利用和煽动可以利用和煽动的一切不满与仇恨，以此作为动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人民的血海中爬到权力的顶峰上去。这就是自辛亥以来不断在中国出演的史实。眼下因为他们寄人篱下，无法搞“外向的民族主义”，所以只好煽动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搞“内向的民族主义”亦即种族主义。谁都看得出来，只有中国大乱，才能给这些人带来掌权机会，而要把中国搞乱，利用已经是非常尖锐的民族间矛盾当然是最有效的一条。

用不着我多说，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客观的读者都能看出来，一旦这些人“咸鱼翻身”之日，立刻就是中国陷入血海之时。就凭

刘国凯先生把少数民族当作“外族”、要人家为几百年前祖宗干的事给汉族下跪的态度，他代表的政治势力一当国，立刻就要逼反少数民族。整个事情已经荒唐到了这个地步：竟然有人跟ＸＸ先生的帖说：民运是汉族的事，跟你们少数民族无关，你就不用在这事上插嘴了，说明如今许多“民运”人士和辛亥乱党们也差不多，整个自绝自外于少数民族。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未来的“民主”中国中根本就没有少数民族的位置！

有趣的是这些人还居然生活在美国！我怀疑他们因为语言障碍，根本就没能力看懂人家的报刊、电影、电视，只能向刘国凯先生那样，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身在海外还孜孜研究记录中国最黑暗的朝代明朝的历史。这大概就是这些人显示出来的惊人地缺乏现代文明知识的原因。在美国，没有哪个白人政治家敢说刘先生那样的话，否则立刻完蛋。所有的白人政治家都竞相讨好黑人，因为那意味著一大笔政治资本——选票数。

作为民运的原来的同情者，我深深地为这些人感到悲哀。看来，除了少数例外，毛主席哺育出来的一代人没有自发获得现代知识包括民主知识的能力。中国的希望还在国内新一代知识分子。

这当然不是全面否定海外民运。我再次重申，民运人士如果真有点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诚意和决心，就该与毛共党文化那套彻底决裂，彻底抛弃暴力革命的反动观念，把民运政党建设为类似西方反对党那种良性的、建设性的压力集团。

关于你对中共的实用主义的盛赞

中共挂羊头卖狗肉，全面背叛共产主义理想，打著共党招牌疯狂走资，这在策略上的高明我是肯定的，但这策略无限期地用下去就不行了。

眼下明摆着：中共在国际上当冤大头，继续扮演那个已经不再是的“共产恶魔”形像。普通老美是一群好来坞电影洗脑洗出来头脑简单的大孩子，那“共产恶魔”的卡通形像就跟大日本皇军在中国人头脑中的形像一样牢不可破。那些人的夜郎心态还特别足，根本没什么兴趣去研究外国的事，谁知道你锅里煮的是羊肉还是狗肉？还不是照样当你是传统的正宗的“共产恶魔”。眼下这“共产恶魔”就咱们一家，俄国和老美好得穿一条裤子。伊凡们最近成了G8一员，入了北约，咱们立刻就要成国际公敌特别是老美的假想敌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中共还要自称共党，枉担那个虚名。他们当然是怕改了名引起社会动荡，其实完全不懂国民心态。如今谁还相信共产主义？谁还出于理想由衷地拥护你？无非是把你当成一种不得不尊重的政治现实接受下来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改名换姓，谁会大惊小怪?

最愚蠢的实用主义还是打“民族主义”那张牌，这话说起来太长，等今晚我再写系列文章出来专门讲一下，你自己看吧。

2002 年 8 月 29 日

朴素的世界主义 vs 民族主义

当代中国的一个奇观，便是爱国者们豪情万丈地捍卫一种“杂种国粹”。老芦荣任大汉奸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曾历数过中文作为学术语言的弊病。有趣的是，那些坚决捍卫据说是天下第一完美的汉语的愤青们根本不知道，现代中文不过是个“西崽”，不仅反映现代生活的概念的名词全部是从西文里翻译过来的，绝大多数直接就是从日本人那儿拿过来的，而且语法、句法甚至标点符号都来自于西方。在这方面，港澳台报纸上那些读不通的文章还比咱们的更纯粹些。至少人家没像大陆那样，使用参照英文语法制订出来的汉语语法强行部勒过中学生。当然也不是所有受过教育的大陆人都学会了这套，网上许多著名大陆写手分不清“的”、“地”、“得”就是证明。

眼下这最走俏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老芦点明，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这玩意其实是洋货。的确，古代中国人根本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他们的“国”无非是“家 ”的放大，“君”无非是“父”的放大，国民效忠的对象是君父，而君、父和国、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离开君王谈“国”，离开父亲谈“家”，无异于痴人说梦。著名的方腊“起义”演说中就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连大土匪头子都这么说，可见儒家的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

不仅如此，因为中国和其他文明的地理隔绝，古代中国人认定“神州”及其周围就是整个“天下”。所谓“中华”的“中”字，指的是世界中心，“华”（同“花”）指的则是文明的灿烂。在这

种原始的世界观中，中华这块文明的腹地不但居于天下之中（中点的准确位置在洛阳。老杜“天中贡赋均”，此之谓也），而且为野蛮人包围。这种原始的世界观当然符合局部历史的真实，所以它被奉行了几千年而无人怀疑。

信奉这世界观的结果，是古代中国人全都成了“世界公民”，根本没有什么民族观念。在他们眼中，不同人群只代表了文明程度的高低。所谓“夷、夏”之辨，与其说是种族和地域的区分，不如说是文明程度的区分，这就是孔圣人“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由来。如果说这种区分也有民族和地域的性质，那不过是纯粹的偶合。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例如周朝早期，中原之外的国家如秦国和楚国都算是蛮夷，“荆楚”在那时算是一种辱称。吴越似乎也好不到哪儿去，被称为“南蛮鴃舌之人”。我不是古文字专家，不懂那“鴃”的意思，只是因为从“鸟”旁，免不得要猜那是说南蛮子如出尘公子者的舌头和八哥差不多，讲的方言如同鸟语，只有公冶长能解。

这种“世界公民”的概念，不但使中国没有欧洲国家那样的国旗、国歌、国徽，甚至连个国名都没有，而且更使古代中国人成了最有容忍性的民族。我党在 60 年代教育咱们这些黑崽子时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类似地，一个人无法选择种族和出生地域，但可以改变自己的文化程度。“夷”一旦变成“夏”后，就再也不是“夷”了。所以，不但秦、楚、吴、越摘掉了文盲帽子加入了“中国”，就连两广那些直到秦汉都还是典型蛮夷的地区也都变成了“中国”的一部份。

因此，除了元朝那一百多年的时间外，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士人们可能会看不起没文化的人，但决不会像现代民主斗士那样，将文化程度很高的胡人视为“外族”，更别说歧视人家了。不仅《全唐诗》上收录了日本人晁衡的诗作，而且当时诗坛当

仁不让的伟大舵把李白同志还赠过人家诗作。这决不是说李白精通统战策略，人家脑子里根本就没那个概念，就是想歧视也歧视不起来。

这种“世界公民”的容忍性，使得古代中国人宽容地接纳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的蛮族，把他们化在了华夏文明的大“酱缸”里。“乱华”的“五胡”不必说，南北朝也不必说，就连“未乱我中华制度，但变我中华冠裳”的女真人也被接受下来了。这里的前提就这么一条：不管您是哪个族的，只要信奉孔孟之道这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咱们便奉你作主子也无妨。

前段时间有人研究到中国定居的犹太人的下落，最后惊奇地发现，犹太人本是世上最能抱成团、最顽强地保留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不料进了中国后便给化得无影无踪。有的学者由此得出中国人缺乏宽容精神的结论，其实恰好相反，它证明了古代中国人毫无种族歧视观念。没有压迫，定居的外来民族对外界的抵抗力也就自然消解了，接下来的当然就是自我崩解。不仅犹太人这样，我猜想吉普赛人也是给这样化了的。该民族遍布世界，唯独在中国找不到，大概也是让咱们化得乾乾净净了。

缺乏民族观念、只有文明差别、没有民族间的壁垒，我看就是汉族血统如此庞杂的基本原因。我有时看着那些在网上辱骂蒙族兄弟的汉族网友不禁暗自好笑：天知道您那血管里奔流着多少蒙古人的鲜血！

一般人没注意到的是，其实这种宽容精神仍在许多现代中国人身上保留着。我出国前，从来就没有发现少数民族问题是个问题。当年大学班上有个少数民族学生，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就完全跟对汉族毫无差别。不到填表的时候，谁也想不起他是少数民族来。大夥儿笑相笑、打相打、骂相骂，几曾注意到什么“民族统战策略”！所以，出家恶少对少数民族记汉族的仇深觉委屈，这心理我完全能

够理解。中国过去没有过种族歧视，现在鄙视甚至侮辱少数民族的汉族也不过是几个网上愤青而已。最严重的歧视其实还是祖传的“文明歧视”，因为中共那个历史上最反动的政权人为制造了“两个中国”：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后者变成了前者的殖民地，古代不存在的所谓“城乡差别”被人为制造出来并恶变为文明与野蛮的差别，所以城里人那一等公民普遍看不起“乡下佬”那二等公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歧视其实和种族、文化无关，不过是那种势利心态的延伸而已。

这种民族间的宽容精神和欧洲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的发展和中国最大的不同点，是中国以中原为文明中心，由此向文明程度较低的周边地区幅射，但欧洲的文明发展分布比较均一。各强国秉承了埃及——希腊——罗马文明的共同祖宗，发展程度虽然有快慢之分，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便没有明显的“夷”（蛮族）“夏”（文明）之别。以后，罗马天主教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先被英王亨利一世打破，后被法国大革命冲得七零八落。拿破仑东征西讨胡打一气，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从此，鲜明的“民族主义”观念便成了各国据此立国的根本。列国彼此之间剧烈竞争，促进了科技文化军事的迅猛发展。从这点上来说，民族主义可以说在欧洲后来居上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正如另文要讲到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最后让欧洲人自己吃尽了苦头。比起来，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精神似乎还更人道些，至少，咱们没有干过在欧洲历史上多国、多次发生的排犹甚至屠犹的丑事。

有趣的是，现代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却用西方进口进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去穿凿历史、穿凿古人。岳飞、文天祥、于谦、熊廷弼、袁崇焕、史可法等先贤被普遍当成“民族英雄”尊崇，却没有几个人意识到古代中国根本没有和“民族英雄”等价的概念，这完全是后人用西洋标准来给古人划阶级成份。这些先贤在古代当然也

被尊崇，但他们是被当成“忠臣”的楷模来尊崇的。岳飞那著名的“精忠报国”，忠的是万岁爷，报的是君父之国。无论是从这些人的精神境界还是从后世的评价上来看，我都看不出他们和忠于建文帝、反对明成祖篡位的死节忠臣方孝孺有什么区别。文天祥死前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可那圣贤书只教他如何为君王效忠，根本没教他如何抵抗异族。您就是把四书五经翻烂了，恐怕也找不到民族主义的内容。这里倒用得着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没有西方式林立的不同民族，上哪儿去找“民族主义”？

当然，这种“今为古用”的态度在这里还是可以理解的。可笑的是后来共党硬要对岳飞实行“三七开”，说他打洞庭湖巨寇杨幺是镇压农民起义。其实在岳鄂王眼中，那些水匪（水上之匪，所以不能是“土匪”）和兀术元帅的拐子马骑兵部队又有何区别？两者都是颠覆他忠诚对象的大敌，而杨幺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更是腹心之患，精忠报国，此其时矣。

更可笑的是某些现代汉人的态度。有的人原来对清朝统治挺有好感，也不赞成辛亥革命，不料这种理性的态度却因某些满族网友对汉人的嘲笑而在旦夕之间轰毁。据说，那些满族、蒙族的网友笑骂道：身为汉人，却去歌颂康乾盛世，真是生就了的奴才本性！

这种思路，实在不是老芦这种愚人可以理解的。老芦写文章，动不动就用“我大清”，当然那搞笑的成份居多（我还用过“我大明”、“我闯贼”），不过在内心深处确实没把“我大清”的存在看成是汉族亡国的耻辱一页。如果我们套用西洋进口来的那一套，立刻便要抹黑了长达几乎三百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如果不这么办就是奴才成性，就是生贱了，那我毫不惭愧，因为有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大帅在那儿顶着先戴这汉奸帽。林大帅可不光是叫叫“我大清”，人家可是多次“面圣”，每次都给那“外族”主子三跪九叩，山呼海蹈“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

还不光是林大帅一个人这么干，曾、胡、左、李全这么着。如果这些人全是自甘下贱的奴才种子，则老芦能追随这些先贤作个牵马坠镫的小小跟班汉奸，真是三生有幸！

即此一端，便能看出食洋不化而不自知有多可笑。刘国凯先生的长文，据出尘公子说，颇有“学术价值”，我闻到的却只是一股以中共嫡传的二手洋货不伦不类地穿凿历史的腐恶气息。满清给孙中山率领的匪类推翻了近百年，刘先生对“大清”（这讽刺的引号是他加上去的）怨毒还在他的大作中四溅。一面历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骂人家是“外族”，一面却要坚持满清是中国人，否认汉族地区曾是满清的殖民地（据说那是因为没有大洋隔开两者。如此说来，罗马帝国、拿破仑、奥匈帝国乃至苏联帝国的崩解都是美帝的肢解阴谋）。一面痛骂蒙古人侵略，一面又歌颂明成祖那个大侵略者，甚至把奴儿干都司那种军事侵略据点当成神圣领土的证据。如此“学术”，只能说明党文化的熏陶加上极度缺乏现代知识以及西洋文明常识能制造出什么样的“民主精神”来。这种“民主精神”指导下的“民族主义”，绝对只能是传统中国根本没有过的种族主义，既是对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的践踏，又是对老祖宗的背叛。稍微懂点历史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清朝取代明朝那个中共以前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何等幸运的事，不意世上竟然有孙文那个民主“国父”祭明陵于先，后有现代民运领袖在 21 世纪“反清复明”，说明在中国式的“民主”斗士的心目中，和西洋进口进来的“种族”观念相比，老祖宗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念根本什么都不值。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西洋玩意都是好家伙，至少这“民族主义”，我看就不如老祖宗的朴素的世界主义来得更人道。以后的文章将进一步讨论民族主义的利弊。我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中国人学西方，最怕的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民运”领袖居然写出种族主

义气息十足的文章来就是个生动例子。说来说去还是说了一万遍的那句老话：咱们在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群策群力、排山倒海地去喊某个惊天动地的口号之先，最好还是弄明白那口号究竟说的是怎么回事。

2002 年 8 月 29 日

伤人亦伤己的双刃剑

中国不是民族主义的故乡，除了地理自然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原因，那就是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组织社会的思路有很大差别。中国人组织社会的原则是集体主义，否认自私是人类的天性，否认个人利益，强调个体的服从和克制。简言之，东方社会讲究的是所谓“义”而不是“利”。这里所谓“义”，也就是“好让不争”，说穿了便是“喜欢吃亏”。用大白话来说，便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人人争着做冤大头的社会”。小说《镜花缘》里曾描述过儒生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君子国”。那儿的人在市场上讲价是倒过来的：卖主拼命压价，买主拼命提价。这种理想一直提倡到现代。“雷锋叔叔”据说是“共产主义战士”，其实不过是古已有之的“共产主义天堂”——“君子国”里走下来的卡通人物罢了。

与此相反，西方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便把这套“斗私批修”逐渐扔掉了。所谓“个性解放”，其实就是认识并尊重人类的动物本能，不再认为自私是原罪。于是，西方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个人主义为组织原则的社会。其主旨是：社会必须尊重个体的意志和利益，社会的各级组成单位必须代表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去“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如果说东方社会是放大了家庭，讲究的是忍让服从，打出来的幌子是“义”，那么，西方社会其实是放大了的个人，讲究的是“无父无君”，写在社会旗帜上的是斗大的“利”字。

有趣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在国内人欲横流、不似西方、胜似西方的情况下，许多国人还是不明白东西方社会间的这个根本差别，以致一听到老美口口声声“为了美国利益”便吓得晕死过去，

认定我党一点也没说错，老美就是野心狼。如此“闻利色变”虽则可笑，但也怪不得这些同志。直到今天，我党发布的各种文告中似乎还是找不到“为了中国的利益”这样的字眼。从字面上来看，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应该是世上最大公无私的圣人，充分证明了“伪善也是善”的光辉真理。的确，西方社会的弊病是培养出心口如一的咄咄逼人的真小人来，东方则专门出产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

这种社会建构原则的不同，在思路上就否定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就本质来说，民族主义其实是“集合了的个人主义”。所谓“民族”，其实是“自我”的放大，而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追求、实现、捍卫‘大我’利益的政治主张”。在一个为民族主义风靡了的国家中，人人都把国家当成了自我，国家的尊严便是自我的尊严，国家的利益便是自我的利益，国家的损失便是自己的损失，等等，等等。

这种错觉就是民族主义的魔力所在之处。和那“好让不争”的反人性教导不同，它迎合了人类的自尊、自爱、自私、自利、自怜、自得、自大心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式社会组织原则是对人性（包括善恶在内）的阉割，它固然割出了许多伪君子（天性中只有善的那面被割除了），但也割出了许多真正的柔弱的谦谦君子（被割去了的包括恶的那面以及胆囊）。而西方式社会的组织则如同使用激素对天性进行催肥，茁壮成长起来的不但是进取创业精神，更是赤裸裸的恶。

而这就正是在西方发生过的事。放纵的个人主义，使得西方人乘坐着简陋的木帆船，凭借着原始的火药枪便敢漂洋过海，把整个世界踩在自己的脚下，在天涯海角插上一面又一面自家的国旗，实现了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大爆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作为凝聚社会成员的粘合剂，把社会成员的分散的微弱的力量合在一起

形成势不可挡的巨大合力，为推进社会的发展与扩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难看出，民族主义的原初设计目的是外向的，它的工作原理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一、唤起社会成员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诱使个体将国家错认为是自己的放大，以国家为单元在世界舞台上争夺自我利益。社会成员将国家的敌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将国家的朋友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这种错觉最后要达到这种地步：即为了国家那个“大我”的利益，个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或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并以此为荣。

二、为了达到这个洗脑目的，必须使用一切心理学手段来培养、产生、强化这种“认国为己”的错觉。因此，必须使用各种视觉、听觉符号或象征（国旗、国徽、国歌等）以及各种仪式典礼（例如升旗典礼、国庆游行、阅兵等）来培养社会成员的条件反射，使得他们将国家这个本是纯粹的世俗政治概念神圣化，当成一种“准上帝”的东西来加以崇拜。

三、为了达到这个洗脑目的，必须进行所谓“爱国主义教育”，通过颂扬以往的民族政治、军事、文化伟人和本民族的成就，让全民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自己代表正义和光明，对方代表邪恶和黑暗”，等等。

四、为了达到这个洗脑目的，统治阶级常常把“国家”这个抽象的概念化为可见可闻的人格象征。在旧式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帝王如英国王室、俄国沙皇、德国凯撒、奥国皇帝、日本天皇等都成了这种人格化象征，在新式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人也曾起到过这种作用。

这些巧妙的设计因为符合人类天性，所以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种政治发明。世界曾多次目击某个民族在这种“伟哥”的强

刺激下焕发出惊人的活力来，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德国从战败的耻辱中崛起，日本把落后国家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两国联手就把整个文明世界打成半残废，把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最大的共党帝国、最大的工业强国和最大的黄人国家全搞到焦头烂额，最后还得用最大的杀人利器原子弹才解决了问题。如此奇迹，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所仅见。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集合了的个人主义，两者利用的都是人类的自私天性作为前进强大动力，它也具有和个人主义一样的弊病。谁都知道，如果人类对自私天性放任自流、不加抑制，则社会迟早要变成尔虞我诈、互相坑蒙拐骗的杀人场，最后是大家同归于尽，谁也无法自利。民族主义也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民族主义第一次大规模显示出这种互残互亡的伤害效应的历史事件。

一战爆发前，欧洲正普遍处于民族主义顶峰时代。当时欧洲各国达成了一种均势格局，人民深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各国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收拾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头上去。不料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却在此时刺杀了奥国皇储。此前各国各怀鬼胎，各自以对方为假想敌，制订了制订了各种各样的“集体安全条约”，规定如果一国宣战，则该国盟友也得跟着宣战，这样就把各大陆强国全锁进了连环套中。于是，一个色便恐怖分子便令人难以置信地打响了大战的第一枪。

战争爆发时，各国人民那“抗Ｘ援Ｙ，保家卫国”的狂热大概为历史所仅见。在英、法、德、奥、俄各主要参战国的首都，人人兴高采烈，个个眉飞色舞，把宣战日当成了狂欢节。人民自发地聚集在皇宫门口，高唱国歌，高擎国旗，等待着伟大领袖出现在阳台上。大家都坚信自己不但代表正义和光明，而且所向无敌。那些无幸第一批被抓的壮丁还怨天恨地，为自己错过了那班“英雄列车”

而抱憾。谁都知道那战争顶多几个月也就打完了，这壮丁当然只会抓一批，错过了这班车还有什么当英雄的希望？

没成想那列车其实是死亡列车，一上去就是整整四年，一千多万人作了“烈士”，无数的城镇和村庄化作了瓦砾场。到最后爱国志士们给饿成了革命乱党，而当年的伟大领袖成了怨恨对象。皇宫门前不再是唱圣诗、表忠心的场所，却成了攻打目标。俄皇、德皇、奥皇纷纷被推翻，那“民族的人格化象征”如今成了笑话一场。

一战后欧洲普遍弥漫着一种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幻灭，让彼时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很是为东方文明得意了一阵子。然而西方人并未就此像东方人总是一厢情愿地指望着的那样，“回向佛龛一炷香”。相反，民族主义在战败的德国更加走火入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同义语。这战争打下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光在欧洲就至少有两千多万人丧生（据说苏联的死亡数字就有这么多，所以大概不止此数），六百万犹太人进了焚尸炉。德国的所有城市都让老美的“空中堡垒”炸成了废墟。弄到了这种极端地步，欧洲人总算学会了教训，变成了如今世上大概是最热爱和平的民族群体，60 年代中首先喊出了“作爱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响亮口号。民族主义从此一蹶不振。

从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即使是外向型的民族主义，闹到最后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更何况民族主义还有个内在的特点，那就是外向型的民族主义闹到最后一定要变成内向型的民族主义。作为杀人利刃，这把刀子耍弄到后来会莫名其妙切到自己的软腹上来。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内在缺陷。个人主义其实是动物对外界的本能认识方式，它把世界分为“我”和“非我”两个天地。“非我”又进一步分为“友、敌、非友非敌”几个

部份。这种划分界限很明确，大家生来就会，即使是智障人士也不可能弄错。

前面说过，民族主义无非是集合了的个人主义。它的视角和个人主义一样，也是把世界分为“我”和“非我”两个天地，但这里的难题是如何去界定“民族”那“大我”。所谓“民族”，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玩意。洪哲胜老先生那个“一个汉族＋一个蒙族＋一个藏族＋一个回族＋……＝一个中华民族”的“难题”显示的荒谬，其实是许多国家的共同尴尬。

我在《“中华民族”面对的困境》中指出的问题，其实在其他国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例如比照“洪方程”，同样可以给出类似的方程来：“一个非洲美国民族＋一个亚洲美国民族＋白人＝一个美国民族”，“一个英格兰民族（English）＋一个苏格兰民族（Scottish）＋一个威尔士民族（Welsh）＋半个爱尔兰民族（Irish）＝一个英国民族（British）。这后面那个集合名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术语，同样有咱们那“中华民族”或 “中华X国”的偏心问题。例如“英国民族”的直译是“不列颠民族”，但“不列颠”并不包括北爱尔兰，你用这种地域称呼，让人家北爱尔兰人怎么想？“美国人”的统称虽然没这问题，但星条旗上只有原来加盟的那 13 条，严格说来也是一种偏心表现。英国的米字旗也有类似问题，那是由英格兰的十字和苏格兰的叉子联合组成的，压根儿就没有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代表。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家们便挖空心思地在字眼上作文章，虚构出种种统一民族的名称来。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的“苏维埃人”就是个例子，而上面的“洪方程”的难题也可以用文字游戏来加以解决，那就是“一个 ethnic group＋一个 ethnic group＋一个 ethnic group＋……＝一个 nation”。于此，上面那些方程便统统不再荒谬。我们需要的只是造 出与上面这些英文单

词相对应的中文名词来，便可以解决“民族＋民族＝民族”的洪氏悖论。实际上，老洪本人自己就在这么做。他虚构出个“新台湾人”这种相当于“苏维埃人”或“中华民族”的政治术语，建立了“外省人＋本省人＝新台湾人”那自己的方程。

但这些名堂都不过是文字游戏，可怜无补费精神。既然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它就有一个“大我”的界定越来越狭窄的天然倾向，而这就是世界上的民族国家越来越多的原因。先是殖民地国家把自己从帝国那个“大我”中分离出来，接着是宗主国自己大卸八块。举英国法国为例，英国先把殖民地丢光，然后在丢了爱尔兰之后又为北爱打了几十年，前几年苏格兰也在嚷嚷独立，简直是越弄越小。法国情况好些，可科西嘉（拿破仑的老家）的恐怖分子为了独立也在浴血苦战。洪先生如今在鼓吹台独，恐怕没想到台湾如果独立出去了，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出现以省籍为认定“大我”范围的细碎独立。的确，人类的一个天然倾向是把某种理论进行到底，既然台湾可以以省级地域为划定“大我”的依据，那么各县市又胡为乎不可将这“大我”进一步缩小到自己的地域水平？

如此自行大卸八块，只要不影响人民福利，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问题是如今的世界已经联成一气，连国与国之间都在经济上互相依赖，何况是一国之间的不同地区？分则力薄，合则力厚，这就是欧盟成立的初始原因。前苏联的经济本来是一个经过总体规划的共同体，崩溃后给各独立国家带来的经济上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和平解体都还这样，何况是南斯拉夫那种惨绝人环的大悲剧？为了一个莫明其妙地扯不清的“大我尊严”，最后搭进了无数的“小我”性命。人类居然会干出这种自伤自残的蠢事来。这大概是发明民族主义的人当初做梦也没想到的。

这还不是内向的民族主义的表现的唯一方式，最可怕的内向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前面说过，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一个蛊惑方式，是发明出“我是世上最优秀的”种种神话来，籍以培养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干过这种事，登峰造极的大概是“苏维埃人”。文革前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是苏联教科书的译本，如果相信那里面夹着的宣传，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俄国人发明的：蒸汽机（巴祖诺夫）、飞机（儒可夫斯基）、无线电（波波夫）……；在西方谁也没听说过的罗蒙洛索夫是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早在 18 世纪就发现了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衡定律；彼得堡科学院院士尤金是数学奇才中的奇才（其实那家伙是瑞典人，是由沙皇请去帮助给俄国佬启蒙的科学家之一）；高二的化学课本讲元素周期律的那章附着好几页吹捧门捷列夫的小字内容，那谀词之烈，让我恶心到把那几页撕去，甚至让我怀疑周期表根本不是门捷列夫发现的，因为伊凡们的谎言实在太多了（其实那倒确实是真事）。

如此无耻自吹，在“大我”的界定没发生改变时倒没关系，但一旦这种界定改变，则内向的种族主义立刻就出现了。而这就是在德国发生过的事。如所周知，纳粹的种族主义就是建筑在“亚利安人种最优秀”这一“科学发现”上的。纳粹把“德意志民族”的界限缩小为所谓血统纯粹的碧眼金发的“亚利安人”，把犹太人、波西米亚人（吉普赛人）诸民族从德意志民族中开除出去，把“洪方程”的等号两边变成了单项。可惜这减法是用原始的化学工程、在某些叫什么“达豪”、“奥斯维辛”的地方进行的。

或许，最能说明民族主义的这种自伤性质的例子是 1918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主的德国犹太人哈柏。该同志因为合成氨而获此殊荣，在一次大战中堕为狂热的爱国志士，不仅使用化学手段为战时德国提供食物，而且首先发明了化学战，先后发明、规划并现场指挥德

军用氯气、光气、芥子气杀死、毒残数以万计的协约国士兵。他热衷于这种为国毒人的罪恶勾当，连爱妻因此愤而自杀都掉头不顾。不料希特勒上台后，他这个“劣等民族”却面临着“化学减法”的威胁，只得黯然离开他曾搭进了爱妻性命和个人名声捍卫过的祖国，死在孤独与良心责备之中。

就在出了这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丑恶的事后，世上还居然有人热衷于这种减法。美国南方至今还有新纳粹党人。他们高张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成立的南部邦联的国旗，主张用暴力将所有的非白人美国人赶出美国。当他们在公众场合演讲时，遭到人民群众的愤怒抗议，当我看到示威人群中众多的白人时，心里真觉得暖乎乎的。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限度，老祖宗那“中庸之道”的确是个伟大发明。如果鬼子们懂“过犹不及”的真理，则也不至于干出那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杀人兼自杀的行为来。不过正如那些反对新纳粹的白人显示出来的，人家毕竟还有个人道主义在那儿管束着，而这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如果说连人家先进的强势民族都最后明白了人道主义是高于其他一切主义的神圣原则，则我实在不明白现代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去走人家走过的绝路，一面还要沾沾自喜，扬扬自得，以为拾来的唾余是什么自己发明的宝贝东西。

2002 年 8 月 30 日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说过，民族主义是鬼子们用坚船利炮打进咱们的脑袋里来的。由于中国人典型的迟缓应变能力，这个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于抗战达到顶峰，历时大约一个世纪。而类似的变化在小日本不过花了十多年的光景。

不仅如此，咱们的民族主义还有两个中国特色，一是愚昧仇外，二是邪恶排内。这第一个特色是由灿烂的华夏文明造成的夜郎心态决定的。和以往入侵的游牧民族不同，鬼子们和咱们的文明对比倒了过来，人家是“夏”，咱们是“夷”，落后的文明根本就无法“化”了人家的先进文明，要人家来信奉咱们的孔孟之道是再也休提。于是中国人便面临着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文明困境：中外之争根本就不是单纯的民族之争，本质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这种文明冲突其实是全球范围内的，至今还在中东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人的抵抗虽远不如回回们的顽强，但毕竟造成了应对的迟缓、笨拙与愚蠢。

这说起来也怪不得老祖宗，毕竟，要承认自己的文明不如人需要大智大勇。如果今天绝大多数网上写手还不具备这胆识，又如何可以苛责当年的士子和愚民们？对他们来说，最自然的应对方式自然是祭起阿Q爷爷的精神胜利法宝来，闭着眼睛硬说人家不但是野蛮人，简直就连人都不是，不过是鬼之子而已，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夷夏大防”（请参阅拙著《“夷夏大防”论》）。

正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明保卫战”，所以近代中国人仇恨的其实不是那些怪模怪样的外族，而是他们代表着

的先进文明。这种中国特色根本就在西方正宗民族主义中找不到。该特色在拳匪之乱中再鲜明不过地展现出来。彼时爱国愚民们完成的大业主要是烧毁了若干教堂、平毁了许多尺铁路，放倒了几许电报线杆，至于“毛子”和“二毛子”的黄毛和黑毛倒没碰下几根来，因为那需要勇气，而勇气并不能靠吞下祖传的符咒香灰产生出来。

这种愚昧仇外以后又在文革中大规模重演，彼时西方生活方式，大到贝多芬的乐曲、托尔斯泰的小说，小到老美的牛仔裤以及肯尼迪的面包头，统统都在扫除之列。直到 70 年代后期出版的文盲艾思奇编写的大学政治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中还把电子音乐、摇滚乐谴责为“西方腐朽文明”。

当然，要说中国人不会进步，那也不尽然。随着时代进步，咱们对西方文明的抵抗范围也缩小了。如今国内的爱国愚民在爱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是“高选择性的落后文明保卫战”。咱们把鬼子们的文明分为所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前者一律接纳，特别是那些满足官能享受的玩意，上等者如ＶＣＤ、电子游戏、电脑互联网，下等者如海洛因、轮盘赌、马杀鸡更在欢迎之列，而人家的精神文明则只进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部份，人文科学精华如人道主义和民主思想则在禁止之列。这种选择性的文明抵制活动竟然能在“民族主义”的招牌下进行，其思路之奇，大概发明民族主义的鬼子们做梦也想不到。

第二个邪恶仇内的特色倒不是中国传统，最先是那些食洋不化的革命乱党进口来的。我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中指出，所谓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种族主义激情鼓动起来的，这种邪恶激情在邹容、章太炎、孙文等人的文章中显现无遗。孙文率领下的革命乱党居然还考虑过成立纯汉人政权，把中国重新变回南北朝去。

过了近百年，这种邪恶鼓噪仍然还回响在孙文传人的大作中。刘国凯先生的文章虽然没像邹容、章太炎那样对少数民族出之以恶骂，但在仇内程度上却令前辈瞠乎其后：他套用勃兰特给波兰死难犹太人下跪的例子，将少数民族谴责为十恶不赦的纳粹！这战犯起诉书的唯一证据，竟然不过是因为这些人的远祖曾在七八百年前入侵过中国！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如果这类民主斗士当了国，恐怕他们领导下的“民主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针对同胞的“纽伦堡国内法庭”。

无论是孙文等革命祖宗，还是其现代传人的这些胡言乱语，都最充分不过地说明革命家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夺取政权，并不是国家的统一、强大和人民的幸福安乐。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区别，是前者把“主义”当成权力斗争的工具，后者把它当成纯洁的宗教信仰。因此，“民族主义”这戏法在当国的政治家和在野的政治家手上变起来，花样完全不同。孙文煽动种族仇恨，目的是为了抵消当时压倒一切的忠君思想。如果把少数民族皇帝成功地开除出中国人的队伍，当然推翻起来就要比汉族皇帝容易得多。但一旦执政真的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后，这“纯汉族的民族主义”立刻就变成了“五族共和”。这其实丝毫不难理解：想夺权的政治家对能否如愿以偿完全心中无数，所以一般都巴不得天下大乱，国家四分五裂，他们能在乱中抢到一片地盘便是上上大吉。但等到革命真的成功了，他们的权力欲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巴不得统治的地盘越大越好，此时自然要从独派变为统派。不光是孙中山如此，毛泽东也如此。看过未经删节的《西行漫记》的细心的读者可能都还记得，老毛曾对斯诺允诺过中共革命成功后藏、蒙等民族地区的独立。但正是在他统治下搞出了“内人党”的大冤案。

明乎此，便不难窥见中共玩弄民族主义这戏法的真实用意。稍知历史的人都知道，我党当初不过是里通外国、挟老毛子之力问鼎

中原的汉奸党。建“国”之初，毛共对主子吹捧之肉麻，端为有史以来之仅见。随便打开一份 50 年代的报纸，您就会看到“父亲斯大林”、“世界人民领袖斯大林”、“苏联老大哥”的谀称。但在 60 年代中苏破裂后，毛共便开始有意识地玩起民族主义这戏法来，集中表现在文革后期拍的电影《创业》、《熊迹》中。等到后毛时代，因为马列主义毛思想的国教全面破产，中共便把所谓“民族主义”当成替代国教。此中奥妙，我已经在《“以夷制华”论》、《涔涔忧国泪，耿耿美芹心》中详细讨论过了，说穿了一钱不值：民族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诱导国民产生“国家即自己”的错觉，而国家总是由政府和政治家们来领导的，于是这错觉便成了“政府即自己”，也就是敬爱的江总的“三个代表”论。因此，世上再没有比民族主义更有效的统治工具了。

有趣的是，如此一目了然的事，许多读者就是看不出来。出尘公子在他的文章中，对“中共是目前国内‘民族主义’喧嚣的制造者”的说法深表怀疑，理由似乎是，第一，中共对外常常毫无理由地放弃国家利益，根本就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第二，中共从未在国内实行过种族歧视，历来主张各民族的和睦团结。

这两条都是颠扑不破的事实，也都是由执政的政治家的需要决定的。因为统治着一个弱国，中共便不能不是外交上的现实主义者（当然是在他们那低下的智力允许程度内的现实主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放弃国家利益谋求苟安，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听任默许日寇占我钓鱼岛，以及在西沙南沙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卖国口号。因为统治着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当然不希望国家四分五裂而减少统治的地盘，所以当然要比那些海外民运的愤青、愤中、愤老们有点见识，不敢奉行种族主义的取乱之道。

但这并不是说中共便不是那潘朵拉盒子的打开人。不客气地说一句，小出的疑惑不过是出自少年人的天真，分不清“羊头”和

“狗肉”的区别。前面早已说过，在政治家手上，“主义”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所以，执政的中共贩卖的民族主义以“仇外”为主要内容，而在野的政治家的民族主义则以“排内”为号召。前者的目的是以树立假想敌来团结人民，强化他们对政府的认同，后者则旨在煽动内乱，造成夺权机会。

可惜正如另文说过的，民族主义这把利刃不是好玩的，一不小心就得自行切腹。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毫不新鲜，基本是洋人搞过的那一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吹捧“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虽然主要是汉族，但也尽可能把少数民族皇帝拉了进去），宣扬“中国人具有特殊的聪明才智”等等。此外还效法希特勒当选前的仇外宣传，搞什么“百年国耻教育”（或帝国主义侵华史）。前者培养出国民的虚骄心态，后者煽动了国民的仇恨。而这正是导致内向型民族主义的祸根，这可是中共那些愚昧的文盲意识形态总管们万万没想到过的。

其实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中共玩这骗局，目的并不是让同胞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知道用大刀去砍鬼子的坦克是早被历史嘲弄过的笑话。专制国家的外交从来也就没有百姓置喙的余地。但问题是专制国家的百姓基本是愚民，分不清“伪善”和“善”的区别，以为政府演的是真戏，及至政府露出现实主义的真面目来，免不得就要大失所望，心里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这种事干多了，势必要形成激进愚民和政府的对立，让那大刀不砍鬼子而砍政府。

另外一个严重后果是它煽起了中国原来没有的种族主义。你要鼓吹自家文明的优秀，当然就只能去吹汉族文明，这种事干多了，一则得罪少数民族，二则让汉族自以为了不起，更加得罪少数民族。那国耻教育更是火上加油。本来，政府忆苦思甜，忆的民族苦是对鬼子的，但到百姓手上免不得是民族苦就要忆，于是忆来忆去

就会把“靖康耻”也想了起来。这方面最完备、最翔实的忆苦材料，已经由刘国凯先生提供了。

所以，如同历史多次证明过的，大刀很少砍到鬼子们头上去，一亿次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倒是卓有成效地砍在同胞身上，砍得血肉横飞，尸体狼籍。

当然，不是说中国就从来没有过比较不愚昧的民族主义。我个人认为，先总统蒋公的国民政府奉行的算是迄今为止最明智的民族主义。它既没有愚昧的仇外，也没有邪恶的排内，成功地把对外开放和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精华结合在了一起。国民政府更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蒋公领导下的抗战，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国际战争胜利，成功收复了丧失多年的领土的民族圣战。光凭这一点，蒋公便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民族英雄。

因此，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做的，还是向 30 年代回归。政府必须放弃把民族主义作为糊弄百姓的统治手段，真正作国家利益的代表人。过去那种祸国殃民、未能伤人先伤己的“民族主义”宣传必须立刻停止，向美国学习，用先进的生活方式和个人的无限发展前景来团结各族人民。的确，美国是世上种族最繁多的大杂烩国家，人家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悠久的文明可吹，就连个纯净的“美国民族”都找不出来。但该国国民照样充满一种自豪感，照样认同那块土地，靠什么？靠的是“美国之梦”，靠的是把那块土地变成“机会之土”！现在是中国人忘记历史上的光荣和耻辱，把眼光从过去转向于未来，为自己的国民制造无数的成功机会，书写“中国之梦”的时候了。

2002 年 8 月 31 日

“我大清”是否“我中国”？

前段坛里吵民族问题，吵得不亦乐乎，后来又闹“民族英雄案”。余大郎还在坛里拉我和老马写文章。其实我要说的话早就说过了，写在《民族主义系列》中。在那些文章中，我指出，古代中国人根本没有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所谓“民族英雄”是用现代观念去为古代的忠臣“划成份”。这一观点后来得到其他网友的充分论证，让我觉得非常欣慰。

此帖要补充的，只是我个人对教育部取消岳飞、文天祥“中华民族英雄”称号一事的感想。此事居然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实在出乎我的意料。禅宗六祖的名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古代本来就没有“中华民族”这个东西，何来“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一说？硬要把岳、文派作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英雄，势必要引起有关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从而危及国家的统一，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让我觉得欣慰的是，连蠢笨如驴的中国政府终于都看到了这“民族主义”之“哲学的贫困”，毅然“壮士断腕”，说明他们还没有蠢笨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如我在《“中华民族”面临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的，“中华民族”这个词，完全是一种针对帝国主义侵略，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创造出来的政治神话。因此，要评选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便只能控制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就是说，只能在帝国主义时代使用。因此，中国只在鸦片战争之后有全中国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关天培（满族）、左宗棠、聂士成、邓世昌、张自忠、杨靖宇、赵一曼等人就是这样的民族英雄。将这些人列为民族

英雄，只能激励全民真正的爱国热情，不会造成并激化民族矛盾，引起国家分裂。

从这立场出发，我也不同意ＸＸ先生的看法，不赞成搞什么各自评选民族英雄的活动，弄出些什么“汉族的民族英雄”、“蒙族的民族英雄”出来。在中国，历史从来是为现代政治服务的，从来是一种充满主观价值判断的文学作品。而如今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现实利益的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避免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惨剧发生。目前中国并不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根本就没有歌颂“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的必要。反过来，最大的危险是内部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各民族去纠缠历史旧账，树立各族自己的英雄，完全是为中华帝国的崩溃火上加油。

这其实不是我这个帖子想说的事。我真正想说的，是戒网后终于有了点时间看书，想把刚看到的东西抄两句在这儿。

最近出尘西贝公子刨故纸堆，写出了好几篇佳作。但我觉得遗憾的是，他研究晚清史，却没有看到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从组织上根本颠覆了同光中兴的甲申政变，把眼光放到北洋的覆灭上去了。其实，此前的南洋的覆灭特别是马尾一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才是至为关键的历史事件。中法甲申之役，导致“鬼子六”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台，从此政局大变。老醇一反老恭之政策，只知贪污受贿，彻底断送了同光中兴的大好局面，满清帝国的第一枚棺材钉从此敲入。如果没有这场政变，则后来的灾难也未必会发生，发生了也未必会这么惨重。其实我已经在跟帖中提醒过小尘了，让他讲讲南洋的事，可他似乎没有悟出其中的关键。其实在我看来，与其去歌颂李鸿章，不如去研究一下“鬼子六”和他主持下出现的同光中兴以及它的被颠覆，似乎还更有意义些。

话又扯开了，还是回到我要抄的那段书来吧。却说参倒“鬼子六”的功臣首推盛昱。盛昱取了个汉族名字，还学汉人弄了个字

“伯熙”。但他不但是满人，而且是金枝玉叶，祖父是肃亲王第四子，按玉牒排当为“载”字辈，算是同、光的堂兄。他母亲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之女，该家族为满清第一家皇亲国戚，出了许多后妃。所以该同志是民族融合的结晶，应该说，这样的同志说出来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满蒙贵族的心声。

可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在参“鬼子六”的奏章里却如是说：

> “......在该大臣等（案，指李鸿藻、翁同和直至恭亲王等一干人）必托言恐法夷诘问，于和局有关，不知部下喧传，申报刊布，其迹早不可掩，该大臣等唯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纲于不问，试思我大清二百余年有此体制与？抑我中国数千年有此政令与？”

请注意：这可是满蒙联姻生下来的金枝玉叶写在正式奏章里的话，而且这奏章被朝廷采纳，他弹奏的人或多或少都被处份了，说明这是为朝廷正式认可的官方文件。那里面可是写得明明白白：“我大清”和“我中国”不但不是两个不相干的概念，而且明说了前者是后者的延续。那些认为大清不是中国的满蒙同胞，还是先看看您们的祖宗是怎么说的再开口，好伐？

2003 年 5 月 25 日

也谈所谓“民族服装”问题

真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明朝的遗民，爱国爱到非要把满人开除出中国人的圈子去，逼着大夥儿跟着他们去作三百年的亡国奴，让中国历史上长达近 300 年的最辉煌时期变成全民耻辱，让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全成了汉奸，似乎才满足了他们的爱国激情。

要这么办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不过阿，恐怕汉人得统统撤出东三省，恢复明代“建州卫”的疆域。此外，八旗部队给咱们打下来的领土诸如内蒙、西藏、新疆也得统统放弃。林思云不久前就提出汉人应该退回明朝的 18 行省去，这倒是个好主意，建议国务院考虑这一问题。

最让我错愕的，是林思云那根本就不通的什么《没有民族服装的民族》的烂文章，竟然成了他人的偏执狂， 从此成了网上服装专业户的狂热推销对象。我起码看见该同志在此坛贴了不下四五次那破帖子。有趣的是，不但思云写那文字时没想到，后来的读者似乎也没想到这些最简单不过的问题：

第一，什么是民族服装？为什么起源于满族的服装不是汉族服装？汉人不是穿了该服装几近 300 年了么？这么长的时期还不能变成该民族的服装，那日本人是不是也没有了民族服装？他们的服装不是也是从异族那儿学去的么？

第二，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确定民族服装？莫非就是搞“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人海战术”，倚多为胜？

顺便说一句，我发现国人的对民主的理解就只可能到“少数服从多数”这个水平，我那《我们的民主和他们的民主》系列完全是白写了。上次思云和我争辩，就说是非标准须由多数决定，多数人认为是的就是是，认为非的就是非。民主精神如此彻底，最充分不过地演示了“人民民主”的教义是怎么融进了我们的骨髓的。鲁肃网友说的“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大于一个人”的真理，大概许多人到死也不会明白。“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其实是强加于人，只能在无法达成共识的具体决策中不得已而用之，本身就体现了“民主”对“自由”的侵犯。如果拿来当成判别一切是非的方法，则定然造出比毛共人民民主还可怕的暴民世界。

我早反复说过了，西方立国的原则，是先划定基本权利的圈子，圈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一切民主活动不得入内，圈外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演武台。这说的是政治，学术上就更不用说了，从来没听说过学术问题特别是对真的追求可以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强暴手段来决定。

第三，是不是一个民族非得有民族服装不可？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民族服装，是否就是不配生于天地间的贱民？有谁能说出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民族服装是什么么？英国连国徽、国庆都没有，只有国王生日，那到底还算不算国家阿？

顺便说一句，我个人认为，汉人原来的服装实在是难看之极，而且极度原始，不便劳作，那袖子宽大到让你露不出手来，穿上去就得瘫痪，丧失了行动、工作能力。倒是满人的服装比较实用也比较好看，特别是旗袍，完全可以和西方的服装媲美，否认这一点，似乎只能证明这些人“爱国”爱到连理智都没有了。

2004 年 8 月 19 日

评余大郎“放台独，拖藏独，灭疆独”的“安邦定国策”

我说过好几次，当年小芦呆的厂子里的老木匠们，干一辈子木活，却连做个人字梯的本事都没有。在网上碰上的“专业人士”，让我多次想起他们来。年初在驴鸣镇给某专业哲人传授哲学ＡＢＣ就不必说了，如今又得来给专业政治家余大郎先生开最起码的政治入门课。

大郎的“安邦定国策”的要旨就是题目里已经写了的九字真言，也就是三句三字经。可惜，那玩意比国骂三字经的水平还要低。其功能只有一个：证明余大郎这政治家吃了一辈子的政治饭，却连基本国情是什么都毫不摸门。

首先得重复昨天的话：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表明，这世上没有一种独立运动是可以“灭”了的。无论强势民族怎么无情镇压，闹独立的弱小民族最后总会成功。此乃你必须牢记在心的第一个事实。如不服气，不妨举个反证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伐？

第二个必须牢记在心的事实是：迄今为止，世上所有的多民族国家中，似乎只有美国一国没有发生过民族独立运动。

如果你记住了这两个事实，就知道你那“灭疆独”之说的可笑。如果你聪明些，还可以从这两个事实中进一步悟出解决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的正道来。

这正道我早就写在一系列旧作里了，再重复一次吧。就算重复，那又怎的？不懂的人还是照样不懂。

先看你那“放台独”的高论是何等可笑。

任何一个对国情有点起码理解的人都知道，中共继往 20 年的愚昧操作，使法西斯主义成了国内人民的主旋律，于是我党便将死了自己的军，使自己彻底地丧失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灵活周旋余地。任何一个文官政府如果胆敢“放台独”，立刻就要被军人政变推翻，而且那政变还会获得全民衷心拥护，说不定还要因此触发台海战争。因此，你这“放台独”的妙策，完全是制造大陆动乱、祸延台湾的速祸之道。

老芦出来抨击陈水扁，也正是因为看出了这点来，怕他作坑人秀，玩火自焚不说，还把大陆也贴进去。

正确的方策我早在《不统不独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中说过了。这里再说一遍：从两岸人民的利益着眼，“台独”都只宜拖。从大陆这边说，动武乃是下下策，只会毁灭自身。正确的方略是学习盘丝洞的女蜘蛛精，从肚脐眼里吐出无数的软丝来，把台湾团团罩住。通过提供大陆的广大市场，吸引台商资本，用经济纽带把台湾牢牢地捆死在大陆身上，造成客观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看他们还怎么独去？

从台湾这面来看，拖也是最有利的出路。大陆的专制制度，决定了其政局永远含有不可知变数。你可以预言民主国家一百年后的光景如何：英美再过一百年，其基本政局还不只会是今天这副模样，两党轮流执政，是不是？人家一百年前就是现在这样，再过一百年也仍然只会如此。但你绝对无法预言大陆式的半极权政体能维持多久。所以，拖下去对台湾也最有利，那结果无非是两种：大陆文明化了，或者崩溃了。如果大陆将来文明化了，则便和大陆统一

也无所谓。如果大陆分崩离析，碎成七八十块，则正好一枪不放便轻易取得独立，何乐而不为？

所以，依愚见，你那妙策不错，只是动宾搭配弄错了地方，应该是“拖台独”。

再说“拖藏独”。

我早就在旧作中说过了，西藏对中国只有感情价值和国防价值，在经济上只有负价值。因此，应该及早“放藏独”，摆脱那出力不讨好的财政包袱，放弃那填不满的巨大的无底洞。具体办法就是退回到“17 条协议”去，迎回达赖喇嘛，撤回共干，只留下共军负责边防，由中央负责外交，让当地实行高度自治。如果有经济困难，须由地方政府公开向中央政府或其他省区政府告帮，再由中央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公布援助款额，贴钱贴在明处，让藏民知道感激，免得再做花钱暗贴买仇人的冤大头。

我还在旧作中向中央呼吁，留给我党的时间不多了，达赖并不要求独立，要求的只是高度自治，而这一点是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的，符合双方的利益。如果恃仗武力再拖下去，拖到达赖死了，继任人不见得会有他这么通情达理，更别说有他百分之一的政治智慧了。因此，“拖藏独”最终只会坑了自己。将来中共不垮台则已，一垮台那儿的汉族就是人家的屠宰对象，而西藏也就从此脱离中国大家庭。

因此，尔之所谓“拖藏独”，完全是祸国殃民之策。应该是“放藏独”，不过那是及早放人家高度自治，使西藏回到清朝时的事实上的保护国上去。

最后看“灭疆独”。

这问题也早就说过了，西藏和新疆问题完全不同。西藏根本就不是达赖喇嘛指责的那样，是“中国的殖民地”，因为毫无经济价

值和移民可能。而且西藏民族均一，和境外民族并不同质，不可能和其他国家合并，对中国构成威胁。

但新疆完全不一样，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文化根本没有什么同一性，却和境外几个国家同质性很高。例如维吾尔族看的出版物、电视、收听的广播等等，全是境外流进来的。因为语言文化隔阂，中共根本就控制不了基层政权，更无法控制百姓的思想。从内心世界来说，那儿的居民完全彻底地“非中国化”了。这种状况如不改变，那地方迟早要独立出去。如果和文化同源的邻邦合并，则势必造成对中国国防的巨大威胁。

更严重的是，那儿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极度紧张，伊宁地区多次发生武装暴乱，而当地居民多数信仰回教，很容易受到回回极端主义的影响。当地汉族却又极度冥顽不灵，祸在眉睫尚死也不悟，其自认“优秀种族”、鄙视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维族）的作派，比大英殖民者鄙视印巴人还更胜一筹。因此，未来中国不乱则已，一乱那儿的汉族必然要被人家“三光”，只怕死前还要受尽酷刑折磨。

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中国的石油资源全储藏在那儿。现在内地的石油已经挖得差不多了，海上又弄不出来，本世纪内，能源供应中心势必要转移到那儿去。所以，如果说西藏毫无经济价值，那么新疆可是对全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考虑到这些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紧张的民族关系和极端回教分子的血腥传统，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放疆独。但我在上文已经说了，世上还没有什么独立运动是可以消灭的。因此，解决的正道，还是学习美国，用软功把疆独化于无形。

具体建议我也早就提过了。那就是以重利诱惑人口双向流动，国家以优惠条件引诱让少数民族流动到内地来作生意、发财、上学、就业等等，鼓励汉族流动到那儿去淘金，只要大多数少数民族

给吸引到内地来，则定然会很快地稀释消化在庞大的内地人口之中。这种“换血”政策是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应该说是对各族人民都有利的事。

最主要的，还是要在内地提供特别优厚的条件，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到内地来发财，只要大部份回回变成了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去当人肉炸弹的概率也就小多了。在“换血”完成之前，应该公开投标出售新疆油田，把国际财团、当地民族大款、内地政府统统拉进去作股东，这样万一以后真独立了，中国也不至于丧失油田的控股权。

所以，真正的治疆策，应该是“化疆独”。

你说，这三策比你那祸国三策如何？可惜再好的方策，中国政府也决无那远见和胆识去实行，而这就是“中国问题无解”的根本原因。

2004 年 9 月 7 日

奉劝我党莫失良机，迅速迎回达赖喇嘛

最近在网上看到达赖代表和中共重开谈判的消息，据说达赖喇嘛开出了最新条件，对《印度斯坦时报》的采访者说：

> “假如我在未来几个月内或我们能重返西藏之前过世，将会有一位新的达赖喇嘛。但倘若我们不再是难民且能生活在民主的西藏，则我不认为在我过世后应该要有继承人。”

此话表面的涵义很浅显，但深层意味无穷，他的意思是：如果中共不接受他的条件让他回去，则他死后还要转世，领导西藏人民向我党作斗争；但如果我党答应他的条件，同意西藏自治并实行民主，则他便会放弃活佛转世的千年传统，死后不再转世。

达赖喇嘛为了回国，竟然作出如此重大让步，不能不让我瞠目结舌。

西藏最难办的问题，就是缺乏和汉族的文化同一性，天生就有离心力。更麻烦的是，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达赖作为“神王”，是西藏人民当仁不让的精神领袖。我党可以用武力征服西藏，但绝无可能征服藏民的心。达赖喇嘛就算流亡异国，永远是人民的效忠崇拜对象，无论怎么努力，北京根本就不可能改变这一点——一个世俗政权的优势只会是物质上的，任你武功盖世，也绝对不可能击败精神号召力。如果说当年老毛还可以提供替代宗教，那现在我党是再无此能为了：连党中央都没谁相信马列邪教，还能指望以此去洗藏民的脑？

因此，我党自恃武力强大，不把人家流亡政府放在眼里，其实只是为将来储蓄大难。日后如果枪杆子不灵了，西藏立刻就要独

立，而生活在那儿的汉族必然要变成人家的屠宰对象。这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论述过了。

现在达赖竟然愿意作出如此巨大的让步，意味着为国家增添了个难以估量的稳定因素：活佛转世制一旦随达赖逝世而终止，藏传佛教也就和佛教的其他流派没什么区别了。须知崇拜死了的神 / 佛没关系，反正那些死鬼也不可能和世俗政权有什么利害冲突。但崇拜活着的神 / 佛可完全是两回事。如果那神 / 佛站在世俗政权一边，则教民也就和世俗政权站在一边；如果他和世俗政权为敌，则教民必然和世俗政权为敌。你再威胁利诱，也无法改变人家内心的态度。

因此，达赖不再转世，这大概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这意味着佛国世俗化第一步。虽然除了达赖外还有其他活佛，但那些人都不是全体藏民领袖那个档次的人物。如果我党还不接受达赖的条件，那当真是不识抬举。坐失如此天赐良机的如此蠢党，只配让万民唾弃。

我党从来是个势利痞子党，只知道崇拜实力，其审时度势的标准就是对方的利用价值。一件东西到手前后，其态度完全两样。香港回归前后，党国领袖对当地新闻界和名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就最足彰显这种势利眼。或许，我党以为达赖乃是丧家之犬，又已进古稀之年，毫无价值，根本用不着理睬。达赖死后，我党只需按照炮制假班禅一般，制造出个钦定灵童来就行了。

如果我党真打这种愚而诈的臭主意，那当真是发错了梦。假班禅已经弄得在国际社会中丑声四溢，唯一功能便是让我党以掩耳盗铃自欺自慰。倘再弄出个假达赖来，那才是雪上加霜。正如藏民只承认达赖指定的班禅灵童一样，达赖死后藏民也只会承认由他的流亡政府指认的灵童，决不会承认党产货。劝我党还是早死这条心。

其实达赖的要求非常通情达理，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我看完全可以接受。请他回来，并放西藏自治，把汉族共干撤回来，只留下驻军，以后中央政府只负责外交和国防。从此停止中央对西藏的巨额财政援助，请达赖发挥他的国际公关本事，去国际社会沿门托钵，化缘回来用于西藏的管理和建设。如果需要中央政府援助，必须正式申请，再由中央明令拨款，改过去那种暗贴为明补。如此一来，定能化解过去的仇怨，营造出民族友好气氛来。

西藏自治绝对不会引出连锁反应，我党不必为此担心。西藏和其他民族自治区不同，有 17 条协议在那儿。我党只需声明恢复实行原来的 17 条协议就行了，新疆、内蒙等地人民并无理由提出类似要求。

迎回达赖喇嘛也不会引起西藏自治权周边藏族地区的骚乱。当年引起西藏叛乱，无非是与卫藏相邻的地区的土改引起来的。如今的形势已和当年完全不一样了。达赖向国际社会承诺实行民主，决不可能再恢复农奴制度。只要等到达赖天年一尽，独立于世俗政府的政教合一权威便不复存在。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与其往西藏那个无底洞里倾倒无量人民币还只能买来人家的仇恨，不如请达赖回来自己管理。我实在看不出中央这所谓“让步”，除了省去一大笔财务开支外还能损失什么。说到底，西藏本来对中国就只有心理价值和国防价值，而自治根本就无损于这两者，只会减去经济上的负价值，又何乐而不为？

总而言之，劝胡中央勿失良机，迅速定计，早日迎回达赖喇嘛，真正开藏汉之间的万世太平。

2005 年 7 月 2 日

从民族主义说到文明自杀

拙作《史可法的选择》陆续推出后，引起某些读者的强烈反弹。他们无法接受“民族主义是舶来品，古代中国没有民族英雄，儒家的‘英雄’说的乃是道德楷模”的大实话，谓我已经彻底丧失理智，云云。

鉴于同志们顽固地坚持“以洋学代国学”，硬要说古代有民族主义观念，我只好再在此说上几句。

民族主义与民族英雄

现代民族主义纯属欧洲产物，是迟到法国大革命后才最终成型的，任何一位稍微读过点欧洲史的人都该知道这点。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东征西讨，催生了欧洲人的民族意识，此后民族主义就成了欧洲人立国之本。他们不但为此在欧洲打得你死我活，而且用坚船利炮把这套观念打到不发达国家人民心目中去。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就是鬼子侵略的直接结果，最终变成全民意识形态大约化了一个多世纪。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好几个鬼子汉学家都这么说过，我不过是一如既往，告诉大家一点常识罢了。

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的产生完全是欧洲式的偶然，并不符合人类发展的通例（我早在旧作中说过，整个欧洲文明都是违反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一个偶然）。不仅中国古代没有民族主义这套玩意，全世界都如此。除了欧洲，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人还原发性地萌生过这种意识。

要明白这点，只需看看第三世界那些国家的地图就行了。无论是中东还是非洲，那儿的国界都是按经纬线划出来的，笔直如界尺。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则甚至连私有财产的起码观念都没有，这才会不但不驱逐外来的白鬼子，还欣然以一串玻璃珠的代价，把大片土地卖给欧洲冒险家们——在他们看来那买卖毫无意义：土地是神的创造，谁能拥有？要到后来他们重返卖出的土地，因而遭到物主“理所当然”的枪弹迎击时，才首次痛苦地萌生了“所有权”的观念，可惜已经太晚了。

民族主义的基石就是私有制，它其实是民族层面的强烈权益意识。要有民族主义观念，首先得有民族层面的“你我之分”的强烈意识。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的前提是“本族”与“异族”的强烈分野意识，为捍卫本族的精神物质财产和异族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它的实质。这就是否定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原因。

问题恰在于，在欧洲以外的国家，这种意识产生得很晚，这才会有帝国主义趁虚而入征服全世界的事。帝国主义的精神柱石就是民族主义，而作为其极端表现的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柱石就是纳粹种族主义，难道同志们连这都不知道？

中国当然比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先进。正因为此，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要比那些国家早些，而这就是驱使中国在近现代进行种种盲动的主要动力，也是蒋介石比汪精卫高明之处。记得在大陆改题出版的一本鬼子的专著（改名为《抗日战争中的通敌内幕》）中，作者指出，在中国，民族主义观念肇始于鸦片战争，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在抗战中形成全民意识，而汪精卫没看到这点，只看到中共构成了极大危险，为此与日本人合作，却看不到这么做只会被人民抛弃。

第三世界也经历了类似中国的过程，但滞后了将近一个世纪。民族主义在那些地区乃是在二次大战后才昌行起来的。如今回回跟老美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重演咱们过去的把戏，区别只在于人家不怕死玩真的，而咱们一般只是嘴上救国罢了。正因为民族意识已在世界范围内空前觉醒，帝国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才在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前便指出“新帝国主义理论”的荒谬并预言了英美冒险必然以失败终局。

其实哪怕在欧洲，民族主义也是后来才出现的。古罗马帝国颇像中国，根本没有后来的民族观念。他们和咱们一样，乃是用“文明”这个标准，去划分不同人群，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把日尔曼、高卢人等看成是野蛮人，用 barbarians（野蛮人）来指代那些落后民族。但这并非一成不变，野蛮人如果接受了罗马帝国那套文明生活方式，并具有相当财富和地位，就可以取得“罗马公民”的资格，享受和正宗罗马人一样的权利。换言之，这种社会实行的是“文明歧视”而非“种族歧视”。

这与晚清前的古代中国十分相似。古代中国人区分不同人群，用的就是“教化”这个唯一标准。在老祖宗看来，不同人群只有“夷夏”之分，也就是“教化”之分，而夏人的任务，就是用孔孟之道去把夷人转化为夏人。夏人对夷人的态度并非种族歧视而是一种文明傲慢心理。它表现在称呼上，便是用“蛮子”、“胡虏”一类辱称。这倒比较实事求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确实没什么文化并常以抢劫为生。但这种划分方式与种族标准不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我在旧作中指出，不仅唐太宗那前蛮子成了中国的明君，李白那胡人成了中国数一数二的大诗人，就连日本人晁衡学会了中文、能写唐诗之后也毫未受到歧视，不仅在《全唐诗》中留下了作品，就连李白那种超级诗人大拿都有诗作赠送他。

古人的这套观念，在我看来远比舶来的民族主义先进多了，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而且确实在古代中国行之有效。春秋时代的“文明地区”只限于中原，就连秦国最初都是野蛮人，楚国、吴越等地居民就更是蛮子了。当时中原发达国家称楚国为“荆”，那就是对野蛮人的辱称。正因为老祖宗们采用了这种博大的朴素世界主义，“夏”的地域才从中原一隅逐渐扩大到了如今中国全部汉族地区，而接受了“教化”的所谓“汉族”也才达如今的十几亿之多。其实若以种族而论，所谓“汉族”完全是个大杂烩。北方来的同志血管里起码奔流着 10 多种胡人的血液；南方同志的血液相对比较单一些，可惜他们的老祖宗在远古时也是“南蛮鴃舌之人”，并非炎黄子孙，乃是可耻的蚩尤之后：）

依区区愚见，中国式世界主义，比欧洲人发明的民族主义更富有人道情怀，起码没有后者的血淋淋。但它的运作前提，乃是“夷夏之分”。古代中国确实是周边地区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所以当然有教化蛮子的资格。如果夷夏翻转过来，人家成了夏，咱们成了夷，则这套就再也不灵了，而这就是晚清那些敢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们发现的痛苦真情。

遗憾的是，如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看见李中堂当年看见的东西。而中国过往百多年的苦难，就是国人在此问题上的对立引出来的。从义和团到毛泽东的阿 Q 们坚持咱们是夏，鬼子是夷，救国之道是用硬气功把鬼子打出去；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康、梁直到国府那群从政学者的假洋鬼子们认为咱们才是夷，救国之道是在保留夷文明精华的同时，赶快向夏人学习。这两派大打出手的结果，阿 Q 们大获全胜，导致土洋文明扫地以尽，于是咱们不但没把夏文明学来，连原有的一点夷文明都彻底丧失了，这才会有那些“强不知以为知，敢以无知教有知”的夷学盲们在网上跋扈。

不仅如此，任何外来思潮如果要在中国生根，必然得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改造，佛教就是最生动的证明。对进口来的民族主义，咱们也加入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使之变得面目全非了。

前面已经说过，西方民族主义的特点，乃是“为捍卫本族的权益和异族打得头破血流”，但如果是本族内发生纠纷，则人家一般并不大打出手。英国就是最典型的范例。人家虽是民族主义祖师爷，乃是世上外战最多的国家，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世上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可如果遇到自己人闹独立，一般并不动武，只有北美战争是例外，那还是美独分子挑衅的结果。中国式民族主义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发扬了中国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悠久传统，从来是针对“汉奸”而不是鬼子的，亦即在“爱国”的旗帜下清算屠杀本族同胞，使“民族主义”成了内战借口，乃是中华民族的切腹利器。

刻下这统独之争就最生动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爱国志士们从来不敢去要求中国政府收回被俄罗斯抢走的 15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敢责难中共政府出让外蒙、唐古乌梁海、中印边界东段的 9 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以及高黎贡山以西的万顷良田，从来不敢去向日本索要钓鱼岛，却专门针对台湾那弹丸之地显威风，逞杀气，这种怯懦凶残无耻的“民族主义”倒确确实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老芦愚钝，非但不觉得义薄云天，反而无法理解那些爱党志士为何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荣。

扯远了。如果同志们硬要坚持古代确有民族主义观念，确有所谓“民族英雄”，那也行阿，只要有谁亮出《四书五经》中有关教导，则我立刻缴械投降。

几年前，我为国学问题和网友“真假先生”发生争辩，写了《咱也翻翻本本》一文，结尾一段说：

"和真假先生的讨论，不仅促使我秉烛攻读圣教，加深了对圣人的认识，更让我意识到自己简直可算孔门的第七十三弟子，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实现了伟大先师的崇高理想：'欲居九夷'，'贤者辟世，其次辟地'，'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无道，富而贵焉，耻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等等。老芦竟然做到了圣人'一篇之中，九致意焉'的谆谆教诲，想起来就禁不住暗自得意。叛国投敌的思想根源竟然出自于中国的'圣经'，这大概是那些卫道的爱国同志们始料未及的吧。令我苦思不解的是，如果咱们提倡向圣贤之道回归，固然可以使主持偷渡的蛇头那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货柜车里再闷死百儿八十的又怎么办？"

这难道就是圣人教咱们的"民族主义"？

体谅到诸位对夷学一无所知，我再让一步：只需诸位亮出古文中"民族英雄"的等价词汇来就行了，怎么样？据诸位说，古人有"民族英雄"的观念，既然如此，那古文中当然有相应词汇表达。如果连这词汇都找不出来，那请问诸位那"民族英雄"的毛到底附在哪张皮上？

波洛网友在跟帖题目中，引《说岳全传》作为古代中国有民族英雄的证据，这恰好说明我党洗脑工作是何等彻底。他不知道，传统社会乃是把岳飞作为典型的忠臣来表彰赞颂的，而我党认为那是"糟粕"，以马列主义（其实是斯大林主义）的史学观来强奸古人，认为岳飞值得肯定的只是他抗击异族那面，是所谓"民族英雄"，这才把《精忠说岳全传》改名为《说岳全传》。其实看过那本书的人都知道，岳爷爷剿灭"农民起义军领袖"洞庭水寇杨幺的

光辉业绩，要远远超过他抗金战争中取得的战果。既然他是民族英雄，为何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去屠杀自己的同胞？

波洛网友还质疑我的“儒家推崇的英雄都是道德英雄”一说，举项羽作为反证，说明他连司马迁的《史记》都没看过。严格说来，司马迁算不得正统儒家，前人曾批评他“不与圣人同是非”。可就连他这种偏离主旋律的同志，也要指责项羽道：

> “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这里对该大英雄的指责，哪一句不是使用儒家标准进行道德批判，还请波洛网友有以教我。

文明自杀

安魂曲网友质疑道：江山换姓，百姓损失了什么？损失了传统文化！

此话有理，我那话确实是以偏概全，得看那江山是换了谁的姓。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发生的两大劫难，都是江山换姓之后发生的。第一次是江山全部改姓嬴，第二次是江山换为毛姓，反倒是两次异族入主中原后还没出现过这种大灾难。

这怪事该怎么理解？其实答案我早在 6 年前就写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中了。愚以为，如果文化处于和平竞争状态下，则一般是“夏胜夷汰”。比较东南亚和欧美华人的后代立刻就能洞见这点。

尽管东南亚华人移居国外比欧美华人早得多，但人家世世代代顽固地保留了“中华文化菌落”。当年我班那些侨生的祖宗们移居国外乃是几百年前的事，可人家的中文会话写作毫无问题，完全是第一语言，当然普遍作文水平低于国内学生如我者，但这已经是文化奇迹了。

相比之下，吾家小芦乃是 12 岁才出来的，靠他老子给的文学基因，在出国前还曾得过作文大奖。可现在连汉字都不会写，连汉语拼音都忘记了，要拿英文来跟我鬼混！他日后若给我生个二毛孙子出来，难道还会说华语不成？

这相反现象表明，相对于东南亚当地文明，中华文明是夏，人家是夷，而在欧美华人社区，优劣对比就完全翻转过来，人家是夏，咱们是夷，自然要根据自然选择优胜劣汰。

因此，中华文明曾经并正在面临的危机有两种，一是文明间的和平竞争，二是文明自杀。

在古代，中国是夏，周边国家是夷。因此异族统治并不能造成文明的毁灭。例如蒙古、女真原来并无文化，毁灭了华夏文明，他们用什么来代替？元朝实行种族歧视，排斥南人作官，非但没有毁灭汉族的文明，反倒驱使做不了官的读书人去搞民间文学，使得戏曲、说部等过去没有的文学形式异军突起。元朝文学创作之繁荣，与元朝统治之短暂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致“元曲”成了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而满清的文明成果比起明朝来我看也只高不低，起码“朴学”要比“理学”更有学术价值得多。

近现代中国文明面临的外部危机则完全不同了。人家是夏，咱们是夷，人孔老夫子早说过了：“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如果把那“可”字解为“可能”而不是“应该”，则此话便从孔式口号变成了芦式事实陈述。此所以现在出了这么多夷学盲，当真是一代接一代“夏才辈出”。但他们不懂夷学并不构成什么损失，起

码不会因此变成文盲，谋生更无问题。例如吾家小芦颇有夏学造诣，不是他爹可以随便糊弄的。而这才是中国和其他文明落后国家面临的重大威胁。

但比起文明自杀造成的灾难来，外来文明冲击实在算不了什么。上面已经说了，中华文明历经两次空前浩劫，都不是异族而是自己人制造的。

具体来说，这两次灾难的规模、范围与深度判若天渊。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秦始皇虽然焚书坑儒，但并不彻底，乃是通过官僚机构下行政命令，并没有发动人民战争。其效率很可怀疑。连司马迁都承认，烧毁的主要是各国史书，《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仍藏于民间，等汉朝建立后便又再度浮现。所以，秦始皇对文明的破坏，主要还是打断了自春秋就开始的连续历史记载。

毛给中国带来的文化浩劫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真是全民踊跃毁灭文化，不但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被当成"封资修黑货"彻底禁止，而且文明的占有者和学习者要遭到无情的消灭、整肃与迫害。最可怕的是，这迫害不是由官僚机构而是由全民自觉进行的，900 万方公里土地上无处可以逃匿。"知识才能即罪恶"的公式牢牢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头，成了家长们谆谆告诫孩子的第一条明哲保身世故。自有人类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种荒谬反动可怕的情景。

这悲剧是怎么发生的？能否在中国寻出传统根源？难道真如某些头脑简单的倒共同志说，它不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乃是苏联进口来的？那请问苏联搞过这套没有？人家的文化专制乃是以十月革命为界，只在此后管制压迫文化人，规定他们按党的调子创作，但此前的文化成果则不但全盘保留，而且不遗余力地大吹大擂，吹到卫星国家去，以致老芦的俄罗斯文学素养，恐怕不会逊于西方专攻俄罗斯文学的大学生。

所以，这现象只能用咱们的传统解释。

具体解释我过去早在一系列旧作中给出了：所谓中国传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乃是儒家传统，一部分则是痞子毁灭文化的强烈冲动。后者不必再说，前者也有导致文化自杀的先天“原癌基因”，那就是实行“政治挂帅”，强调以孔孟之道指导一切，不容许任何偏离这主旋律的杂音存在。宋明理学问世后，把四书五经视为天下唯一的学问，这自闭基因就给激活了，这才导致文明从明朝开始走上下坡路。等到毛那假马列主义者登场，便把宋明理学和痞子造反的两大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变成了“宋儒加黄巢”式的怪胎，最终导致了中华大地上见所未见的壮丽的文明自杀。

2006 年 3 月 14 日

就民族主义问题简答网友质疑

拙作《从民族主义说到文明自杀》贴出后，安魂曲网友等人提出了质疑，在此作个简答。

安魂曲说：

> “老芦把‘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偷换概念成‘不具备强烈民族情感’，其中之谬误就好比把一个因从未接触而不懂现代合同概念，因此错误在诱骗契约上签字导致家产被恶人霸占、家庭被强行拆散的老实家庭，胡说成根本不珍惜自己家产甚至家庭本身的糊涂虫二百五一样----事实上偷换概念也恰恰是‘芦笛政论’的典型手法，大家读他的文章时可千万要小心为上。”

是么？我何处这么做了？请你把原文举出来行不行？你才是偷换概念，假设个靶子乱批一通。

我说的是原话可是：

> “民族主义的基石就是私有制，它其实是民族层面的强烈权益意识。要有民族主义观念，首先得有民族层面的‘你我之分’的强烈意识。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的前提是‘本族’与‘异族’的强烈分野意识，为捍卫本族的精神物质财产和异族打得头破血流，这就是它的实质。这就是否定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民族主义的理论原因。”

这是你说的那回事么？

现代民族主义，我认为有那么两个特点：

1、把“自我观念”放大于全族，把本族看成是自我的放大，为此把“利己”心扩大到本族的层面上去。

2、基于这种强烈的本族权益意识，建立民族国家，捍卫本族的精神物质财产，包括文化、语言、生活方式、领土、资源以及一切其他财产，甚至为此发动战争掠夺异族的这些财产，且有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异族头上去的倾向。极端形式便是种族主义。

说中国古人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人傻到看不出异族来，而是说古人从来没有把一己放大到全族的思维方式，更没有明确的权益观念。我早在无数旧作中指出了：孔孟之道只强调责任和义务，不强调个体权利，公民没有强烈的个体权益观，由此导致中国民主难产。连个体权益观都没有，谈何把这种权益观放大到全族去?

古代当然有种族歧视，元朝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那并非中国文化主流。哪怕是元朝，那民族划分也主要是根据地域来的，例如中国人被划成“汉人”和“南人”两大类，依据是蒙古人征服的顺序与遭受的抵抗烈度，而不是什么种族原因。“汉人”亦即北中国的人，包括原来汉化了的民族以及契丹、女真、西夏人等等，而南人是最后征服的江南人。这根本就不是严格的按种族进行的歧视，而是一种政治上的反感导致的地区迫害。

古人也不是傻到认不出本族和异族来，史书上就有许多胡人的名称，诸如匈奴和五胡乱华的那五胡。关键在于：中国人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民族如此敏感，特别认同自己的民族，而是把这主要当成了个文化问题，只要接受了汉人生活方式亦即所谓教化，胡汉之分很容易就消失了，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同化”。如果民族之间排斥力很大，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民族融合过程，这该是谁都能理解的吧?

否认古代中国人的民族宽容精神，就无法解释“汉族”何以会融合了几十个民族，变成一个共同的文化体。“汉族”其实只是个文化概念而非种族概念。它甚至把民族观念最强烈的犹太人都融化了：我在《民族主义论》系列里讲过：犹太人、吉卜赛人全世界都有，唯独中国没有。过去西方人曾以此指责中国人排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为这些民族没有受到歧视迫害。没有外力压迫，他们的民族认同心天长日久自然就消失了，因而跟周围的人逐渐融合导致全民族消失。如果像西方那样，遭受外界环境同心协力地歧视压迫，则只会加强他们对本族的认同。

最能说明中国人对异族的容忍力的例子，还是中亚移民能在保留自己的宗教的前提下彻底汉化。内地所谓“回族”乃是中亚来的，许多人保留了中亚白人的面部特征，女的特别漂亮（这让我想起青春时代来了，这女回回就是漂亮，中国也如此，啧啧），但这些人除了严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外，根本就和汉人毫无差别。这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的民族容忍性。中国文化甚至能把穆斯林都给化了，可见其宽容性。共党后来把内地回教徒划为“回族”完全是胡来，哪怕按斯大林的经典定义都不合适。

诸位怎么不敢正视我的挑战，从儒家经典里拎出民族主义的教导来让大家看看？做不到这点，起码得给大家看看古文中的“民族英雄”的等价词是什么吧？老实告诉大家，古文中连“民族”这个词汇都没有，只有“民”和“族”两个词，前者是指“百姓”，后者是指“家族”，亦即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群。“民族”这个词乃是西学东渐之后才人工造出来的（可能是日本人造的吧），光这个事实就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根本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否则怎么连表达它的词汇都没有？

至于安魂曲引用“留发不留头”的例子，正好证明了我的论点。满清本已平定江南，除了南明小朝廷东逃西窜外，谁都没反

抗，后来汉人积极分子上了一份奏折，劝多尔衮说，如果不让汉族剃头，则等于没有征服中国，于是多尔衮才下令。这才激起了局部地区（并非广泛范围，我记得只是嘉定和江阴等个别地方，请诸位不要受辛亥革命后革命乱党的欺骗宣传的当）的反抗。但这恰好说明古代中国人根本不在乎异族统治，在乎的是生活方式。因为剃发令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儒家教导，大众这才无法接受。如果不是为此，本来都已降顺了。

当然，大明百姓不抵抗满族征服，也倒不完全是因为缺乏强烈的民族权益意识，主要原因我看还是怯懦。大家觉得这很可耻，其实是从美学角度来看问题。以实惠观之，怯懦未必不是保种的一种有效方式。还是那句话，江山易姓，百姓到底损失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后来的君主统治是否比原来的更差，除了共产党那种史无前例地要抢夺全民财产的土匪，又何必去反对？

但共产党那种土匪现象空前绝后，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乃是偶然的特例，不足为训。所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不管谁来统治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例如中国如果不抗战，让日本人征服了，难道生活在鬼子统治下还要比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糟糕不成？

安魂曲错乱的另一处，乃是根本不明白那国界按经纬线划的涵义——那正说明那些地区历史上从未形成边界明确的民族国家阿！大部分非洲地区无非是些部落，连国家都没有，毫无历史根据，你让殖民者们怎么去划界？

中国当然早就形成了国家，但其实也有这问题，只是没那么严重而已。历史边界都是模糊的。除了南宋和金国以淮河为界之外，所有皇朝都有这问题。对此问题，《天葬》已经讲得很透彻了，请同志们去攻读那杰作吧。这现象反映的还是上面说的那个根本问题：中国古人没有民族的强烈权益意识，对“家产”有多少不是那

么在意。所以只有在两国交战（诸如上述宋和金）的特例下，才会去明确划界。

Yank先生：

请不要称我为“芦师”，我不配作任何人的老师。

我认为，程朱理学乃是引爆中华文明自杀的炸弹。明朝乃是中华文明骤然下跌的低谷，这原因很多，程朱理学成了主旋律当然是主要因素，其他跟朱元璋全面倒行逆施也分不开。

朱元璋和毛泽东非常相似，两人都是中华文明的杀手。朱上台前不打蒙古人，专门打内战自肥，最后在扫平了所有竞争对手后才派徐达和蒙古人作战。他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彻底摧毁了宋代相当发达的工商业，限制人民迁徙、贸易等等，明朝后来还封海，禁止海外贸易，把资本主义萌芽彻底掐了。他还厉行文化专制，不但大搞文字狱，甚至把孟子从文庙中搬出来，把《孟子》列为禁书。只是后来有人跟他说，孟子的主旨还是维护君王统治的，他才又同意把孟子搬回孔庙去，并批准出《孟子》的“洁本”（把“民为贵”、“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等“大逆不道”的话删去）。

不难看出，毛泽东和他非常相似，两人都靠异族入侵上台，上台后都导致了社会的全面倒退。当然毛的“丰功伟绩”令他望尘莫及。朱最后还打了蒙古人，而毛根本就没打过日本人。朱毕竟没有剥夺全民财产，更没有全面禁止毁灭一切传统文化，像毛那样从庙宇菩萨一直毁灭到私人珍藏的文物。但尽管程度判若天渊，两者都表现了中国传统中最可怕的那一面，亦即暴发痞子毁灭文化的强烈冲动。就是这种强烈冲动使得古代宫殿从没能传下来——每更换朝代一次，前朝宫殿都要化为瓦砾，这是项羽开创的伟大传统。倒是

满清还没有烧毁明朝宫殿，那是李自成烧的，烧得只剩下个武英殿，那就是满清朝廷入京后办公的唯一场所。

因此，明朝乃是中华文明的低谷，在此之后文明有缓慢回升，其原因有两条，一是理学招致明亡的灾难让此后读书人引为惨痛教训，改去治“朴学”了，二是清朝皇帝乃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开明皇帝群体，历200多年竟然没有一个昏君。这才能在中国面临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势文明挑战时、在西洋火器打击下居然苦撑不倒，甚至推出个“同光中兴”来，这和向落后的野蛮人称臣称侄的宋朝皇帝形成了鲜明对照。我相信，如果不是有着尚武传统的野蛮人做了咱们的皇帝，则后来帝国主义打进来咱们早就亡国了。

2006 年 3 月 15 日

伪民族主义论

写了前文后，才想起刚才回答网友安魂曲的质疑时，有若干问题没说明白，再补充几句吧。要说的可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阿随网友若再指责我没有原创性，那就请指出谁讲过这些话。

所谓“现代民族意识”

这到底有些什么涵义？想了一下，大概是这些：

● 民族本体意识：亦即强烈的民族认同心理，乃是把“我”的一己观念放大到全民族的规模，把个体间的“你我之分”放大到民族之间去。通俗地说就是：“本族人都是自己人，异族则是外人”。

古代中国根本没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本体意识。套马克思的话，过去中国各民族乃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或“自为”的。

清末民初，西方民族主义已经被初步引入。孙大炮借用西方的民族主义加上中国的民间故事，弄出什么“驱逐鞑虏”、“种族革命”的闹剧来，发明了狗屁不通的“民族主义”。安魂曲以此作为古代中国有这套把戏的证明，还加上“反清复明”的那些地下帮会。

可惜他却忘记了：第一，孙中山并非古人，他搞那套祸国宣传时，鸦片战争早发生多年了。第二，那些江湖帮会根本也就不代表儒家文化，而后者才是中国文化正宗，否则义和团也可以算是中国主流社会思潮了。即令是那些文盲，也不过是想复辟明朝那个一家

一姓的统治，并不是“反满复汉”，硬要把这说成是民族本体意识，恐怕过于牵强。

哪怕是民初，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没有西方式鲜明的民族本体认识，当时的口号是“五族共和”，亦即“满汉回蒙藏”，其实是个地域观念，其中的“回”指的是新疆，也就是清朝所谓“回部”，并不包括内地的回教徒。

抗战是中国人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时代，那其实是五四的延续。这民族本体的认同乃是“中华民族”，包括了中国居住的所有民族。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可惜还没等到全民形成“同族即自己人”的坚定共识，共党便上了台，用“阶级斗争”的土匪理论，把已有的一点进步一扫而空。一部分同族人被划分为阶级敌人，被彻底剥夺了人籍。有史以来，中国人还从未经受过这种族群撕裂。

以阶级斗争分裂人民还不够，中共还要在中国人内部精细划分族群。我党执政后，不但彻底查清每个人的成分，还在全国各地武断地精细地划分了许多“少数民族”，这种倾向越演越烈，以致全国民族数量越来越多，开头只是 10 多个，后来增加到 50 多个，现在竟然到 70 多个了。本来，共产党的正宗教义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但因为斯大林自己是少数民族，在布党内以“民族问题权威”自命，所以喜欢搞这套，害得中共那儿子党也跟着学起来。

这一套当真是荒谬绝伦。许多被我党强行划成的“少数民族”过去根本就不认为他们自己不是汉族，而且汉族也不这么看待人家。这种人为的民族分野，完全是我党人为制造出来的。例如内地的“回族”，人家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我的许多回族同学很讨厌人家叫他们“回族”，坚持认为自己是“回教”（他们自称“回回”，我们在他们后面叫“回子”，那是汉人使用的辱称），说他们和我们只有宗教信仰不同。

的确，那些人除了宗教信仰和我们不同之外，精神世界完全一模一样，语言文字同一，文化意识形态一致，根本就没有保留任何阿拉伯文明。古代回回照样学习孔孟之道，读书作官，和汉人毫无差别，郑和那三宝太监就是回回。

广西“壮族”的划分就更荒唐。其实广西从秦始皇时代起就是中国本部的一部分，和西藏、蒙古、新疆绝对是两回事，硬把人家当成少数民族，真不知从何说起。

真正的少数民族也被共党越分越细。例如彝族起码分出 10 几种来。弄这么精细，到底有何文化依据？又有什么必要？

因此，以抗战为高峰的中华民族本体意识形成过程，被共党彻底逆转了。只是从 60 年代起，共党为了维护统治，才开始唱起“民族主义”高调来，可惜那不过是仇外思潮。在缺乏民族本体意识的前提下煽动起来的无缘无故的仇恨，最后必然指向自身，下文还要详论这个问题。

● 民族的权益意识

前文已经说过了，这就是民族国家赖以形成的精神柱石。民族国家不过是民族权益的物化。没有这权益意识，何来民族国家？何来民族主义？

这就是古代中国人何以没有民族主义：儒家根本没有“权利”的观念，只强调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亦即所谓“三纲五常”：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外加什么“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儒家提倡的全部道德核心所在，到了宋儒，这奴才哲学就被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

不仅如此，它还强调道德高于利益，也就是所谓“义大利”。从孟子开始就胡说什么“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把仁义和私利看成是“熊掌”和“鱼”的关系。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历来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丑事。儒家从来反对争权夺利，从来提倡谦

恭退让，由此导致个人之间的权界极度模糊。在儒家看来，最可耻的就是为财产争讼。某家公子为了邻居修墙侵入了自家的领地，向在京作官的父亲写信告状，父亲超然地回答：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种淡泊名利的超脱，不但使得儒家学说从根本上和西方民主思想格格不入，而且也妨碍了全民形成强烈的民族权益意识。

须知西方民主思想是建立在所谓个人本体主义上的，其“墙基”就是尊重个体利益和权利，由此引出了保障公民公平地争权夺利的民主制度。而西方民族主义则是将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放大到全民族水平，将泾渭分明的私有财产界定放大到国界上去。他们精密划分国境线的原则，与我家和邻居的界限分割的原则同一，都通过精确测量，画出详细地图并载入法律文件。

由上可知，民族本体意识和民族权益意识乃是形成西方民族主义的前提。

● 民族文化认同意识

这种意识咱们倒不缺乏，也就是古人划分“夷夏”的基本依据。但光有这一条并不足以形成西方式民族主义，因为它并不构成“同族即自己人，必须为自己人争权益”的民族主义形成前提。

中式伪民族主义

我已经在旧作中多次指出了这区别，那就是，人家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针对境外异族，而咱们的则是内向的，专门针对自己同

胞，大刀从来不敢向或很少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专门用来砍“汉奸”。

在西方，大敌当前时，鬼子们内部再有天大的争吵也会暂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无论英美都这样：打仗前两党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一开仗立刻就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而在中国，大敌当前正是爱国志士们“以夷制华”、借外力助自己爬上去的宝贵时机，清亡明时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系列降将降臣如此，抗战时的中共更如此。日寇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破坏，但乃是我党的真正建设者。我党不但靠日本人替他们打天下，而且利用抗战来谴责真正抗日的国民党“不抵抗”。从西方进口来的“民族主义”被中国人运用到了这种出神入化的地步，当真是匪夷所思。

如今我党的民族主义又何尝不是出口转内销？便借他们一个胆子，胡温也不敢去和老美、日本较真，那戏是演给国内人民看的，以诱使他们认同政府。我党真有胆子去打的，只会是同文同种同胞的台湾人。

这些都是说过无数次的轱辘话，了无新意，而且不过是现象学，并非病因学。下面要说的则是新鲜话，是我刚才才悟出来的。

这区别是怎样造成的？如果诸位看懂了上面第一段文章，就不难看明白中西式民族主义发生机制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虽然用坚船利炮给咱们带来了民族主义，但中国领土上并没有养活它的丰厚养分，那就是强烈的“民族本体意识”和“民族权益意识”。

鬼子的侵略只造成了中国人的仇恨心理。它和西方民族主义的相似之处其实是皮相的。例如义和团乃是典型的仇外暴乱，它又与西方民族主义有何实质相似之处？它无非是一种盲目仇恨的群体爆发，根本就谈不上民族本体意识和权益意识的觉醒，这就是为何那仇恨主要发泄在“二毛子”头上，并造成了民族权益的惨痛损失。

缺乏民族本体意识，使得咱们在民族水平上的“你我之分”比较淡薄，绝不会向西洋鬼子那样，把“本族”当成“我”，把异族当成“你”。

记得有部鬼子电影，上面某德军军官开枪杀了几个逃跑的德国平民，当即引起大哗，某人起来抗议道：“难道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连自己人都要杀的地步了么？”

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在中国发生的。中国人没有把同族当成自己人、异族当成外人的习惯，反而有将同族开除出自己人的天然强烈倾向。而这种开除的全部依据竟然脆弱到连我都不好意思提，那多半是本族内部利害冲突甚至是观点分歧，根本就不是如鬼子那样以民族作划线标准。

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方式是“杀汉奸”而非“杀鬼子”，动辄就把同胞当成比较容易料理的“外国人”，去加以“抵抗”和消灭。

刻下从中央到网上“义民”们对台湾人的深仇大恨，就最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大众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就应该像西方人那样，对同胞要分家另过感到难受伤心，而不是无缘无故的深仇大恨。大陆官方人士威胁要用中子弹轰击台湾，台湾人扬言要轰炸三峡大坝，都什么混帐东西！对同族人竟然如此心黑手辣，端的是举世无双！

缺乏民族本体认识，使中国人的仇外心理很容易转为指向自身，使人民更倾向于将同族当成死仇加以消灭。而这就是刻下所谓“民族主义”喧嚣真正使我担忧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了，它伤不了鬼子们一根毫毛，甚至也很可能伤不了台湾人一根毫毛，但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将在后共中国引起民族间大屠杀。

中共本是自己的掘墓人，撒但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把全体中国人统统变成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乌眼鸡，因此把中

国变成了一个活火山。共产党为全民族带来的最大灾难，恐怕还不是在其执政期间发生过和将要发生的那一切，很可能是要等到它垮台后才爆发的那场大爆炸。

上述毫无必要地强分民族、制造族群分裂就是他们作的最大的孽之一，这罪孽以及他们为了一党私利推行的“爱国主义”洗脑的唯一的功能，就是将后共中国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屠杀场，而什么“南乡子”、“飞云”之类的土法西斯分子就是帮凶。

缺乏民族本体认识，也是中共在 50 年代媚苏卖国外交没有引起全民反感的基本原因。对毛共使用的“苏联老大哥”那种肉麻称呼，哪怕是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也没有引起强烈反感。这在西方国家根本就无法想象。

缺乏民族权益认识则使得中国人在对外谈判中常常弃领土资源如敝屣。在这点上，政治家们完全秉承了儒家“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君子作风”。抗战胜利后，老蒋居然“以德报怨”，不向日本索赔。与此同时，苏军却把在德国和东欧所有占领地区的机器全部拆了搬回国去。

在“中苏友好”的口号响彻云霄时，苏军从未放弃或松弛边境巡逻，甚至在东北和新疆趁机越过边界向中国境内扩张。东北地方政府向中央报告，中央还“高姿态”地表示不要纠缠这些事。根据中央精神，东北地方政府下文件告诉边民：中苏本是一家，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存在，则连边境都不需要了。现在之所以需要边境，乃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特务渗透破坏。中国现在没有力量保卫的地方，由苏军代为保卫更好，云云。

同样出于这种“让他三尺又何妨”的“高姿态”，毛泽东才会慷慨出让了外蒙、唐古乌梁海、中印边界东段、江心坡、珠穆朗玛峰南麓等将近两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才会慷慨豁免日本战争赔偿；后毛政府才会拒绝索回钓鱼岛并压制民间索赔；江泽民才会背着全

国人民与俄罗斯签订卖国密约；朱镕基才会在入世贸易谈判中向美牺牲大量利益。这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必然特点，起码苏联没有这种卖国传统。因此，在我看来，这还是咱们缺乏民族权益意识造成的。正因为中共是中国一切腐恶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才会变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主动卖国贼”，亦即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便主动向外国出让国家利益、领土和资源。

总而言之，在缺乏民族本体认识和民族权益认识的前提下培养出来的所谓“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根本就是个谬种流传，与西方民族主义没什么相干，主要内容乃是伤害民族自身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必将在后共时代为全民带来难以想像的巨大灾难。

2006 年 3 月 15 日

惊闻拉萨骚乱之杂感

一、藏汉之别

有的网友询问，西藏人何以与内地汉人不同，不会被我党的“枪杆子”震慑，被党的“笔杆子”愚弄，有的网友指出，那是因为人家有信仰。有信仰才能抵挡万能的二杆子，才不会轻易被权势者愚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信仰，成了行尸走肉，古话 “哀莫大于心死”，就是为咱们后世子孙定身度做的。

再说得具体些，汉藏的区别，在于人家有一个僧侣集团。这就等于汉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乃是社会的精英脊梁。我党在汉族地区的成功，乃是用金钱美女收买了知识分子这个精英脊梁造就的。如我在《未来中国社会走向预测》中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精英脊梁乃是社会稳定第一要素，牢笼了它就能“纲举目张”，保持社会稳定，此乃李世民早就作出的发现，如今我党不过是师古人旧智罢了。

但这一套绝对无法在藏族佛国成功，我党绝无可能在那儿复制内地“奇迹”。盖人家的精英脊梁有信仰，而信仰是无法被收买的。因此，同样是自发骚乱，在内地发生与在那儿貌似而实质不同。第一汉人没有离心倾向，第二内地民众骚乱基本没有知识分子介入，而没有精英集团的组织领导，那就永远只会是此起彼伏的自发骚乱，不会成为同步的燎原烈火。其实若论规模与暴烈度，内地

发生的无数次自发骚乱未必弱于拉萨此次骚乱，发生率就更非后者之比了，但它们的潜在危险度远不如藏民地区。

这就是我为何反复建议我党退回到当年的十七条协议上去，迅速迎回达赖喇嘛，藉此造成他与手下激进少壮派的分离，并由此笼络住西藏的僧侣集团。其实那地方完全是月球表面一般的废地，毫无经济价值，只有国防价值，咱们只要如大清时一般，让它作为中国的保护国，有国防军在那儿驻扎就够了，除此之外一律不必多事，何必去背那出力不讨好的包袱？

但此策现今的党国领导根本听不进去，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当年那群共党邪教志士，而是一群经过我党二杆子强大负筛选出来的人渣，绝对没有能力理解“信仰”是怎么回事，绝无可能知道信仰的顽强抵抗力，绝对不相信“金钱+暴力恐吓”不是万能的，绝对不相信没有人不会倒在“糖衣炮弹+真枪实弹”之下。蠢党非但看不出达赖喇嘛不是二杆子可以战胜的，还竟然蠢到以为达赖的死亡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枢钥。此所以竖子不足与谋。

二、达赖与我党的关系犹如当年康梁与我大清的关系

网友在楼下提醒我达赖对西方作的宣传如何偏离事实，我当然知道。既然是宣传，就必然有欺骗成分，只是程度有别。西藏当然不是达赖口中的那个“香格里拉”，人间乐园，但更不是我党笔下的那个剥皮抽筋挖眼的人间活地狱。人家过去当然是实行农奴制，那又怎么样？人家实行的是人道（或准确说来是“佛道”）的温情脉脉的旧式农奴制，毛共实行的是从苏联进口的野蛮血腥残暴的农奴制。西藏在“民主改革”后发生的社会大倒退，并不亚于内地在“人民公社化”之后由千年自由耕作制跌入共产农奴制而出现的社会大倒退。要明白这点，只需去看看张戎毛传中引用的班禅喇嘛给

人大常委会的上书就够了。请爱党同志务必记住，班禅可一直是我党的统战对象，千万别骂错人。

更何况人达赖多次向国际社会宣称，如果他返回西藏，不会再复辟原制度，还要实行民主化。世界屋脊能否实行民主化当然可以讨论，但拿“复辟农奴制”的魔鬼面具吓唬人，这套早就老掉了牙，建议爱国同志换换戏码。

我曾在电视上数次看过达赖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仔细聆听和观察了该同志的每一句话与每个表情，不能不由衷折服。而让芦某能如此倾倒的政治家，除了他这世上还真没有。他对西方人心态之熟悉，对采访记者的巧妙驾驭，简直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他非常精通如何去巧妙地歪曲事实，迎合西方左右派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式，彻底俘获他们，把全世界的同情都争取过来。如此毫无实力舞台，更无国家资源支撑，全靠一己聪明才智进行外交，与我党强大的三杆子（枪文钱）周旋，还能取得国际宣传战的全面胜利的伟大政治家，自有人类以来大概也没有几个。当年康梁之所以能在国外把慈禧抹黑得一塌糊涂，无非是我大清不知道世上还有争取国际舆论这回事罢了。人家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党则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因为永远不可能出现达赖那种具有大智慧的国际政治家（敢情这“活佛转世”还真有点道理？要不平民怎么会生出这种天才来？），我党在国际社会中只能是当年老佛爷在列强眼中的那个颟顸昏庸怯懦残暴形象。我党绝无可能在外交领域里战胜这伟大的国际政治家。中国除了达赖喇嘛，谁也不配做大英雄，要服气，不服气不行（改编自敬爱的林副统帅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批斗彭德怀时的亲切教导）。我党连李大牙那种上辱祖宗，下羞子孙的烂痞都有本事推出来做外长，还配做梦与达赖在外交战场上驰骋？！

三、骚乱必然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压服只能压而不服。"他还忘记了一条："收买有可能买而未收。"他还说："小道消息发达是大道消息不发达的结果。"却忘记说："骚乱多半是群众没有表达怨气的法律渠道的结果。"我党迷信三杆子威力，陶醉在收买知识分子的成功中，对空前的社会危机视而不见，当然民间骚乱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就是必然的。有无国外教唆都一样。岂不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内因是变化根据，外因是变化条件。"若社会不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谁有本事去煽起骚乱来？怎么不见隔壁的爱党人士去把美国人民也煽动起来，来他一个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诸位怎么只知道被动防御，不敢主动出击，白白浪费蹉跎了深入美国虎穴的立功良机？

即使是常态社会也照样可能出现骚乱，美国和欧洲在 60 年代社会普遍出现骚乱就是证明。人家和咱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家的社会制度保证了社会危机能够得到和平化解，所以用不着如我党一般怕进了骨子里，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魂不附体，惊呼："救命！万能的 CIA 来了！"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我可能极大地低估了爱国同志们除了"网上声能"之外的其他能量。前两年洛杉矶不是发生过非洲美国人发动的大规模骚乱么？说不定那就是英明的党中央发动爱党人士组织动员黑阶级兄弟取得的伟大战果，是不是啊？

四、中央情报局倒海翻江的大神通

本人不是华裔美国爱国贼，是尊重客观事实的独知。我当然知道美国 CIA 在 60 年代初资助训练过西藏的自由战士们，令他们越

境回国去发动反共游击战——这如今已经是世人皆知的解密档案了；我更知道 CIA 组织武装训练回回抵抗入侵阿富汗的苏军的事实；甚至也在西方报纸上看到 CIA 保镖护送吾尔开希抵达美国的消息。这些事实恐怕连爱党激情有余、理智毫无的党朋都不知道。他们拿手的就是转贴“西点军校高官承认最怕毛泽东的革命化军队”的劣等小说，再由某女士出来作伪证，言之凿凿地说她认识的西点高官证实了那无耻谎言。

但那是冷战时代。和毛泽东扮演亚洲共运掌门人，向印度支那、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尼大规模输出革命、颠覆人家的合法政权的伟大革命行动比起来，CIA 那点猫腻实在是上不得台盘的小儿科。世间只有因爱党而彻底丧失了神智的党朋，才会有脸说 1989 年北京百万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是 CIA 煽动的结果。这完全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放肆侮辱——难道他们竟然会认为“太阳最红，CIA 最亲”？

五、信仰双重论

到底该怎么看待信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青年网友们因为阅历不同，似乎有很大分歧。

老芦是在狂热的邪教宣传中长大的，当初也曾是狂热的信徒，因此深知这信仰的可怕，见怕了信仰如何扭曲人性，使得本来是温文儒雅的读书人旦夕之间变成青面獠牙的妖魔。在沉痛深思历史教训之后，便不能不回溯到孔孟之道特别是宋明理学那些魔道上去，找到了国人在民族危机降临之时集体“义令智昏”祸国殃民的文化传统原因。

针对这个弊病，我自上网以来反复抨击只讲“大义”、不计后果的民族传统，提倡功利分析，指望国人建立理性思维习惯与责任

伦理观念，在事关国家前途、苍生气运时不要再干那种哗众取宠招来重大灾难的烂事。同样是为此，我写出了长达九篇的《“犬儒“篇》，痛驳胡平“以道易天下”“反对自由主义”的儒家及毛共传统，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就是《与其“义令智昏”，不如“见利忘义”》，觉得目前国内席卷一切的拜金主义与物质主义虽然弊端无穷，却恰是消解毛共将万事万物政治化，把全民改造为政治动物的背时国症的良药。

青年网友的成长经历恰好与我相反，人家是在毫无信仰，只有物欲横流的时代长大的，自然就觉得信仰非常可贵，起码不会同意芦老邪对所谓“道德”的反复嘲笑诋毁。

愚以为，这说明了信仰的“二重性”（咱们只好借用马列术语了）。两代人看到的都是事实，但都只是部分事实。例如如今网上信仰最坚定的人就是王希哲，您说那种花岗岩脑袋一旦当了国，或至少变成国民主体，那还了得？但问题是若一个民族只知纸醉金迷醉生梦死，那还能有什么前途？

具体展开来说这“前途”。我整理的全集中有一集题为《反革命书》，其中反复破除的一个迷信就是“只有革命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指出，事实与此完全相反，社会进步只能由统治阶级让步实现，自下而上的革命只会适得其反，招致社会大幅度倒退。这其实说得不全面，全面来说应该是以下两条：

1）社会进步只能由统治者作出让步，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来实现。

2）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统治者作出让步，就必须由知识分子组织率领民众理智地、有意识地、有克制、有限制地自下而上地向统治者施加压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进步得以发生的两个必要条件。它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在缺乏民众压力下，统治者照样可以作出主动或被

动让步，这我已经在《重释“民主恩赐”论》中讲过了。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国家经济繁荣了，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那个烂摊子，统治者觉得可以苟安一时，因而再也没有作出主动或被动让步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坚持改革，取得社会进步，自然就需要知识分子率领民众主动向统治者施压了。

但要做到这点的前提，乃是知识分子必须有健康的信仰（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更必须有高度的责任伦理观念，这才能避免重蹈 89 年学运领袖们的覆辙，和我党又勾结，又斗争，将要求的上限始终保持在统治者让步的限度内。但这根本就是脱离国情的空想，因此是绝无可能实现的。中国社会除了经济成长外，就再无可能取得重大的社会进步，此所谓“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绝不会有前途”。

在我看来，这就是汉人最大的问题，咱们要么是“聪明过份”，要么是愚蠢疯狂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因此永远只会处在“有信仰时极度危险，无信仰时默默腐烂”两种极端状态之中。

2008 年 3 月 16 日

建议中央取消民族地区的“暗娼”制度

刚才在《多维新闻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西藏和新疆动乱是不当民族政策的直接后果》。作者是曾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据他说：

> “在中国， 各民族是不平等的。对少数民族特别优待。在工资，分房，上大学，找工作，生孩子等各种与日常生活有关方方面面都全面照顾。禁止汉人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客观上造成了在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在少数民族民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如西藏，南疆等地区，少数民族高人一等，飞扬拔扈。少数民族打汉人，杀了汉人，汉族干部和当地司法部门不敢管，不敢判。只有少数民族一把手点了头才能判刑。甚至发生了叛乱，少数民族一把手不同意，也不能定性为叛乱。这客观上鼓励少数民族民族中的不法分子为非作歹， 甚至发展成动乱。这种少数民族‘政策’是内地的汉人无法想象的。”

这其实是指责我党在民族地区实行了针对汉族的种族歧视，这政策“导至大量汉人找出种种理由改为少数民族。无端的造成国家，民族的离心化”。而且，“过去的政策，强行安排不愿去的城市青年去边疆。严禁愿意去新疆，西藏的穷苦地少的农民到那里，不但不报户口甚至当作盲流遣送回原籍”。作者认为，“只要自由上户口，老百姓自然流动就能逐渐解决边疆问题”，也就是靠汉族自发移民把边疆地区化为汉族地区。可惜政府却不敢采用此策，原因是“中国什么作法都不怕世界各国评论，就怕外人说我们向少数

民族地区移民。不知怕什么？衷心希望中国能改弦更张，使边疆地区长治久安”。

此类抱怨我早就听熟了。在新疆时我就发现，当地的民族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汉族对维族充满鄙视和嫉恨，一开口就是维族怎么怎么傻，怎么怎么脏，让我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历历想象出日后大乱爆发时他们被让当地少数民族血洗的惨景来。这些同志表现了典型的鼠目寸光的优秀汉族传统，当真是燕巢幕上，兔眠虎旁，望乡台上打莲花落。我也试图向他们指明这潜在的危险，建议他们改变对少数民族的态度，那结果当然是天怒人怨，成了汉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

这也不去说它了，还是来说说我党面临的困境吧。也就是“土”和“流”的关系。

我党今天遇到的问题，历史上早就多次出现过了。我已经在《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指出，古代对边疆的治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土”，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实行民族自治，朝廷并不派官，也不干涉人家的内政，由当地土司头人管理；另一种则是“流”，也就是把原来自治的民族地区化为郡县，由朝廷命官像内地那样治理。

清朝乃是中国历史上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最成功的王朝。他们治理民族地区主要采用“土”的方式，西藏，蒙古都如此，蒙古由当地的王公统治，西藏则由达赖和班禅治理。中央政府只要求他们名义上的臣服，并不过问其内政。

这一套非常成功，可惜只能在封闭状态下工作。等到帝国主义打上门来后，原来运转如意的“土”制却卡了壳，逼得朝廷不能不使出辣手来，“改土归流”，也就是废除原来的民族自治制度，设置郡县，改由朝廷命官，如内地一般治理。

清廷为何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心理上的原因。西方列强到来前，北京的大皇帝乃是天下圣主，“四夷”当然不能不“宾服”。当时“夷人”们若得到皇帝的赏赐，哪怕是个空洞的封号也罢，都意味着极大的荣耀与实际的权威。等到鬼子来了，“夷人”们才发现强中更有强中手，原来天并不止一个井大。特别是在大皇帝的军队被鬼子们痛殴之后，原来的景仰崇拜之心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离心倾向自然出现。

第二个则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土”的治理制度的最大缺陷，是主权不分明，在鬼子看来类似殖民地或保护国。殖民地与领土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归属性可以改变。以当时的国际法理而言，西藏、蒙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与缅甸、越南、朝鲜等国毫无实质差别，其中北京与西藏的关系大概比与朝鲜越南的还要更松弛得多。起码驻藏大臣的实权与威风从未如在朝鲜担任实际监国的袁世凯那么结棍。

袁世凯最初投靠的上司吴长庆不过是个区区广东水师提督（约等于后世省军区司令）。他到朝鲜后，竟然能派兵把朝鲜摄政王大院君（当时朝鲜国王的生父）抓起来，送回国内治罪，而朝廷竟然能下达这种上谕：

> “此次朝鲜叛乱，皆出自李昰应（芦注：即摄政王大院君本名）主谋。论其积威震主，谋危宗社之罪，本应执法严惩，唯念朝鲜国王于李昰应谊属尊亲，若竟置之重典，转令国王无以自处。是用特沛恩施，姑从宽减。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

在我印象中，驻藏大臣似乎还从未如此风光过，也没听说有哪位达赖喇嘛给抓到北京去问罪的。

因此说起来，咱们既然可以口口声声 “西藏、新疆、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当然也就可以同样高喊：“越南、朝鲜、缅甸、琉球、暹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两者的

区别，仅在于后者丢给了帝国主义，从“中国的殖民地”变成了“外国的殖民地”，而前者还来不及而已。

正因为主权不是那么明朗，所以帝国主义当然要来打主意，把越南、朝鲜、缅甸、琉球、暹罗等盘算去之后，当然脑筋就会动到具有类似性质的民族地区去，拉拢威胁利诱当地的“土官”（诸如蒙古王公活佛，西藏活佛），让他们改变效忠对象。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饭要一口口吃”的教导，俄国把蒙古人为划分为“外蒙”和“内蒙”，英国把西藏人为划分为“前藏”与“后藏”。那意图都差不多，都是“革命发展阶段论”，先把“外”吞了，再慢慢打“内”的主意。俄国吞并外蒙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清廷同意外蒙为中俄两国共同的保护国。这一手小日本早干过了。他们吞并朝鲜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清廷同意中日为朝鲜共同的保护国。

清廷发现了这问题后，采取的对策就是使主权明朗化，亦即“改土归流”。此策其实是袁世凯在朝鲜危机爆发时提出来的三策中的上策，那就是废了国王，将朝鲜改为直接由朝廷派官治理的省份。只是朝廷根本没有听取，却采取了下策，亦即苟且因循，听任事态自然发展，最终战争爆发，大败之余割让了朝鲜。

此后袁世凯主持朝政大计，便着手“改土归流”，而且相当成功。方面大员赵尔丰先在四川藏边大肆改土归流，后来又攻进西藏“平叛”，一直打到离拉萨不远的江达宗，吓得 13 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13 世达赖喇嘛就是现今 14 世达赖喇嘛的前身，怪不得 1959 年达赖逃起印度来滑溜之极——他前身早就把路探明了）。

类似地，清政府驻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在外蒙古大力推行新政，改革外蒙古的行政管理机构，废除不准汉人到蒙古垦荒的禁令，设立兵备处，统领外蒙驻军。他虽然没有公开“改土归流”，废除王公，设官分治，但也注意到抓兵权，并试图以汉人移民稀释蒙族，巩固边防。

可惜辛亥丑剧打断了这一系列的明智措施。辛亥革命前脚爆发，外蒙后脚就宣布独立。西藏也趁机脱离了中国（幸亏没有在国际上宣布独立）。赵尔丰在川边威名赫赫，却在乱中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党手下。此后内战无日无之，中央对边缘地区的控制名存实亡。尽管如此，民国政府仍然尽可能地秉承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将边疆地区一律设为省份。例如内蒙设为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多个省份，与内地省份完全一致，彻底消除了过去主权不明的弊病。

“解放”后我党却倒行逆施，从苏联那儿学来狗屁不通的“民族划分法”。这民族越划越多。我的旧印象是中国一共有官定的 56 个民族，殊不料上次见到一个国内治少数民族问题的学者，据他介绍现在国内划分的少数民族已经高达 100 多个了。从民国时代的满汉蒙回藏五族，发展到了如今这三位数，看来中国的“民族”颇像过去的化学元素，发现得越多便越有成就。谁发现了某个新“民族”，大概那荣耀也就相当于发现了一个新的化学元素。

这些人为划分无聊无知无学到了极点，广西“壮族”就是最大的笑话。广西在秦朝便是中国的领土，真正的“自古以来”，也就是自远古以来，不是新疆西藏蒙古那样只是自清朝以来。就这种老牌正宗汉人（比中原地区的汉人血统纯粹多了）也给划成了什么“少数民族”。以致唐德刚问李宗仁他知不知道广西是壮族自治区时，李宗仁诧问：什么是壮族？没听说过啊？

正如唐德刚正确抨击的，民族地区也效法苏联搞成什么“自治区”，简直是莫名其妙。可惜老唐没有说明这么搞的弊病，还必须由老芦来透彻阐述。

从上面介绍可知，传统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只有两手：要么强制同化，也就是“流”；要么放手让人家自治，那就是“土”。很明显，“土”的政策更人道，弊病更少，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关系

更融洽，更能相安无事，朝廷也更少操心些，对此诸葛亮早就在征服南蛮后系统论证过了。清朝的民族政策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明白这一点。

这政策之所以失效，有着特殊的时代原因，那就是中国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围攻。如果篱笆扎不紧，野狗就会钻进来。因此，作为补救之道，改土归流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但如今时过境迁，世界早不是帝国主义时代了。只有心理有严重疾患的人，才会相信我党的鬼话，以为中国还在列强环伺之中，慢慢眼就要让人家瓜分肢解了。现在的问题恰好相反，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崩溃，出现了全世界规模的民族意识觉醒，以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了时代潮流。

在此大气候下，民族问题就成了最敏感，最棘手的难题，就连民主国家都未必有本事处理，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就是最生动的证明。北爱尔兰六郡的大多数住民是所谓“忠诚派”，愿意留在联合王国内。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少数住民就是要和大多数民意对着干，搞了几十年的恐怖活动。英国政府铁腕镇压多年无效，只好与之和谈，到现在也未能处理这个问题。英国人乃是世上最善于妥协应变、最具有政治智慧的民族，也是迄今为止镇压恐怖分子效率最高的民主国家。连人家都一筹莫展，何况中国那种弱智之邦？

更何况中共愚不可及地为自己制造出了无数麻烦。借用老毛的话来说，那许多“民族自治区”就是套在我党脖子上的绞索。既然标榜是“自治区”，按理说就该实行传统的“土”，让人家自治，可它们在实质上和内地省份一样，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毫无自治可言。但它又不是传统的“流”，区别就在于在“自治区”对少数民族加以特殊优待，而且禁止内地人口向那些地区流动。

这结果，就是既妨碍了人口自然流动造成的民族融合，又不给少数民族真正的自治权。乃是典型的不良不娼，不“土”不

“流”，两面得罪。汉人为不能享受与少数民族的相同权利愤愤不平，少数民族因为汉人成了事实上的头人（亦即党委书记）而愤愤不平，由此人为制造出民族分裂与民族对立来。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蠢笨的制度设计了。政府夹在这种背时制度中，一旦少数民族和汉人发生冲突，必然是两面不讨好，如林则徐处理云南回汉冲突时向朝廷上奏说的那样，汉视官府护回，回视官府护汉，绝无可能作不偏不倚的青天大老爷。

我早在几年前就跟某民运人士说过，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民族独立运动曾被武力消灭了。在帝国主义全面走向崩溃，民族自治走向全面胜利的今天，要防止中国出现前南斯拉夫那样的惨剧，就必须想到中国在将来解体后发生的事（那是必然的），尽可能减轻甚至避免帝国解体后发生的民族间大屠杀。

解决的方法我早就在多篇文章中说过了，那就是及早结束这“不土不流”的暗娼制度。实行“土流结合”，一面实行人口双向自由流动，让少数民族自由流向内地，内地汉人自由流向边疆地区，内地的招工、招商、招生、招干等等，必须优先招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他们在内地特别是大城市提供优厚的就业创业经商等机会，而边疆地区也应同样为内地人民提供就业创业经商等机会，在尊重个人自由意愿的基础上，实行人口双向流动，促进民族融合。另一方面也应该在有条件的地方（暂时不包括新疆，但应该包括西藏）谨慎地、逐步地实行民族自治。在实行真正自治之前，所有的虚假的“自治区”的名号应予统统取消。

总而言之，要避免中国在未来解体，唯一的希望是向美国学习，创造各族人民为经济吸引而自由流动的客观条件，藉此将国家变成各民族的大熔炉。我党必须认识到，越是鼓吹滥杀少数民族的“爱国者”，就越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汉奸国贼，对那些人必须严惩不贷。

最后预测一下西藏的乱局。愚以为，虽然胡锦涛以在 86 年镇压藏民骚乱起家，但这次他不至于匆忙下手，原因很简单：奥运会乃是我党“侍妾扶正”的认证书。全世界众目睽睽，甚至已经有众多体育明星提出要杯葛北京奥运会，所以中央不能不投鼠忌器。但现在骚乱已经波及与西藏相邻的省份，拖下去恐有失控危险，他也不敢承担这风险。所以看来中央最可能作出的决策，还是先“硬着头皮顶住”，实行“内紧外松”，等到奥运会开完再算总账。

2008 年 3 月 18 日

我是怎样放弃帝国主义立场的

某网友说，他虽然痛恨中共，但在西藏问题上和我党持相同立场。我刚出国那阵也是这么想的，还和我导师为此激辩过，现在想起来很好笑。记得我跟他说：西藏是中国领土，这点没有疑问。

他说：Ask the Tibetans about this. （去问问西藏人是怎么看这问题的吧）

我说：你是说达赖喇嘛吧？他或是任何其他西藏人也不能改变历史，是不是？你不知道中国历史，西藏从清朝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迄今已经有快三百年了。我不是共产党，也不赞成他们关于西藏从唐朝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谎言，但我说的确实是历史事实，谁也无法改变，这种客观事实总不能用公民投票来决定正误吧？

他说：我确实不知道中国历史，无法断定你说的是否事实，但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也不能作为不让西藏独立的理由。美国过去还不是英国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缅甸等等，不都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么？莫非因为历史事实如此，这些国家就无权独立？

我语塞。想了半天后我说：西藏很落后，以前是农奴社会，共产党去了后给了他们很多帮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没有理由独立。实际上，全中国人民都为西藏人慷慨解囊，给了他们很多钱。他们独立了日子只会更难过。

他说：人家愿意那样，你有什么权利替人家操心？我不理解世上为什么有这种怪事：人家并不求你们给钱，只求你们离开，你们

却要赖在那里拼命给钱，否则就要开枪杀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

我导师极有幽默感，他的原话我记不住了，但非常幽默而且富于讽刺意味，比我现在的枯燥转述生动多了，再加上他的讽刺表情和手势、风度等等，简直就像个喜剧演员（某著名笑星当年曾是他的同学），逗得我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笑完后我哑然——说实在的我也真想不出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过了一阵他又说，我发现你们的态度很像 19 世纪的英国人，他们的理论是，他们之所以要去到处侵略，建立殖民地，是因为当地人民太落后，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他们去做教师，在殖民地建立文明社会，训练当地人民怎么管理自己，等到当地人民学会了，他们也就可以让那些地方独立了。这其实不过是借口，但你们连英国人都不如，因为英国人好歹还答应将来让那些地方独立，你们连这点都不同意。

我说，你这儿犯了概念混乱错误，中国和英国不可比，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不是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他又重复了那句话：Ask the Tibetans about this.　西藏是不是中国的殖民地，必须由西藏人说了算，对吧？

此后我一直在琢磨此事，主要是在琢磨他指出的那个怪事：为什么咱们要不顾人家的反对拼命给人家塞钱？好几天后才想出答案来。于是下次跟他下酒吧时就说：关于那个问题，我想出答案来了，咱们之所以要那么干，乃是因为过去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因此感情上不能再承受丧失领土的打击了。因此，即使为了保有西藏，需要投入大批金钱，我们也只能这么干。

他很诧异地扬起眉毛说：你的意思是，你们把自己受过的羞辱转嫁到西藏人头上去，而且认为这么做是应该的，人家必须为你们的感情损失作出牺牲？你怎么就想不到，你们现在对西藏人做的

事，和过去帝国主义对你们做的一模一样？我很理解你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感受，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西藏人的感受呢？因为自己被人羞辱过，所以就要去羞辱无关的人，这是怎么回事？我更加不明白了。

我就此大彻大悟，此后再不挺身出来捍卫大中华帝国了。

2008 年 3 月 23 日

就西藏问题答网友

某网友认为我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持双重标准，苛责汉族而一味支持少数民族，反对汉族起来革命，却支持藏族骚乱，谴责中共，却肯定满清，其实满清比中共还坏，云云。

多谢这位网友的批评，大概是我表达能力有限，没能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以致造成了你的误解吧。

我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是从实际效果考虑的，一般人只看道义问题，觉得弱者起来抗暴是天经地义的，美国宪法就规定了这条，但他们没看到实际效果。我对此已经说得很多了，反复指出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当然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不能剥夺，但不能凡是权利都可以鼓动他人去行使，例如自杀也是天赋人权，你可以自己行使这权利，但不能煽动别人去行使这权利，是不是？

因此，我最不能容忍的是煽动他人起来暴乱的革命家，而不是受骗群起自杀的革命群众。我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一致，从无你指控的双重标准。只要是人民起来反抗政府，无论是否使用暴力，我在感情上从来站在人民一边，但严厉谴责煽动者。我对六四的态度最典型，痛骂学领，更痛骂屠民政府以及为屠杀辩护的人，但从不责备那些赤手空拳倒在长街上的人。

这说的是有人煽动的“动乱”。如果是自发骚乱受到血腥镇压，则我只会谴责政府，汕尾事件就是如此。

这次西藏骚乱，我看不出受人煽动的迹象，真相也不明朗，无法在道义上判断谁正确，因此只能呼吁双方克制，避免使人民遭受

更大牺牲，使得藏汉之间结下更加难解的血海深仇。我实在看不出这道德立场错在哪里，又在何处使用了双重标准，还得请你指教。

其实不是我而是那些鼓吹对藏民实行铁腕镇压的沙文主义者们采用了双重标准。他们只知道谴责英美入侵伊拉克，但轮到这种时候，他们就一定会忘记民众抗暴的正义性，忘记自发暴力行为与恐怖活动的区别，将暴民自发暴力行为当成本拉登式恐怖活动，鼓吹铁腕镇压。我不过是提醒他们这些区别罢了，莫非连你也不明白这些起码常识？就算不明白，政府不但武装到牙齿，而且迷信“屠民治国论”，决不会缺乏血腥镇压的勇气，似乎并不需要大家挺身出来，在网上为他们鼓劲打气，你说是不是？

总而言之，我是反对政府血腥镇压，敦促他们克制，理智地化解矛盾，并不是主张藏民起来抗暴。

其实我在旧作中就曾批评过达赖喇嘛，说 1959 年西藏人民起来抗暴时，他虽然身不由己，但应该看出那么干对人民没有好处，应该动用他的精神权威，呼吁藏民停止反抗，以免遭受重大牺牲。如果他那么干了，在道德上就无可指责了。但这只是个道德修养欠缺问题，因为叛乱是西藏周边（所谓卫藏）的“民主改革”激发的自发行为最终波及到全西藏，并不是他煽动起来的。我党囿于自己的夺权经验，凡是大规模动乱都要认定后面有人在操纵，这阴暗心理分析非常可笑——中国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大规模的自发暴乱？

至于你认为中共比满清好，当然是你的自由，我无意干涉，只是想指出这么几个事实：

第一，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像毛时代那样，当国者甫执政就有计划、按指标、冷静地屠杀人民，为的不过是先发制人，以此巩固政权。满清入关当然搞过屠杀，但那一般是人民抵抗引出来的。像毛共那样出于“必须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的屠夫逻辑而无端“镇反”、“肃反”，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第二，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像毛时代那样，有如此众多的人口丧生，而且是发生在和平年代。如我在旧作中说的，日本人辛苦八年还赶不上咱们大跃进两年。

第三，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如毛时代那样，公民彻底丧失财产和全部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人身自由，更没有哪个时代农民不但丧失自己的土地，而且成了毫无迁移自由和行动自由的农奴。

第四，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如同毛时代那样，人民被统治者周期性地频繁地煽动起来揪斗、毒打、迫害另一部份人民，彻底丧失了传统道德提倡的仁爱、忠恕等等起码人格，堕落为青面獠牙的野兽。

第五，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如同毛时代那样，由皇帝发动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全民文化毁灭运动，将古今中外全人类的文明遗产当作“封资修黑货”加以全面毁灭，不但平毁文化遗迹，将孔子的尸骨刨出来游街，而且废除教育，将整整几代青年变成半文盲，再驱赶到农村去受罪。

第六，历史上从无哪个时代如同毛时代那样，在国力空前强大之时，毫无必要地向几乎所有周边国家拱手相让万里河山，而人民从头到尾给蒙在鼓里，毫不知情。

以上事实不过是挂一漏万，不过光是这些，似乎也就够了，万恶的满清人似乎还没这两下子吧？这种政权出现，不是因为汉人不如满人，而是因为咱们善于搞革命，中共政权乃是既往“不断革命”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我为何反对暴力革命，以免历史重演，就这么简单。

希望至此已经说明了我的立场。再次谢谢批评。

2008 年 3 月 25 日

藏事断想

一、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对帝国主义的羡慕与嫉恨

许多国人不知道，痛恨帝国主义的并不光是过去被欺压的第三世界的人。西方特别是欧洲的左派自由知识分子照样痛恨，而且，人家的痛恨和咱们的有个本质不同。人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咱们是出于私仇。人家是“非不能也，实憎恨也”，咱们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这正如同林肯与黑人中的种族主义者的区别。表面上两者都反对种族歧视，但林肯是出于人道关怀，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只反对白人对他们的歧视，自己可以欺压其他种族特别是华人。我的一位亲戚在加拿大当访问学者时，为了省钱住在一个比较便宜的社区中，受尽了黑邻居的欺压。

如某网友观察到的，咱们的民族梦想，就是“千年媳妇熬成婆”，恨不得明天就“撅起”，好把当年在帝国主义那儿受的窝囊气连本带利从比我们弱小的国家那儿收回来。至于复仇对象不是虐待自己的婆婆，而是无辜的儿媳，那根本就不是咱们应该考虑的内容。咱们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其实是“羡慕＋嫉恨”，之所以恨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欺压弱小，违反了我们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他们有咱们没有的欺负人的本事。

因此，法西斯主义思潮目下在中国极度猖獗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为何要在 6、7 年前写的小说《当中国成为世界的龙头老大》后记中说：“贫穷的中国使人心痛，强大的中国使人心悸。”

但我也反复指出，土法西斯主义与原版有个本质区别：它只会指向自身，如同米罗塞维奇一般，专在自家庭院中大砍大杀。如今万事俱备，只欠我党垮台，好把这妖魔放出来。正因为看到了这点，我才反复抨击大汉族主义，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呼吁民族和解。不过这长达 8 年的努力除了换来无数侮辱外，什么鸟用都没有。

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乃是欺压弱小的帝国主义国家

那些疯狂的爱国者们到死也看不出：至少就国际宣传战而言，我党是在打一场早已失败、并且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在国际舆论看来，咱们乃是侵略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西藏人民起来反抗，即使是动用暴力，也完全是正当的。因此，无论你怎么在媒体上展示藏人打砸抢的镜头都毫无意义，绝无可能动摇西方对藏人的同情。

更何况我党严禁西方记者作中立采访，只展示藏民打砸抢的镜头，这就更加在鬼子眼中证实了自己的心虚。人家不是白痴，熟知我党的猫腻。文明世界的规矩是绝不轻信一面之词。我党封锁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只出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哄骗不了国际社会，只会招致谴责。最近这几天，西方电视台在播放中国电视台提供的骚乱景象时都要指出，中共只提供“暴乱分子”打砸抢的镜头，不提供军警镇压的录像，说明他们试图掩盖真相，云云。

虽然因为缺乏信息，无从断定骚乱到底是中共野蛮镇压和平示威引起的，还是藏民主动闹事。但要说中共军警没有镇压，只怕连白痴都不会相信——难道我党不怕乱到无从收拾的地步？因此，问题只在于镇压场景是否被拍摄下来而已。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民间偷拍这种录像的可能性很大，需要的只是把它们走私到国外来而已。

而这事若真在未来发生了，对我党的国际形象当是沉重打击。我记得 1989 年中共镇压西藏骚乱的录像就被走私到了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电视台播放了一群武警冲进喇嘛庙，不由分说地对一群跪在地上诵经的喇嘛无端拳打脚踢，当即引起西方各派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若记录我党此次镇压实况的录像在奥运会前给走私到西方来，那我看我党的“侍妾扶正认证大典”还是取消算了。

总而言之，我党的困境是，国际社会早就先入为主，认定中国是侵略者，在占领区灭绝文化。我党的宣传伎俩又实在低劣，从反面加固了人家这一坚若磐石的成见。党中央的致命失误是内外不分，把生活在信息开放的自由世界、独立思考已成本能的国际新闻界人士，当成了头脑可以任我党雕塑的国内愚民。

难是难在我党根本就无从消除人家的成见。要这么做，你就得开放边界，任西方记者去自由调查，这才能证明你“没有开枪”的表白。可惜我党绝无这么做的胆色。于是哪怕真是没有开枪，只是动用了人道镇暴手段（诸如催泪弹、警棍等），说下大天来人家也不会相信。我党自己弄个圈套把自己套进去，神仙都解不脱。

三、为马悲鸣疗愚

马悲鸣氏自以为是燃灯古佛转世，乃是达赖上级（达赖似乎只是文殊菩萨转世，菩萨似乎比佛低一级），有资格出来教训西藏人民，写了个烂帖子，标题竟然是什么“我不赞赏西藏暴民打砸抢”之类，还满世界贴。那烂帖子我也没打开看，光是看见那僭越的“赞赏”两字就气不打一处来：尊驾到底是什么东西，配用那居高临下、纡尊降贵的话语？！你“赞赏”不“赞赏”，有谁在乎？

我想告诉马氏代表的诸多爱国愚氓一点常识：

第一，“勿以恶抗恶”乃是宗教信仰，并不能用于苛责大众。大众使用暴力是否该谴责，先得看那因果关系。美国宪法就规定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君的权利。我反对以暴抗暴，主要是从其恶果着眼，并不是认为凡是人民使用了暴力就该作道义谴责。

第二，不是所有的暴力行动都是恐怖主义，只要是大规模的群众骚乱，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自发暴力行为，这和恐怖活动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洛杉矶的种族暴乱也可以谴责为恐怖主义了。为何不见美国政府事后去抓捕恐怖分子们？如下面要说到的，西藏这次发生的暴力事件很可能是自发的，不是什么恐怖活动。将自发暴力行为当成本拉登式恐怖活动谴责，完全是偷换概念。

第三，我对西藏出现的不幸暴力事件表示遗憾，更担心的是它会招来中共的血腥镇压，不仅要让藏民作出不必要的牺牲，而且势必使得藏汉之间的仇怨越结越深，不利于民族和解，因此呼吁双方克制，更希望中共吸取教训，迷途知返，放弃以暴力镇压加金钱收买来维持统治的梦想，迅速找到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

最重要的是，从目前已有的信息来看，这次骚乱不是达赖在境外遥控的结果。骚乱蔓延到西藏周边省份这个事实本身就提示这一点。

这道理非常简单：假定如此规模的骚乱是由达赖集团在境外发动操控的，则西藏及其周边省份诸如四川、甘肃等等的广阔地域中，必然遍布了达赖的特工网。考虑到青藏高原的交通不便，该特工网必须使用电讯手段协调组织各地的行动，并以大功率电台随时向境外的达赖请示汇报，接受命令，再迅速向各地传达。对分布如此之广阔，电讯联系非常频繁的庞大的特工网，我党竟在事前毫无所察，当真是天下第一饭桶了。任何在我党的极权统治下讨过生活的人都知道，此乃对我党控制人民的强大能力的不可容忍的侮辱。这种对我党执政能力公开的怀疑与贬低，我们一百个不“赞赏”！

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附注：这儿的“我们”并不敢代表中国人民，只包括芦某和他尚未诞生的孙子）

四、我党为何不把达赖迎回来

有的网友说，谁都看得出来，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指望是把达赖喇嘛迎回来。问我中共为何就是不肯这么办，这其中到底有何阴谋“脆计”？

他说 “谁都能看出来”，我不敢苟同。这建议我早就在 2002 年提出了，当时不但没有一个网人赞同（或“赞赏”），还有网友批驳，说我远居海外，不懂藏事还要出馊招。彼此争论了一番也就无结果而终。连海外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未必能达成此共识，要我党那只懂实力一门语言、看不到信仰的力量的市侩党看到这问题，是不是要求过高了些啊？

我党不肯迎回达赖，相反在迫不及待地等他死，我想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条：

1）上面已经说过，我党非常势利，只看得见有形的金钱、权势与实力。身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在港澳台专门拉拢讨好大资本家。达赖无权无势，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丧家之犬而已。

2）80 年代初达赖代表团回过一次西藏，受到藏民狂热欢迎。他们纷纷拉着亲人的手痛哭流涕，痛说他们在我党暴政下受苦受难的辛酸遭遇。这反应为我党始料未及（我记得是胡耀邦批的），引起了他们的绝大恐慌，因而改了与达赖和解的主意。生怕达赖回去后，再来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让西藏彻底脱出我党控制，遗世而独立。

3）我党在西藏已经培植出了一个庞大的藏族官僚集团，这些人在本质上和内地汉人的官僚集团没有什么差别。达赖回去必然要威

胁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势必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如今的中央连邓中央的权威都没有，不能不看诸侯的脸色行事，是以不敢干得罪藏官僚的事，以免两面不讨好。

4）我党指望在西藏复制内地的奇迹，亦即以享受主义瓦解西藏的佛教传统，使得新一代统统变成醉生梦死的“犬儒”，以此糖衣炮弹消解达赖作为精神领袖的信仰基础。

在我看来，这些可能就是我党不想让达赖回去的原因。其中第四条该是我党伟大的战略部署。它是否有效，还得等着看。

2008 年 3 月 24 日

达赖将是第二个赵紫阳

网友说我在谈汉族问题时把功利放在道义之上，在谈少数民族问题时却反过来。我没有把功利放在道义之上。我说的是，完美的善乃是功利和道义的统一，实际上就是韦伯说的政治家的“责任伦理”，这才是最高的道义。

任何一个看过我的治藏策旧作的人都该知道，我恰是从汉藏双赢的角度来提出那些建议的。如果只考虑道义，我应该无条件支持西藏独立，因为那儿不过是中国的殖民地，而且在中共进入西藏前乃是联系非常疏松的殖民地，其实是实行完全彻底自治的保护国，但我尊重现实才提出了那些建议，说起来我已经违背了自己的良知和对“住民自决”原则的信仰，把功利考虑放在了道德之上，以致少数民族网友（如铁木和别的蒙族网友）一眼就看出了这点，批评我完全是站在汉族的立场，处处替汉人着想。这批评我也暗中同意，觉得他们比汉族聪明多了，一眼就看出我的软穴何在。的确，要彻底摆脱狭隘民族主义还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的基本考虑还是站在尊重现实的功利分析上，主要是怕中共垮台后出现大屠杀，这所谓“功利分析”说到底还是人道关怀。如果不是怕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只会赞成方励之在 80 年代提出的“中国必须解散”的主张，全国实行住民自决，要独立的一律请便。

我的前两个帖是告诉大家，国际社会只会从道义上看西藏问题，人家也有道理：要人家赞同中国对西藏的搞法，如同要人家同意六四镇压合理一般。鬼子不是汉人，没义务像我这样兼顾功利，

考虑到尊重汉人的现实利益，中国愤青在网上大叫大喊，只暴露了中国法西斯化的程度，让大众齐齐恶心。

汉族的一大毛病便是自我中心，说难听点便是自恋自怜化作的自傲自狂，只看到、只关心、只考虑被我党塑造出来的“中国人感情”，不考虑人家藏族的感情。你们知道侮辱达赖喇嘛对人家藏人意味着什么吗？过去班禅喇嘛回西藏，大便必须秘密处理，否则就会被虔诚的信徒们抢回去当灵药，连班禅都这样，何况达赖？如今我党却不但在宣传机器上几十年如一日地侮辱达赖，而且逼迫普通藏人跟着辱骂，人家烧了中国国旗乃是最起码的回报了。一个殖民地国家人民起来烧帝国的国旗，到底犯了什么罪？就连美国国民都能任意焚烧自家国旗，为何中国的国旗就那么神圣？

说真的，汉族的反应让我感到深深的绝望，它反映了普通中国人倚冰山如泰山，“得下手时且下手”，以为可以靠武力镇压“开万世太平”的超愚心态，全然想不到日后中国必然崩解，要为此预留地步。看来举国昏昏如此，咱们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刚才在网上看了一阵，看到鬼子和王力雄都指出，达赖正受两面夹攻，一边是无法约束的手下激进的“藏青”（＝愤青），一边是立志要让他的中间路线破产的中共党内既得利益派特别是西藏官僚集团（那个省委书记张什么使用的语言竟然与文革时期一模一样，杀气腾腾，剑拔弩张），达赖的中间路线（不独立，非暴力，与中共对话，争取高度自治等等）正面临“边缘化”，以致他威胁西藏动乱若还不停止，他就要辞职，等等，不禁悲从中来，想起了89 年的北京。达赖和赵紫阳的命运一模一样，都注定要因两面狙击而翻船。

中国的国情（其实是汉人的心态）决定了凡是搞中间路线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凡是主张双赢，主张和平理性解决争端的人都要被冲突双方齐心合力地“抛进历史垃圾堆”。赵紫阳当年不明此理，

最后是死在绝不退让的“民主造反派”和党内死硬派的联合炮火下，达赖喇嘛也不明此理，必然也要死在绝不退让的藏青帮与鼠目寸光、自以为得计的中共死硬派夹击之中。“趁自己占上风时斩尽杀绝，绝不让步”乃是中国的万古国教。勤劳勇敢的汉族敢于并善于自求多祸，又岂是区区一个草民芦某可以回天的？我反正尽到自己的努力了，由它去吧。套柴玲的话来说就是：愚昧虚骄绝伦、自求多祸的大汉族，你不值得我操心！

2008 年 3 月 26 日

胡锦涛的政治智慧面临严峻考验

——兼谈所谓“国家利益”

3 月 30 日，《联合晚报》发布消息，谓 3 月 29 日西藏僧侣藉政府组织西方外交人员访问西藏之机，再度在拉萨市小昭寺和大昭寺前举行抗议示威，数千名藏人立即参加，云云。

这消息令我十分忧虑。最近骚乱似乎已经平息，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我说的那个问题，同意国际新闻界前往拉萨访问，免得被国际社会指责把持舆论，制造谎言，掩盖事情真相。但如此一来，势必又演成了 89 年的态势——当年学领们就是抓住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记者团云集北京的良机举行大规模示威，占据天安门广场，弄得政府连接待国宾都只能改到首都机场去，大大地扫了最爱面子的中共的面子，促使他们动了杀机。

如今藏人又来这手，令北京进退维谷：不请记者去作独立调查，便再说下大天来国际上也不会有人相信；若请记者团前去，则我党就不可能一手遮天，垄断新闻发布了，若藏民趁机起来和平抗议示威，请问我党该怎么办？不镇压，难道听任西方媒体在国际上展示西藏人心向背？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公民和平抗议”这条，他们理解的“和谐” 就是全民俯首称臣，山呼万岁。镇压则只会更糟，势必引来国际舆论强烈反弹，这奥运会也就别想开了。无论我党怎么处置，都动辄得咎，连我都替他们想不出办法来，盖他们以为可以撇开达赖治藏，这就没有救药了。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你的名字叫愚蠢。自从半世纪前您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以来，举凡重大内政外交举措，除了改革开放

这条外，似乎就没有一件不备受国际舆论谴责。请别赖在西方妖魔头上，说他们蓄意抹黑伟大的中国。

当年越共搞的也是西方痛恨的共产主义，而且实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然而人家就有本事把全世界的同情争取过去。连好莱坞影星简·方达都跑到越南去，向全世界记者谴责美国政府实行种族灭绝。美国国内更发起全民反战运动，逼得民选政府只好撤兵。最后当河内撕毁巴黎协议，北越坦克越过 17 度线大举入侵南越时，福特总统发布的紧急援助南越的命令竟被两院以压倒多数一致否决，致使西贡陷落，美国大使馆人员和难民一道仓皇辞庙，乘直升飞机从屋顶上逃跑，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出足了丑。

中共据说是龟孙子兵法的祖宗，为何从来不见使出如此漂亮的国际统一战线神功来涅？咱们有的只是李大牙的“我在大饥荒中挨过饿，所以知道不能在中国讲人权”、熊光楷的“除非你不要洛杉矶”，以及朱成虎流芳千古的“西安以东”。

我党的根本问题，是他们势利入骨，只懂实力一门语言，实力有所不逮之时，才想得起谈判来。用党电影的话来说便是：“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换言之，党字典里只有“巧取豪夺”一语，也就是革命的软硬两手。“谈判”即是“巧取”，“武装斗争”则是“豪夺”。已经恃强夺过去的掌中物，当然就不容谈判了。统战只对尚未到手的台湾才存在。

这就是他们何以顽固拒绝与“达赖集团”谈判，因为他们自觉西藏早在铁腕掌握之中，达赖不过是丧家之犬而已，不必理会。可人家是藏民的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如同当年的越共一样，争得了全世界的同情，使得我党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永远是那个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大灰狼。我党如欲化解这漫画形象，首先要做的就是把那副为所欲为的恶霸模样收起来，向全世界展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恢复与达赖喇嘛的谈判。

当然我党可以作出对国际舆论不屑一顾的大无畏状，可惜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方今之世，再没哪个国家的虚荣心如中国强烈，再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玉皇圣旨了。卢梭说：人类结成社会后的一个弊病是“自己的幸福取决于他人的意见。”中国人的幸福则完全取决于国际认证。没有洋人首肯，咱们就连活都活不下去。

咱们多的也不用说，只需看看这“Olympic fuss”就够了，自奥运会有史以来，似乎从没哪个国家如中国那样把它当成全民生死系之的演出。人南韩才半个国家，不也早在 1988 年就主办过奥运会么？人家是否也如中国那样，如穷人家的孩子盼过年一般搞“倒计数”？金日成为何又不去一头撞死？中国那么多人，怎么就没多少人看出来，咱们烧到这荒唐地步，只会让外人看轻了。随便哪个西方文盲都能一眼看破，咱们的自卑情结已经深重到了何等走火入魔的地步。

所以，不管咱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所谓“国际威望”，已经构成了“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大内容。而这“国际威望”并不能以巧取豪夺得之。六四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了中国国际威望的两个死穴。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无论中国如何强大，国际社会都只会把咱们看成是暴发的野蛮人。目前最要紧的，是千万不能在国际外交人员或记者团在藏时重演六四悲剧，免得让中国国际形象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已经构成了对胡温政权的最大的智力挑战，切望二位好自为之。

下面应张朴先生之请，说一下我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这问题其实我过去与党朋们激辩时谈过，并雄辩地证明了，我党乃是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向几乎所有邻国主动大量出让国家利益的卖国贼，至今未见到他们的理性批驳。

孙中山说："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这种文盲废话，说了等于不说。所谓政治，在我看来就是对群体争利活动的组织管理。因此，利益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与鹄的，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统统如此。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将一部分人使用暴力强抢利益制度化，后者则通过程序化的协商来和平分赃。这我已经在《盲人摸象说民主》中阐述过了。

至于所谓国家利益，则是在国家范围内的群体利益。它与个人利益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在表面上，国家看来似乎是个人的放大，国界如同自家物业的疆界。国家的资源财产则类似自家物业内的财产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的并不错，国家乃是私有制的产物。他只错在误认为私有制是可以废除的。

但国家毕竟不是私人的放大，这儿有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个人利益由个体自己判定，但什么才是国家利益则不是个人说了算的，须由全民决定。因此，"国家利益"和"全民利益"其实是同义语，中共谅来也不敢否认这点。但一旦承认这点，就得承认他们盗用全民名义擅自判定解释国家利益，并制定相应国策是犯法的。

第二，个人争利如发生冲突，有更高的权威裁判，而国家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则没有这一说。

第三，"个人"的外延是固定的，不可能分解。而"国家"圈定的群体范围可以变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大势乃是国家的范围越来越小，新生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大英帝国和苏东帝国的崩解，使得世界上多出了许多新生国家。如我在旧作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世界上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帝国。

最后这个问题，使得"国家利益"的概念变得富于争议性。例如你说西藏独立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那人家可以说，我西藏根本就不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你凭什么把我圈在你的国家利益范围内？

这说法并不是毫无道理，否则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也无权独立了。而正是这种说法驱使着原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致成了世界大势。

这世界大势是怎么发生的？在我看来，它既是殖民地人民斗争所致，更是帝国主义国家让步的结果。如同当年设计出民主制度来解决国内社会危机一般，西方政治家终于把民主制度的设计原则应用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

民主制度设计基本原则是，“一般争利问题由多数人说了算，个体的基本权利则由法律保障，不在表决范围内”。违背了第一个原则就是独裁国家，违背了第二个原则就是暴民专制。大多数国人似乎只能理解第一条，不能理解第二条。他们不知道，民主不是以众暴寡。如果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可以被多数人任意剥夺，那这种社会就是谁都毫无安全可言的恐怖世界。即使撇开言人人殊的道义问题，光从利益博弈来看，保障个体权利也是合理的。

这就是“住民自决”原则的由来。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语居民只占全民少数，其独立势必伤害全民利益，但人家并没有以众暴寡，倚多为胜，而是放手让魁北克人民自己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虽是道义使然，但从功利上来看也是合理的。

我反复指出过，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曾被武力镇压消灭。如果咱们要坚持无视少数人的意愿，用以众暴寡的方式“捍卫国家利益”，势必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中，最后是谁都没好处，谁都占不了便宜。这已经被世界历史特别是帝国主义史反复证明了。19 世纪的帝国主义者们口口声声“国家利益”，到最后才发现放弃了殖民地后，本土反而繁荣兴旺起来了，英国的经济繁荣恰是在二战后出现的，伴随的是日不落帝国的失去，对此张朴先生应该熟知吧。

现在来看张朴先生与丁林等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丁林先生强调国家利益必须经程序判定，否则是非法的。这在民主国家当然如此，但若拿去硬套专制国家，则必然导致“国家利益不可知论”。如所周知，中国现在并没有个民主程序来判定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那咱们岂不是连指责中共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利都丧失了么？其荒谬不待智者而后知之。

但张先生所说我也不敢苟同。他似乎认为，中国的江河都发源于西藏，西藏独立后即可以此挟制中国，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看不能容忍。此说似乎比牟其中炸开喜马拉雅山引入印度暖气流的设想还雄奇，但若能成立，则亚洲第一大河（？）湄公河的上游流经中国，咱们也就可以以此挟制东南亚国家了。可请问咱们把那河流截断了，堆积下来的水到底放哪儿去？若像某位网友建议的那样令其改道，则这种伟大工程只能请夸娥氏二子再度下凡，联合好莱坞的超人一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我已经反复说过：西藏对于中国只有国防价值与感情价值。所谓国防价值王力雄早就指出了：若所谓“大西藏”独立出去，则河西走廊、四川等地立刻成了边疆，不能不给国人带来一种威胁感。感情价值倒决不是说汉人对藏民有什么感情，甚至也不是说汉人喜欢那块地方，而是说中国人因为过去被帝国主义侵略，对丧失领土非常敏感，难以接受（奇怪的是爱国者们却从不谴责中共主动跪送出去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说穿了还是西藏留在中国版图内满足了汉族“地大物博”的虚荣心。

除此之外，西藏对中国什么用处都没有，不是说它没有资源，而是说它严酷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汉人无法在那儿存活。一般人不知道，藏人之所以能在那地方生存，乃是因为人家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他们能在高原稀薄的空气中摄取足够氧气来维持机体活动。而这本事并不能靠后天锻炼获得。我有位亲戚曾去西藏支边。据他说，汉

人在那儿生孩子一般活不下来，连和藏人通婚生下来的孩子都未必能活。他酷爱运动，身体原来很好，但去西藏工作了几年，心脏便扩大到了要衰竭的地步，最后总算蒙政府恩准返乡，才捡了条命回来。回到内地后，心脏病便不药而愈，可见那地方之可怕。

因此，哪怕那个地方遍地是黄金，对汉人来说也没什么意思。要开发就必须投入大批汉人，而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藏人其实不必担忧汉人抢夺他们的资源，咱们的“血氧曲线”不允许。

达赖喇嘛对此也该心中有数，前两天看网上新闻，见他解释他说的“文化灭绝”是指汉人大量移民，至今已达 50 万，但他也同时承认那并不是政府有意搞的。其实进藏汉人多半是短期经济移民，并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在那儿长期生存。在此，“神圣的达赖喇嘛”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有时不惜危言耸听、但仍然不失诚实的精明政治家。

因此，这事情明摆着：中国不可能通过大量移民使得西藏变成内蒙那样以汉族为主的地区，地理条件决定了藏人将永远是那儿的多数民族，因此永远无法把它变成内地省份，从根本上消除它的离心倾向。相反，越是试图去控制它，粗暴干预人家的传统生活方式，强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越发引起藏人反感，提升人家的排斥力。既然如此，唯一的明智选择就是退回到当年的十七条协议上去，迎回达赖喇嘛，汉人从当地撤出，关闭当地的党政机关，由西藏流亡政府接管，只留下国防军，并由中央政府负责外交。

这在我看来乃是汉藏双赢之途。汉人既然无法“消化”西藏，又不愿吐出来，不如回到清朝的“土”政策上去，只需西藏作为事实上的附庸国就行了。以后内地对西藏的财政援助，须由西藏地方政府向人大公开提出，再由中央明令拨款，化“暗贴”为“明帮”，也可避免现在这种“花钱买仇人”的蠢事，有助于培育汉藏亲善。如此既保障了中国的国防利益，又照顾了汉人的大一统情

怀，还化解了汉藏仇怨，省得朝廷日日为“分裂”噩梦操心，到底有哪一条违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西藏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合理解决方式。苏联经验提示，在许多情况下，独立只对本国政客有利，对普通百姓其实没有什么意思。中国现在经济急剧发展，堪称蒸蒸日上，又何必在此锦上添花之际，跳下 “祖国大家庭”这辆车去？只要藏民获得了自由决定生活方式的权利，那又还有什么必要非和强邻闹成乌眼鸡不可？

这就是我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已经反复发表过。我认为它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功利上都是合理的，既符合住民自决生活方式的原则，又符合藏民与汉人的利益。

2008 年 3 月 31 日

汉族永远无法“消化”西藏

老芦告诉大家，藏族的生理机制和咱们的不一样，红血球的携氧和卸氧能力比我等的高得多，因此人家能在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上传种接代，而汉族就没这本事，这是由种族的遗传差异决定了的，无法可想。

此话一出，愤青们立即把我打成种族主义者，我于是只好把国际学术杂志上的有关论文摘要翻译了几篇，贴在论坛里。任何一个理解力正常的读者看了那些摘要，就立即能看到科学家们的发现揭示了汉族的两个不利：

一、遗传造成的种族差别决定了他们对高原的适应能力远不如藏族，因此严重影响了胎儿发育。

二、发育不良的婴儿降生后存活率必然低于藏族，这儿有双重先天因素，一是基因决定了正常汉族婴儿对高原的适应能力本来就不如藏族婴儿，二是胎儿发育不良使得在高原出生的汉族婴儿的心肺机能低于正常婴儿。前者是遗传因素，后者则是非遗传的先天因素。

为什么说藏族对高原的适应能力是遗传决定的呢？那是因为受试者都是长期生活在西藏的汉族，他们已经克服了初到高原后的不适应，机体已经发展出一套补偿机制来对付高原持续的低血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各种生理指标还远不如藏族，说明那差别只能用遗传原因解释。

这从进化论来看是必然的：西藏人在那儿生活了几万年，高原缺氧使得不具备适应能力的人或是活不下来，或是无法传种接代，

而发生了有利的基因突变（诸如血红蛋白的携氧卸氧能力高于常人）的人就能繁殖后代，这种自然选择延续几万年，最后留下来的藏族当然全是具有类似遗传优势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进化论也可以推翻了。而这就是某位愤青一直在进行的努力。他认为凡是敢指出不同种族之间有遗传造成的性状差别的人，就是种族主义文盲。

这科学发现的涵义是什么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决定了中国将西藏汉化的希望终将破灭。咱们也不必装模作样了，实话实说吧：斯大林早就英明指出，民族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谁也没本事。只要不同民族杂居在一起，就迟早要打得头破血流。巴尔干之所以是世界火药桶，就是因为那儿是多种民族的聚居地。南斯拉夫因民族问题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又在上世纪末以种族灭绝震惊世界。正因为斯大林和其他世界领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在战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种族净化，亦即把住在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赶入德国境内，把德国境内的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去，企图把中欧东欧的国家搞成单一种族国家，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种族大迁移。此乃人类历史上比较残酷的一页，但被战胜国成功地隐瞒下来了。

所以，一个多民族国家迟早是要崩解的，玉皇大帝都没本事拦住。解决这个难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结成联邦，各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省得因互相干扰而摩擦，而大打出手。如果实在合不在一起，那就随时可以退出，免去不必要的种族残杀。第二种则是实行“种族净化”，把多民族国家变成单一国家，那自然也就没有民族矛盾与民族纠纷了。

米罗塞维奇采取的就是第二种方式，他和现在科索沃独立虽然方式不同，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其实都是制造单一民族国家，只是老米想使用武力把科索沃的多数民族阿族杀光，让新南盟变成单一

的塞族国家，而现在科索沃则干脆独立出去，变成单一的阿族国家，虽然具体目的和手段不一样，但都是“种族净化”。

美国则是两种手段都使用了，又采取联邦制，又实行同化或曰“种族融合”。后者倒不是故意的，而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美国固有的地大物博特点决定的自发过程。我已经说过，一个建立在车轮上的社会必然要造成种族融合，也就是不管种族背景千差万别，最后拥有的都是共同文化，具有类似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心态。这种国家虽然仍然无法免除种族摩擦和纠纷，但绝不会有什么独立运动——大家都跑来跑去，朝秦暮楚，楚材晋用，还独立什么鸟？例如本坛网友就有人曾在美国各州都居住工作过，毫无什么“安土重迁”一说。

这就是我提出一系列民族政策时依据的历史与世界的大视角，我认为要避免南斯拉夫的惨剧，中国必须走美国的道路，双管齐下，既实行人口的双向对流，促进民族融合，又逐渐向联邦制过渡。

据张朴先生说，他对西藏的观点有部分是从我的“人口双向对流”主张中得到了启发。但他不明白，我的“人口双向对流” 主张主要是针对新疆而不是西藏的。我早就知道汉族在西藏没法活下去（或起码是无法在那儿传种接代），这双向对流只可能是单向的，亦即把藏族引诱到平原上来，而不可能是相反。这么搞下去，那地方岂不要变成无人区？

总而言之，考虑西藏问题必须面对科学事实，不能再使出毛泽东的“老子不信邪”的反智主义蛮干态度来。因为生理结构不同，汉族无法在那儿生存本是个事实。如果你藐视这事实，就算把 1 亿汉人迁居到那儿去，再过几百年留下来的也只会是藏族，那 1 亿汉人早就“天葬”得连根人毛都没有了。岂不是筛子打水一场空？诸位还来什么劲，发什么屁眼儿疯？

爱国者们全是慷他人之慨，出力建立在他人的肌肉上，淌汗建立在他人的汗腺上，流血建立在他人的动脉上，吸氧建立在母亲的肺部上[1]。早在 8 年前我就在网上说过：谁要是主张打台湾，自己先报名去参军。现在我要补充：谁要主张镇压藏民，自己先报名去支边！

这些当然只是气话，还是心平气和地谈长治久安问题。若读者明白了上面那个严酷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西藏与新疆不一样，新疆在将来可以变成汉族地区，正如内蒙已经变成汉族地区那样，但西藏永无这种可能。因此，它将永远是一个汉族无法消化的坚果，永远只能以藏族为主要居民，永远具有潜在的独立倾向。咱们可以做的，就是无为而治，让人家去自己管理自己，那样无论是好是歹都赖不到汉人头上来。如此即可避免花钱买仇人，使得自己的亲善姿态反而激起了对方的排斥力。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翻译的某篇“种族主义”论文有个缺陷：忽略了母亲的营养状况对胎儿发育的影响。但这其实对汉人有利，因为汉人生活条件一般要比藏族的好多了，对怀孕妇女的照顾也比较完善。因此若将这因素加进去，则汉族的流产率、死胎率、夭折率只怕还要更高。

这本来是个科学问题，可是有人就是坚持要用政治干扰学术。谁要胆敢承认种族之间有遗传决定的差别，谁就是种族主义者，那位网友从头到尾就是在玩这一招。我于是问他，是不是白人之所以白，黑人之所以黑，不是遗传决定的，而是是否晒太阳的结果，可到现在他也没回答上来。

2008 年 4 月 6 日

---

[1] 这是挖苦那位骂我是种族主义者的愤青。在与我争辩过程中，那位先生什么笑话都闹了出来，竟然坚持新生儿的血氧水平受母亲的血氧影响，谁敢不同意他这伟大发现，谁就是文盲。

王力雄大作摘要评点

楼下转贴的王力雄先生的大作，堪称字字珠玑，非常值得吐血推荐。王先生是我认可的中国的寥寥数个知识分子之首，常令我油然而生敬慕之心。他会见达赖喇嘛的文章，含有众多的宝贵原创思想，非常值得注意。文章太长，恐怕大众没有耐心，是以我把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挑出来，以粗体楷书列出，加上小标题，并略加解释或评点。

一、西藏有充分的法理权利独立

我在讲座上表示，十七条协议的确是在军事威胁下签订的，但不能因此断定不合法，因为历史上和国际上很多重要协议同样都是战争的结果。十七条协议是否合法，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合法协议必须完整实施，而不能只实施部分条款，不实施另外的条款。十七条协议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自 1959 年 3 月的拉萨事件后就不再实施，这种改变并没有得到签署协议的另一方——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十七条协议应该被认为已经废止。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十七条协议废止，西藏属于中国的承诺也就随之无效。这一点是“西藏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的基础。

【芦评】

此话对极，不能因为是城下之盟便可以不遵守，否则世界必然要乱套。契约双方有一方不遵守，则该契约则自动丧失法律效力，违约方应该受到惩罚。王力雄在这儿其实指出了一个事实：十七条协议是西藏方面第一次正式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的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这协议存在一天，西藏就没有独立的法理依据，可蠢共却不知道珍惜，片面撕毁了该协议，因此西藏有足够的法律理由撤回原来的立场，宣布独立。

因此对解决西藏问题，最佳途径莫过于中国与西藏重新签订一个确定西藏归属中国的协议。而目前，能被绝大多数藏人共同听从的唯有达赖喇嘛，除此无人可以整合已被严重分化的藏民族；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达赖喇嘛是藏民族代表，他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同时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如果能形成一份由达赖喇嘛签署的法律文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那么无论是藏人还是国际社会，从此对西藏属于中国的事实就无从质疑，西藏独立的诉求也就失去根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健在时签下这样一个协议。一旦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机会则失不再来，因为除了达赖喇嘛，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整个藏民族承认西藏归属中国。

【芦评】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惜蠢共太蠢，他们代表的中国人太蠢，倚冰山如泰山，绝对不会在自觉占尽风头时还会主动让步，说了也白说。

二、达赖对我党本性的认识

达赖喇嘛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不管中国政府承不承认，西藏问题都是一个确实的存在，无法回避。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西藏问题，并且关注着西藏问题如何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对西藏人民是痛苦，对中国也不是好事。不仅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直受这个问题困扰和损害，中国自身的问题，如台湾，也因为西藏问题的存在而对统一抱有许多疑虑。所以解决西藏问题不仅是对西藏有利的，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利的。为了表明他不反对中国政府，他特地用汉话对我说："我不反共！"他解释说看过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很多观点是赞成的。他还插进一段轶事，他在访问台湾时跟连战也用汉话说过这句"我不反共！"连战的回答则是："我反共！"说完他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

【芦评】

据说达赖在年轻时还研究了毛主席著作，觉得共产主义与佛经颇有相通之处，还准备申请入党来着。幸亏他没有这么干，否则共产世界多了一个无耻走狗，文明世界少了一位杰出领袖。

达赖喇嘛不知道，他反共不反共什么区别都没有。今天的共产党不过是个招牌，没谁再信仰共产主义。他现在即使提出入党，我党也不会理睬他，因为人家自觉吃定了西藏，绝对不可能没有理由便主动让步。这就是中国人的永恒悲哀：鼠目寸光，倚冰山如泰山，一定要使足顺风船，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接着谈到，中国政府一直反复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独立，就像念经一样，而他自己在各种场合也一再说西藏不要求独立，也像念经一样。双方似乎都在不停地念自己的经，但是首先需要互相对话和讨论。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对话。他开玩笑

地说，中国政府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同时表示，他一方面重视与中国政府之间进行接触，另一方面也深知人民之间的交流很重要。他和我见面的意义就在这里。过去他见的大陆汉人大都是流亡者，有国不能回，而既能够客观理解西藏问题，又能在中国之内观察和发言的知识分子，不但对西藏人民和解决西藏问题有帮助，对促使汉族人民理解西藏问题，更是有特殊的帮助。

【芦评】

达赖此话，不但说出了中国政府的心理障碍，也说出了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疾患，13 亿中国人起码有 10 亿人“的脑子里可能一多半物质都是从事怀疑的，总是在猜测别人怎么加害。然而若是只有怀疑和恐惧，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

接触中国人没有什么鸟用，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理解达赖的英明睿智，更无平和客观的心态去心平气和地思考西藏和中国的前途。除了别有用心的民运垃圾，能了解达赖的大智慧的先知先觉们恐怕还不到两位数。建议达赖喇嘛还是专注于西方社会。

三、达赖喇嘛是中国流行心理疾患的特约大夫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

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芦评】

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古人说的“哀莫大于心死”，似乎就是特地为现代中国人度身定做的。中国人有脑无心，决定了那脑袋绝对无法获得大智慧。这种民族绝对不可能有前途。

四、达赖喇嘛所说的“文化种族灭绝”是怎么发生的

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芦评】

看来文化种族灭绝不是汉人移民，而是汉人的腐败生活方式污染造成的。

五、极权制度下的非暴力主义是死路一条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

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芦评】

这些话字字千金不易，我每个字都同意，在无良知、无法治、无民间社会的极权国家搞非暴力抗争什么鸟用都没有。但反过来搞暴力革命非但不现实，而且后患无穷，结论就是无解。

六、王力雄病急乱投医，指望靠西藏医好中国的不治之症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 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

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

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鼓吹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芦评】

王力雄对这“递进民主制”简直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这在我看来是空想主义。它的工作前提，乃是全民都变成民主志士。可真实的情况是，人类的社会改革都是由一小撮精英构思、启动、推行的，广大人民不过是群氓跟屁虫。指望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只会让他们把自己解放到地狱里去。

达赖喇嘛照抄西方代议制，乃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行程序民主。王力雄的设计了忘记了程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法治程序严格制约民主，则他的递进民主就算搞成了，也只会变成暴民专制。

七、欣赏达赖喇嘛本身就需要文化素养和智慧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近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

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芦评】

我也是达赖喇嘛的巨大粉（a great fan of his），王力雄看来跟我的审美情趣、人文情怀颇有共通之处，可惜他忘记了，正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欣赏交响乐一样，没有几个汉人具有欣赏达赖喇嘛的人文情怀、智能与审美情趣。达赖不可能是汉人的领袖，因为他不会装腔作势，更不能唤起人们心中巨大的恐惧感，而那才是中国人理解的领袖魅力。达赖的悲剧在于他永远只可能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只会备受势利的汉人鄙视。

我对达赖喇嘛说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我也把达赖喇嘛视为中国的领袖，而不单单是西藏的领袖。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西藏问题，它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在中国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西藏问题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只有先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社会，西藏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说，希望达赖喇嘛不是只把力量放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还应该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

如果达赖喇嘛是汉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领袖非他莫属。不过他真是汉人，还能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吗？不过，他虽不是汉人，难道不可以是中国人吗？中国人并非一定就得是汉人啊。他多次表示西藏可以留在中国，实际就等于承认他可以成为中国人。一位在达兰萨拉见过达赖喇嘛的人告诉我，达赖喇嘛亲口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江泽民先生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愿意为他成为第二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奔走呼吁。"如此而言，第一个获得诺

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指的是谁呢？不就是他吗。那么，他既然可以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成为中国的领袖！

我不是那天晚上才想到这一点。2000 年 1 月，我在新千年写的第一篇文章《有关达赖喇嘛的一个幻想小说提纲和另一个小说的片断》中，就以故事方式写了我对西藏问题两个结局的设想。那两个结局一反一正。一个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自己的灵童转世到美国，并以此实现了西藏独立另一个是达赖喇嘛被汉人的有识之士推举为中国国家元首，成为保证中国安渡政治转型期的稳定因素。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皈依了藏传佛教的朋友把这两个故事拿到康区色达五明佛学院去讲，对前一个故事，周围僧侣个个点头称是；对后一个故事，僧侣们则是个个神情怪异，陷入无语。

不过，在洛杉矶听达赖喇嘛演讲时，我开始对此进行更具体地思考。可以说，达赖喇嘛成为未来中国的领袖，其他条件目前都已具备，知名度、影响力、国际社会的认可、精神信仰方面的权威，以及整合中国各民族和不同族群的能力等，最大的问题是他目前尚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中国百分之九十多是汉人，不被汉人了解和接受，其他方面再好也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在这方面做一点事。

【芦评】

我完全理解并同情王力雄的拳拳之心，然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那是一厢情愿，我们配不上达赖喇嘛。

2008 年 4 月 18 日

领袖魅力与权势魔力

那天马悲鸣抄袭王力雄《关于达赖喇嘛的两篇短篇小说提纲》，请胡锦涛让位给达赖喇嘛。引起网人哗然。因为该文上了导读，某个浑人竟质问斑竹道：“这乱七八糟的还置顶？”

这种反应毫不足奇，没有几个中国人能看得上达赖喇嘛，此乃中国人的价值观使然。

某网友在他的杰作里表达了对“新新人类”法西斯倾向的困惑与失望。的确，这些人和我们的生长环境不同，不但强制性洗脑没有我们那阵的万分之一强烈，而且信息的灵通根本就不是我们那阵敢于梦想的，为何网络的发明非但没有促使新一代的觉醒，反倒让他们使出“精神自阉术”来“各取所需”，变成了无所畏惧的法西斯信徒涅？

此中原因我已经解释过了，那就是新新人类们生长在一个充满剧烈竞争、弱肉强食的无情的丛林里，他们从小就不相信一切道德说教，认定“狼羊-点菜律”真的是“宇宙运行规律”，从小就学会崇拜成功，崇拜强权。在他们心目中，凡是成功了的权势者都是大英雄，凡是失败者都是只值得鄙视与唾弃的可怜虫。待到这个病态的价值观成了思维定式后，无论怎么接触西方自由世界都只会选择性地加强他们这种势利心理。

因此，在权势崇拜教徒心目中，光是把在心里胡锦涛那权势顶峰与达赖那丧家之犬联系起来，都犯了玷污权势圣殿的大不敬罪，何况是建议胡锦涛让位给他！

这也是王力雄为何要发出这由衷浩叹：

> “那一晚我主要不是听达赖喇嘛演讲的内容，而是在看听众反应。我周围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以崇敬眼光注视他，全神贯注，时而会意点头，时而哄堂大笑。达赖喇嘛面对他们则是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地引导着全场上万人的思路和情绪。看着这样的场面，我深感触动，更加认识到他是一个多么宝贵的领袖人物，我们中国是多么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而未来的中国又是多么需要这样一个领袖。金山银山易得，如此一个领袖难求啊。未来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最缺乏的因素之一就是领袖。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近枯竭。多年来我观察走马灯般轮流进入视野的人物，期望看到有可能带领未来中国走出危机的领袖，最终只能放弃期望。我的汉人同胞不乏方方面面的优秀人才，却始终无法出现同时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物。那种人物不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不是精于权谋的弄臣，不是揭竿而起的大王，而是能够平衡各种因素，总揽各方局面，有人格魅力，有精神权威，被全世界接受和爱戴，可以带领中国完成自由民主的转型，创造一个走向未来的新社会，却又不会把权力当作个人私产的领袖。总而言之，就应该是达赖喇嘛那样的领袖。”

可惜王力雄没有解释“汉人自身的领袖资源已近枯竭”的原因何在，其实那是明摆着的——中国人心目中的“领袖”不能脱离“权力”而存在。对中国人来说，权势就是领袖头上的那道光环，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的权力与他个人的巨大成功是不落的太阳！

如果要给“中国领袖”作个逻辑定义，那就只能是“中国领袖乃是通过无情的负筛选，击败了所有竞争者，爬到了权力顶端，掌握了所有的权力，能决定他人穷通祸福乃至生死存亡，因而唤起了全国人民由衷敬畏与崇拜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这就是权势的魔力，它的心理发生机制相当复杂，既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恐怖分子产生恐惧、崇拜甚至依恋心理）因素，又有对“领袖”个人成功的巨大艳羡，更有对“领袖”的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的由衷敬佩。

对权势的崇拜也决定了中国人的成功观。在国人看来，离开权势也就无所谓成功。而取得权势的能力就是最上等的智能，它与权力斗争的血腥度成正比。因为东方政治的血腥，中国人天生要对从那绞肉机里胜出的优胜者们的智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必然要有意无意中使用想象补足那优胜者的大智大勇，使之成为好莱坞电影里的超人。

如今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能引起新一代中国人的由衷崇拜，我看基本就是这个原因。听国内网友说，就连某些商界巨子也佩服老毛，那原因非常奇特，据说是他从不按规矩出牌，对同志发动突然袭击，让刘少奇在屠刀行将砍到脑门之际还在傻傻地帮他搞运动“反修防修”，等等。

因为崇拜权势已经成了民族本能，所以，这种民族中不会有失败的英雄，不会有毫无权力的领袖。跪在泥地里的民族不会产生耶稣，不会产生甘地，不会产生马丁路德金，不会产生达赖喇嘛，更无从发现与世俗权力无关的领袖魅力，没有足够的智能感受超越于世俗权力的人格感召力，不会被大慈大悲情怀导致的圆通的大智慧的无可抗拒的吸引，不配领略达赖喇嘛轻松自如地自嘲他的“broken English”，不知道叹服达赖喇嘛坦率向记者承认他也是肉体凡胎，照样有凡人的欲念，只是善于自我调节控制罢了。

这种民族更没有起码的智能认识到，胡锦涛温家宝皆豚犬，古往今来，类似人物多如恒河沙数，就连黎元洪都比俩竖子“称头”（川话，“像样”之意）些，而达赖喇嘛只有一个，正如耶稣、甘地、马丁路德金只有一个一样。他当然是失败者，当然是丧家之

犬，以世俗的价值来衡量可谓一钱不值，可惜这世上的天平并不是只有中国那一副。

这就是何以“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治国白痴”这大实话永远无法被爱国者们接受——只有疯子或别有用心者才敢怀疑那有史以来最大的“成功者”的智力。这也是为何不管是什么阿猫阿狗，哪怕是上辱祖宗、下惭后代、中对不起牙医、连人话都不会说的李外长也要被捧成“诗人外交家”。爱国者们崇拜的不是什么领袖魅力，而是他头上的权势光环。

这种民族当然要耗尽领袖资源，枯木朽株上只能长出毒菌，丛林里只能窜出一代又一代钩爪锯牙食人肉的生猛狼群。

最后简介一下前面提过的王力雄的那个小说提纲：未来的某一天，中国被内战撕裂，面临着核毁灭危险，北京派使者到印度去秘密拜见达赖喇嘛，告诉达赖，他成了各方唯一可以接受的人物，请他看在苍生面上，出来调和各方冲突，把中国从毁灭中拯救出来。故事至此戛然中断，给读者留下悬念。

我看那小说提纲时，泪水忍不住湿润了眼眶，不能不为王力雄的拳拳之心深深打动。但我也觉得他因为爱国之情太深，一厢情愿脱离了现实到了荒唐的地步。首先，“妥协”从来就不在中国字典中，民初就这样了，何况是我党把“妥协”当成最大的罪恶批判了50 年之后。其次，他过高估计了中国人的心智，竟然以为中国“领袖” 会有那智能理解达赖调和各方的政治天才与淡泊名利的节操，甚至误以为一个跪在泥地里的民族，会将一个远远高出他们卑污视野的人物认同为自己的领袖。

或许，就是这种爱国心切导致的一厢情愿，使得王力雄未能解释为何中国业已耗尽领袖资源吧？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从来就没有过这种资源，从未产生过如达赖那种精神领袖，从未见过有谁像他那样，丝毫不籍仗世俗权力，不靠金钱，也不诉诸语言暴力（不管是

芦某的鲁迅式恶言毒语还是李大牙的粗鄙痞子腔），光凭他的慈悲情怀与大智慧，便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全世界文明人的心。

2008 年 4 月 19 日

笑看蠢党作法自毙

这两天好戏连台，先是新华网北京 4 月 25 日电披露，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同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宣布准备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谈判一事作出回应，提出双方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恢复藏区的秩序，承认达赖喇嘛的积极作用和停止对达赖喇嘛的诽谤。接着又是博讯新闻网披露，国内中学已经接到紧急通知，“为防止国际反华势力阴谋操纵破坏社会治安与奥运会准备工作，任何学生在五一期间参与围堵家乐福属于破坏社会治安，如被警方拘捕将遭勒令退学处分。”

这当真是令人忍俊不禁，真想不通我党好吃好喝的，为什么偏偏要和自己过不去，为自己出难题。

这七八年来，我什么事都没干，天天劝告敬爱的党中央：仇外这把火可不是费翔那把火，不是好玩的，最后一定要把自己烧进去，晚清就是先例。为照顾首长们的低下智力，我还特地写了预言小说《公元 2093 年中国大事记》，具体而微地描绘了军界强人如何借我党掀起的仇外思潮向文官政府发难，最终导致中国核毁灭，可领袖们的智力实在太低下，屡教不改，害得我灰心丧气，几乎要放弃“疗愚帝王师”的卑贱职业了。

要说的都反复说过了：天下再没谁比我党更对人民起来闹事恐惧入骨的了。自从 89 年闹了那次，至今领袖们的尿还不分点地滴。而所谓“民族主义”的闹剧，本质上是群众大规模释放仇恨。如今社会危机这么深重，满肚子怨气的人多的是，没借口还想闹事涅，

何况政府还给了这么个正大光明的理由？若闹将起来，请问政府该怎么办？支持还是镇压？不镇压，失控了怎么办？如今哪个领导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闹事就上上大吉，一旦群众起来游行示威，第一本能就是出于莫名恐惧实行镇压。而一旦镇压，岂不是自己掌嘴，成全了“卖国贼”形象，使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的神话死灰复燃？

当然我也深知，愤青之愤，乃是专门针对洋鬼子的安全义愤，我党即使镇压，他们也只会大赞大颂党妈妈的英明，然而党内军内的强人可就不会这么看了，这不是为他们发难提供最理想的借口么？请问锦涛家宝（可惜不是嘉宝），二位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眼下这与“达赖集团”的交道，就最能彰显我党那常人决计无法设想的弱智。我党不是谴责达赖喇嘛是恐怖分子么？怎么还要跟人家谈判涅？世上几曾有过跟恐怖分子谈判的政府？

因此，这里只有两种可能：

1） 假定达赖集团真如我党说的，是恐怖分子集团，则我党乃是全球第一家向恐怖分子屈膝投降的怯懦政府。

2） 假定达赖集团不是恐怖分子，那我党就是满口谎言、肆意欺骗全世界人民、诬良为盗的骗子。

所以，我党不是懦夫就是骗子，两者必居其一。凡是受过初中教育的人都能理解以上严谨推理，想来锦涛家宝既然上过大学，虽然在学校里忙着作积极分子顾不上学习，但这儿需要的毕竟只是初中智力，就算再蠢笨也不至于看不懂、想不过来吧？

与“达赖集团”一比，我党的弱智就更给比衬得惊天动地。现在我党主动放出了谈判风声，可人家立即打蛇随棍上，提出了那仨前提，每条我党都无从拒绝：

“恢复藏区的秩序”，这是当然的。维持社会秩序乃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最起码职责。西藏发生骚乱，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我党有

脸把这责任推给“境外恐怖分子”么？中东恐怖分子仇美报复再猖獗，也只听说过炸大楼，邮寄炭疽杆菌等等，还从未听说人家能在美国煽起暴乱。不接受这前提，我党就必然要在全世界舆论前显得蛮不讲理，可要接受这前提，我党不就等于承认了西藏骚乱是自己失职么？

“承认达赖喇嘛的积极作用”，这也是我党无法拒绝的条件——如果不接受这条，坚持认定达赖喇嘛只有消极作用，那还何必跟人家谈？这不等于承认自己毫无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与达赖谈判完全是作公关秀么？但如果接受了这条件，请问我党该怎么向全国人民弥缝以前撒下的无量弥天大谎？

“停止对达赖喇嘛的诽谤”，这条其实已被第二条涵盖了。上面已经指出，我党同意与达赖喇嘛会谈，本身就证明了“达赖集团是恐怖分子”的宣传乃是无耻诽谤。但间接辟谣的难堪毕竟要比主动认错要小得多，这让我党怎么答应法？但若不答应，天下哪有一边辱骂诽谤对方一边跟人家谈判的理？

这三条合情合理的要求一提，就此把胡温逼进了死胡同：答应了，在国际上丢脸倒是小事，独裁政体也毫无求得人民谅解的必要，可党内军内强硬派能答应么？西藏那个口口声声辱骂达赖是“披着僧袍的豺狼”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某人能容忍么？倘若因此触发党内权力斗争的惊涛骇浪，胡温那俩“卖国贼”该如何避免灭顶之灾？倘若不答应，那岂不是在全球舆论界面前自动描足了蛮不讲理的恶棍形象？平时倒也无所谓，眼下可是指望洋大人统统来北京朝圣，参加咱们的“侍妾扶正国际认证大典”的关键时刻啊。为这大典，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投注了“震惊世界”的无与伦比的热望，要是砸了锅，岂不要被政敌当作两位施政失误，变成党内权力斗争的绝佳口实？

想来想去，连我这疗愚帝王师都无法给两位想出个解药来，同情 ing。怪只怪江总煽起了仇外的那把火，两位又极度弱智地把奥运炒作到了发高烧的热昏程度，就此为藏独人士提供了绝佳七寸，捏起来再方便简易不过。

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事实反复证明了我老人家神目如电，料事如神，对两位竖子的哼哼教导又是何等英明。希望两位吃此一堑，长他一智，从此发现本师尊的英明，以后多听取我老人家的哼哼教诲，停止饮鸩止渴，放弃煽动所谓“民族主义”的仇外思潮，把精力转移到化解国内深重的社会危机上去，否则迟早要玩火自焚，本师尊有厚望焉！

2008 年 4 月 26 日

中国人的恩公情结

网友写了篇文章，说老美的幼稚造成了伊拉克的乱局。我追补了一句，说那是布什家族的贪婪造成了伊拉克的乱局。我这话可不是毫无根据乱说的，乃是看了一部得奖美国文献片的感受，人家列举了大量证据，证明早在九一一事件前，战争贩子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早就在谋划入侵伊拉克，连油田都分配好了，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布什和他家的人，云云。

但他说的也对，应该说，入侵伊拉克那个千古大错之所以铸成，美国人民的幼稚与布什的贪婪缺一不可。老美毕竟是民主国家，如果没有占绝大多数的民意依托，布什是不可能把国家拖入灾难的。他无非是把九一一这屎盆子栽到萨达姆头上去，巧妙地利用了九一一事件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引起的巨大愤怒罢了。如果美国人民不是那么幼稚，就一定会听了参议员某某（我又忘了名字了，好像是 Richards）“We got the wrong guy”的话。

老美性格简单，完全按好莱坞的英雄观世界观做人，喜欢做人家的解放者，最后一片好心把人家解放到地狱里去。勿过，我本来是最坚定的反战派，当初在本网站受尽了那些华裔美国爱国贼的侮辱，但现在反倒觉得美国只能在那儿坚持下去。

这立场转变恰好与多数美国人相反。一位美国朋友原来是坚定的主战派，现在却坚决主张撤军。我于是对他说：国际共运之所以变成一种现实的灾难，乃是因为一个大国的资源落在了列宁手里，这才能殃及全世界，使得中国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布什确实是白痴，但祸已经闯下了，难道能眼睁睁看着最大的石油出产国落在恐

怖分子手中？由此导致的灾难当令国际共运瞠乎其后。他问我，那该怎么办？让美国的男孩们再在那儿坚持下去，没完没了地打一场没法取胜的战争？我说，是啊，不是所有的错误都能弥补，布什那白痴不但坑了美国，还把整个文明世界连累进去，弄出个几代人都无法解决的祸根来。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出兵伊拉克确实是取一种善意态度，想去把人家解放出来，按美国生活方式幸福地过日子。无过，这种“解放者情结”不但美国人有，中国人更甚，直接就是“恩公情结”。如果说老美的解放者情结给人的感觉是滑稽，则中国人的恩公情结就让人恶心。为这种恩公情结折磨的人，连起码的文明人的做人方式都缺缺，白让他们生活在西方那么多年，骨子里绝对是无法改造的野蛮人。

某位愤青就是这种同志。此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抵死要作西藏人民的恩公。他也真是如开滦煤矿工人一般特别能战斗，为了坚持“藏人离开汉人喂养就得饿死”的主张，发明了不计其数的“科学理论”，那婴儿靠母肺呼吸的笑话据说他已经 N 次认错，咱们就不说了，人家的最新科学发现，是西藏人比汉人更不能适应高原缺氧环境。据他披露的独家新闻，班禅就是因为长期生活在平原，骤然回到高原去后才害高原病死的（此人记性太差，忘记他曾披露班禅到北京后便从未返藏的新闻了）。所以，为了做达赖的恩公，咱们坚决不能同意他回去，免得藏独人士悉数患上高原病，猝死在青藏高原上！

中国式恩公也见多了，如此无耻的作恩公法，真超出了我对中国人的最恶劣的设想。我原来以为无论国人作出什么下流事来，我都不会再惊奇了。不料这位先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真个是吾生有涯，国人的无耻无涯，以有涯研究无涯，殆矣哉！

不幸的是，这种态度在国人中非常有代表性。许多国人对藏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就是：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多好处，让你们占了这么多便宜，怎么还不知足？真是喂不饱的白眼狼！

就智力水平而言，中国人绝对是越活越回去。稍微对传统文化有点认识的人都该知道，传统道德把“施恩望报”当成了一大恶德，提倡记住别人对自己做过的好事，忘记别人对自己的损害，但要忘记自己对人家做过的好事，记住自己对别人的损害。这道德戒律在道义上的合理性咱们就不说了，光从功利上的合理性来说，这古老的教训也非常睿智。现代国人却死也不明白，施恩望报，给了人家点好处便从此以恩公自居，绝对是买来仇人的速成之道。于是这才会有毛泽东把民脂民膏往外国阳沟里倒，最后买来“我们的敌人遍天下”。

可惜国人太愚昧，死也不明白这最简单的心理反应。最有示范作用的就是这位愤青。此人去西藏旅游过一次，从此就成了当仁不让的“西藏专家”。可他就是弱智到竟然认识不到，他用来支持“恩公”说的论据，恰好证明了这种恩公态度的反作用有多伟大。据他说，他亲眼目睹某藏民在某医院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免费医疗，可对汉人照样充满敌意。大概到他死那天，也不会悟出来毛病恰恰出在以他为代表的汉人的傲慢态度上。

说来可悲，就连批评老美入侵伊拉克的那位网友也免不了落入这窠臼。他虽能看出美国人救世主情怀的可笑与有害，却看不到更有害的汉人恩公情怀。许多汉人一开口就是西藏的农奴制怎么可怕，藏传佛教怎么个伤风败俗惨无人道，坚持认为汉人解放了西藏，让广大农奴翻身做主。这些说道，我看并不比那愤青“为了达赖集团能长命百岁，必须禁止他们返乡，猝死于高原病”的说道更有耻些。请去看看张戎毛传上转述的班禅的新旧社会忆苦思甜再来发言。光是“镇暴平叛”杀害了那么多藏人，汉人就对藏人欠下还

不清的血债。达赖不纠缠旧事已经是大慈大悲了，是人家是咱们的恩公，不是反过来。否则德国人给犹太人赔了那么多钱，也可以作人家的恩公了。

就算尔等说的是对的，“解放”前的西藏确实是人间地狱，那又怎么样？人家愿意受罪，你管得着么？是谁磕头如捣蒜请尔等强行破门而入，去作人家的大救星？这种不请自来强行“施恩”的恩公中国人也曾有过，那就是把东北建成了亚洲第一工业强国的日本人，咱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去礼请人家回归祖国大家庭啊？

2008 年 4 月 18 日

北京为何妖魔化西藏流亡政府？

2008 年 9 月 25 日，《明报》记者李江琳在达兰萨拉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采访视频与记录由《博讯》12 月 2 日发表在网上。

看了那报道，我不禁大吃一惊，总算首次了解到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主张，不能不为北京不择手段地愚弄欺骗人民、妖魔化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制造民族分裂、煽动民族仇恨而深感气愤，也为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长期以来只注重西方国家的公关工作、忽略与海外汉人沟通、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感到遗憾。

一、要求行宪何罪？

在许多大陆人心目中，所谓“达赖集团”乃是一小撮背叛分裂祖国的叛徒，想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里分离出去，实现西藏独立。因此，北京和他们的争吵，与中共倒行逆施制造出来的其他内政问题不同，代表着全体中华民族与民族叛徒的斗争，是维护祖国统一、人民团结的神圣事业。每个中国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该站在中共一边。

我虽然知道达赖喇嘛早就放弃了独立主张，要求的只是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自治，但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西藏流亡政府已于 2002 年放弃了这一要求，现在人家要求不过是两条：第一，严格按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民族自治。第二，将所有的藏族居住区域划入西藏自治区。

关于第一条，桑东仁波切讲得非常清楚：

“2002 年至今，我们要求的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条款，以及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自治，你们什么也没有实行。目前给予藏人的自治只是名义上的，并没有实质上的自治。有关自治的法规一条都没有启用。自治区的立法机构并没有起到他们应该起的作用。

因此，……我们要求的仅仅是宪法条款上的内容。宪法条款中提到语言，提到文化，提到宗教自由，提到经济，提到教育，提到内部安全，还提到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贸易关系，这些在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上都有明确的定义。因此，我们会参照每一项细则，要求他们诚心诚意地为全体西藏人民实施这些条款。这就是我们的自治。

无需改变政策，也无需修改宪法，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意愿。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政治意愿的话，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够做到。只是落实而已。举例说，实施自治条款的第一步是制定基本法，也就是自治法规。自治法规必须实行。

……

如果这些全部实施的话，自治区不必有独立的军队。军队将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自治区不能与任何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自治区只会送学生出去学习，或者邀请与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学者。自治区可以与西藏周边接壤的国家进行边境贸易，不必请求中央政府。因此，实际地说，国防和外交将是中央的事情。而且，中央政府不必给自治区拨款，使得在自治区（在经济上）依赖中央。自治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来使用自己的自然资源。

宪法第 112 条到第 122 条，所有的自治条款都相当明确，还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条款。如果这些都认真实施，那就没问题了。藏人会满意，西藏文化将会得到保护，藏人在感情上将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合。那是解决西藏问题相当容易，简单，平和，透明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问我‘你所说的自治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那就是中国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这不过是要求中共尊重自己制定的宪法，严格实行它而已，究竟何罪之有？中共要么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那部宪法不过是骗人的，认不得真，要么干脆废除现行宪法，制定出一部反映国家真正的权力结构、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权利的真实宪法来，何必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制造出“达赖集团闹分裂、搞藏独”的弥天大谎来，煽动汉藏仇恨？

二、要求成立“大西藏自治区”也无可非难

把所有的藏族居住区域都划入西藏自治区，乃是西藏流亡政府的第二个要求，其理由桑东仁波切也讲了：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的是，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确保每一个少数民族获得自治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西藏这个少数民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不是十个或者十五个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治区。

这也就是我们放弃分离和独立的原因。如果我们要求分离的话，那么在 1951 年，我们就不会要求内藏和外藏的统一。我们就只能要求外藏的分离。因此，当我们接受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适当地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有一个包含全体藏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不

是一个领土问题，也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只是一个有关人民的问题。

由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提倡该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要实现那个目的，西藏人民应该生活在同一个自治的行政区域之内。我们是一个民族。如果参照其他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都只有一个自治区。蒙古人是一个蒙古自治区，维吾尔人是一个维吾尔自治区。只有藏民族被划分为如此之多的区域。因此我们对中方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个政策必须摒弃。马克思提倡民族自治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平等和合作，以便于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和团结的人民。为此，汉族沙文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必须被摒弃。

为了合适地实施这个想法，藏民族就不应该被划分成这样多的小块。如果藏人有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中央政府跟自治区打交道就会容易得多，反之亦然。语言保留，文化认同将会一次性实行，而不是分为许多层次。这样将会有助于藏人与其他人民，其他民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上的团结。这就是我们这方面的理由。”

这些理由我看中共根本就无从驳倒，别的不说，人家已经讲了，既然维吾尔族、蒙古族都是一个自治区，为何唯独藏族要分为许多小块？这岂不是对藏族的一种歧视？人家又不是要分离出去，不存在什么“领土野心”，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一大块领土挖走，不过是想要实现民族团结的梦想而已，这难道能称之为罪行？

当然，我个人认为，除了青海和西藏可以考虑合并为一个藏族自治区外，要让所有的藏族都住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也有实际操作困难。所谓“内藏”地区有大量汉族居住，他们的权利同样不能无视。即使是蒙古人、维吾尔人，也不曾悉数居住在一个统一的自

治区里。据我所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就有其他民族诸如蒙族、哈萨克族的自治县。类似地，东北境内似乎也有蒙古族自治县。民族的分布并不严格按照天然地域，多种民族常常交错杂居。所谓“内藏”就是这种汉藏互相扩散形成的杂居区域，根本无法一刀切。将这些地区悉数归入西藏自治区，似乎谈不上兼顾了各个民族。

因此，我看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求中共行宪，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只要这条能做到，则行政区划并不是那么重要。居民均一的地区当然应该划入同一自治区，但多种民族杂居的区域还是以自治县为单位比较合适。关键在于那自治必须是真实的，不是斯大林式骗局。如果中共真能做到这点，则行政区域划分我看并非什么关键问题。流亡政府应该也可以在此问题上妥协。

三、可笑的“自古以来”

据桑东仁波切介绍，北京和达兰萨拉主要有两个分歧，一个就是上面说过的“大西藏自治区”问题，另一个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北京要求达赖喇嘛接受“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说法，而且没有指明那“自古”是“古”到何时！

“XX 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早就成了“民族主义”符咒了。虽然国人习惯于模糊思维传统，一般不会去界定那“自古以来”是从何时算起，不过在一般人朦胧印象中，那似乎是指很古老很遥远的事。可惜西藏、新疆、蒙古进入中国版图不过是清代的事，要算“古”，也只能算是“近古”。

我党宣传动辄就拿文成公主作文章，好像文成公主进藏如同 1951 年解放军进藏一般，其实那跟昭君出塞没什么两样——打不过

外国野蛮人，只好“和亲”，靠美人计去买静求安，其实没什么光荣的。

《新唐书》说得清清楚楚：

> “吐蕃（芦注：读如“吐波”，这大概就是 Tibet 的由来）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下同）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吐蕃首次与中国发生联系，乃自唐太宗贞观八年始。遣唐使节回去后，对国王挑拨说，唐朝本来想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新唐书》称为“弄赞”，意为“君长”），但因为吐谷浑（唐朝当时的一个属国，念“土浴浑”）使臣挑拨而改了主意。“弄赞怒，率羊同共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亢，走青海之阴，尽取其赀畜。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命使者贡金甲，且言迎公主，谓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韩威轻出觇贼，反为所败，属羌大扰，皆叛以应贼。”

这段话是说，为了强索公主，吐蕃国王不但发兵打跑了吐谷浑人，而且进攻大唐的松州，威胁说若不把公主嫁给他，他就要深入入侵，打败了驻守松州的都督韩威。此后兵连祸结，双方互有胜败，大唐败多胜少。

后来吐蕃坚持不了持久战，遣使谢罪，但坚持求婚。唐太宗同意了，“（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

至此，长达 7 年的“求婚战争”才算结束。如上引文所述，文成公主入藏确实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甚至可以强解为“民族团结”的象征，但若把这当成汉族征服西藏，就完全是搞笑了。

“和亲”确实带来了汉藏和睦，吐蕃一度成了大唐藩属。可惜这关系在松赞干布死后就结束了。自高宗起，吐蕃就开始与大唐交恶，频频入侵大唐西域，灭了吐谷浑，多次大败唐军，占领了大唐安西四镇，国势与幅员急剧扩张：“并西洱河诸蛮，尽臣羊同、党项诸羌。其地东与松、茂、巂接，南极婆罗门，西取四镇，北抵突厥，幅圆余万里，汉、魏诸戎所无也”，此时文成公主尚在世。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极度衰弱，吐蕃便成了大唐的严重边患，频频入寇。大家都熟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诗句：“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那“西山寇盗”指的就是吐蕃。

可惜这“西山寇盗”并不听老杜的绝望呼吁，相侵愈急：

> “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使散骑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伦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地尽亡。进围泾州，入之，降刺史高晖。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帅郭子仪御之。吐蕃以吐谷浑、党项兵二十万东略武功，渭北行营将吕日将战盩厔西，破之。又战终南，日将走。代宗幸陕，子仪退趋商州。高晖导虏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栖山谷，乱兵因相攘钞，道路梗闭。”

这是唐代宗手上的事，吐蕃大举进攻京畿一带，吓得唐代宗逃出长安。吐蕃攻入长安，立广武王为帝，还改了元（按中国传统，新皇帝登极后都要改纪元），大赦天下，委派官职。

所以，以愚见，有如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如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一部分”。大唐和吐蕃的交战，基本是守卫自己领土的防御战。是吐蕃主动来打大唐，不是大唐出征吐蕃。哪怕连后来的历史也算上，汉族就算是在国势最强盛之时，也从未威风到攻入拉萨，立谁谁作西藏王。

此后吐蕃衰落，基本上和中国没什么来往。虽然一度被蒙古征服，可以算成是蒙古帝国一部分，但那不幸与汉族没什么关系。所谓“元朝”乃是汉族当亡国奴的时代，并不能算中国的一个朝代。把这当成“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证据，犹如越南因与柬埔寨一道被法国人征服，就把柬埔寨当成越南一部分那样可笑。

西藏真正可以算成是中国一部分，应该自清朝始。这是因为不但清朝统治者自己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是明朝的继承者，而且国际上也把清朝帝国当成“The Chinese Empire”，把中华民国当成了清帝国的后继政权。

即使如此，西藏也并非中国的一个行省而是一个藩属国。中国对西藏拥有的是宗主权（suzerainty）而非主权（sovereignty）。有清一代，西藏只是在形式上对清廷表示臣服，但一直高度自治，朝廷从未管过那儿的具体政务。西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甚至连新疆、蒙古都不如。新疆和东北类似，是满洲将军直接治理的特区，而蒙古虽是王公统治，但蒙古亲王乃是清朝皇族的姻亲，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西藏则既不由满将军治理，又和清廷没有亲戚关系。清廷不过有个驻藏大臣在那儿。但他也就是个宗主权的象征而已，并非中式“监国”，更非西式殖民地总督，并不介入当地的政务。

因此，要说“西藏是清帝国的一部分”，当然也说得过去，不过似乎还没有说“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那样理直气壮。至少，英国人是在实实在在地治理印度，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经济建设等几乎一切方面都留下了丰厚遗产，

打下了无从磨灭的印记。1951 年前的中国做到这点了么？在西藏留下了什么痕迹？恐怕还不如英国人对藏人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敢于正视事实，就不能不承认桑东仁波切说的一点都不错：“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佛教比丘，他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发表不真实的声明。”要求人家作出此类声明，完全是逼人撒谎。

所幸达赖喇嘛并不是不知妥协的人，人家已经够通情达理了，据桑东仁波切介绍：

> “达赖喇嘛尊者说，我们不应该争论历史问题。我们何必要讨论历史呢？不管历史是怎么回事，我说当下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我们还会如此。这就够了。把历史放到一边，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吧。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确实如此，只要西藏流亡政府愿意发表声明，说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也不脱离中国，这不就够了么？有什么必要逼迫人家撒谎？莫非多了“自古以来”那句话，就多了一道防止西藏独立的紧箍咒？这是哪家的兵法？巴尔干半岛诸国自古以来就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后来这些国家独立出去，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他们的领袖没有作出类似声明？何其可笑乃尔！

四、北京的苦衷

北京坚持要西藏流亡政府作出这荒谬声明，我看乃是为达成妥协故意设置障碍。我党的真正心病，既不是行政区划问题，更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行宪就意味着放弃“党天下”。西藏人民若真的获得宪法赋予他们的自治权利，势必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民族

“自治区”必然提出类似要求。这就意味着我党必须从几占中国2/3 的领土的少数民族地区撤出，这是他们绝不会同意的。

我党更大的心病，还是被苏东帝国的崩解吓坏了。目前国内社会危机深重，官民矛盾、民族矛盾重重，国家早就呈现了崩解趋势。党魁们只求在任上箍住濒于散板的木桶，岂还敢放西藏自治，恶化既有离心倾向？刻下多数大陆人似乎都传染上了这恐惧，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说我党代表了他们一手塑造出来的民意。

说到底，我党的先天尴尬，乃是从马教带来的。马列主义只看得见阶级，看不见民族，只承认阶级矛盾，不承认民族矛盾。可笑的是列宁既信奉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却又主张民族自治，全然意识不到“党天下”和任何一种自治水火不相容。这结果便是斯大林的“民族自治”骗术，害得中国俄奴党既要坚持作“党领导一切”的婊子，又不能扔掉“民族自治”的牌坊；既无法撕下面具搞晚清的“改土归流”，又不敢也不愿真的实行宪法。当然最后只有靠撒谎欺骗全国人民，诬蔑“达赖集团”是“分离主义者”，是“藏独分子”。

我党这么干，完全是饮鸩止渴，虽能靠煽动民族仇恨维持一时的统治，其实是为我党垮台后发生的民族间仇杀做足铺垫，必将给全民带来深重灾难。华鉴不远，在南斯拉夫之世。

2008 年 12 月 5 日

含泪请求胡温以平常心处理民族问题

前两天新疆乌鲁木齐维族闹事，不幸酿成流血事件，造成许多无辜民众丧生，引起海内外华人关心。除了那些土法西斯分子和种族主义者，我看多数人表示的还是善意关切，希望各民族能和睦生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与前段西藏闹事不同，国际舆论并未一边倒地抨击政府，我还看到《多维网》介绍美国布朗大学的某位“新疆学”教授夸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但在我看来，闹事之所以发生，政府还是不能辞其咎，必须深刻反省施政中的谬误。

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中国政府最触目的一个特点，是它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most powerful）的统治者，其掌握的权力特别是镇压暴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见所未见，相对于人民占了绝对的压倒优势，绝无被人民推翻之虞，然而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心虚最胆怯的统治者，永远生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的永恒噩梦中。这结果便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有风吹草动便如临大敌，惶惶然以为末日将至，因而动辄过度反应，小题大作，人为激化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自讨苦吃还其乐无穷。

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处理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完全是同一种反应定式，就是不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常态社会必然出现的现象，却一定要以病态心理去将它们视为颠覆政权的敌对行动，除了铁腕镇压便绝无第二招。处理“89 风波”是这路数，处理西藏闹事是这路数，处理新疆闹事也绝对只会是这路数。程咬金还有三板斧，我党就一板斧，连“封建”皇帝都不如。因此似乎可以说，我党占了中

国历史上三个“之最”：最强大最富裕的统治者，最胆怯最心虚的统治者，最愚蠢最笨拙的统治者。当真是“占尽风情向小园”。

其实是人都该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种族矛盾、朝野矛盾、官民矛盾，等等，此乃最自然不过的事，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应该知道这常识。

敬爱的林副统帅早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的著名讲话中就谆谆告诫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 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把矛盾分为所谓“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但处理不好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胡温不是据说是马列毛主义者么？怎么会连革命导师们的这些经典教导都不知道，以为“和谐社会”就真是一团和气，毫无冲突甚至对抗性冲突？

正如故李慎之老指出的那样，伟大领袖因为建立了“人民内外部矛盾”学说而沾沾自喜，自以为成了理论家，却不知道他连西方大老粗的水平都没有。人民就是人民，没有什么“内外部”之分，全体社会成员都在“人民内部”，享受同等人权，即使是西方古代奴隶社会，奴隶主也没把奴隶看成是只能镇压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若要乱说乱动，坚决镇压！”还设计出无数羞辱毒打他们的“群众专政”手段来，让他们生不如死。

尽管如此，伟大领袖的隧道眼还是例外地看到了点常识范围内的事：矛盾之所以恶化为对抗性冲突，常常是统治者处理不当的结果。在中国，这处理不当就是上面说的那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之道：用变态心理去看待民间一切骚乱，将一切群体事件政治化，不去对矛盾产生具体原因作起码分析，却将它们一律视为颠覆行为，

予以铁腕镇压。如果是社会矛盾引起的骚乱，则那解释必然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若是民族矛盾引起的骚乱，则必然是“境外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分裂主义暴乱”。不管是哪种情形，都永远不会是政府的错，只会是百姓的错，绝无可能是官逼民反，只能永远归咎于“极少数坏人”，并赖到“境外敌对势力”头上去。

这完全是对人类智力的放肆嘲弄。这种弱智笑话，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具有如此广大的消费市场。是人都知道，世上最麻烦的就是民族或种族问题。只要有不同民族或种族存在，就必定会有乱子。英国北爱尔兰的新芬党闹了足足半个世纪，大搞恐怖活动。有次保守党开会，爱尔兰共和军在旅馆里放了个炸弹，几乎连铁婆娘撒切尔都炸死了，那又是哪家“境外敌对势力”煽动起来的？前几年美国洛杉矶因白人警察痛殴黑人，引起大规模种族暴乱，莫非那是俄国克格勃或中国国安部或英国 MI6 或德国盖世太保的杰作？中国人咋那么容易就被外国敌对势力动辄煽动起来涅？莫非中国人是世上第一不爱国的民族？为何就连金盾工程都不能防止他们受境外敌对势力煽惑，迫使他们爱国涅？没有金盾的西方又该怎么过？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教导我们：“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其实是从“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古语化来的，和马克思哲学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仍有相当的道理。

上面已经说过了，任何社会都有官民矛盾，民族或种族矛盾，这毫不足奇。但矛盾之所以恶变为暴力冲突，必然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如果各民族间本来很团结，那么无论境外敌对势力再怎么煽动也没用。如果内部关系本来就很紧张，政府又只有铁腕镇压那一板斧，那么就是再没人煽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量变引起质变”，恶变为暴力冲突。

这和夫妻关系其实并无两样。如果丈夫时时猜疑妻子受外人勾引，处处猜忌提防，一有风吹草动就饱以老拳，那么，这种夫妻关

系绝无可能持久，迟早要以离婚收场。如果无法离婚，那就更糟糕。那妻子的心事，就是咬牙苦挨，等到丈夫某日一病不起时，再把往日受过的苦楚连本带利地找回来。

不幸的是，无论是对汉族还是对少数民族，中国政府扮演的都是这种猜忌丈夫，永远活在对子民的无穷猜疑之中，时时怀疑妻子移情别恋。这结果便是将群体事件政治化，将民族纠纷“分裂化”，但凡汉族闹事，便认定那是想推翻中共统治；但凡少数民族闹事，则一定认定人家是想分家另过。如此拙直呆板的直线头壳，堪称举世无双。

我党蠢到认识不到，这么做，只能从汉族与少数民族两方面同时下手，恶化和激化已有的民族矛盾，促进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我早在八、九年前就警告过我党，所谓“民族主义”宣传乃是饮鸩止渴，不但培养出了百姓的仇外心理，而且哺育出了大批鄙视少数民族的土法西斯分子与种族主义分子，实际上是自讨苦吃，为多民族国家的崩解、乃至崩解后南斯拉夫式种族灭绝做足铺垫功夫。

更严重的是，我党为了文过饰非，拒绝承认民族政策的谬误，将少数民族的骚乱一律解释为“分裂主义暴乱”，就更会煽起已经是害了“爱国狂”的汉族沙文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仇恨。他们不知道，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在实质上与在瓮安、界首等地发生的骚乱也没有什么不同，是社会问题引起来的。少数民族也是弱势群体，与内地普罗大众相比，唯一区别只在于语言障碍使得他们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此，他们不满心态主要是社会财富分割不均引起来的，未必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有什么鸟相干。许多汉族见不及此，却受了政府宣传误导，一致认定闹事者必然是“分裂主义者”，异口同声地谴责那些“卖国贼”，甚至建议政府使出当年王震、张国华等辈的辣手来，以血腥屠杀少数民族谋求祖国统一。这反过来就更加煽起了少数民族的怨恨。这种蠢笨治国之道若不迅速

纠正，则中国将来必然要解体，而我党将以一手搞垮中华帝国的罪人载入史册。

以上所说，不过是世上最浅显不过的道理，胡温若有三分正常智力，就该看出必须彻底走出恐惧，与 paranoia 心态决裂，把所有群体事件都“去政治化”，以平常心视之。无论是内地汉族闹事还是边疆少数民族闹事，都不要动辄上纲上线，要么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要么贴上“分裂主义”标签，而是就事论事，停止包庇官僚集团，认真查找分析引起每次事件的具体原因以及深层的社会弊病，惩办有关渎职官员，并切实纠正致使矛盾积累恶化的社会弊病。这才是正常的治国之道，懂此道的人才配称为国务家，而不是只知操刀的文盲屠户。

2009 年 7 月 15 日

新疆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北爱尔兰

刚才仔细看了王力雄先生就新疆事件答《亚洲周刊》记者问，看到他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已经超过了临界点，再也无法靠小修小补应付了，心里只觉得沉甸甸的。我佩服王先生的洞察力，更深知他对新疆情势的熟悉，相信他这一判断确有依据。

其实只要是长了眼睛和脑袋的人，即使对新疆事务不是那么熟悉如我者，照样也能看出深重的危机来。早在 8、9 年前，我就预感到新疆汉人必将在未来遭受当地维族的屠杀。而这就是我这些年来和层出不穷的土法西斯分子南乡子、安魂曲、RE、余大郎等人在网上打斗的原因——我深怕他们的推波助澜，使得法西斯主义思潮在国内更加浊浪拍天，最后让血淋淋的报应落在边疆汉族头上。

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我先后出过些馊主意。例如我开头主张实行真正的高度民族自治，“改流归土”，反对向边疆移民，但后来我又鉴于新疆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主张向美国学习，以重利诱惑双向移民，实现自愿基础上的民族融合。但此次事件使得我发现这方略根本不可行——实际上，新疆此次事件就是双向移民引出来的：维族移民到内地打工，引出韶关事件，反馈回新疆引出暴乱。而后者之所以轻易发生，离开了大量内地移民抢了维族饭碗引起的怨恨，根本就无从想象。

所以，某种政策设想并不是在表面上无懈可击就能付诸实现，首先必须作周密的流弊预估，而这预估的准确，有赖于对国情民俗的深刻把握。那“双向移民”的馊主意忽略了最大的国情——汉族普遍的病理心态。

这病理心态是什么？那就是普遍的权势崇拜与暴力崇拜（其实两者是一回事），朝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坚定地相信“狼羊律”，认为强者与弱者的关系类似于自然界狼与羊的关系。狼吃羊乃是天经地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 “宇宙运行规律”，你喜欢它是那样，不喜欢也是那样。自然界的羊不会变成狼，人类社会中的弱者也绝无可能转化为强者。因此，强者靠暴力建立并维持的社会秩序，绝无被弱者推翻之虞。

不能不承认，这就是当今大多数国人的坚定信念，几乎可以说成是一种宗教信仰（谁说中国人没信仰？），它成了支配国人对待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不但以此看待国际关系，认定美帝就是那只亡我之心不死的野心狼，而且以此处理社会矛盾，认定强者百般蹂躏社会弱势群体就是应该的。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也当然只会如此。具有这种普遍心态的民族，能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才是咄咄怪事。

如所周知，城里人根本就不拿进城的民工当人看。海外华人归国后，恐怕都曾因亲友粗暴喝斥饭店侍女而感到羞愧。这些人还是所谓“高知”，其势利心态尚且如此，一般人还用说么？要指望他们看得起“老缠头”（汉族对维族的蔑称），不如指望太阳从西边出来还更现实些。

最能说明这种权势崇拜心态的，恐怕还是《上书房内参》新近刊出的批判本人“亡国三段论”的一篇文章。主办那内参的野鸡章京余大郎特地将它高悬导读，意在引起“上书房行走”们注意，及时进呈御览，余大郎在网上公开承认过，他就是用这种办法向“摄政王”上条陈的。

所谓“亡国三段论”，是我 2000 年台海危机中在《多维网》的《大家论坛》与爱国愤青论战时提出来的。我先为“帝国”作了定

义，告诉大家所谓帝国并不一定非有个皇帝不可，指的是“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然后给出了下面这个三段论：

大前提：一切帝国都要崩溃解体，

小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帝国，

结论：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迟早要解体。

并说：“要批驳老芦，就得或者否定我的大前提，或者推翻我的小前提。也就是或证明帝国可以万年不老，或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由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多民族国家。这才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人应该作的事。”

两年后我写《中国需要民族和解》，把这些话拷贝进去。最近因为新疆事件，有人又把那篇拙作重贴出来，某位网人于是加以痛驳，并在文章末尾庄严宣告：芦笛此后可以不必再用这三段论招摇撞骗了。此文被军（野）机章京余大郎视为瑰宝，特地在内参中进呈御览，给“摄政王”打气，告诉他们靠暴力维持的多民族国家一定会万年不老，寿与天齐。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还是暴力。这就是他早给“摄政王”献过的“灭疆独”之计。

那么，那位勇士是怎么驳倒我的“亡国三段论”的？很简单，他说我那演绎法用的大前提是归纳出来的，而归纳法不可靠，以此作演绎的前提得出的结论当然也就未必成立。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他说的一点也不错。然而他迟钝到没有意识到，要说那归纳出来的大前提未必成立，就等于认定“靠暴力建成并维持的国家未必会崩溃解体”，换言之，世上就是能有千年帝国，暴力就是可以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窃以为，这种想法极有代表性，实际上连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例如我党的统治根本就是不可推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看不到崩溃迹象，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以万年不老，寿与天齐。但若是认定世上就是会有千年帝国，暴力是个纲，纲举目张，政权可以

靠果敢屠民永久维持下去，那似乎太违反人类常识了：远的不用说，中国现在的武力再强大，似乎也比不上当年的老大哥吧？苏联帝国而今安在哉？

然而看来许多人就是坚信镇压是万应灵丹，让步反而会引出乱子来，野鸡章京在那内参上就曾高挂过邓力群的讲话，说新疆西藏的问题是胡耀邦做滥好人引出来的。这话其实反映了新疆汉族内心的呼声，我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听到那儿的人说，解决新疆问题需要的只是王震那种好快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连开口“民主”，闭口“人权”的“民主斗士”安魂曲、余大郎等人，也是这种拜刀狂。

如果这种屠夫哲学在一个民族中有相当市场，那这个民族就危险了。如果它竟然成了该民族的共识，则这个民族就不可救药了。可怕的是，这就是今日的国情民俗。这屠夫哲学一以贯之，乃是我党乃至大部分知青（通作“知识分子”，误）对待族内和族外的弱势群体的共同态度。

据《资治通鉴》：

> “国忠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馀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或劝陕郡进士张彖谒国忠，曰：‘见之，富贵立可图。’彖曰：‘君辈依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失所恃乎！’遂隐居嵩山。”

这是说，唐玄宗时代，杨贵妃的弟弟杨国忠作了宰相，气焰熏天，有人劝进士张彖去巴结他，说是富贵立刻能到手。张说：你们以为巴结上了杨右相就跟靠上了泰山一样，我看来不过是靠上了冰山，等到太阳出来，尔等不是要靠空了么？

这就是国人普遍的心态，他们拒绝承认作威作福不可能是永久的，却认定权势不会衰亡，只会与时俱进，蒸蒸日上，中央政府永远是那么强大，绝无衰落之虞。因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用想后事，铁打的江山万年长，是绝不会融化的。

这种假定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问题是既然用这种心态治国，那也就绝无可能实现民族和解了。在强大的镇压力面前，新疆当然不可能独立。但我早告诉“上书房民运”头领、土法西斯分子、野鸡章京余大郎了，芦某无知，还从未听说过世上有哪个独立运动是给灭了的。爱尔兰共和军折腾了半个世纪，北爱尔兰至今尚未独立出去，但那儿的居民这些年来过的也不是什么太平日子。

在我看来，这就是新疆的前途——变成中国的北爱尔兰，一个不时出血的溃疡，汉族居民将永远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当然这预言似乎又犯了本文开头检讨的忘记国情的毛病。汉族天性怯懦，根本就没有白人的胆气。因此北爱打杀了那么多年，当地居民也不曾大规模逃离。但这例子搬到中国来就未必适合了。现在那儿的民族矛盾，无非是我党疯狂掠夺当地资源，维族却无法分到经济繁荣的一杯羹，饭碗又被大量涌来的内地移民夺走引起的。如果骚乱或恐怖事件频频发作，则内地移民迟早要大规模逃离，到时民族矛盾可能会缓解也未可知。

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汉族的这种普遍心态，民族问题根本就没有希望解决，而王力雄企盼的“总体解决”也是空想，他说：

> “……你不能光讲美国模式，而不看到美国模式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民主和对人权的保证。如果个人权利能够得到保证，由具有人权的个人组成的族群当然也会有得到保证的权利，就不一定需要民族区域自治。而在个人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民族的权利怎麽得到保证呢？如果这时再被剥

> 夺掉民族区域自治的保护，便只能受到更多欺凌。所以我说，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中，很难产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权保证的社会体系，才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所在。”

这话每个字都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可惜在中国行不通，盖中国人只知趋附强者，倚冰山如泰山，按权势等级严格划分尊严与机会，根本不知道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谈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有充分人权保证的社会体系”？哪怕奇迹出现，我党还政于民，愿意建立民主国家，这种势利入骨的民族也绝不会知道尊重弱势群体，遑论少数民族那种特殊的弱势群体？

因此，看来唯一符合国情的措施，还是实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把近年来大量涌到那儿去的移民撤回来，省得少数民族备受汉族同心协力的欺侮，迟早要给逼反了。

2009年7月18日

民族问题也是“放狼难题”

一、放狼难题

这典故我在《论晚清改革的失误》中用过，乃是杰弗逊用的比喻。他说，奴隶制问题就如同一个人死死地抓住一只狼，使得它无法吃掉自己，既不敢放开，也无力永久抓住，直到再也撑持不住倒地，被狼吃掉而后快。他以此来说明解决奴隶制问题的两难：放开怕惹出更大的乱子来，不放却又明知抓的是头狼，并非什么好东西。

这倒有点像咱们的成语“骑虎难下” ，但比它更形象地描绘了人的惊恐与尴尬，盖骑虎比较潇洒，没有人狼相持的紧张与体力付出。我在论晚清改革失误那篇文章中误记成了杰斐逊用此比喻说专制制度，不过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咱们的民族问题也就是这放狼难题，所不同者，只在于大家并不认为是在死死抓住或摁住一只恶狼，毫不感到潜在的危险。即使朦胧有此感觉者，也大都认为那狼是永远可以按住的。汉族对民族问题的理解，颇有点像我党对社会矛盾的理解：汉族认为少数民族可以永远被按住，我党认为普罗大众和其他弱势群体可以被永远按住，都是同一种心态。

二、统与独

有人似乎误认为我主张民族独立，不是这么回事。我历来的态度是，国家的版图大小，与草民毫无相干，只涉及君王的虚荣。比、荷、卢那么小，也没见人家羞愧之下去上吊。统独只是手段，人民的福祉安乐才是目的。正因为着眼于此，我才反对“中国解散”，盖那必然引出南斯拉夫式的种族仇杀来，边庭流血成海水，几个世纪都不得安宁。Otherwise，我根本不介意中国分裂成七八十块。

但要维护统一，正确之道是让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珍视祖国的统一，无论怎么吵闹，压根儿就不会起分家另过的念头。这才是“攻心为上”，不是靠捆绑实行洞房花烛。我所有文章都是着眼于此的。汉族作为强势民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中起决定因素的那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一政策是否能成功，因此不能不成为我的疗愚对象，并不是我偏袒少数民族。

实际上我所有的民族文字都是从汉族利益出发的，当然重在双赢，并不是只顾汉族，但毕竟还是难以摆脱出身局限。当初在《罕见奇谈》就曾有位蒙族网友指出我是“汉族本位思维”。人家说的是事实，我不能不哑然，那阵我正被汉族法西斯愤青骂得狗血淋头，当下慨叹汉族的智力真是低下，远不如人家少数民族目光如炬，将我的苦衷看得清清楚楚。这次吴耐又指出这个问题，确实是事实，我无法否认，应该说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影响吧。尽管使用换位思考，毕竟还是有亲疏之别，不可能做到墨家的“兼爱”主义。

三、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没有民族问题？

尊重事实的过来人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时代尽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但没有什么严重的民族矛盾。西藏“叛乱”有如说

是民族冲突，莫如说是宗教冲突：毛教与藏传佛教的冲突。民族矛盾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而且随着经济繁荣越演越烈。

这是什么原因？两条：第一，当局用所谓“民族主义”取代了否定民族只讲“阶级”的马列主义作为国教。第二，经济繁荣激化了民族矛盾。

先看第一条。马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基本教义，就是否认民族矛盾存在，认为民族矛盾不过是阶级矛盾的表现。共产党只认“阶级”，不认“民族”。“民族主义”不是什么好听字眼而是一种罪行，与今日截然相反。因此，无论是在边疆还是在内地，大家都认为少数民族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从不把他们看成是另类。虽然曾出现大规模关闭捣毁清真寺或佛寺，甚至逼迫回民养猪等烂事，但那是宗教冲突而非民族冲突，干这些烂事的并不光是汉人，有大量的本族积极分子参与。实际上，在西藏根本就没有多少汉族，顶多集中在拉萨个别城市中，西藏边远地方的寺庙乃是藏族红卫兵去捣毁的。因此，当地少数民族并不至于把这种罪行视为汉族的欺压。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少数民族并不是白痴，你心里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不说出来人家也知道。当时去边疆的汉族确实没有什么民族界限，真把少数民族当成了自己人。那阵子的人头脑简单，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共同相信一种宗教，认定对方是弟兄，因此自然没有太大的矛盾。

改革开放后马列再不管用了，我党只好捡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那破烂货作国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我早在 9 年前就警告过党中央了，告诉他们这是饮鸩止渴，虽然能唤起汉族对我党政权的认同，但必然促进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人家并不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与什么张衡、祖冲之、唐宗、宋祖、四大发明、万里长城等等毫无鸟相干（万里长城倒与北方游牧民族确实有相干，可惜是负

相干，乃是民族冲突与种族隔离的伟大纪念碑）。而且，民族主义这把火不能随便玩，弄不好就要 backfire，变成自伤自残的种族主义，最终结果是哺育出无数的米洛舍维奇来，将中国制造成前南斯拉夫，为日后国家解体必然发生的民族仇杀做足铺垫。

九年来，我眼看着这警告一步步化为现实，不能不感到锥心刺骨的绝望。

再看第二条。一个统一国家需要国民认同作为黏合剂。过去毛教就是把各民族粘结在一起的黏合剂。改革开放后这黏合剂没有了，政府引入民族主义作为代用品。对汉族而言倒确实起了作用，可对少数民族来说反而成了瓦解团结的腐蚀剂。我党便只能指望靠经济起飞来收买少数民族。

But again，此策对汉族有效，对少数民族只能适得其反。盖人心的满足不是以生活水平的绝对改善，而是以分配是否合理为尺度来衡量的。最重要的幸福指数是，经济繁荣是否能给人一种不断改善自己境遇的盼头。如果繁荣不能满足这两条标准，则必然是越繁荣越不稳定。所谓“发展才是硬道理”乃是隧道眼思维。

汉族地区出现的骚乱，乃是普罗大众弱势集团认为分配不合理引发的，但不管怎么样，多数人特别是精英集团毕竟认为自己的境遇能不断改善，小日子很有盼头，因此大局还能稳得住。

这就是最重要的稳定因素：若大多数人都觉得日子有盼头，他们就会出于自身利益反对“现钟不打打铸钟”，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反过来，若大多数人都觉得没有改善自己境遇的希望，那么这种社会就岌岌乎危哉。经济越繁荣，便越是燃起他们的熊熊怒火。

这不幸就是在新疆发生的事：因为语言障碍，当地少数民族天生处于弱势。即使没有种族隔阂与成见，汉族老板也只会倾向于雇佣没有语言障碍的员工。当地的经济越发达，少数民族的相对失业比例也就越高，从繁荣中分到的好处的比例也就越低，生存空间也

就越小，而这繁荣乃是靠掠夺当地资源实现的，你让人家心里怎么下得去？

这结果便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满洲国”的把戏：当时东北地区是全亚洲工业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区域，然而繁荣的果实完全落在日本人手里。按我党以及许多爱国愤青（含方应看那种“民主愤青”）的思维方式，东北人该为日本人给他们带来的繁荣感激涕零，而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出去，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就更是跟自己过不去了，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发展不是硬道理”呢？

那位愤青说了，你这是偷换概念！满洲和日本并不是一个国家，大英殖民者是入侵非洲国家的帝国主义者，而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错，但问题是，是不是同一个国家，似乎是百姓说了算，并不是政府说了算，也不是某个强势民族说了算。正因为如此，世界上的国家数目才越来越多，不光亚非拉如此，就连欧洲也如此。过去欧洲也就只有几个大国，什么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等，“自古以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而中东那许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人家那可是真正的“自古以来”，不是新疆那种“自清朝以来”，所谓“新疆”就是“新领土”的意思，爱国同志们总不至于连汉字都不懂吧？既然那些国家可以独立，新疆又胡为乎不可？

总而言之，“自古以来”并不是什么万能魔咒，更不是旧式老太太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多念一次国家便稳固一点。要统一的国家不崩解，最根本的还是少数民族自己没有外心，如同汉族一般，压根儿就不想分家过日子。这才是根本的治国之道，而这既不是武力镇压，也不是经济繁荣可以换来的。尽管“犬儒”们无法理解，对许多人来说，这世上就是有比物质幸福更重要的东西，“尊

严”就是其中一条，这就是为何世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好日子不过宁肯分出去。

所以，要让人家不想分家，首先就得把人家当成自己人。问题是中央对新疆和西藏从来就怀着鬼胎，觉得那地方是偷来的，迟早要丢掉，毫无自信，因此处心积虑，处处设防，脑筋全动在如何“灭疆独”、“灭藏独”上去了。而这无形中就把少数民族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处处提防猜忌人家，美其名曰“自治”，却让汉族担任占据所有关键位置，“党天下”之外还加上“族天下”，这还能有什么好事？你当人家是白痴，不知道你的心病？

这心态倒很像毛泽东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毫无安全感，总觉得那政权是窃取来的，慢慢眼就要丢掉，因此瞎猜疑瞎折腾，到处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最后生生把无限忠于他的全国人民都逼反了才了账。

这也是我党在新疆干的烂事，最蠢笨的是所谓“抓大放小”：对任何可能引动他们猜忌之心的正常活动，诸如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人物等等，都要遭受无情打压，对宗教活动百般限制，而对一般的刑事犯罪则从宽处理，甚至就连伊力哈木那样坚决反对疆独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容忍（请参考黄章晋先生的《再见，伊力哈木》），当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了可笑的地步。

铁腕镇压政治犯，宽纵刑事犯，这结果非但没有引来维族的感激，反倒人为制造了民族矛盾，恶化了维汉关系。汉族觉得维族成了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而维族则因正当的宗教活动与学术活动被压制而愤愤不平。我党的心病甚至恶化到了漫画的地步——竟然禁止维族公务人员留胡子！这 TMD 与当年满人入关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到底有何区别？！

更恶劣的是我党近年正不动声色地推行强制同化的措施，使得汉语成了生存的基本前提，企图以此消除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

化认同感（鬼话所谓 identity）。这又是刻意制造民族矛盾的蠢举：汉族只看见维族学生考大学能加分，却看不到此举口惠而实不至：维族如果上的是内地的汉族大学，则在内地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到新疆去。如果上的是当地的民族大学，则汉语不过关，毕业后根本也就没有出路。

目睹身边的经济繁荣而自己没有出路，没有盼头，自然就会刺激出犯罪行为来。维族犯罪行为猖獗，乃是社会弊病的表现，却被汉族认为是该民族的特征，似乎认为人家天生就是堕落种族，对政府宽纵维族犯罪行为更加愤愤不平。反过来，维族的有识之士又为汉人带来的烂污生活方式败坏了他们原有的淳朴生活方式而愤愤不平。记得王力雄的维族朋友曾对他说，西方殖民者给殖民地带去的是先进的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汉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确实如此，汉族只给少数民族地区带去腐败，烂污与钢筋水泥，如同全面彻底毁掉内地的传统家园一般，让民族地区也迅速港台化了。

于是经济繁荣非但没有换来边疆的稳定，反倒成了制造民族分裂的温床。

四、为什么美国没有独立运动？

美国当然有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但这种冲突从未发展为独立运动。相反，如果谁敢建议将某个州划为黑人州，请所有的黑人搬到那儿去住，只怕立即就要成为众矢之的，就此身败名裂。

美国之所以没有独立运动，是因为黑人再怎么闹，仍然认定美国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有权享受与白人同等的一切权利。这当然与美国是个移民国家，除了印第安人外谁也不能自称美国自古以来是他们的领土有关，但最根本的我看还是几条：第一、黑人和其他少

数民族确实与白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尊严与成功机会，奥巴马当选总统就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第二，种族歧视在国民心目中臭不可闻，个别人即使有种族偏见也只敢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否则立即身败名裂。不论长的面孔是白是黄是黑，是人就享有同等尊严。第三，民主社会具有海纳百川的多元宽容精神。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乃是神圣人权，政府或他人无权干涉。无论是黑人去欧洲寻根，还是黄人祭祖，从来不会被当成罪行被政府抓起来。

这些条件在中国一条都不具备。少数民族莫说当总统，当“自治区”一把手也绝无指望，永远只能做“统战花瓶”。最可怕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即使刨除社会制度的因素，中国人的心态普遍严重失常也使得中国绝对无望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和解，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统一。

这第一个心态失常乃是中国政府有意煽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哺育出了无数土法西斯分子，培养出了他们虚幻的种族优越感，使得这些烂仔比当年的大英殖民者还傲慢，比南非前白人政权还猖狂，不是如“北京痞子”那样自居恩公，以为离开汉族的援助，西藏人就得活活饿死，就是如方应看那样侮辱维族“文化水平低，野蛮好斗”，“杀人放火贩毒在行，正经经商的少”，“不思进取，游手好闲”等等。

第二个心态失常便是信奉“狼羊律”，倚冰山如泰山，认定武力镇压是解决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唯一手段。若迷和方应看在《自由中国论坛》的辩论比什么都说明问题：那位据说是相信“人权高于主权”的“民主斗士”，在对待少数民族时立即就变成“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者，宣称资源是国家的，不是人民的。维族毫无人权可言，更没有民族自治权与自决权，只该“杀怕他们”。

在中国人手上，“民主”竟然能变成法西斯主义，西方人大概要闻此骇而却走，然而我早就见惯不惊了。这些年来在网上遇到的“民主斗士”诸如安魂曲、余大郎等辈，卖的无一不是这种货色。不难想见，中国要真是成了民主国家，那绝对也只会步南斯拉夫后尘，而安魂曲、余大郎、方应看就是那个“民主国家”的米洛舍维奇总统。

这就决定了民族问题乃至疆独藏独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乃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这简单道理哪怕是“民主”浑人如安、余、方辈也能明白：这世上并不是只有金钱才是珍贵的，如果我是维族，看了诸位的教导，哪怕是让乡土糜烂、血流成河，我也要一息尚存便为本民族求解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死前还要告诉子孙后代继承我的遗愿，世世代代奋斗下去，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本民族能享受起码人类尊严的国家来。

老实说，当我看到伊力哈木郑重其事地对黄章晋分辩：“我们维吾尔人一点不笨”，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少数民族竟然落魄到了必须为本族人智力自辩的地步，这种国家还能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希望？！

所以，看来在中国，民族问题将永远无望解决，少数民族就是让政府乃至汉族死死摁住的恶狼，直到力竭倒地那天为止。这大概是各派都能同意的事实吧？分歧只在于那狼是否能永远被摁住。“民主”法西斯分子安魂曲、余大郎、方应看的滑稽，只在于他们认为政府不能永远摁住汉族弱势群体那只狼，却能永远摁住少数民族那只狼。

当然他们可能也有道理，毕竟，汉族别的本事没有，能生，人口有 13 亿之多，比较难按些，而少数民族人少。如果汉族同心协力把少数民族杀光了，问题不也就不存在了么？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名言：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幸亏这些同志的言传身

教，我才得知民主原来是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发明的杀人理论。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2009 年 7 月 19 日

沈崇案与新疆七五事件

沈崇案老帮菜应该都听说过，记得当年高中语文课中学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注解就讲过，把《维基百科》的有关介绍拷贝在此：

> 1946 年 12 月 24 日平安夜，北京大学先修班法文组女学生生沈崇往东长安街的平安影戏院看完电影的回家途中，在北平东单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绑架到东单广场强奸，被北平工人孟昭杰目睹，跑到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案，主犯当场被逮获。翌日，北平亚光通讯社发表新闻：“本市讯：某大学某姓女生，年十九岁，昨晚九时，赴平安戏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时，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迄行至东单操场，即对该女施以非礼，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某行路人闻之，急至内七分区一段报告，由警士闻德俊电知中美警察宪兵联络处，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军已逃去其一，当即将另一美兵带走，某女生被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验后，转送警局办理。”
>
> 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进而掀起“反政府”，“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运动。
>
> 皮尔逊被美国在华军事法庭判刑。但回美国后，经审讯，被无罪释放。

无论古今中外，所谓“军队”的另一定义是：“性饥饿患者的集合体”。如所周知，和俄国人在东北一样，老美在日本、越南都留下大批的“二毛子”。但两者有本质不同：俄国人是强奸，老美是合奸。苏联红军走到哪儿强奸到哪儿，整个是支强奸犯大军。德国有几百万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有的村镇全体女性被强奸后集体投河自杀，连西德前总理科尔夫人都是受害者。而美军驻在中国好多年， 强奸案也就只有沈崇案一例。这在世界远征军史上，应该算是奇迹了。

我的老家也出过“未遂沈崇案”。这事是我听先母讲的。

所谓“老家”也者，并不是我的出生地，不过中国人讲究莫名其妙的“籍贯”，因此那地方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老家。那阵子我老家驻了美国军队。我有个亲戚（弄不清楚是什么亲戚，那镇子是几家老祖宗传下来的后代，因此所有的人都是亲戚） 思想比较前卫，英语说得不错，于是便与陈香梅一样，和老美的一个小白脸军官好上了（据说那军官长得斯文秀气，戴着眼镜），成了当时所谓“吉普女郎”。

所谓“吉普女郎”乃是当时国人的眼中钉，国耻的象征。当时美军机械化程度很高，吉普乃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既可用于战争，当然也可用于谈恋爱或是嫖妓。吉普自然也就成了运载未婚妻或是妓女的载体，而这就犯了国人的大忌讳：韦春芳已经教导过抚远大将军韦公讳小宝了：她什么客都接，连西藏喇嘛都没问题，盖那是同胞，但老毛子若要来嫖她，则“老娘要用大扫帚把他赶出去”。

此乃中国人爱国情操的实质，它约等于女人的贞操，“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就再明白不过地揭示了这一点。但它似乎又大于女人的贞操：妓女本无贞操可言，但同样必须有爱国情操——她必须将主顾严格控制于国人。张爱玲说“女人征服男人通过食

道，男人征服女人通过阴道”，似乎还可以补充一句“中国人爱国即捍卫女人的阴道”。中国男人最无法容忍的，便是女人让异族的男人睡了，哪怕是人尽可夫的妓女都不行。这就是中式国耻。从这似乎可以推出“中国爱国者相当于中国女性的处女膜”的结论，然而却又不是这么回事。若真是如此，则鬼子先得“破处”——杀了中国男人才能睡中国女人，可惜咱们却是反过来：杀了中国的女人让鬼子没法睡。神州大地当年无数的贞节牌坊就是这伟大战略的见证。这可谓釜底抽薪之计，谁说中国人不聪明？

我那位老乡兼亲戚可不是妓女，而是知书识礼的淑女，虽非大家闺秀，堪称小家碧玉。不幸的是，她爱上了异族小白脸。这就犯了双重忌讳，盖我那老家虽是夜郎国，却自命“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深受孔教熏陶，所以孔教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整合在我的基因中了。为现代青皮大儒们丝毫不知的是，孔教的集体实践，便是用圣人的教导去监视邻居，形成一种暴民专制的恐怖气氛。自由恋爱乃是第一大忌讳。

听先母说，民初那阵子，那地方的暴民专制还猖獗到这地步：若有哪个妇人出嫁前被卫道士们怀疑不守妇道，则她在出嫁时，花轿游行全镇的途中，义士们就要挺身而出，在花轿上贴上白头条子，揭发她的罪行。不用说，无论是男方家还是女方家，都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常常以新妇自杀告终，于是好事未成却变成了丧事。我还在旧作中介绍过敝族一位寡妇生子被族人群殴致死的惨事。这都是东海青皮大儒之辈闻所未闻的孔教的千年伟业（此处的“业”也就是佛家的“孽”）。

我那位亲戚或同乡既然作了“吉普女郎”，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阵当然不是民初了，可那小地方照样还在孔孟程朱的统治下，更何况她爱上的还是个金毛鬼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

某晚她与那金毛白脸开车到湖滨谈恋爱时，便被早已义愤填膺的族人跟踪前去，抓个正着。

所幸他俩只是坐在湖边看着水聊天，什么都没干，衣服完整，甚至没有肢体接触，只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开展革命谈心活动。虽说是“捉奸捉双”捉到了双，不幸却没有捉到奸。但族人哪会管你奸不奸，先臭打一顿再说。那金毛小白脸给打得不成模样，那女的也给打得够呛。好在彼时毕竟不是清朝年间了，不可能再将那对狗男女沉塘。最后还是让那鬼子挣扎着回去了，从此知道中国女人的阴道可不是那么好问津的。

他走了倒好，却害得那位淑女成了“破鞋”，从此身败名裂，最后嫁了个找不到媳妇儿的大老粗。倒是行凶的族人们屁事没有，鬼子也没来问罪，打了也就打了。若是摊到鸦片战争辰光，遇上的是英国鬼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结的了。

其实我老家的人对老美印象极好。听大人说，当地小孩见到老美，便伸出大拇指嚷道：“老美顶好！”老美便满面笑容，竖起大拇哥来回答：“顶好！”接着便掏出糖果来散发（那大概是少爷兵们的军粮吧）。据说老美会讲的中国话就一句“顶好”，与国人交流的方式便是竖起大拇哥来说“顶好”，大概他们以为那相当于“OK”。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彼此的交流方式。中国人原无竖大拇指夸人的传统，我怀疑那是老美传入中国的。

记得流沙河先生曾写过篇夸老美的文字，这与我从长辈那儿听来的完全一致。在我少年时代，老美留下来的物资还比比皆是：美国军毯、“克林奶粉”、铝合金制的汽油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此类东西。不仅如此，我看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当时他们的司令部就设在中国大城市里，但老美投鼠忌器，从来不去轰炸，生怕炸死了

无辜的中国百姓，毁了盟国的建筑。正因为此，日本人才在战争后期把工厂搬迁到东北去。

饶是如此，爱国者们仍然不许老美和中国女人来往。难怪沈崇案会引起全国的反美热潮。当然，我老家发生的那“案子”跟沈崇案不同：人家是正儿八经“谈”恋爱，重在言论而无行动，并没有发生肢体接触。然而革命群众就连这都不能容忍，何况是强奸了沈崇的美国大兵？然而奇怪的是，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了那么多良家妇女，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何以又忍气吞声？除了汉奸党的有意压制外，这是否还反映了国人的势利？沈崇是北大学生，而在东北被苏联兽军蹂躏的千百万中国妇女绝大多数不过是 faceless 的农家妇女们。人与人之不同，于兹可见一斑。

“沈崇案”直到 80 年代末期还在中国的南京大规模地发作过。那阵子我已经出国。忽一日，某鬼佬朋友问我：中国为何有那么多种族主义者？接着便递过一张报纸来。那上面有张照片，拍的是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强烈抗议“黑鬼”强奸中国妇女，高举着写得四六不通的英文标语牌，“Nigger”赫然在目。我再看文字报道，说那些学生示威，乃是因为某些女同胞竟然为钱抛弃了“民族气节”，堕落到向老黑卖淫或是嫁给他们，云云。

我看了后只觉得脸上发烧，知道那报道说的绝对是事实，盖我深知国人对黑人的种族偏见。如果不出国，惨遭鬼子洗脑，我自己就是个种族主义分子，从心底里看不起黑人，觉得他们是进化不完全的亚人类。不难想象，如果我留在国内，听到国女和“黑鬼”同居，或甚至是嫁给他们，肯定也要义愤填膺。这就是我在政治幻想小说《当中国取代美国成了世界的龙头老大》中捏造南京出租车司机打死携带妓女“陈一姬”（“一鸡”）的非洲黑人的由来。

从 40 年代北平的沈崇案，到 80 年代南京大学生的“抗暴示威”，反映了时代给中国人带来的“观念进步”。80 年代崇洋媚外

乃是全民风尚，国女嫁给白种人已经不再是耻辱，而是至高无上的光荣，爱国者们捍卫阴道的圣战对象也发生了战略转移，只限于“劣等民族”了。虽然范围作了修改，但激情不减。“劣等种族”睡了高等的中国女人，仍然是煽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最有效的导火索。

使得两名维族丧生、多名维族受伤的韶关事件，不就是“维族强奸妇女”的谣传煽动起来的么？如今官方已经辟谣，说没有那回事，可爱国者们还不依不饶，铁嘴钢牙咬定官方撒谎，包庇维族犯罪分子。不知道这些同志哪来的那股子底气：强奸不强奸，请问您是从哪儿知道的？就算真是强奸犯罪吧，那也只能通过司法机构调查处理，岂能构成大规模武力犯罪的理由？

这虚构的“强奸犯罪”不但触发了韶关事件，还引出了新疆的七五事件：韶关事件的消息通过网络传回新疆去，自然要为本已极度紧张的民族关系火上加油，最终酿成悲剧。而事件发生后，汉族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在公众论坛上弘扬自家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宗教歧视意识，全然意识不到那才是真正的祸根。

说到底，中国人的最大毛病，是它是一个本质上极度势利、欺软怕硬的民族，骨子里就一个“贱”字。过去认定白人是劣等种族，所以白人若睡了国女，无论是双方情愿与否，都是最大的国耻，比火烧圆明园还严重万倍。但即使如此，也是“择弱而欺之”，专拣软柿子捏。不敢去向强奸了成千上万中国妇女的苏联红军问罪，却向平等待我、恩重如山的世代友邦美国汹汹问罪。对强奸了成千上万中国妇女的日本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却因为黑人娶了或嫖了国女而上街游行示威。不敢去与本族的强奸犯和势力空前庞大的黑社会较量，却有本事为“维族强奸妇女”的道听途说实行大规模群体犯罪。这种欺软怕硬的爱国情操，适足给真正有点知耻心、自爱心的国人丢脸。我看还是趁早收起来为好。

2009 年 7 月 25 日初稿

2010 年 8 月 14 日修改